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

区域经济评论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2年第2期,总第56期)

双月刊

学术顾问 范恒山 程必定 洪银兴

编委会主任 金 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一鸣 王承哲 史育龙 宁越敏

阮金泉 任晓莉 安虎森 孙久文 李同新

李国平 李海舰 李曦辉 杨开忠 杨继瑞

肖金成 谷建全 张可云 张占仓 张世贤

张军扩 张其仔 陈 耀 金 碚 周金堂

赵 弘 郝寿义 贺灿飞 秦尊文 高国力

崔民选 覃成林 喻新安 魏后凯

主 编 任晓莉 陈 耀

社 长 任晓莉

副 社 长 刘昱洋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评论

(双月刊)

笔谈

5 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

刘应杰 陈 耀 李曦辉 王智勇 邓仲良 田惠敏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16 中国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分析

覃成林 韩美洁

23 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探索

孙久文 胡俊彦

28 东北振兴的中国经济学视角及其产业选择

冯彦明

区域高质量发展

33 区域高质量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

贺灿飞 李 伟

43 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动态演进分析

付 媛 郭 晨 任保平

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

51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

彭俊杰

60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评估与“双碳”政策探讨

陈绍晴 吴俊良

67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吴朝霞 张 思

城市经济研究

74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瓶颈与经验借鉴

曹 静 冉净斐

81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现实价值与提升策略

张绍乐

88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空间分异及演进

李彦军 马 港 宋舒雅

97 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刘一丝

104 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思路与对策

郑州师范学院课题组

区域创新发展

112 新发展格局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路径研究

胡艳 张安伟

120 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孙锦礼 陈悦

区域协调发展

128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困境与推进

吴碧波 任文

133 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障碍与突破

高昕

141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常露露

147 高水平开放助力后发展地区“四化”同步的思考

戴翔 申代润莹 占丽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153 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综述

颜银根 冀宇星 张森

157 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李曦辉 陈温都苏 杨新文

主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
地址 郑州市丰产路21号
邮编 450002
电话/传真 0371-63690786
投稿邮箱 qyjpl@163.com
网址 www.qyjpl.cn

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登记证 金市监广发变登字【2020】021号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郑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6-44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5690
刊号 ISSN2095-5766 CN41-1425/F
定价 16元

<http://qyjpl.cbpt.cnki.net/>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2.2 *Bimonthly*

- Study on the Multipolar–Network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 *Qin Chenglin Han Meijie*(16)
-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Sun Jiuwen Hu Junyan*(23)
-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Choice of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conomics
..... *Feng Yanming*(28)
-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He Canfei Li Wei*(33)
- Measurement and Dynamic Evolution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E–commerce
..... *Fu Yuan Guo Chen Ren Bao–ping*(43)
-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Peng Junjie*(51)
- Assessment of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 and Discussion on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Polic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Chen Shaoqing Wu Junliang*(60)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Green Finance Supporting Low Carbon Economy
..... *Wu Zhaoxia Zhang Si*(67)
- The Bottleneck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Cities in China and Reference Experience
..... *Cao Jing Ran Jingfei*(74)
- Practical Value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Metropolitan Area Construction in Central Region
..... *Zhang Shaole*(81)
-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Mid–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 *Li Yanjun Ma Gang Song Shuya*(88)
- The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 *Liu Yisi*(97)
-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Zhengzhou
..... *Research Group of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104)
-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Huyan Zhang Anwei*(112)
-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Finance Ecology on the Incubation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 *Sun Jinli Chen Yue*(120)
-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Wu Bibo Ren Wen*(128)
- Obstacl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in Late Developing Areas
..... *Gao xin*(133)
- Path Selection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 *Chang Lulu*(141)
-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with High–Level Opening Up
..... *Dai Xiang Shen Dairunying Zhan Li*(147)
- The Review of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2021
..... *Yan Yingen Ji Yuxing Zhang Sen*(153)
-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Li Xihui Chen Wendusu Yang Xinwen*(157)
-

【笔谈】

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

编者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实现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共性问题。现阶段,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但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为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更加注重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在实现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格局基础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于此,本刊特邀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发表真知灼见,以期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所启迪和借鉴。

关键词:共同富裕;区域平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05-11 **收稿日期:**2022-01-19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六大重点

刘应杰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制定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更加积极有为地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为鼓励、支持实践探索和引领示范,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浙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始向着富裕社会迈进。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达到10500美

元,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十四五”时期是关键的一年,这期间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535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计中国到2022年年底可以达到这一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正呈现出梯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格局。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期间,全球将有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4.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7%,相当于美国的70%以上。根据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人均GDP方面与美国还存在很大差距。截至目前,美国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6倍,因而中

国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隐含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都将再翻一番以上,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当然,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地方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以上,如北京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8万美元,上海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万美元,苏州、无锡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6万美元,南京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4万美元,杭州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2万美元,深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3万美元。以县级市为例,江苏昆山、张家港、江阴等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超过3万美元;—些设市的区则更高,如北京西城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4万美元,深圳南山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美元,杭州滨江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万美元。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区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会有先有后,有条件的地区应该发挥自身优势率先发展,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国家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因为浙江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浙江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4位,2020年,浙江的地区生产总值为64613亿元,按当年的平均汇率计算约为9368亿美元,接近排名世界第16位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总量;浙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万美元,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水平。与此同时,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小于全国,人民富裕程度居全国前列。2020年,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远低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2.56:1的差距;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699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居全国第3位,在全国各省区排名第1位;浙江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1930元,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2位,在全国各省区排名第1位。这些年,浙江—些市县发展势头良好,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智慧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此外,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带动了千家万户的勤劳致富,造就了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相结合,成为浙江发展的—个新的重要特点,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丰富内涵。

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要在实践探索中先行先试,创造和积累成功经验,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中国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发展。具体来讲,中国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以下六大重点。

第一,全面建设富裕社会。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富裕。浙江的“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浙江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3万元,即达到2万美元以上。到那个时候,浙江将全面达到富裕水平。这其中还有—个重要指标,就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联合国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40%,属于相对富裕;恩格尔系数在20%—30%,属于富足水平。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19年已经下降到28.2%,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略有上升,达到30.2%,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7%。未来,全国将会向着30%以下持续迈进,浙江则会进一步向着25%以下迈进。

第二,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结构。从社会贫富差距来看,传统贫富差距大的社会—般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贫困和低收入人数多,越往上人数越少,富人站在塔尖。而现代富裕社会则是“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而两头低收入穷人和高收入富人都相对较少,这是相对比较公平富裕、更加稳定的社会结构。浙江提出,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超过5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生产总值之比持续提高。

第三,加快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未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显著扩大,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这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项重要任务。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标准?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的为中等收入群体,每人每月收入在2800元—1.4万元;如果夫妻双职工带—个子女,那么夫妻二人

月工资收入应该在4200元—2万元。现阶段,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5亿人。浙江提出,到2025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为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为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第四,着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浙江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到1.9以内。二是居民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一般用五等分划分收入差距,特别是用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分别所占比重来衡量,差距越小则共同富裕程度越高。浙江提出,到2025年,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水平明显提升,努力成为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省域范例。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就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不断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鼓励高收入人

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再分配的手段,建设制度化的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第六,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中国全面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之后,还要继续坚持不懈地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保障和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综合性的大政策,涉及加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包括生育、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低保、救助等各个方面,努力为所有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此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示范样本,需要有一套标准,包括指标体系。这应该是高于全国的标准,是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的标准,是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可比性和操作性的标准。尤其是在涉及人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需要研究制定科学的量化指标。共同富裕寄托着全体人民的美好希望和梦想,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一项把希望和梦想变为现实的伟大实践。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懈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作者简介:刘应杰,男,国务院研究室专题调研组组长,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017)。

提升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陈耀

从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

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可以从“条条”(部门间、个体间)和“块块”(区域间、城乡间)两个维度来发力,在这其中,解决好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和方向。

观点一:平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条件和要求。

第一,共同富裕是区域城乡普遍的繁荣。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全体人民都要富裕起来,而全体人民居住在国家的各个区域、城市和乡村。进一步地说,不同地区不同城乡的居民富裕程度与其生活所在地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般来讲,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较高,生活普遍富裕;而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富裕程度也较低。因此,共同富裕不仅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表现为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是区域的普遍繁荣,而不是个别地区或少数地区的局部繁荣,也不是只有城市的繁荣。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学术界曾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即区域政策究竟是要追求区域繁荣(Regional Prosperity)抑或是人的繁荣(People's Prosperity,这里译为“人的福祉”更贴切)?如果是前者,不管这个区域的条件多差,都要加大投入让其发展起来,一些学者批评这种追求区域繁荣的政策为地理僵化;而如果是后者,就可以把人口从条件差的区域迁移出来,鼓励失业者向就业机会多的地方流动,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今天来看这场讨论仍有积极的一面,也就是政策要更多地聚焦到“人”上,但是仍然不能否认区域繁荣对人类福祉的基础作用,特别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大国,除极少数不适宜生存的地区可以实施“生态移民”外,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地区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福祉,而不能任其衰落。当然,区域城乡普遍的繁荣也不是没有差异的繁荣,任何时候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都会存在一定差异,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尽可能地缩小区域城乡的发展差距,并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

第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抑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变化看,绝对差距在扩大,相对差距在缩小,横向差距仍然较大。2000—201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23元,提高到高于全国23480元;中部地区人均GDP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17元,扩大到低于全国12164元;西

部地区人均GDP从低于全国3268元,扩大到低于全国17150元;东北地区人均GDP从高于全国1187元,转向到低于全国24338元。然而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例,2000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0.76%,到2019年提高到56.95%。再看极值差,2000年,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上海)是最低地区(贵州)的12.4倍,到2019年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北京)是最低地区(甘肃)的4.9倍。现阶段,尽管国内相对差距缩小,但地区差距仍然比较大,如极值差一般在2倍左右。二是从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变化看,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领先,相对较低的是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增幅最低,这与人均GDP水平的分布及变化高度相似。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板块极差,由2000年的2933元增加到2020年的19712元,增幅达到572%。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东北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为3462元,仅次于东部地区的5440元,并远高于中部地区的2790元和西部地区的2507元;到2020年,东北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为27797元,远低于东部地区的44746元,与中部地区27234元和西部地区25035元的收入水平接近。再看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板块极差由2000年的3072元增加到2020年的18140元,增幅为490%,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板块极差由2000年的2175元增加到2020年的16562元,增幅为661%。这说明,近20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扩大幅度要高于城镇和整体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决定着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直接影响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观点二:科学运用区域政策推动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第一,推动区域共同发展,强化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做好,而这这就要求各地区都能够获得有效的高质量的发展。对此,要支持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做大做强,尤其是实施好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

大战略,充分发挥其要素集聚、创新引领和辐射带动的强大引擎力量,提升国家整体效率和总财富创造能力。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通过引导产业转移、重大项目布局和系列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欠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和陆地边境等地区,避免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无限扩大。

第二,规范纵横向转移支付,充实共同富裕的再分配手段。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需要合理地切分“蛋糕”,从区域层面看,转移支付是国际通行的“分蛋糕”即区域再分配手段,但国际上大多采用的是中央政府通过对发达地区征收税赋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纵向转移支付,几乎没有发达地区直接向不发达地区提供财力的横向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的各种类型区域需要根据因素法或承担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等功能,合理规范地实施中央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逐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与此同时,要用好“对口援助”这个横向转移支付工具。事实上,中国的对口支援或对口帮扶,不仅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或重灾区的财力支持,还包括基础建设、产业扶持和干部交流。对口援助是中国的制度优势,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将援助地区和受援地区的责任义务规范化,避免滥用,特别是要防止对援助地区造成过大的负担和压力。此外,要科学运用对口援助的方式

方法,善用“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以免产生受援地区的“等靠要”或“养懒汉”后果。

第三,探索多重利益共享,打造共同富裕的区际协调机制。倡导各地区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实行地区利益共享,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促进地区关系协调,避免地区冲突,推动各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因此,要在涉及地区利益的多重领域,如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生态保护、财税政策等领域,积极探索地区合作的利益共享模式。其中,决定地区利益最核心的是产业发展,目前正在推进实施的产业转出区与产业转入区之间的“税收分成”,就是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有益探索,能够有效消除产业向外转移对转出区财税和就业的负面影响,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使得这项有利于产业转移和承接的经济合作方式能够顺利推进。此外,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要实行跨区域(流域)联防联控和共保共治,必须把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起来,真正落地做实,让那些对生态治理和保护付出多、牺牲多的地区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

作者简介:陈耀,男,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6)。

共同富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

李曦辉

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同富裕只是这一社会发展的前奏,并且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有这

一切,都指向全体人民,都需要以地区经济发展作为支撑,没有地区经济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得出了有益的经验,也积累了深刻的教训,成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财富。

阶段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内向型均衡发展带来了水平不高的共同富裕。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的经济极不平衡,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农

业时代的特征,只有很少的工业经济成分,且分布不均衡,主要布局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当时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此,新中国建立后就一直注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区域的平衡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布局,沿海工业大量向内陆地区转移,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绝大多数建在了内陆地区,1/4左右建在了西部地区,初步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由于平衡布局指导思想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都得到了实质性地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战备需要,中国的工业布局要向偏远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转移,而少数民族地区恰好具备上述条件,于是,大批的工业向少数民族地区转移,虽然后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证明“三线建设”的生产布局是不完全正确的,并加以了纠正,但这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的工业基础与工业体系,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由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现了趋同化倾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拉平,人们对不平衡的主观感受开始变淡,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差异。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平衡发展是封闭式的,与国际的同类产业缺乏竞争,导致中国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与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存在很大的差距,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和共同富裕的低层次。

阶段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人民群众收入增长和差距扩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这段时间,《决议》总结到:“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主要是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进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设计,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陆地区发展。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当时中国的发展选择了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揭开了中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建设特区的序幕。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区域非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让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率先发展了起来,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第二位。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根本性改变,从追求温饱阶段发展到了全面实现小康阶段。这样的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家也十分赞赏这种发展模式,然而,由于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中国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差距,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高速发展为主要追求目标的发展模式,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急需加以改进和完善。

阶段三:党的十九大以来均衡协调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提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既有国际国内矛盾,也有地区间、人群间的问题,成为了困扰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构成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国家先后

实施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带一路”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求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农业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会低于工业,鉴于农业的要素禀赋特征,其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体现为生产要素赋存好的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就高;反之则发展程度低,影响不同地域农民的共同富裕。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出台了精准扶贫政策,解决了数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和小康问题,为了巩固扶贫成果,国家又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保证贫困农民小康目标的实现。为了解决国内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国家实施了对口支援政策,中央要求发达地区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出发,无偿向欠发达地区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全方位支援,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中国为了带动周边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求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措施,其核心目标都是一个,就是追求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且各类措施的特征表现是一致的,就是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新时代,只有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才能带来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也只有共同富裕目标的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044)。

以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均衡发展

王智勇

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6%,同期中国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在随后的2020年和2021年,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中国的人均GDP仍旧稳定保持在一万美元之上,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2万美元。然而,中国区域之间存在悬殊的差距,以省为单位计算,2019年,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是北京,其人均GDP为23085.18美元;最低的地区是甘肃,其人均GDP为4782.86美元,两者相差近5倍。这种差距,也正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重要体现。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到中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的均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发展不协调是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

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而言,城镇化和工业化是重要的保障。城镇化不仅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劳动力的这种转移本身就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城镇化能够有效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城镇化对于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劳动力进城能够获得远高于农业耕作的收入,这些人把劳动所得带回农村,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农户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约束农业耕作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更能够激发各类消费需求,促进相关生产地进一步扩张。通俗地说,当农村居民能够获得与城镇居民

基本相当的就业权利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趋于缩小。而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比也趋于下降,这也证实了城镇化确实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镇化也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从区域层面上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为悬殊,但在城市层面,这种差距就小的多。例如,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相比,发展差距就并不十分明显。因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仅靠城镇化并不足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城镇化需要与产业发展,特别是与工业化一起共同作用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从而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工业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一个重要就业渠道,而且工业部门往往提供大规模的就业,使劳动力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能够获得稳定收入时,经济发展也就更容易趋于均衡。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在产业发展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规模化和一体化的产业形态,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不仅具有大规模吸纳就业的能力,更能够通过竞争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相反,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产业集聚,致使这些地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等方面也相应地落后于东部地区,从而形成了地区发展差距。此外,工业化应采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发

展单一产业的模式来实现。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不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密切的分工与合作,需要有上下游产业的配合,产业发展往往形成了链条式的一体化产业形态,对就业形成持续稳定的需求,因而能够吸引人口流入,并通过激烈的竞争,促进技术创新的应用,实现产业扩张和产业升级,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相对较快,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也会有较快提升,这也为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镇化和工业化应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工业化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动因,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重要保障。因此,对于一个地区而言,要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保持协调关系,即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应保持基本的同步性,共同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当前,促进中国区域的均衡发展,要着重促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包括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良好互动机制的形成,是保证这些地区尽快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基石。此外,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从而更好地保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确保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作者简介:王智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邓仲良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共性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统筹好城乡区域发展和人的发展,在构建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等重要论述的

基础上,本着以人为核心的重点,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将以人为核心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如何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党中央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协

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共同富裕则是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人既是劳动力供给和创新的主体,也是消费者,统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中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农村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就业,不仅增加了流入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规模,而且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形成稳定的新城市居民,有利于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累积,进而提高自身劳动技能和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而且也夯实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人民的收入问题是影响流动迁移决策和实现富裕的基本指标。共同富裕要求“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和“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其本质在于形成劳动者就业机会公平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的经济格局下,为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更关注如何实现就业机会的空间均衡化。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测算来看,2011—2017年,80%的外出流动人口从事务工和经商,这表明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就是追寻更高的就业收入回报,因此应立足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比较优势,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流动人口为载体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推动乡村和中小城市融入周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产业体系和市场范围,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降低人口流动失衡引起的区域衰退。此外,区域协调发展要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这表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仍然在农村,应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覆盖,逐步弥合城乡制度和发展差异。二是外出就业流动人口规模仍较大,尽管户籍分割、城市落户门槛逐步降低,但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部分缺失,外地流动人口无法全部享受流入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流动人口中对随迁小孩和老人的照料需求还较高,应尽快探索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强化户籍制度登记功能,逐步将居住证和户籍合二为一,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第二,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新

发展格局下统筹区域发展和人口发展尤为重要。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在尊重人自身意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市居民比重和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同时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升以城市、农村为空间载体的经济活动效率,这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具有相同的制度基础,目前亟待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促进城乡制度改革联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近3.76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04%,这表明未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显著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对城镇化阶段判定而言,从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2020年,中国常住城镇化率为63.89%,还位于城市化率曲线(Northam曲线)的“加速阶段”,距“第二拐点”(70%)仍有增长空间,但中国特有的城乡制度差异使得城乡要素市场存在二元分割,这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变缓,也进一步制约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从常住城镇化率和户籍城镇化率的差距来看,2020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5.4%,远低于常住城镇化率,这表明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并未有效、稳定地融入流入地,外出农村居民人口的长期“人一地”分离不仅造成流出地农村地区发展滞后,而且也无法使城市发展获得持续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应以流动人口作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加快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人一地”匹配的城市户籍改革路径,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人一地”落户收益与居住地公共服务获得相协调,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切实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深化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农村经营建设用地融入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允许人口净流出地区的长期荒置宅基地、集体经营用地重新转换为生态和农业用地。

作者简介:邓仲良,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岗位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促进人口流动与城乡要素一体化协调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21BJL090)。

以区域协调三大目标为导向促进共同富裕

田惠敏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提出中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新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就要以目标为导向,着力破解难点和短板问题,保障不同地区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

第一,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为共同富裕筑底强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

具体而言,一是要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做好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衔接。按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重点围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事关民生的重点领域,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以标准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权责关系、创新治理方式,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二是要引导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首先,推进土地和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资本跨区域流动渠道,提高资本利用效益。其次,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最后,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技术转化和产业化。三是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引导公共服务资源向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倾斜。首先,加大公共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和社会困难群体的倾斜力度。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健全覆盖城乡的教育资助帮扶体系;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条件,提升贫困地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给付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扩大医疗保

险报销范围等。其次,引导公共服务资源向广大农村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最后,健全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边疆地区等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第二,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均衡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产业。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均衡发展,是打通民生内生动力的基础,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通过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均衡发展落实区域协调发展、保障不同地区的发展机会。

具体而言,一是统筹各区域基础设施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一方面,统筹点线面网、城市农村、东中西部地区、沿海内地地区、国内与国际等方面,做好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衔接。既要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又要补齐短板,提升发展质量效益,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重提高基础设施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更好地发挥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后发地区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努力改善当地的开放环境、城镇建设、人口素质等,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推动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快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动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首先,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建设西部地区内外大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加快补齐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货运铁路、公路、机场、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其次,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清洁能源为主的电力外送大通道,提高电网智能化水平,加快西气东输、北煤南运等大通道建设。最后,推动农村电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电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发展生物质能源。对高原、边疆、山区的无电区,要结合通信网络建设,实现电力和信息通信的双连通。三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区域“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能够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并突破资源和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各区域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机会,弥补公

共服务短板。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注入新动能。欠发达地区要抓住发展契机,超前谋划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转型升级,不断缩小区域差距。

第三,实现地区间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践行共同富裕使命。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重大任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地区间的相对平衡,着力解决不平衡问题,最终要体现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

具体而言,一是要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首先,从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出发,应合理优化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用结构性调整的办法,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创造物质财富,提高生活水平。其次,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建立健全长效普惠性的扶持机制和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支持机制,有效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短板,确保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能更好地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最后,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二是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探索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方式方法。首先,加快构建生态补偿立法,明确流域上游对下游、生态保护地区对受益地区的法定责任,将森林、草原、湿地、水流等纳入生态补偿重点领域。鼓励流域上下游之间通过资金补偿、项目补充、对口支援、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等

多种形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其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推动各省区间多元化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义务,优化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最后,加快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率和农产品质量。三是优化区域互助机制,补齐“三农”发展短板。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发展和收入不平衡,农村地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一方面,要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坚持东西部地区的协作和对口支援,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完善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 and 老工业基地等地区的精准支持政策,增强落后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发展,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另一方面,要“调低”“扩中”,注重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补齐“三农”发展短板,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农业的升级,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发展非农特色产业,在乡、镇、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让农业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助推农业产业化,建设农产品集采中心,打造一批区域公共品牌,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田惠敏,男,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00)。

(责任编辑:齐 双)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分析*

覃成林 韩美洁

摘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初步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主要表现在,形成了珠三角增长极、长三角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长江中游增长极、成渝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和关中增长极等多极共存格局,各增长极之间存在结构、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均持续增强;空间经济网络的规模、密度、连通度等均持续增大;这些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其中,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趋于减弱,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的影响则相反。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组织基础,建议把长江中游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关中增长极建设上升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及其他空间经济网络建设。

关键词: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增长极;空间经济网络;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16-07 收稿日期:2021-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研究”(19ZDA055)。

作者简介:覃成林,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2)。

韩美洁,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广州 510632)。

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四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国家先后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略。与之前侧重于“面”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不同,这些新的重大区域战略的空间表现一类是“点”,另一类是“线”。由此,我们不难判断,在这些新的区域重大战略塑造下,中国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因为,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开发模式或空间组织模式不一样,必然带来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发生相应变化。那么,在上述新的区域重大战略作用下,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或者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空间组织模式呢?覃成林认为,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全国区域发展应采用多

极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在此基础上,覃成林、贾善铭等学者在《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引领中国区域经济2020》一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构想。笔者注意到,他们重点从战略角度分析如何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并未对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这个现象做深入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建立相应的识别方法,使用2008—2019年全国高铁频次及GDP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现象,揭示其特征及演变,并从研究结果中提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启示。

一、文献评述

自覃成林提出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已有20多年,

但关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学术界并没有建立专门的分析方法。因此,目前没有现成的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分析方法供本文使用。所幸的是,大量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的探讨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分析方法提供借鉴。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增长极的分析和空间经济网络分析。

1.关于增长极的识别方法研究

关于增长极的研究文献颇多,其中,如何识别现实中的增长极,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个方面,已有文献大体上形成了两条识别增长极的路径。一是设计反映增长极经济属性的指标,测度和识别增长极。其中又分为单指标与多指标综合或指标体系两种做法。较有影响的单指标方法有KZ指数、Esteban-Ray指数等。多指标综合或指标体系方法可以避免单指标方法的不足,但是其通用性和可比较性又明显不足。二是从增长极与腹地的关系出发,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来识别增长极。不难看出,这两条识别增长极的路径均只是反映了增长极的某一个属性。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在构建识别增长极的方法时将避免重蹈这两个路径的覆辙,力求综合反映增长极的经济属性和关系属性,并要在识别单个增长极的基础上,识别出多个增长极共存的状态。

2.关于空间经济网络的构建及性状分析方法研究

由于网络行为可以反映企业、区域等之间的合作行为,且网络具有外部性,因此,关于空间经济网络的研究文献快速增加。一般而言,网络是由节点和节点间的连接组成的。空间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可以是城市,也可以是企业、个人等主体,连接包括具体的交通联系和抽象的要素流动等。于是,在空间经济网络的建构方面形成了多种方法。在流数据不可获得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借助引力模型构建空间经济网络,采用包括公路、铁路或航空交通联系数据构建空间经济网络也是一种较为常用的方法。随着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增加,一些学者转为采用企业数据构建空间经济网络,根据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所选择的企业类型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学者同时用多种联系数据构建不同的空间经济网络。总体来看,这些构建空间经济网络的方法各有千秋。但截至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研究出能够全面反映空间经济网络的方法。本文选择用高铁联系数据来构建空间经济网络。理由有二:

其一,近十多年来中国高铁建设快速推进,对区域之间、城市之间既有的空间经济联系产生了系统性大规模的重塑。因此,使用高铁联系数据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空间经济网络的新变化。其二,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之间的高铁联系从无到有并快速的、大规模的扩展,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空间经济网络形成演进历史过程的一次重现。因而使用高铁联系数据就更便于观察空间经济网络的特征及演变。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1.研究方法

笔者从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建立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分析方法。

第一,多个增长极共存的识别方法,多个增长极共存是判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据之一。这里,我们将多个增长极共存简称为多极共存。

增长极的构成与区域尺度有关。在大区域尺度上,增长极是由核心城市与其有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的周边城市组成的。本文拟先识别出核心城市,然后,找出与其有紧密空间经济联系的周边城市,从而识别出增长极。因此,本文首先要解决如何识别核心城市的问题,基本思路是对城市 i 的规模加权经济增长率 R_i 和节点度数中心度 C_i 作最大最小标准化处理,构建一个识别核心城市的指标 I_i 。

将所有城市按照 I_i 值由大到小排序,取前20%的城市作为备选核心城市。那么,如何进一步在备选核心城市中确定核心城市呢?对此,本文根据增长极的空间特性,提出以下原则:其一,增长极的空间匹配性原则。即一个增长极是与特定区域相匹配的。因此,一个备选核心城市能否作为某个增长极的核心城市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其在上述 I_i 值排序中的位序,而是由其所在增长极内的所有备选核心城市之间的比较而定。其二,增长极核心城市有限性原则。即在一个增长极内,只有少数几个 I_i 值大的备选核心城市是核心城市。这就意味着,该增长极内的其他备选核心城市尽管在上述 I_i 值排序中的位序比较高,但是也不能作为核心城市。

对于一个增长极而言,按照上述方式确定了核

心城市之后,本文再依据其与周围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强度来确定增长极的构成及范围。如果一个增长极有多个核心城市,则综合考虑其与周围城市的空间经济联系强度来划分增长极的范围。

运用上述方法,我们可以识别出全国的增长极。如果存在多个增长极,则表明在全国有多极共存现象;反之,如果只有一个增长极,则表明全国是单极主导,无多极共存现象。

第二,空间经济网络的分析方法。存在空间经济网络是判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本文参考复杂网络、社会网络的相关分析工具,选择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连通度这3个描述网络整体性状的指标,对空间经济网络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为了节省文章篇幅,本文不再赘述这3个常用指标的计算方法。

第三,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共生关系的分析方法。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共生是判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据。如果仅有多极共存、空间经济网络,还不足以判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只有当多个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才可以判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反之,亦反。据此,本文引入生态学的共生度模型,对多增长极和空间经济网络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检验。

首先,运用式(1)计算多增长极的质参量 P 。另外,选择连通度为空间经济网络的质参量,记作 L 。

$$P = \sum I_i \quad (1)$$

其次,运用式(2)和式(3)分别测算 P 与 L 之间的数量关系。

$$P = \alpha + \beta L \quad (2)$$

$$L = \lambda + \mu P \quad (3)$$

再次,计算它们的共生度。 θ_{PL} 表示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共生度,由式(4)计算所得,反映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的作用。 θ_{LP} 表示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的共生度,由式(5)计算所得,反映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作用。参考共生关系类型的判断,如果 $\theta_{PL} = \theta_{LP} > 0$,则多增长极和空间经济网络是正向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如果 $\theta_{PL} \neq \theta_{LP} > 0$,则多增长极和空间经济网络是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如果 $\theta_{PL} \theta_{LP} < 0$,则多增长极和空间经济网络是

寄生关系。

$$\theta_{PL} = \frac{dp/p}{dP/L} = \beta \frac{L}{P} \quad (4)$$

$$\theta_{LP} = \frac{dP/L}{dp/p} = \mu \frac{P}{L} \quad (5)$$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全国已开通高铁的地级及以上市作为研究的样本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范围没有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

本文用各城市的高铁频次数据来构建空间经济网络,所使用的高铁数据主要来源于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建立的2008—2017年的高铁数据库。但是,该数据库中缺少2011年的数据。因此,本文对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并新增了2018年和2019年的高铁数据。本文计算各城市规模加权经济增长率所使用的GDP和GDP增长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2008—202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同时,根据有关城市的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对部分缺失数据作了补全。

三、中国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特征及演变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和数据,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特征及演进展开分析。

1.多个增长极共存且差异明显

图1显示的是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中 I 值分布中前20%的城市。本文以这些城市作为增长极的备选核心城市,然后,根据前述关于核心城市的两个选择原则,参考覃成林等划分的7个增长极,在图1的备选核心城市中筛选出如表1所示的各增长极核心城市。

结合表1与图1,我们分别比较各个增长极中 I 值仅次于其最后一个核心城市的其他备选核心城市,可以进一步证明表1所选择的的核心城市是合理的。在珠三角增长极,位居深圳之后的备选核心城市是佛山,其 I 值为0.2896,位序为32,明显弱于深圳。在长三角增长极中,位于南京之后的备选核心城市是无锡,其 I 值为0.5827,位序为8,也弱于南京。在环渤海增长极中,位于天津之后的备选城市是青岛,其 I 值为0.3309,位序为25,比天津弱。在长江中游增长极,位于南昌之后的备选核心城市是

宜春,其 I 值为0.2520,位序为40,明显弱于南昌。在中原增长极,郑州之后是洛阳,其 I 值为0.2692,位序为35,明显比郑州弱。在关中增长极,除西安外,没有其他城市进入 I 值前20%。所以,总体上看,表1所选择的中心城市是比较合理的。与覃成林等(2016)所确定的各增长极核心城市相比,仅有环渤海增长极略有不同,即沈阳没有进入核心城市之列,因为其 I 值仅为0.2605,位序为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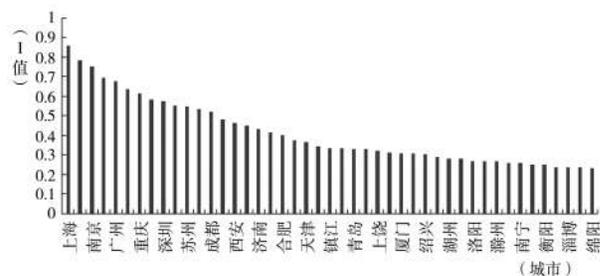


图1 2019年 I 值排名前20%的城市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1 2019年各增长极的核心城市

增长极	核心城市
珠三角增长极	广州(0.6758;5),深圳(0.5770;9)
长三角增长极	上海(0.8615;1),杭州(0.7823;2),南京(0.7511;3)
环渤海增长极	北京(0.6943;4),济南(0.4320;17),天津(0.3646;21)
长江中游增长极	武汉(0.6374;6),长沙(0.5518;10),南昌(0.3106;28)
成渝增长极	重庆(0.6168;7),成都(0.5229;13)
中原增长极	郑州(0.5367;12)
关中增长极	西安(0.4652;15)

注:核心城市后括号内的数字,第一个为该城市的 I 值,第二个为该城市在图1中的位序。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确定了核心城市之后,本文根据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划分出各个增长极的范围,确定其城市构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全国层面存在着多个增长极共存的情况。但是,这些增长极之间是有结构、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的。在结构方面,长三角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和长江中游增长极都有3个核心城市,珠三角增长极和成渝增长极均只有2个核心城市,而中原增长极和关中增长极都只有1个核心城市。在规模方面,7个增长极的城市数量差异显著。其中,环渤海增长极最大,有27个城市,而关中增长极最小,仅4个城市。从发展水平来看,随着高

表2 2019年各增长极的城市构成

增长极	核心城市	其他城市
珠三角增长极	广州,深圳	佛山,东莞,肇庆,惠州,珠海,江门,中山
长三角增长极	上海,杭州,南京	无锡,苏州,常州,宁波,镇江,金华,嘉兴,绍兴,湖州,台州,南通,扬州,泰州
环渤海增长极	北京,济南,天津	青岛,沈阳,淄博,潍坊,德州,大连,石家庄,烟台,秦皇岛,唐山,邯郸,盘锦,廊坊,鞍山,铁岭,营口,邢台,沧州,威海,保定,辽阳,衡水,本溪,丹东
长江中游增长极	武汉,长沙,南昌	上饶,岳阳,九江,株洲,鹰潭,咸宁,湘潭,荆州,孝感,黄冈,黄石,鄂州,景德镇
成渝增长极	重庆,成都	绵阳,南充,德阳,乐山,内江,遂宁,眉山,广安,资阳
中原增长极	郑州	洛阳,漯河,开封,许昌,新乡,焦作
关中增长极	西安	渭南,宝鸡,咸阳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铁建设的推进,各个增长极内部的空间经济网络连通度均呈增加的趋势,说明在增长极内部各城市间的联系在加强。但是,它们之间的网络连通度差异也是明显的。如,2019年长三角增长极的连通度最大,为1029;环渤海增长极次之,为487;再次为珠三角增长极和长江中游增长极,分别为397、359;成渝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和关中增长极的网络连通度较小,分别为147、153、172。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多个增长极共存的现象应该是早已存在的。高铁建设和运营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重现”了上述多个增长极共存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是,其一,从各个增长极的构成城市数量来看,随着高铁建设的推进,各增长极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2008—2019年,珠三角增长极的城市由3个增加至9个,长三角增长极的城市由8个增加至16个,环渤海增长极的城市由14个增加至27个,长江中游增长极的城市由7个增加至16个,成渝增长极的城市由2010年的4个增加至11个,中原增长极的城市由2010年的6个增加至7个,关中增长极比较特殊,其城市由2010年开始一直是4个。其二,受高铁建成运营时间先后的影响,各个增长极的形成时间也存在差异。2008年,珠三角增长极、长三角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和长江中游增长极开始形成,而成渝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关中增长极的形成是从2010年开始的。其三,各增长极的内

部联系渐趋紧密。2010—2019年,珠三角增长极、长三角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长江中游增长极、成渝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关中增长极内部的空间经济网络连通度分别增长了2.3倍、7.4倍、8.4倍、27.6倍、6.4倍、15.3倍、24.6倍。其四,各增长极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强度也存在差异。由表3可知,总体上,按照一个增长极核心城市与其他增长极核心城市的网络连通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长三角增长极、珠三角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成渝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关中增长极。从联系强度变化来看,各增长极的核心城市之间的网络连通度普遍出现了大幅增大。如,长三角增长极与环渤海增长极核心城市之间的连通度由2008年的22增加至2019年的496,约增加了21.5倍,与珠三角增长极核心城市之间的连通度由2008年的49增加至2019年的425,约增加了7.7倍。

表3 2019年各增长极核心城市之间的网络连通度

增长极	珠三角增长极	长三角增长极	环渤海增长极	长江中游增长极	成渝增长极	中原增长极	关中增长极
珠三角增长极	—	425	265	348	227	225	206
长三角增长极	425	—	496	454	378	425	391
环渤海增长极	265	496	—	240	202	245	200
长江中游增长极	348	454	240	—	158	227	154
成渝增长极	227	378	202	158	—	111	141
中原增长极	225	425	245	227	111	—	56
关中增长极	206	391	200	154	141	56	—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2.空间经济网络持续发育

根据前述建立的研究方法,本文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连通度三个方面分析空间经济网络的特征及演变。结果显示,总体上空间经济网络呈持续发育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经济网络规模持续增大。图2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铁线路开通运营,空间经济网络的规模是持续增大的。2008年的空间经济网络中只有55个节点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到了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的城市节点数量增加到了224个,较2008年约增加了4倍。这是由于高铁建设不断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中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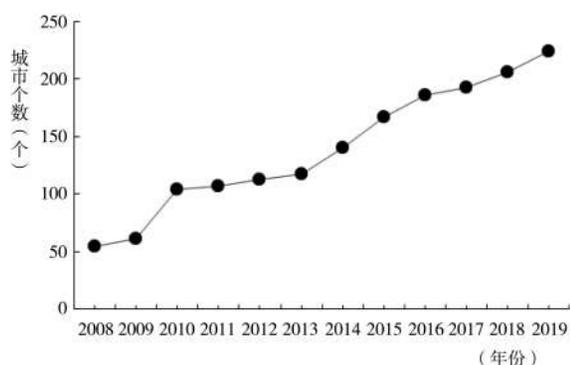


图2 2008—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部地区的高铁建设提速,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到全国的高铁网络中。

第二,空间经济网络密度显著增大。图3报告了2008—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密度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空间经济网络密度呈上升趋势,这说明,2008—2019年,随着高铁建设的推进,空间经济网络得到了持续发展,网络结构更加紧密,城市之间的互动性增加。2008年,空间经济网络密度只有0.0059,在样本城市中,只有约0.59%的城市间存在联系。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密度增大了约31倍,为0.1826。其中,从2014年开始,空间经济网络的密度持续快速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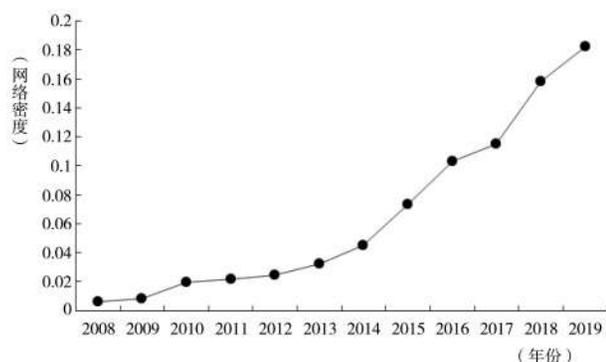


图3 2008—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密度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空间经济网络连通度总体上显著增大。由图4可知,空间经济网络连通度整体也呈增大趋势,但其变化过程与上述网络规模和密度明显不同。2008年,平均每个节点城市对外联系次数的一半仅为30.2。随着高铁建设的推进,节点城市的平均联系数量大幅增加,2019年平均每个节点城市对外联系次数的一半已经增加到799.6。尤其是,2017—2018年,空间经济网络的整体连接水平出现了显著提高,城市之间的连通性明显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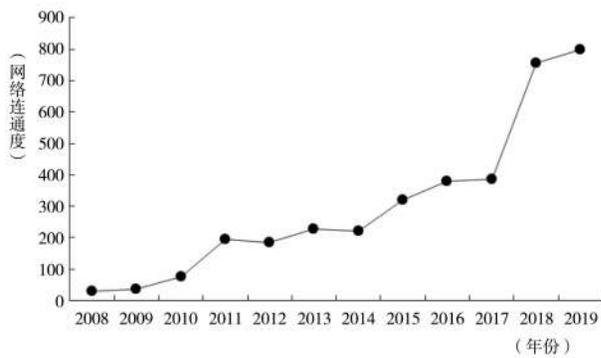


图4 2008—2019年空间经济网络连通度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3. 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共生发展

由表4可知,2008—2019年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比较来看,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的促进作用。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形成的推动作用整体上呈增加趋势,强化了多极共存的格局。与之相反,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推动作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非增长极城市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也在不断增强,相对弱化了多增长极对其影响。

表4 2008—2019年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的共生度

时间(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θ_{PL}	0.017	0.018	0.036	0.076	0.093	0.116	0.095	0.124	0.127	0.189	0.313	0.278
θ_{LP}	23.029	21.776	11.186	5.317	4.317	3.463	4.224	3.235	3.170	2.136	1.285	1.449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初步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其特征及演进主要表现在,一是多极共存。在全国层面,共有7个增长极,分别是珠三角增长极、长三角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长江中游增长极、成渝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和关中增长极。各增长极之间存在结构、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增长极内部和增长极之间的联系均持续增强。二是空间经济网络持续发展。总体上,全国空间经济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度均呈增大趋势。三是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多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趋于减弱,而空间经济网络对多增长极的促进作用则趋于增强。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初步建立了识别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的方法。该方法可以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其中,本文所建立的增长极识别方法能够综合反映增长极的本质特征,避免了已有方法顾此失彼的不足。同时,本文引入生态学共生模型,揭示了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这不仅是一个方法创新,也是一个有

价值的发现,对于深入揭示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的内部关系性质具有重要作用。其二,本文证实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这个研究结果为证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现象提供了有力证据。同时,也表明覃成林等提出的全国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战略构想是有事实根据的。

本文的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组织。目前,已初步形成的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适宜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组织基础。二是在全国层面,7个增长极共存和互动有利于形成支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链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枢纽。因此,建议把增长极建设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大举措。通过制定新的区域重大战略,如把长江中游增长极、中原增长极、关中增长极的建设上升为区域重大战略,使之与正在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相配合,形成7个增长极引领新发展格局的局面。三是空间经济网络发展有利于把全国各级各类区域更加紧密地纳入新发展格局之中,促进其通过互联互动而产生群体效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激发出新的发展

动能。可以预见,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建设的推进,全国空间经济网络将会加快发展,必将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除高铁网络外,还需要重视和发挥其他基础设施网络和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作用。因此,应加快“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以及航空网络、高速公路网络、新一代信息网络、物联网、能源网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企业空间组织网络发展,重点提升全国空间经济网络的规模、密度、连通度和融合度,以及智慧化水平,推动各级各类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相互促进,做强国内大循环。四是多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共生可以增强新发展格局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因此,要统筹7个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的规划和建设,使之共生发展,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当前,要重视解决以增长极为主体的区域重大战略与以发展轴为主体的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对接和联动问题,同时要继续出台新的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完善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 [1]覃成林,张震,贾善铭.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变迁、成效与新构想[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 [2]周叔莲,魏后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战略[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1).
- [3]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1(4).
- [4]覃成林,贾善铭,杨霞,等.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5]覃成林.中部地区经济崛起战略研究[J].中州学刊,2002(6).
- [6]覃成林.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研究[J].中州学刊,2006(1).
- [7]ZHANG X, KANBUR R. What Difference Do Polarisation Measures Make? An Application to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7(3).
- [8]ESTEBAN J, GRADFN C, Ray D. An Extension of A Measure of Polariza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Five OECD Countrie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7, 5(1).
- [9]WOLFSON M C. When Inequalities Diverg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2).
- [10]贾善铭,王亚丽,位晓琳.粤港澳大湾区多极增长格局下广州交通发展对策的思考[J].城市观察,2019,59(1).
- [11]FEDEROV, LEONID.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Polarization in Russia, 1990—1999 [J].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3).
- [12]马国霞,田玉军,石勇.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的空间极化及其模拟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2).
- [13]李敬,陈澍,万广华,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及其解释——基于网络分析方法[J].经济研究,2014(11).
- [14]唐子来,赵渺希.经济全球化视角下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J].城市规划学刊,2010(1).

Study on the Multipolar–Network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Qin Chenglin Han Meijie

Abstract: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nitially formed a multipolar–network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 polar coexistence pattern, such 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growth pol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growth pole, the Bohai Rim growth pole,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growth pole, the Chengdu Chongqing growth pole, the Central Plains growth pole and the Guanzhong growth po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scale and development level among these growth poles, and their internal and mutual relation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cale, density and connectivity of spatial economic network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re is a positive asymmetric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growth poles and the spatial economic networks. Among them,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multi growth poles on the spatial economic networks tends to weaken, and the impact of the spatial economic networks on the multi growth poles is opposite. Multipolar–network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provides a good spatial organization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 to buil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suggested to upgra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growth pole, the Central Plains growth pole and the Guanzhong growth pole into a major regional strategy,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 vertical and eight horizontal” high-speed rail network and other spatial economic networks.

Key Words: Multipolar–Network Spatial Organization; Growth Pole; Spatial Economic Network; Regional Economy

(责任编辑:张子)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探索

孙久文 胡俊彦

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得到解决的当下,空间经济所强调的空间分异正愈发成为西南、西北地区的真实写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西部大开发战略应当立足于西部地区空间分异的客观事实,锚定西部地区作为国家能源和资源主要生产基地的定位,明确西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地位,通过积极发展数字经济与加强东西部地区合作及利益共享,构建西部地区发展的空间新格局。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空间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23-05 **收稿日期:**2021-11-22

作者简介:孙久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72)。

胡俊彦,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长期以来,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西部大开发正是这一重点的有力表征。西部地区^①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后发区域,其繁荣、发展和稳定事关各族群众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立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西部大开发拥有新的目标与使命,也要在实践中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与发现。

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任务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在于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在为此不懈奋斗的实践中,西部大开发依据实际情况对侧重点进行了若干次调整,取得了丰厚的发展成果。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发展环境的改变,新发展格局下的西部大开发也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部地区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西部地区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重点,走高质量的协调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一实际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新概念,具体到西部地区来说,主要任务应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应完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在西部地区具备条件的区域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创新载体,提升西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

其二,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推动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集群,通过发展生态集约高效、用地规范的设施农业来保障农业发展,同时促进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抢占先机。

其三,优化能源供需体系。西部地区作为我国

能源的主要生产基地,在“双碳”目标的实现中负有艰巨使命。在能源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应确保环保红线,培育一批清洁能源基地,加强管线建设与加强电网调峰能力建设,在实践中践行并发展“两山”理论。

其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西部地区应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当前西部地区已经全面脱贫,但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仍需要警惕返贫风险。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将是西部地区的一个阶段性重点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应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通过适当加强生产要素的集聚来达到良好的区域开发效果。

其五,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东部沿海地区仍有一定差距,需要在基础设施通达度、通畅性和均等化水平三方面加以奋斗。特别是,西部地区应加快抵边村镇和抵边通道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其六,巩固国家边疆安全。沿边地区多位于西部地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既要发展也要安全的要求愈发彰显了其所承担的国家安全屏障作用的重要性。同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亦将是其工作的重心所在。

其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西部地区需要保护好冰川、湿地等生态资源,通过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并对青海三江源汾渭平原、成渝地区与乌鲁木齐等地区开展重点区域综合治理,不断推进美丽西部建设。

二、对西部地区发展问题的再认识

空间经济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从空间经济视角出发,对西部地区发展问题进行分析能够很好地拓宽思路、了解症结所在。

1. 空间分异视角

西部地区空间辽阔,土地面积达687.28万平方千米,内部地形复杂多样,不同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笼统地将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有失偏颇。综

合考虑自然环境特点、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态势,西部地区可进一步划分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其中前者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后者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从自然地理上来看,西南地区由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构成,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水土搭配好,而西北地区由黄土高原和盆地、山地组成,特产资源丰富,但缺少水资源。西南、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前者制造业占比大,后者以资源性产业和资源加工业为主。经济发展的南北差异在西部地区也客观存在,从经济总量上看,2020年西南地区生产总值达14万亿元,是西北地区的1.91倍;从经济增速上看,近年来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近四年GDP增长率分别是5.35%、9.02%、11.63%、13.03%,是同期各个大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而西北地区增长速度较慢,尤其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增长率不足2%;从发展潜力上看,以成渝城市群为轴心的西南地区正成长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心骨,而西北地区则存在东北化的危险。毋庸置疑,空间经济所强调的空间分异正是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区域形态差异的最佳写照。“十四五”时期,在进行政策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异质性,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的差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考量。

2. 西部地区的资源能源开发

通过国家的政策资源布局来推进各类功能平台的建设和提升效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相较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是政策洼地,而其对已有的平台利用也不够充分有效。如何提升自身对于平台资源的利用、争取国家在西部适宜地区打造更多的战略平台,是新时代西部地区需要思考的课题。

与相对匮乏的平台资源相反,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矿产超过130种,其中铅矿、铜矿等9种矿产资源的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30%以上。西北地区能源资源蕴藏量尤为巨大,在现已证实的探明储量中西北地区化石能源总资源量为17400亿吨标准煤,占全国化石能源总资源量的41.8%。其中,煤炭预测资源量占全国的51.8%,石油和天然气总资源量分别占全国的30.3%和39.2%。西部地区作为全国化石能源最富集的地区和重要战略接替区,是我国能源的主要输出区。但在实践中,西部地区

资源产业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源产业是否需要深加工以及哪些产业可以搞深加工,哪些产业又不宜搞深加工。深加工指对半成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是对已经形成的商品的再次制造,目的在于使其更具价值,是产业链完善的一大表征。产业链的完善将带来更强的创新力、更高的附加值与更好的安全保障,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但囿于资源能源的特殊性及我国发展现状,西部地区资源产业深加工过程中出现了两大困难,一是以煤炭为代表的部分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较大的资源在进行深加工时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二是部分产业现有深加工地区与资源产地出现分离现象。后者的典型代表是铝,电解铝的生产多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但当前铝制品的生产仍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提供资源并承担大部分能源消耗一方的西部地区仅能从中获取较少利润,而由于路径依赖,相关产业转移存在较大困难。

除上述问题外,西部地区发展面临的另一大障碍在于水资源。水资源一方面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采时的消耗品,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十四五”期间,可考虑适时启动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通过破除水资源束缚来促进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便已有设计方案,其总体思想是从长江流域调水进入黄河,从而改善沿黄省份的用水问题,同时还将部分水资源运入南疆,以期在塔里木河下游地区、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形成新经济发展的基地。从其预期成果来看,是有理由将之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性、引领性项目去施行的。

3. 积极发展数字经济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的愈发融合,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发提高。作为一种人类通过大数据的识别与使用来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改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提供了更加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进入新时期,我们有理由对通过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给予一定程度的期望,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条件同传统经济有所差别,数字技术可以降低产业发展对

区域经济条件的依赖,有利于重构产业体系;其二,数字经济需要全新的基础设施,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均需要强大而稳定的网络覆盖,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和原有的基础设施优化相结合,从而极大地改善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条件;其三,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等公共服务数字化发展趋势明显,这使得西部地区能够通过网络授课、远程医疗等多种途径更好地享受先发地区良好公共服务产生的外部性,进而有力地促进西部地区发展。

4. 进一步深化东西合作

区域合作当中,欠发达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发达地区具有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这些优势要在合作中得到最佳配置,避免资源大跨度、大规模调动,降低全社会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东西合作应当是一种双赢的合作。但在当前的合作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与流通壁垒仍然存在,商品贸易合作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进一步深化东西合作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与数字资源等在东西部地区间无限制地流动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如部分在东部地区发展已经不再具备优势的产业可适当向西部地区转移,在帮助东部地区实现“腾笼换鸟”的同时利用西部地区相对丰富的资源进行生产,提高双方的发展水平。此外,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国内开放发展的不断推进,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旅游等多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东部地区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对外开放等方面仍需要加强同东部地区的学习与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东西部地区合作不应停留在东部地区帮助西部地区、给予西部地区的初级阶段,而是要结合时代背景与自身特质,寻找以“东数西算”^②为代表的能够实现双赢、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途径。

5. 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

产业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要立足到具体产业之上。自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了很好的优化,技术水平出现了显著提高,但西部地区制造业多数属于初级加工、技术含量较低的低附加值产

业,产业集群仍以资源型集群为主。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的当下,西部地区需要更好地把握自身优势与特质,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发展一批特色产业。首先,基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的事实,可以发展基础设施产业,同时西部地区还应以完善自身的产业基础、产业结构与产业链条为目标发展制造业,努力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其次,各省(区、市)可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相应资源产业,如青海可以对盐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陕西可尝试进行高性能镁合金开发及生产。再次,西部地区风景秀丽、景观壮美,民族文化氛围浓厚,具有良好的旅游业发展基础与独特优势,但需注意在相关产业发展中要守住绿色底线。最后,西部地区占我国陆上边境线的80%,在对外贸易上具有独特优势,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下进一步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对外贸易产业,是西部地区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空间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特色产业建设,重点包括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以及适当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自身优势是空间差异的直接体现,因地制宜是应对空间异质性的最佳选择。而产业在空间上分布过于分散就无法形成集聚优势,而过于集聚则会形成集聚阴影,只有“大分散、小集中”才能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城市发展的“普遍沸腾”。

三、新发展格局下的西部大开发 空间优化思路

新时代赋予了西部大开发新的理念、方向与使命。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新发展格局下的西部大开发需要更为明确的空间优化思路。

1. 构架西部地区的空间新格局

西部地区空间新格局的构架可分为“面、点、线”三个层次。“面”的层次上,针对西部地区南北发展分化的事实,应当将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分开规划,在制度建设、平台建设、产业指导等方面形成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点”意指在空间格局构建中当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中心。西部地区面积广大,

城乡发展的差距很大。在目前阶段,应当先把发展的中心放到大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上面,通过推进空间开发、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进而以城带乡实现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线”指西部地区空间新格局中沿边境“沿边经济带”的规划建设,利用铁路、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将沿边城镇串联起来,并进一步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功能,在巩固国防的同时振兴边疆。

2. 明确西部地区新时代的战略定位

构建新格局的一大原则是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在此过程中不能只考虑建设本区域市场,一个区域的循环、一个区域的产业链条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一角度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合作与东西互补。同时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提升了其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地位。西部地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双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西部地区的经济性质仍然以资源经济为主。资源经济是以资源的占有、配置和开发为主的经济形态。但是资源经济并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有选择地发展制造业,同样也要加快适向创新驱动的转换。习近平总书记在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全国能源最富集的地区和重要战略接替区,新时代西部地区仍应肩负起这个重任,继续坚持国家能源和资源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一定位,努力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3. 发展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新任务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正悄然改变当代人的生活,数字经济亦随之应运而生。数字经济强调数据信息及其传送是一种决定生产率的技术手段,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发展数字经济既是时代发展的新任务,也是西部地区实现发展的良好契机。鉴于数字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政策支持同传统经济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的事实,西部地区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式吸引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应引进创新人才,在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产权认定等环节给予支持。同时,西部地区应在5G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基建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力争与东部地区

先进地方并行发展,通过谋划一批突出西部地区产业特色和发展需求的重大项目来落实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建设。

4. 谋求利益共享的新思路

在区域合作中,仅靠合作中的规则是不能维持长期合作局面的。因此,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区域合作的利益分享以及补偿机制。对不同的合作领域和不同的合作项目,合作方要适宜地采取不同的补偿和激励措施。可以采取合作优势一方给予劣势一方以必要补偿的方式,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共享合作收益。当前,西部地区的合作层次与水平均有很大提升空间。立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西部地区应从三方面探索利益共享新思路:一是紧扣国家战略大势和前沿发展、未来发展,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适宜地区打造更多的战略平台,如追求设立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通过推动沿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加快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更好发挥边境城市内外联通作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二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突出矛盾、落实重大发展改革任务,发挥主观能动性,强化自身资源整合能力,打造具有特色的高品质功能平台,实现资源交换与优势互补;三是加强与发达地区合作,采取适当

形式将其设立的功能平台延展到西部地区,或者联手打造新的平台,将“蛋糕”做大。

注释

①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②东数西算指把东部地区的数据流动到西部地区存储、计算,从而实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算力资源协同发展格局,推动形成自由流通、按需配置、有效共享的数据要素市场。

参考文献

- [1]孙久文,夏文清.区域差距与亟待解决的问题[J].改革,2011(6)
- [2]孙久文.探寻新时代西部大开发2.0的新方位[J].人民论坛,2020(26).
- [3]孙久文,蒋治.“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展望[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2).
- [4]江志国.中国西部地区国土资源丰富[J].山区开发,2000(7).
- [5]孙廷容,张洪波,黄强.西北水资源与能源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J].西北水力发电,2004(4).
- [6]朱永楠,苏健,王建华,等.西部地区油气资源开发与水资源协同发展模式探索[J].中国工程科学,2021,23(3).
- [7]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5).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un Jiuwen Hu Junyan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poverty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mphasized by the spac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reg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and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objective fact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chor the western region as the country's main production base for energy and resources, and clarify the western region's role in the "double cycle". Position, construct a new spatial patter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through ac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trengthening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Western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ace Economy

(责任编辑:张子)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东北振兴的中国经济学视角及其产业选择

冯彦明

摘要:东北振兴提出已近20年,但“振兴”的效果不理想,造成不平衡发展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东北振兴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中国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在制度方面,通过设立大东北特区实现体制机制突破和创新,为东北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产业选择方面,要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全民素质的前提下,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占领价值链顶端,通过产业的数字化、生态化、文化化和数字、生态、文化的产业化,实现农业、重工业、文化旅游业和金融业等主导产业的更新升级和融合发展,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全面发展,形成相对独立、完整且又与国内其他地区、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市场有机联系的产业链。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东北振兴;产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28-05 收稿日期:2021-11-09

作者简介:冯彦明,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虽然早在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以及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之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划等,但迄今为止不仅“振”而未兴,反而经济增速下滑,人口外流严重。如2000年、2010年、2019年东北三省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9.25%、7.19%、5.09%,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42%、8.07%、7.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4.1%降至2019年的2.6%,同期税收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从3.4%降至2.3%。此外,产业结构老化甚至退化,新兴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不仅原有的优势未被发挥,新的机遇也未能很好地抓住和利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

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东北地区虽地处祖国边陲,但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交通便利,既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又有良好的工业和教育基础,不仅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也具有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试验田”和示范区的条件。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东北振兴的经济学选择

东北振兴是一个历史问题,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包袱,也承载着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任,需要从人类文明演进中寻找智慧,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盛衰兴亡的历史记录中吸取教训,借鉴经验;东北振兴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是世界各国、

各地区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缩影;东北振兴更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需要多管齐下,系统谋划,战略统筹。

1. 只从经济角度发力难以实现东北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要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历史思维,并且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的准确,战略上谋划的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实际上,东北振兴之所以成为历史问题和“老大难”问题,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学会科学思维,尤其是缺乏战略思维,缺乏系统观念和系统设计,把东北振兴仅仅看作是经济振兴,而经济振兴又主要看作是区域生产总值的增长。东北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只从经济角度发力难以实现东北振兴。因此,要振兴经济,就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意识和完善的经济学理论。理论不完善,意识(认识)错误,不仅会事倍功半,还会南辕北辙。只有扎根中国文化,放眼世界文明,深析历史与实践,着眼高质量发展,才能创新理论,完善制度,指正方向,才能解决东北地区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和两极甚至多极分化问题,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

2. 试图依靠西方经济学理论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是幻想

当今流行的、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西方经济学。实际上,西方的“经济”和“经济学”分别是“家庭(财富)管理”和“富国策”之义,完全不同于中文的“经世济民”。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由唯利是图所决定的以物(利)为本和经利济资,虽然从表面上看倡导自由、平等,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在历史上的起点并不相同,又经历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造成贫者愈贫而只剩下出卖其劳动力的“自由”;由于其信奉经济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零和博弈,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仅不是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反而是两极分化和不平衡发展。以西方区域发展理论为例,不管是区域内发展理论,还是区域间发展理论,也不管是点极轴优先发展理论,还是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其出发点都不外乎追求利润和收入,其结果也都不外乎产业结构畸形和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试图依靠西方经济学解决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人群之间不平衡发展问题只能是幻想。

3. 中国经济学是实现东北振兴的有效选择

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基础和灵魂,继承了中国文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的传统。其以人为本、经世济民的基本要义反映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情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党和执政的宗旨;既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要求,又为解决包括不平衡发展和两极分化等在内的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具体对策。因此,要彻底解决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经济学问题,只有依靠以中国文化(准确地说是中华文明)为基础和基本依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运行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形成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远高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所揭示的经济、管理规律的经济管理科学。

二、东北振兴的制度设计

东北振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的要求,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首要位置,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更新观念,激发自我活力。

1. 从改善营商环境和树立东北亚样板入手设立大东北特区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从东北地区的情况看,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法治建设不够完善,一些政策制度落实难;服务企业能力不强,甚至有的故意制造困难;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不重视研发和培训投入;信用体系不够健全,甚至存在“新官不理旧账”、推诿扯皮、不按时兑现承诺等现象。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认识问题,是思想观念问题,从管理上来讲是制度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高度和角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根本上创新体制机制,既为个人全面发展和积极上进创造机会,为单位、公司创新发展创造条件,又对墨守成规、得过且过进行训诫,对违规违纪、不作为、乱作为进行惩罚。为此,我们建议设立大东北特区。

“大东北”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的范围除东北三省外,还有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五盟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设立特区的目的是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适宜的营商环境,在刺激当地人的生产、创新积极性的同时,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激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热情,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共同体提供“东北亚样板”,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区域示范。

2.设立大东北特区主要体现在体制和机制创新上

要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全生产要素的作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建立既有发展动力又有发展能力、既有竞争力又有凝聚力、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实现政治民主、生态文明和文化繁荣的营商环境。

设立大东北特区要与人事制度,特别是就业(退休)制度、休假制度、社保制度、继承制度等的改革结合起来。一是除国家公务人员及特殊情况如疾病、残疾等外,取消固定退休制度,在满足最低工作年限如40年和最低退休年龄如65岁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确定退休或不退休,以及什么时间退休;二是取消目前的全国法定假日制度,实行“三三一工作制”,即原则上实行每周三天工作制,剩余的四天实行夫妻三天倒休,一天公休。在保证年度工作不少于156天的前提下,也可以由夫妻双方与所在单位协商,定期或临时确定休息时间。这样可以充分体现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减轻人类的劳动负担,使人逐步成为真正的人。此外,既可以减少请假,又可以避免法定假日交通、旅游等的拥堵,既可以方便照顾好父母和孩子,还可抽出时间充实学习,加强自我和家庭教

育,不仅有利于提升全民素质,更体现了美好、和谐生活的需要。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与废除继承权配合,原则上实行自我负责的制度,即除非出现重大疾病及残疾等情况,其他人一律自己缴纳社保、自己储蓄,在退休后完全根据自己缴纳的社保和储蓄由自己安排享用退休金。

3.设立大东北特区要与发展教育相结合

教育是促进和实现人的新陈代谢的基本途径,因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东北地区要全面、全力发展教育事业,一是要把教育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抓住提高“认识”这个“牛鼻子”,全面发展教育事业。国家不仅要为每一个人创造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如实行“三三一工作制”,实行个人、家庭、单位、学校、社会、国家六位一体的全方位教育,还要实行严格的检查考核制度,如实行严格的结业和毕业考核制度;不仅要加强各级各类单位及各层次人员的形象建设,充分体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成就,还要严把宣传关,特别是要加强对网络宣传教育的管理。二是降低入学年龄,缩短学制,实行通识教育而非现在的专业教育。三是改变应试教育模式,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教育不是强制输入和接受知识,更不是考试和高分,而是使现实的、不完善的人逐步成长为理想的、完善的人,是从幼儿养性开始,到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的过程。四是改革教育的方法,从“诚意正心”的“知止”开始,所谓“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与《道德经》所讲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以及“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不谋而合,也与我们日常所教育的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异曲同工。

三、东北振兴的产业选择

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是全方位振兴,但从经济角度讲,主要的问题就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的关键又是主导产业的选择,东北振兴的产业选择要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前提,以融入新发展格局为基础,以建立大东北特区为突破,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全民素质的前提下,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占领价值链顶端,通过产业的数字化、生态化、文化化和数字、生态、文化的产业

化,实现农业、重工业、文化旅游业和金融业等主导产业的更新升级和融合发展,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全面发展,形成相对独立、完整且又与内地、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市场有机联系的产业链。

1. 产业发展的原则是实行产业的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指充分利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支撑,把企业、产业及其产品、组织、管理等的产生、运行与发展全过程,特别是技术和供应链的数字化、信息化进而智能化。产业生态化是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和标准推动企业和产业绿色发展,生态发展,避免破坏生态,损害自然环境。产业文化化是从认识并总结企业、产业产生、运行与发展的规律入手,认识并总结出反映创业者、所有者、管理者与经营者等关于自然界、社会、人类以及企业制度设计、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组织运行、产业互动依存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并使之成为企业和产业的标准及约束力,外化于行,内化于心。显然,不论是产业的数字化、生态化,还是文化化,所产生的效果都将不仅仅是“三化”本身,而是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即在对传统企业和产业理念变革、模式改进、质量提升的同时,形成的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新模式、新标准。与产业的数字化、生态化、文化化相对应和协调,目前,数字产业化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已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产业化也开始发挥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碳交易将刺激生态产业迅速崛起,带动健康产业全面、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化也将随着文化自信的深入人心、文化与日常生活、生产的紧密融合,特别是在文旅融合、研学升级和规范管理的推动下,成为传承文化、助推经济、沟通人心、和谐社会、实现民富国强的支柱产业,体现出软实力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再一次展现出中华文明无可比拟的魅力。

2. 抓“基础”发展现代农业,建立生态食品基地

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生态基础好,山水林地相间,不仅被称为我国的“粮食市场稳压器”,也是重要的林木渔业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2019年,仅东北三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就达2347.176万公顷,占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2%;粮食产量达到13811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20.8%。2020年仅黑龙江的绿色食品种植面积(含有机食品)就达8513.7万亩,比上年增长4.8%。绿色食品认证个数

2936个,增长4.7%。绿色食品加工企业产品产量1699万吨,增长1.7%;实现产值1598亿元,增长0.8%;实现利税90.2亿元,增长0.4%。绿色食品产业牵动农户92.3万户。从周边国家情况看,日本人多地少,农业产值和粮食自给率都很低,大量食品需要进口,是世界上主要食品进口国之一;俄罗斯土地资源虽十分丰富,但人力资源不足,气候条件较差;韩国的稻米自给率较高,但其他食品的自给率较低,也需要大量进口。从国内发展条件看,2018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可通过建设加工园区,建立优质商品粮基地和建立产销区储备合作机制以及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服务式开展产销协作,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共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东北地区可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绿色生态文明建设,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安全需求;发挥现代科技优势,把农业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农业现代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发挥政校研企“协同创新”的优势,抓住产业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机会,推进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意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产业小镇。

3. 抓“硬核”升级重工业,抢占产业链核心地位

东北地区有发展各类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丰富矿产资源和强大工业基础,只是没有利用和发挥新技术革命的条件和机会及时升级更新;东北地区有着优越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国际合作的条件,但还没有充分发挥产业引领、供应链连通的作用,提高国内区域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领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切不可“自废武功”,迷信西方理论和宣传,盲目放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片面追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必须根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走以区域自循环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的开放发展之路;必须根据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要求,走以强化研发和创新驱动为基础、以工业支撑和信息引领为主导、以拉长产业链、升级价值链、深化区域及国际分工合作为补充的共享发展之路;必须根据产业

生态化和文化化的要求,走以生态工业园区为基础、以文化工业园区为主导、以工业研学与旅游为补充的绿色发展之路。

4.抓“软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展现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生产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区域、人群特点的对自然界、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和看法,反映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与生产过程之中,主要表现为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地区传统和民族文化,还有着令人惊叹的红色文化和跨境的国际文化,更有着一直被忽视的现代产业文化,由于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不过,东北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不可重旅游而轻文化,不可重身体“日行千里”而轻头脑新陈代谢,需要在构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旅游一体化发展时重视该地区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使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既带动各相关产业发展,又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既可增强区域凝聚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合力,又可提高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促进“民心相通”。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
- [2]冯彦明.从经世济民的经济观看美国金融形势[J].金融与经济,2020(6).
- [3]冯彦明.对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思考——兼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思路[J].财经理论研究,2020(1).
- [4]冯彦明.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思考[J].财经理论研究,2021(6).
- [5]冯彦明.“三孩儿”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兼谈经世济民的中国经济观[J].财经理论研究,2020(4).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Choice of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conomics

Feng Yanming

Abstract: It has been nearly 20 years since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was proposed, but the effect of "revitaliz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resolv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ak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economic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fundamental goal is to real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nd take the road of leapfrog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suggestions from two main aspects: general system design and specific industry selection: in terms of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i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eat Northeast Special Zone,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China, In terms of industry sel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occupy the top of the value chain under the premise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through the digitalization, ecologicalization, culturaliza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digital, ecology and culture, realize the renewal, upgrad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illar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heavy industry, cultural tourism, and finance, thereby dri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form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omplete and organically linked industrial chain with other regions in China,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ics;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Choice of Industries

(责任编辑:张 子)

【区域高质量发展】

区域高质量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

贺灿飞 李伟

摘要: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引入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具有合理性。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技术周期、技术关联与技术发展方向3个方面分析区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产业发展路径,探讨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过程中经济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并就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经济韧性与社会保护问题进行分析意义重大。未来,准确总结中国实践经验,构建演化发展经济地理学将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创新驱动;产业演替;产业创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33-10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地方互动与区域产业重构”(417312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机理研究”(42001140)。

作者简介:贺灿飞,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李伟,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南京 210023)。

各地区如何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需要进行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需发挥学科优势,展开深入探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度性,包括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等不同方面(刘志彪,2018)。本文聚焦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与演替问题,主要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展开探讨。21世纪,演化经济地理学逐步形成,将区域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形成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新陈代谢过程,侧重于从知识与技术角度研究区域新旧产业演替规律(贺灿飞和李伟,2020)。区域新旧产业演替的速度、方向、驱动因素与影响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成,现有产业资本报酬递减,未来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这些发展条件的变化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

论假定和前提越来越相似。建立在发达国家核心地区创新与产业实践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必能为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背景

区域产业发展一直都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与主流经济学主要从要素禀赋角度探讨国家产业演变不同(林毅夫,2014),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知识与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内生性的新旧产业演替。为此,学者们引入了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和复杂系统理论,形成了初步性的理论框架(Essletzbichler, et al., 2010; Martin and Sunley, 2006; Martin and Sunley, 2007)。随着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区域新旧产业演替中的制度变迁与政治经济博弈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MacKinnon, et al., 2009; MacKinnon, et al.,

2019; Pike, et al., 2016; 胡晓辉、朱晟君、Hassink, 2020)。

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学界主要对区域新旧产业演替机制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认为新产业从现有产业分化而来的,并且二者存在较强技术关联性(Boschma, Minondo and Navarro, 2013),地区存量知识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导致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Martin and Sunley, 2006)。在特定时期,地区要跳出舒适圈,向新的关联性较弱的知识、技术与产业领域迈进(郑江淮、冉征, 2021),打破路径依赖。引入外部资源、推动本地组织机构学习全新的知识与技术是打破路径依赖的重要基础。当然,区域产业演化不仅仅涉及新产业的创生,还涉及现有产业的存续与退出(Boschma and Martin, 2010)。一些地区现有产业持续存在、占据资源、利益锁定、难以退出,导致区域产业发展路径锁定,新的产业难以形成。第二,一些学者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与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相结合,分析不同类型区域创新系统产业演化特点及应采取的对策措施(Isaksen and Trippel, 2017)。经济发达地区既能够进行相关多样化分化,也能实现路径打破型产业创生,要完善地区创新系统,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专业化地区产业更新能力较弱,会产生路径锁定问题(Chaminade, et al., 2019),要进行系统更新,建立外部知识连接。落后地区不具备创造新产业的内在能力(Isaksen, 2015),需要从外部移植高成长性的企业。第三,一些学者深入行业层面研究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李伟、贺灿飞, 2020),重点关注新产业形成过程中关键资源如知识、资本、市场和合法化的形成与整合(Binz, Truffer and Coenen, 2016),以及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政府、大学与研究机构等主体的作用(Jolly, Grillitsch and Hansen, 2020; Semper, 2019)。从产业生命周期来看,新产业发展可以分为导入期、快速增长期和成熟期等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技术创新模式、融资资金来源与市场消费模式都会发生变化,企业与政府要动态调整自身行为、相应制度与政策(Perez, 2003; 陈平、刘刚, 2014)。一是在导入期,大学与研究机构是前沿知识探索的重要主体,国家要给予合理财政分配。这时由于技术前景的不确定性,私人投资者往往不愿意冒险投资

(陈平、刘刚, 2014)。二是当新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的前期阶段时,金融资本、私人资本与风险投资蜂拥而至,形成大量新企业,进行多样化技术探索(Perez, 2003)。这一时期市场扩张迅速,企业股票价格飞涨甚至可能产生泡沫。政府要维持良好竞争环境,甚至采取金融管制措施。在快速增长期的后期阶段,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失败,退出市场,胜出企业不断优化工艺流程,融资模式转向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三是在成熟发展阶段,企业利润下降,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政府要制定反垄断政策,防止少数寡头操控市场(陈平, 2019),防止垄断企业阻碍新技术与新产业的产生与成长。第四,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经济系统转型。一些行业的发展并非在原有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内进行延伸,而是会重塑技术—经济—社会范式(Perez, 2009; 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8)。除了要推动自身行业发展,还要开发互补性技术,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在系统层面嵌入和改造整个社会物质形态(Isaksen, et al., 2019)。要对现有制度法律体系进行调整,重塑社会文化形态,使新产业合法化,推动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协同演化(Freeman, 2019)。要防止旧有利益集团通过短期大幅降价、兼并收购等手段阻碍新产业的发展,防止政府被守旧势力捕获,制定出不利于新产业扩张的政策(Aghion, Antonin and Bunel, 2021)。第五,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Hassink, 2010; 胡晓辉, 2012)。区域经济韧性可分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适应韧性(Boschma, 2015)。演化理论强调适应韧性,认为地区要主动变革,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Pike, Dawley and Tomaney, 2010),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以实现地区经济更新的过程。在发展新产业与淘汰落后产业过程中,企业、政府和各类机构要发挥集体能动性,对地区企业组织、集群网络、政企关系、制度与规制体系等做系统性变革,单兵突进无法取得较好效果(Hu and Yang, 2019)。当然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如忽视了国家层面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忽视稳定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投资和出口等手段的切换,简单地企业层面的产业链韧性等同于区域层面的经济韧性等。

二、演化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较为丰富,包括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等多个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问题。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看,区域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在于实现高质量的产业演替,既包括推动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新产业的创生,也包括在恰当时机,以恰当节奏推动旧产业退出,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具体可以从产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在产业层面,高质量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新产业具有技术前沿性。二是产业创生具有内生性。三是新产业发展具有方向性。四是旧产业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结构对新产业创生的阻碍作用小。新产业的前沿性是指要发展那些处于科技前沿的、技术路线尚未明确、处于快速变化阶段中的新兴产业,从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获得先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产业创生的内生性是指地区达到技术前沿后,新产业并非从外部移植而来,而是在本地知识生产基础上内生创造而来。新产业发展的方向性要求新产业是使命导向型的,有助于缓解或解决当今时代人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差距扩大等。要防止旧产业过度占据资源,凭借垄断地位阻碍新技术、新产业的产生。与上一轮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广义制度结构需要随着新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区域层面,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区域知识、技术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三是降低区域新旧产业演替对社会的负面冲击。要保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既不过度专业化,导致知识结构单一,难以吸收非关联性新知识,也不过度多样化,导致无法形成有代表性的、有竞争力的关联性产业群。要保持区域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保持一定经济冗余、连接度与开放性,关联性产业群发展到特定阶段时,向非关联性产业领域迈进。要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从而既能应对短期经济冲击,又能在较长时间范围内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地区推动新旧产业更

替时,要把握好新旧产业更替的速度与节奏,把握好政策力度,防止旧产业过速过快退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冲击。

三、演化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演化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其内在要求的独特性。以下将从发展路径、经济主体和区域经济韧性视角进行逐一分析。

1. 对发展路径的要求

第一,技术周期视角。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中国一些地区要抓住新兴产业发展的机会窗口,获得先发优势,从而实现赶超。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来自于成熟产业中由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导致的后发优势,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新兴产业领域的先发优势与引领地位(Lee, Gao and Li, 2016)。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或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应该优先发展那些处于国际前沿领域的,尚处于模糊地带的、导入期的、技术周期较短的新兴产业领域,而不是优先攻克那些发达国家已有较多技术积累、投入较大、技术壁垒较高、技术周期较长的已有产业领域(Lee, 2013; Lee, 2019)。

从韩国的实践看,20世纪80年代,韩国已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增长动力趋缓,这时韩国跳过一些发展难度较大的产业领域,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机会窗口,直接发展尚处于国际前沿领域的电子信息与通讯产业,与美欧日在世界最前沿的产业领域展开竞争,大力发展芯片、手机等相关产业,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Lee, 2013)。等到发展水平有进一步提升、资本更加雄厚后,再去突破发达国家已有较多知识积累、技术周期较长、研发投入较高的产业领域,如医药业(Lee and Lee, 2021)。可以说,韩国正是由于抓住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才真正实现了赶超。当然,电子信息与通讯业的技术周期都相对较短,韩国学者才总结认为要优先发展处于世界前沿的短周期技术。

韩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在于,当前

中国要实现赶超就要优先发展那些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获得先发优势,尤其是要着眼于技术周期较短的产业。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仍处于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末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开启、机会窗口尚未打开,因此中国并没有换道超车的可能,只能做好直道超车的准备,在现有关键产业领域实现突破(封凯栋、纪怡,2021)。但从宏观角度讲,现有产业已经过了过去40年的黄金增长期,在需求增长放缓的条件下,实现技术突破的难度在增加,要解决好关键技术应用难的问题(郭年顺、李君然,2019)。就区域经济而言,当前南方与北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如果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于南方地区,则南北经济差距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如果北方地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则南北差距可能缩小。不过,如果当前确实仍处于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末期,短期内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尚不能打开,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南北方经济差距将难以缩小。

第二,技术关联视角。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演化路径与新旧产业更替速率都会发生较大变化。从产业演化路径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主要表现为关联性移植和非关联性移植。关联性移植是指后发国家移植世界上已有的产业,并且这些产业与本地产业基础较为相似。非关联性移植是指后发国家移植世界上已有的产业,但是这些新产业与本地产业的关联性相对较弱。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关联性移植占主导,但非关联性移植也相对较多(李伟,2021)。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前,中国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较低,这时即使移植非关联性产业,也能获得市场竞争力。二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引入外资企业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外资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与技术,而不依赖于中国本地的知识与技术,这也是非关联性移植占比较高的原因(李伟、贺灿飞,2021)。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中国可以从外部移植的产业已越来越少,必须在本地已有知识与技术基础进行内生性的产业分化或创造出全新的新兴产业,产业演化模式将与发达国家越来越相似。中国

区域产业演化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内生性的产业分化与建立在颠覆性技术基础上的产业创生。内生的产业分化是指在现有知识、技术与基础上衍生出与之关联度较高的新兴产业。企业迁移到与技术关联性较高的地区,有利于找到关联性知识和具有相似技能的劳动力,有利于获得先发优势,抵消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颠覆性产业的创生需要大学与研究机构创造出全新知识与技术,实现商业化,甚至变革现有技术—经济范式。总之,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将增强,会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内生性的产业创造模式。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区域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旧产业的更替过程,包括新产业进入、在位产业存续和在位产业退出。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地区产业进入率、产业存续率与产业退出率将会发生变化。有学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1998—2012年产业进入率、产业存续率和产业退出率的变化(李伟,2021)。1998—2004年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前,中国产业进入率不断提升、产业存续率不断降低、产业退出率不断提升,区域产业更替速度相对较快,新产业不断取代在位产业。并且,在新产业中,路径突破型新产业的占比不断提高。2004—2012年,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与新一轮重工业化,中国产业进入率不断降低、产业存续率不断提高、产业退出率不断降低,新产业取代在位产业的速度明显降低,许多产业固化在特定地区。即使在新产业之中,路径依赖型新产业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在未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区域产业更替的速度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产业空间锁定现象可能会更加突出。产业空间锁定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现有产业技术水平提升与相关多样化分化,但长期内要防止地区陷入路径锁定。

分区域来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东部发达省份进行了更多的非关联性移植,实现了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但大多数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主要进行关联性移植,某种程度上说,已经陷入了产业发展的路径锁定(李伟、贺灿飞,2021)。未来,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既要在现有知识与技术基础上内生分化出关联性新兴产业,也要考虑推动颠覆性技术的创生,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西

部地区的普通地级市要打破路径依赖,发展非关联性新产业;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要直接去发展新兴产业,这样才能实现赶超,缩小差距。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或北方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大、未来收入增长较快,可以利用接近市场的优势,发展增长潜力大的非关联性产业与新兴产业,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第三,技术发展方向视角。

应对当代重大社会挑战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人口老龄化与发展不平衡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重塑现有产业体系如实现产业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是解决当代重大社会挑战的重要手段。一些地区要以改造或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社会系统为目标,提前探索与试点,开发数字技术、低碳技术与就业增长型技术,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新市场,重塑制度与文化观念,实现生产模式与消费的转型(余振、龚惠文、胡晓辉,2021)。转型是一个系统过程,必然涉及包括企业、研发机构、咨询服务机构、政府等在内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的经济主体,发达地区存在较强的网络锁定效应,甚至守旧势力。可以先在一些产业发展薄弱、现有利益牵绊少、网络锁定效应弱的地区进行试点,构建新的生产生活场景及技术—制度支撑体系,率先成为高质量发展典范;随着吸引力的提升,各类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起到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将新兴技术及与之相适应的标准、规则输出到全球,占领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2.对经济主体的要求

第一,国家能力转型。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看,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与新旧产业更替速率将发生较大变化,要求政府与企业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国家,国家政策的目标在于引入国外成熟技术、构建产品生产能力(相对于技术能力),促进出口(封凯栋、姜子莹,2020)。在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大背景下,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府担保贷款、低价工业用地、产业投资基金等是地方政府移植关联性与非关联性产业的重要手段。政府掌握较为集中的决策权,扶持特定企业与产业。之后,政府与少数被扶持企业保持高强度互动,保障关键企业长期存

续,让企业不断积累并提升技术水平。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介入的目标已不再是引入国外成熟技术、构建产品生产能力,而是构建本地知识生产能力,促进本地知识扩散,内生性的创造关联性新产业与颠覆性新产业(Malerba and Lee,2021;封凯栋、姜子莹,2020)。这时,知识创造者的范畴超出了原来被引入、被扶持的重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新创企业尤其是新兴的中小企业成为知识创造的主体。政府要推动大学与研究机构新知识、新技术的商业化,要与大量的、处于产业萌芽阶段的新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保持高密度的互动,鼓励新兴产业领域新兴企业的多样化技术探索,为新兴企业的公平竞争提供保障,让市场在技术路线选择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限制大企业垄断,保持新兴产业领域一定的竞争强度,推动产业动态演化(Aghion, Antonin and Bunel,2021)。

当颠覆性技术出现时,政府要在技术—经济体制层面发展互补性技术、建设互补性基础设施、提升新技术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修改法律法规、重塑社会风俗与文化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原有产业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政府要防止守旧势力与利益集团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防止原有产业利益集团占用过多资源(李伟和贺灿飞,2020),主动淘汰落后产业,推动低效企业退出,保障资源配置到新兴产业之中。从日本的经验看,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要更加精准,避免宏观政策客观上保护低效落后企业,使其不断获得贷款,不能及时退出市场,阻碍高效企业的成长(蔡昉,2021)。要形成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力在落后部门与新兴部门之间快速转移。否则,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将降低知识与技术的扩散速度。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对由创造性毁灭导致的结构性失业(Aghion, Antonin and Bunel,2021)。

第二,企业能力提升。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主动融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负责研发、设计与销售,中国企业按照指令进行生产,本地企业的技术学习被整合到跨国公司学习系统之中。中国出口加工企业在干中学,掌握了机器设备操作技能,掌握了现有产品的生产流程。但是,大量企业无法在现有产品生产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模

仿,无法对现有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更不具备开发全新产品的能力。开发全新产品要在整体上把握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在各个环节的链式反馈中不断动态调整,从而最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导致本地企业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相对缺失,企业研发能力、市场调研能力、全球销售网络的搭建与控制能力以及对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能力还存在诸多不足。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原来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领域及其所在地区,要在特定时间内主动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脱钩(Lee, 2019),适度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适度推动企业垂直一体化,提升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企业感知、挖掘、掌控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力量。等到本地企业能力补全后,要以“链主”的身份重构全球价值链体系(Yeung, 2016),这是部分韩国企业与产业成功追赶的经验,即先融入全球价值链,然后在特定时间内断开全球价值链,推动垂直一体化,培养自己的研发设计与市场能力,最后再次按照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组织生产(Lee, 2019)。这样,一些外向型的地区才能真正实现由外生性向内生性的产业演替转变。当然,这一过程也会伴随着“专精特新”等隐性冠军企业的成长,需要国家层面的一系列配合,如维护良好的贸易与对外投资环境,保障企业到海外搭建研发前哨,建立全球市场网络。

第三,创新系统重建。

除了提升企业能力、掌控全球价值链,还要构建内向整合型的区域创新系统。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中国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跨国公司将本地企业的知识学习过程整合到自己的生产过程之中,削弱了本地企业与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中国大学科技论文的发表指向了国外最前沿的技术与工业实践,而并不完全指向本地技术进步与工业实践,这也是本地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相互分离的重要原因。在高速增长阶段,本地创新系统实际是被肢解的、破碎的、各自为战的、缺乏内向整合的。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要构建起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紧密联系的,内向整合的区域创新系统,以本地知识创造为基础,内生性地创造新兴产业。当前,中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许多中国企业已具有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要

适当调整大学与研究机构的评价体系,让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知识生产与本地工业实践相结合,让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市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自主把握技术前进方向,形成自身独特的技术演进路径。在构建内向整合型的区域创新系统时,要完善体制机制,在系统层面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发挥集体能动性。

3.对经济韧性的要求

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类外部与内部冲击,要提升区域经济韧性,避免系统崩溃或陷入长期衰退。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宏观经济曾出现过短期大起大落现象。之后,中国吸取教训运用各类宏观经济手段变短期大起大落的强波(动)周期为微波(动)周期(陈东琪, 1992),即将经济周期的时间拉长,在经济上行期防止上升过快,在经济下行期防止暴跌,从而在较长的时间内熨平经济波动(陈东琪, 2009; 刘伟、蔡志洲, 202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部出口市场受到冲击,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投资来稳住经济增长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果遇到短期外部冲击,可以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稳住内需,使区域经济恢复到受冲击前的水平,即演化经济地理学所说的短期适应性。就中长期而言,如果在中长期内遇到特定产业市场饱和或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则可以移植关联性或非关联性新产业来维持增长势头。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复制的产业也已经复制完毕,现有产业进入资本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如果遇到外部经济冲击,再进行大规模投资拉动,其效果将大大减弱。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扩大消费来稳住需求增长。但扩大家庭消费支出会导致储蓄减少,影响未来新产业的投资与未来潜在增长,甚至产生负债消费并导致债务问题。从较为长期的视角看,地区要保持开放性与一定的经济冗余,不断投资并生成新兴产业,不断改变自身组织与制度安排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抵消旧产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一些地区可能会遇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问题,一些颠覆性产业部门出现,将另外一些产业部门淘汰,导致产业结构性衰退与失业。这时地方政府要制定相应社会政策与就业政策,为失业人群提供保障,对失业人群进行再培训,推动技能转换,使失业

人员能够转移到新兴产业之中。政策上要把握好新产业就业创造与旧产业就业岗位减少之间的平衡,掌握好政策力度与节奏。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文章立足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转变,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对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1. 研究结论

总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产业转型与升级、企业价值链提升与创新能力提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等方面。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显然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引入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演替与升级有其合理性。在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不断扩大投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在发展工业过程中不断进行模仿创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当前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传统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现有产业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能够复制的产业已基本复制完毕,能够学习到的技术与模仿创新都趋于减少,因此未来必须走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内生产业创造之路。演化经济地理学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理论假设暗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接近充分就业、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等,在此假设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建立在知识创造、技术进步与创新基础上的新产业部门。因此,要从知识与技术角度而非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要素禀赋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条件已与欧洲和美国越来越接近,也越来越需要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来研究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产业演替问题,包括新兴产业培育与旧产业退出等。

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探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的差异、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机理、区域转型和区域经济韧性等问题。第一,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认知邻近与技术

关联等概念推导出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提出了相关多样化分化(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分化)与不相关多样化分化(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等概念。后发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主体或建立外部连接而打破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第二,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专业化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产业演化路径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内在产业分化能力,专业化地区大多只能进行相关多样化分化,而落后地区大多缺乏进行产业分化的内在能力。第三,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依赖于不断培育新兴产业,形成新产业发展路径。新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导入期、快速增长期和成熟期,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市场培育与拓展等会发生变化,要求企业、政府等不同经济主体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维度上发挥不同作用,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第四,在新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还要在系统层面发展互补性技术、新型基础设施、调整法律法规与社会文化氛围等。要防止守旧势力过度占据或垄断资源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五,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区域经济韧性,认为当区域经济遇到宏观经济波动、外生冲击或有大的宏观趋势性与转折性变化时,地区内部组织、结构与制度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不断发展出新兴产业来抵消这些冲击。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看来,第一,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主要通过移植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或较为成熟的产业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达地区或具有一定技术积累的地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优先发展那些处于国际前沿领域的、模糊地带的和处于导入期的新兴产业。鉴于中国还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阶段,应重点关注那些技术周期较短的新兴产业。这类新兴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抢先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抓住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取得领先地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赶超。这实际上也是北方地区打破区域产业发展路径、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途径。第二,中国区域产业发展要从移植模式向内生产创造模式转变。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各地区主要通过关联性移植和非关联性移植来发展新产业。未来,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在现有知识与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拓展,进行关联性分化,内生创造出新兴产业,这些

内生创造出的新兴产业有时也会具有颠覆性。第三,从关联性移植与非关联性移植到内生创造新兴产业,要求转变政府政策、提升企业能力、重建内向整合型的区域创新系统。政府要从扶持特定企业和产业,与这些企业与产业保持高强度互动的模式,转变为与大量新兴的中小企业进行高密度互动的模式。这样,政府才能理解新兴产业中大量中小企业进行的多样化技术探索,为政策制定提供基础。当新兴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时,要在系统层面进行设计,发展互补性技术与相应基础设施,调整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市场需求,防止现有产业利益集团与守旧势力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等。在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线,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被跨国公司所整合,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以国外学术前沿及其工业实践为基本场景,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与本地知识生产机构相互分离,内向整合的区域创新系统难以形成。未来,在部分产业领域的追赶中,本土企业要适度兼并重组,提升研究设计能力,建立全球销售网络,掌握系统层面的集成与协调能力。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政府要分散化地资助新兴研究方向与机构,促进本地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政府的密切联系,构建本土创新共同体,形成内向整合的区域创新系统。第四,在高速增长阶段,区域经济韧性问题实际并不突出,如果遇到较大较长时间的外部需求冲击,则可变出口导向转型经济为投资驱动型经济,移植关联性与非关联性新兴产业,从而维持住增长势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遇到短期外生冲击,政府仍然可以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等手段进行短期应对。从长期来看,一些内生创造出的新兴产业可能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导致某些产业的消失与毁灭、某些地区的经济衰退,这时政府要采取政策解决好结构性失业问题。

2. 研究展望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不仅涉及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问题,还包括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文章仅关注了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演替问题,未来还要借鉴相关理论进行更全面的研究。第二,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启示主要

体现在供给侧方面,实际上,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分配领域的调整与需求侧管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调节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以及居民内部的分配结构,才更有利于扩大总消费需求,总需求的扩张才更有助于拉动总供给与新兴产业的扩张。否则,总需求扩展缓慢必然降低新兴产业的扩张,降低区域新旧产业更替的速度。与此同时,政府要调节支出结构,减少对传统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增加对广义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有利于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有助于新产业的产生与区域产业新旧更替。对分配领域和需求侧的研究需要纳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之中,才能在更大的经济循环中全面认识区域产业演替机理。第三,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既需要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获得先发优势,又需要在一些已有产业领域实现追赶。文章对已有产业领域追赶的分析还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结合起来,未来需要将二者结合,进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技术—经济范式意义上的新兴产业与技术—经济范式内的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进行明确区分,未来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第四,区域产业演替实际上包含了新产业的进入、在位产业存续以及在位产业退出过程,文章的研究重点是新产业进入,而没有对在位产业的存续及其渐进式创新等进行分析,也没有对旧产业的退出进行深入分析。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下,存在许多僵尸企业与僵尸产业,这些企业与产业长期占据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会对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影响,其实质是一种逆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蔡昉,2021)。未来需要基于中国体制,对区域产业演替中的产业退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五,实现内生性的产业演替需要教育制度、科技创新制度、劳动力与就业制度、金融制度等进行一系列的变革,文章未对这些进行深入分析。第六,文章只是较为笼统地将发展阶段划分为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发展阶段的划分实际上可以更加细化。例如,就高速增长阶段而言,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刘易斯拐点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和刚达到刘易斯拐点后的资本深化阶段,进而比较这两个阶段产业演替特征与创新发展阶段产业演替的差异。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就发达国家核心地区产业演替特征展开研究,而忽视了

前两个阶段。未来应基于后发国家实践建立一门演化发展经济地理学,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演替的方式、速度、动力机制与影响等,这样可以为更多后发国家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C ANTONIN, S BUNEL.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 BINZ C, B TRUFFER, L COENEN. Path Creation as a Process of Resource Alignment and Anchoring: Industry Formation for On-Site Water Recycling in Beijing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2).
- [3] BOSCHMA R.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Resilience [J]. *Regional Studies*, 2015(5).
- [4] BOSCHMA R, R MARTIN. The aims and scop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Boschma R and R Martin (eds) [M].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5] BOSCHMA R, A MINONDO, M NAVARRO.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Spain: 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Relatednes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1).
- [6] CHAMINADE C, M BELLANDI, M PLECHERO, et al.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path renewal and creation in thick specializ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two textile districts in Italy and Sweden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9(10).
- [7] ESSLETZBICHLER J, D L RIGBY, R BOSCHMA, et al.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Boschma R and R Martin (eds) [M].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8] FREEMAN C. History, Co-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9(1).
- [9] HASSINK R. Locked in decline? On the role of regional lock-ins in old industrial areas [N]. In: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10] HU X, C YA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ivergent economic resilience: Path development of two resource-depleted cities in China [J]. *Urban Studies*, 2019(16).
- [11] ISAKSEN 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in regions: trapped in path exten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3).
- [12] ISAKSEN A, S-E JAKOBSEN, R NJØS, et al.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resulting from individual and system agency [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9(1).
- [13] ISAKSEN A, M TRIPPL. Exogenously Led and Policy-Supported New Path Develop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Analytical and Synthetic Route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5).
- [14] JOLLY S, M GRILLITSCH, T HANSEN. Agency and actors in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and longitudinal analysis [J]. *Geoforum*, 2020(5).
- [15] LEE J, K LEE. Catching-up national innovations systems (NIS) in China and post-catching-up NIS in Korea and Taiwan: verifying the detour hypothe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11).
- [16] LEE K. Schumpeterian analysis of economic catch-up: Knowledge, path-creation,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7] LEE K. The art of economic catch-up: Barriers, detours and leapfrogging in innovation system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8] LEE K, X GAO, X LI. Industrial catch-up in China: a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perspectiv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6(1).
- [19] MACKINNON D, A CUMBERS, A PIKE, et al.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apt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2).
- [20] MACKINNON D, S DAWLEY, A PIKE, et al. Rethinking Path Creation: 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2).
- [21] MALERBA F, K LE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catch-up by latecomers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21(4).
- [22] MARTIN R, P SUNLEY.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4).
- [23] MARTIN R, P SUNLEY. Complexity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5).
- [24] NELSON R R. Co-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995(2).
- [25]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 [26]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1).

- [27] PIKE A, S DAWLEY, J TOMANEY. Resilience, adaptation and adaptabilit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1).
- [28] PIKE A, D MACKINNON, A CUMBERS, et al. Doing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2).
- [29] SCHOT J, W E STEINMUELLER. Three frames for innovation policy: R&D,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 [J]. Research Policy, 2018(9).
- [30] SEMPER D. Machina ex Deus? From Distributed to Orchestrated Agency [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019(3).
- [31] YEUNG H W-C. Strategic coupling: 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2] 蔡昉. 从日本经济表现看“长期停滞”的典型特征[J]. 日本学刊, 2021(4).
- [33] 蔡昉. 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5).
- [34] 陈东琪. 强波经济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35] 陈东琪等著. 繁荣与紧缩——中国2003-2007年的宏观调控 [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9.
- [36] 陈平. 代谢增长论: 技术小波和文明兴衰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37] 陈平, 刘刚. 代谢增长论: 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J]. 清华政治经济学报, 2014(1).
- [38] 封凯栋, 姜子莹. 国家在创新转型中的双重角色: 创新理论视角下发展型国家兴衰对中国政策选择的启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6).
- [39] 封凯栋, 李君然. 技能的政治经济学: 三组关键命题[J]. 北大政治学评论, 2018(2).
- [40] 郭年顺, 李君然. 本土半导体企业打破“后进者困境”的路径和机制——以华为海思为例[J]. 企业经济, 2019(6).
- [41] 胡晓辉. 区域经济弹性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8).
- [42] 胡晓辉, 朱晟君, R HASSINK. 超越“演化”: 老工业区重构研究进展与范式反思[J]. 地理研究, 2020(5).
- [43] 黄阳华. 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兼论构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经济学[J].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1(1).
- [44] 李伟.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 从双重空间打破到双重空间锁定[D].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后出站报告, 2021.
- [45] 李伟, 贺灿飞. 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 研究述评与展望[J]. 区域经济评论, 2020(6).
- [46] 李伟, 贺灿飞. 企业所有制结构与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J]. 地理研究, 2021(5).
- [47] 李伟, 贺灿飞.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4).
- [48]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49] 刘伟, 蔡志洲. 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的稳定性[J]. 管理世界, 2021(5).
- [50] 许宪春, 雷泽坤, 窦园园. 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2).
- [51] 余振, 龚惠文, 胡晓辉. 可持续性转型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3).
- [52] 郑江淮, 冉征. 走出创新“舒适区”: 地区技术多样化的动态性及其增长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5).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e Canfei Li Wei

Abstract: Birth-death process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us in-depth analysis of birth-death process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s reasonab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echnology cycle, technology relatednes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iscusses the behavioral change of economic 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s. This study also analys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ly, 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on the basis of China's practice will b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gional high-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Birth-death Process of Regional Industries; Creation of New Industries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高质量发展】

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动态演进分析*

付媛 郭晨 任保平

摘要:从规模水平、经济地位、发展支撑、竞争能力、协同发展和共享发展六个维度构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TOPSIS法测度2015—2020年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借助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显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差异持续扩大;动态视角来看,电子商务发展处于高水平的省份存在极高的稳定性,而处于低水平、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的省份转移概率均会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分维度来看,不同排名区间的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和薄弱环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各省份要根据具体的发展特点提升核心维度并补强薄弱环节,以此提升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

关键词: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熵权TOPSIS法;动态演进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43-08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研究”(19FJLB011);陕西省社会科学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电商发展质量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20ZD195-157);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陕西省电商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2021KRM165)。

作者简介:付媛,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 710127)。

郭晨,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西安 710127)。

任保平,男,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西安 710127)。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协同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消费更加便捷。2009—2020年,国内电子商务交易额从3.8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37.21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为25.46%。但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导致平台的无序扩张,形成垄断,对部分线上商铺和线下实体零售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对于依靠互联网开展业务的企业,网络零售信息技术和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快递作为电子商务的支撑,二者的协同发展态势仍不稳定,农村电子商务末端物流配送也存在提升空间,这些都是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2018年全国电子商

务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加快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因此,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要转变发展方式,提质升级,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测度省域电子商务发展质量,并分析其动态演进趋势,为“十四五”时期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缩小省份间差距提供参考。

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

通过明确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相

应的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恰当的方法对2015—2020年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动态演进特征。

1.内涵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来源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理论,但又根据其自身特点以及所涵盖的范围在目标要求上有所区别。史丹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同时注重发展的“量”和“质”,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关注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公平、产业协同发展,关注城乡协调发展。赵剑波等(2019)指出高质量发展要强调发展的充分性和均衡性,是发展方式、发展结果、民生共享等多个维度的增长和提升,最重要的是对民生充分关注。

基于以上观点,电子商务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以前重点关注“量”的增长到同时考虑“质”的提升。一方面要满足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注重发展方式,强调充分、均衡的发展。具体从省域视角来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基本面增长稳定,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以及良好的竞争能力,发展成果有助于协同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从根本上要着眼于促进发展的充分性和平衡性,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表现为:

基本面增长稳定。高质量发展的电子商务,其规模平稳扩大依然处于重要地位,同时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电子商务发展潜力的提升与可持续性体现在拥有良好的发展支撑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发展支撑具体表现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企业增加,吸引更多人才流入,通过竞争增强企业活力,地方财政为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资本的流入为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有助于促进协同发展。促进协同发展意味着与电子商务关系最为密切的快递物流行业表现出同步发展的趋势,二者相互促进,实现实体价值链与虚拟价值链的有效整合,促进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区域层面,高质量的电子商务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

2.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有助于明晰现阶段各省份电子商务发展质量,为各省份在“十四五”期间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比性原则,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及连续性,依据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表现,构建包括规模水平、经济地位、发展支撑、竞争能力、协同发展和共享发展六个维度的中国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尽可能采用比率或均值,避免各地区电子商务总量差异带来的影响,以确保评价结果相对准确(见表1)。

表1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代码	单位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规模水平	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量比重	X ₁	%
		人均电子商务采购额	X ₂	万元/人
		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	X ₃	万元/人
	经济地位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GDP的比重	X ₄	%
	发展支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比重	X ₅	%
		信息产业法人单位数比重	X ₆	%
	竞争能力	信息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X ₇	%
		信息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X ₈	元/人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比	X ₉	%
		电子商务交易净流入	X ₁₀	亿元
	协同发展	人均快递业务量	X ₁₁	件/人
		快递业务收入占GDP的比重	X ₁₂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员比重	X ₁₃	%
	共享发展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占比	X ₁₄	%
		单位面积农村投递路线	X ₁₅	千米/km ²

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比重以及信息产业法人单位数比重均指其占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比重。

电子商务规模水平可以表现出电子商务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采用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量比重度量电子商务发展的广度,采用人均电子商务采购额和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度量电子商务在多年发展中的成果积累。经济地位提高代表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和稳定性提升,采用电子商务销售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相关实体配套服务企业对于电子商务后续发展的支撑以及人才和资金流入带来的竞争能力提升两个方面,发展支撑对电子商务后续建立越来越完善的服务体系以及吸引人才集聚进行创新有重要作用,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比重以及信息产业法人单位数比重来度量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企业起到的支撑作用大小;竞争能力离不开人才和资金的支持,以信息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以及平均工资衡量人才方面的竞争力,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比衡量创新方面的竞争能力,以电子商务销售额与采购额的差额衡量资金方面的竞争力。协同发展最直接表现在快递行业,采用人均快递业务量、快递业务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比重来反映协同发展水平。实现共享发展是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采用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占比衡量电子商务对线下零售业的挤占程度,用单位面积农村投递路线这一与网络零售密切相关的指标来间接反映电子商务发展从城市到农村的带动作用。

3. 数据处理与评价方法

本文采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的补充数据。

第一,通过熵权TOPSIS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既可以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损失指标信息,简明直观。第一步,标准化处理;第二步,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通过TOPSIS法得到所评价对象的综合指数。推导过程具体可参考杨丽(2015),李军(2017)。

第二,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15—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发展趋势,通过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将周边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探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地理相关性。

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本部分通过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分析、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分维度评价三个方面的探讨,来分析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结果。

表2为2015年和2020年各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指数以及全国的平均值。整体来看,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2015年电子商务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取值区间为 $[0.0527, 0.4357]$,而2020年这一区间扩大到了 $[0.0652, 0.7193]$,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表2 各省2015年和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指数

省(区、市)	2015年	2020年	省(区、市)	2015年	2020年
均值	0.1226	0.1900	河南	0.0826	0.1154
北京	0.4357	0.6685	湖北	0.1075	0.1536
天津	0.1982	0.2775	湖南	0.0759	0.1184
河北	0.0667	0.1512	广东	0.2061	0.4157
山西	0.0678	0.1033	广西	0.0591	0.0897
内蒙古	0.0828	0.1221	海南	0.1156	0.1535
辽宁	0.0976	0.1467	重庆	0.1228	0.1702
吉林	0.0663	0.0933	四川	0.0886	0.1293
黑龙江	0.0705	0.1090	贵州	0.0781	0.0902
上海	0.4331	0.7193	云南	0.1042	0.0895
江苏	0.1646	0.2575	西藏	0.0564	0.0856
浙江	0.2057	0.4407	陕西	0.0928	0.1312
安徽	0.1121	0.1825	甘肃	0.0527	0.0652
福建	0.1049	0.2002	青海	0.1092	0.1006
江西	0.0870	0.1265	宁夏	0.0749	0.0931
山东	0.1132	0.2052	新疆	0.0694	0.0848

从各省数值大小来看,2015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为0.1226,排名前五位的省(区、市)为北京(0.4357)、上海(0.4331)、广东(0.2061)、浙江(0.2057)、天津(0.1982),均为东部地区省(区、市),排名后五位的省(区、市)为河北(0.0667)、吉林(0.0663)、广西(0.0591)、西藏(0.0564)、甘肃(0.0527)。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为0.1900,前五名依然为上海(0.7193)、北京(0.6685)、浙江(0.4407)、广东(0.4157)、天津(0.2775),五个省份表现出了较高的稳定性,后五位为广西(0.0897)、云南(0.0895)、西藏(0.0856)、新疆(0.0848)、甘肃(0.0652)。

从变动趋势来看,2015—2020年电子商务发展质量提升幅度较大的省(区、市)有上海、浙江、北京、广东,指数分别增长了0.2862、0.2350、0.2328、0.2096,电子商务发展质量倒退的省(区、市)有云南和青海,指数分别降低了0.0147和0.0086。

总体来讲,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四个省(市)的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排名靠前的省份在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持高增速,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较低的省份在发展的过程中质量增长较为缓慢,这会导致发展差异的持续扩大。

三、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分析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将从其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三个维度展开研究。

1.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密度估计

基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2015年、2016年、2018年以及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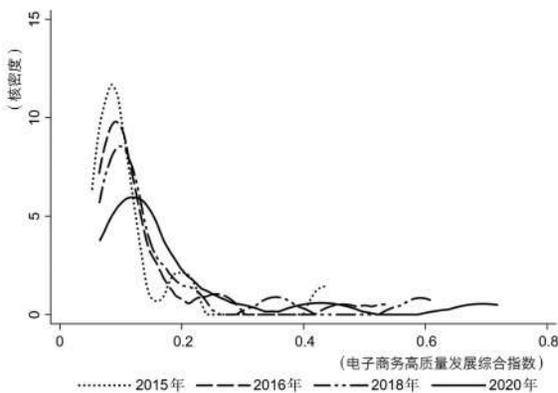


图1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密度估计

从分布形态来看,中国省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密度函数呈偏态分布,波峰峰值逐渐降低且波峰右移,宽度增加,说明虽然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初在较低的区间聚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另外,从分布延展性来看,出现了极其明显的右拖尾情况,也说明2015—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靠前的省份与发展靠后的省份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从分布的波峰数量来看,各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呈现多极化现象,2015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在省域层面出现了

明显的断层,但峰值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说明极化现象得到缓解。

2.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

表3以2015年作为基准年份,采用马尔科夫链方法进一步分析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动态演进特征。依据综合指数大小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水平区间,处于 $[0, 0.0705]$ 的为电子商务发展低水平省份、处于 $(0.0705, 0.0928]$ 的为电子商务发展中等水平省份、处于 $(0.0928, 0.1156]$ 的为电子商务发展中高水平省份、处于 $(0.1156, +\infty)$ 的,则为高水平省份,分别记作状态I、状态II、状态III和状态IV,最终通过MATLAB软件求解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表3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I_{t+1}	I	II	III	IV
I	0.5500	0.4500	0.0000	0.0000
II	0.0513	0.5641	0.3846	0.0000
III	0.0000	0.1389	0.5278	0.3333
IV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由表3可得2015—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动态性信息。根据结果,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指数处于低水平的省(区、市)一年后依然处于低水平的概率为55.00%,处于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的省份,在一年后保持同等水平的概率分别为56.41%和52.78%,这三个状态的省份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指数处于高水平的省份有极高的稳定性。

样本观测期(2015—2020年)内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分布演进具有如下特点: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转移概率矩阵中,各省份倾向于保持现状,处于高水平以外的省份有相近的稳定性,但处于高水平的省份则获得了极高的稳定性;处于低水平、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的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正向转移的概率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概率为零,变动多发生于相邻状态下,但朝更高水平区间转移的情况相比反向转移更容易发生。

3.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

区域电子商务的高质量发展变动带来的各方面提升会对周围的省份产生影响,因此基于邻接原则建立空间权重矩阵,以滞后一年为条件计算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表4反映了31个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转移概率矩阵。处于高水平的省(区、市)自身获得了极高的稳定性,不容易受到周围省份的影响,而处于其他水平的省(区、市)发展并不平稳。例如,处于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的省(区、市)存在反向转移的概率。周围省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高时产生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定。例如,周围省(区、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处于高水平的情况下,低水平和中高水平的省(区、市)向上转移的概率都有较大提升,均为50%,但对中等水平省(区、市)来说,邻接省份为高水平条件下的正向转移概率要低于邻接省份为中高水平的情况。对于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的省(区、市)来说,当与邻接省份处于相同的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时,会增大本省反向转移的风险。

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分维度评价

表5是31个省(区、市)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指数以及排名,参照程晶晶和夏永祥(2021)的划分方法,定义各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维度和薄弱环节,各省份排名最靠前且处于前50%的分维度为该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维度,把各省份排名最靠后且处于后50%的分维度定义为薄弱环节,对各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在各维度层面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分维度来看,在不同的排名区间,各省(区、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和薄弱环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核心维度分布较为均匀,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发展支撑维度的提升。排名靠中间的省(区、市)核心维度多出现在发展支撑和共享发展维度。排名靠后的省(区、市)除发展支撑外少有核心维度,且在所有维度均出现了薄弱环节,重点需要提升规模水平与竞争能力。

1. 规模水平

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规模水平指数均值为0.1436,整体来看,各省(区、市)在规模水平上获得了较快的增长。以该维度为核心维度的省(区、市)有北京、重庆和内蒙古。北京的规模水平分维度指数得益于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与较高的经济活力,该维度下所有三级指标均为全国第一。该维度为

表4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滞后类型	$t/t+1$	I	II	III	IV
I	I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I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III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IV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I	I	0.5833	0.4167	0.0000	0.0000
	II	0.1176	0.5294	0.3529	0.0000
	III	0.0000	0.2000	0.6000	0.2000
	IV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II	I	0.5000	0.5000	0.0000	0.0000
	II	0.0000	0.5455	0.4545	0.0000
	III	0.0000	0.2308	0.4615	0.3077
	IV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V	I	0.5000	0.5000	0.0000	0.0000
	II	0.0000	0.6000	0.4000	0.0000
	III	0.0000	0.0000	0.5000	0.5000
	IV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薄弱环节的省(区、市)有河北、山西、河南、吉林和黑龙江,主要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较低的省(区、市),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规模水平短板。综合来看,以规模水平为核心维度的省(区、市)在“数量”的提升方面相对其他维度表现优秀,仍需要重点关注提升发展质量,而规模水平维度为薄弱环节的省份则要注意加大对电子商务的扶持力度,改善电子商务企业外部营商环境,助力电子商务企业健康发展。

2. 经济地位

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地位指数平均值为0.2020,前两名的省份是北京(1.0000)和上海(0.8491),远远超过其他省(区、市),最后一名的省(区、市)是西藏(0.0288)。经济地位指数较高的省份电子商务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以该维度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核心维度的省(区、市)有北京、重庆、山东、内蒙古。与此同时湖北、福建、陕西、吉林和西藏的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该维度成为其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应当在发展的过程中予以重视。

3. 发展支撑

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支撑指数的平均值为0.5123。以该维度为核心维度的省(区、市)有天津、辽宁、江西、湖北、黑龙江、山西、新疆和宁夏,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对配套服务企业的支持为

表5 2020年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指数

省(区、市)	综合指数		规模水平		经济地位		发展支撑		竞争能力		协同发展		共享发展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上海	0.7193	1	0.7630	2	0.8491	2	0.6619	4	0.7500	2	0.7189	1*	0.9243	1*
北京	0.6685	2	1.0000	1*	1.0000	1*	0.4434	24#	0.9551	1*	0.3807	4	0.4587	2
浙江	0.4407	3	0.1561	6	0.2416	7	0.5506	13	0.5436	4	0.6976	2*	0.3364	5
广东	0.4157	4	0.2391	4	0.3681	4	0.5523	12	0.5836	3*	0.5483	3*	0.2830	6
天津	0.2775	5	0.2422	3	0.4150	3	0.7637	1*	0.2977	8	0.2577	5	0.4019	3
江苏	0.2575	6	0.1486	7	0.1565	13	0.6521	5	0.4076	5	0.2284	7	0.3632	4*
山东	0.2052	7	0.1429	8	0.2436	6*	0.5477	14	0.3104	7	0.1489	11	0.2334	8
福建	0.2002	8	0.1131	10	0.1384	18#	0.5930	9	0.2616	10	0.2357	6*	0.1984	9
安徽	0.1825	9	0.1147	9	0.2053	10	0.5658	10	0.3118	6*	0.1220	18#	0.1425	15
重庆	0.1702	10	0.1614	5*	0.3059	5*	0.4814	20#	0.2336	11	0.1232	17	0.1359	17
湖北	0.1536	11	0.1011	14	0.1400	17#	0.6224	6*	0.2621	9	0.1261	15	0.1434	14
海南	0.1535	12	0.1060	12	0.2166	9	0.5275	16	0.1857	15	0.1385	13	0.2788	7*
河北	0.1512	13	0.0531	23#	0.1467	15	0.5260	17	0.1697	19	0.2195	8*	0.1789	11
辽宁	0.1467	14	0.0841	16	0.2195	8	0.6995	2*	0.1885	14	0.1626	9	0.1606	13
陕西	0.1312	15	0.0742	19	0.0883	23#	0.4556	23#	0.1999	13	0.1332	14	0.1802	10*
四川	0.1293	16	0.1032	13	0.1465	16	0.4829	19	0.2043	12*	0.1096	21#	0.1304	19
江西	0.1265	17	0.0799	17	0.1563	14	0.6635	3*	0.1810	16	0.1085	22	0.0940	23#
内蒙古	0.1221	18	0.1096	11*	0.2038	11*	0.5033	18	0.1039	27	0.1150	20	0.0483	31#
湖南	0.1184	19	0.0845	15	0.1160	19	0.4352	26#	0.1769	17	0.0913	25	0.1746	12*
河南	0.1154	20	0.0482	27#	0.0832	24	0.4172	27#	0.1732	18	0.1257	16*	0.1368	16*
黑龙江	0.1090	21	0.0193	31#	0.0441	29	0.6051	7*	0.1094	26	0.1573	10	0.0782	27
山西	0.1033	22	0.0518	25#	0.1611	12	0.6046	8*	0.1149	23	0.1061	23	0.1323	18
青海	0.1006	23	0.0641	20	0.0684	25	0.3065	29	0.0880	28	0.1162	19	0.0490	30#
吉林	0.0933	24	0.0212	30#	0.0334	30#	0.4664	22	0.0826	29	0.1447	12*	0.1286	21
宁夏	0.0931	25	0.0519	24	0.0584	27	0.5394	15*	0.1235	22	0.0890	26	0.0553	28#
贵州	0.0902	26	0.0606	21	0.1033	22	0.3307	28	0.1453	20	0.0560	31#	0.1293	20
广西	0.0897	27	0.0606	22	0.1093	20	0.4788	21	0.1114	25#	0.0947	24	0.0928	24
云南	0.0895	28	0.0744	18	0.1082	21	0.4423	25	0.1131	24	0.0792	27#	0.0783	26
西藏	0.0856	29	0.0362	28	0.0288	31#	0.1987	31#	0.1362	21	0.0575	30	0.0545	29
新疆	0.0848	30	0.0360	29	0.0482	28	0.5555	11*	0.0779	30#	0.0713	29	0.1163	22
甘肃	0.0652	31	0.0507	26	0.0587	26	0.2088	30	0.0575	31#	0.0773	28	0.0789	25

注：*代表核心维度，#代表薄弱环节。

未来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展现了良好发展态势;在该维度上处于薄弱环节的省(区、市)有重庆、陕西、北京、湖南、河南和西藏,综合排名靠前的北京和重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相关实体配套服务企业的同步发展,而陕西、湖南、河南和西藏则应积极调动区域资源,提高信息服务以及物流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将生产、销售、运输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全环节打通。

4. 竞争能力

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竞争能力指数的平均值为0.2471。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北京(0.9551),拥

有优越的发展环境,经济基础对相关人才的吸引提升了北京的电子商务竞争能力,同时将竞争能力作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的省份还有广东、安徽和四川。而该维度处于薄弱环节、亟待发展的省份有广西、新疆和甘肃,存在人才吸引能力不足以及财政对创新支持不足的问题,需要采取措施,提高本地电子商务人才及创新方面的竞争能力。

5. 协同发展

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在协同发展维度的平均值为0.1884,整体发展稳定提升。排名第一的是上

海(0.7189),上海的电子商务起步早,各方面发展均衡,快递与电子商务相互促进,深度融合。同时浙江、广东、福建、河北、吉林和河南也以该维度为核心维度,但中西部地区在协同发展方面还需继续提升,安徽、四川、云南和贵州四个省份的协同发展维度为薄弱环节,其中,云南和贵州需要进一步促进物流业转型升级,提高二者协同发展水平。

6. 共享发展

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共享发展指数平均值为0.1935,整体发展缓慢,在所有维度中变化最小。以该维度为核心维度的省份有上海、江苏、海南、陕西、湖南和河南,该维度处于薄弱环节的省份有江西、宁夏、青海和内蒙古。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打破了交易的地域限制,对线下的实体交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农村电子商务的交易扩大与服务体系完善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电子商务发展,解决电子商务对实体交易的挤占与农村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困难的问题。

五、结论与提升路径

本文基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内涵对中国各省(区、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全国层面来看,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梯队的省份增速不同,导致总体差异不断扩大且存在多极化现象,产生了发展的断层。二是从动态视角来看,各省(区、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倾向于保持不变,向上转移的概率会随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电子商务发展高水平的省(区、市)具有极高的稳定性,而不属于最高水平区间的省(区、市)转移概率会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并且发展状态存在反向转移的风险。三是分维度来看,不同排名区间的省(区、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和薄弱环节存在差异性。排名靠前的省(区、市)核心维度分布较为均匀,但需要重点加强发展支撑维度的提升。中间排名的省(区、市)核心维度多出现在发展支撑和共享发展维度。排名靠后的省(区、市)除发展支撑外少有核心维度,薄弱环节在各个维度均有分布,重点需要提升规模水平与竞争能力。

薄弱环节的补齐可以帮助各省(区、市)缩短差距,进一步提高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实证结论与现实背景,本文提出如下提升路径: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环节,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电子商务提质增效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能助力电子商务发展覆盖更多农村地区,帮助更多农产品触网,从而扩大农民收入。政府也应当在发展中积极引导,依据各省份产业特点通过数字化推进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与升级,并同时对本省份电子商务企业加强监管,树立良好的地区品牌形象,保证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为规模扩大打下坚实的基础,稳步提升电子商务的经济地位。

第二,特许经营实现短期布局,标准管理确保长期发展。特许经营是地区内物流网络快速覆盖的有力手段,应鼓励快递物流网点持续向乡镇延伸,初步的布局结束后可以通过大数据建成域内高效物流网络,通过出台标准化管理措施对快递网络的各个节点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规范管理,保障形成长期稳定的物流体系,提高服务质量,为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第三,虚拟集聚打破地域限制,搭建人才协调新机制。竞争能力维度最重要的是对人才的吸引,对人才的吸引力本质上依靠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适配的岗位以及人才待遇,加快培养创新型、发展型、复合型“互联网+现代商务服务”高素质人才,能够帮助企业现有电子商务人才提高并扩充现有人才队伍。借助地区内部电子商务发展质量较高省(区、市)的优势,利用网络虚拟集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解决缺少人才和配套服务的局面,降低地理位置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扩大服务范围,实现区域内空间互动的人才协调新机制。

第四,政府财政支持创新发展,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与电子商务联接的智能化制造管理要依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政府在学习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符合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引导新技术发展,加大对信息技术研发应用的财政支持,鼓励电子商务企业优化研发和设计,促进产品更新迭代适应互联网的快节奏,整合物流等优势资源,创新解决农村电子商务配送问题。一方

面是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对电子商务企业发展促进,另一方面也对现代物流体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能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强电子商务的竞争能力。另外,在对创新发展支持的过程中,要营造公平有活力的创新发展环境,拓宽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领域。

第五,物流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推动进一步协同发展。乡镇网点的全覆盖依赖于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乡镇地区,统筹推进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将快递物流相关的用地纳入城乡规划,提供政府财政支持,逐渐将配送体系向乡、村延伸,重点解决乡镇末端配送问题,帮助拓宽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渠道。

第六,加速线上线下创新融合,推动实体零售新发展。实体零售拥有线上零售没有的现场体验与服务优势,可以满足顾客对于了解商品实物形态的期望和要求,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推动实体零售数字化发展,提高交易效率,从而突破交易的区域限制;另一方面要转变旧的经营模式,突出实体零售的体验功能,利用社交软件将线下和线上商城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并加以普

及,支持实体零售发挥线上零售没有的现场体验与服务优势,扩大实体零售交易。

参考文献

- [1]李怀政.互联网渗透、物流效率与中国网络零售发展——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分析与方差分解[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8).
- [2]沈颂东,亢秀秋.大数据时代快递与电子商务产业链协同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7).
- [3]赵广华.基于共享物流的农村电子商务共同配送运作模式[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7).
- [4]杨伟民.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8(2).
- [5]刘志彪.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学术月刊,2018,50(7).
- [6]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管理世界,2019,35(7).
- [7]王一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突破哪些关口[N].联合时报,2018-04-13(4).
- [8]史丹,赵剑波,邓洲.从三个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N].经济日报,2019-09-09(14).
- [9]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

Measurement and Dynamic Evolution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E-commerce

Fu Yuan Guo Chen Ren Baoping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of e-commerce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six dimensions of scale level, economic status, development support, competitivenes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Mea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vincial e-commerce from 2015 to 2020 based on the Entropy TOPSIS method. The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by us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arkov chai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shows an upward trend, but the development gap continues to expand.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provinces with high level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have high stability, while the transfer probability of provinces with low level, medium level and medium high level will be affected by neighboring provi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mension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re dimensions and weak links of e-commer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rankings. All provinces should improve the core dimensions and strengthen the weak link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impro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mmerce.

Key Words: E-commer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Entropy TOPSIS Method; Dynamic Evolution

(责任编辑:平 萍)

【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

彭俊杰

摘要:以2000—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在厘清“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机制基础上,构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质量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相关分析探讨三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联系,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并处于中等发展水平阶段,其空间分布与区域资源禀赋具有高度一致性;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呈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各省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发展特征,总体上表现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典型的“阶段突变”特征。以2010年为分界线,2010年以前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空间集聚不稳定,呈现正负分化明显的波动特征;2010年以后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正在从区域离散向区域集聚发生转变,且表现为“高—高”区域、“低—低”区域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关键词: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51-09 **收稿日期:**2021-12-28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互馈作用机制与协同优化研究”(20CGLO33);2021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强化副中心城市能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研究”(2021WT47)。

作者简介:彭俊杰,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 450002)。

一、引言

2020年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这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重要的能源基地,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能源和粮食发展的关键要素。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科学认知“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准确把握三者之间的时空演进规律,对于共同抓好黄河流域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促进全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作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其发

展先后经历了水—能源、水—粮食和能源—粮食以“单一中心”为主体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而后演变成将三者纳入统一框架的研究过程。2011年,在德国召开的波恩会议上,有学者首次提出了“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W-E-Fnexus)的研究命题,建议重构纽带系统与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等作用关系与内在机理。随后,关于“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纽带系统的科学认知。主要从安全(Hoff H, 2011)、管理(FAO, 2014)、功能(Endo A et al., 2017)、学科(Van Gevelt T, 2020)四个维度来不断丰富对“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认知。二是纽带系统的复杂关联。主要存在“水—能源—粮食”系统的静态观(Kalomoria Z, et al., 2018)、慢变量观(Patience M, et al., 2020)和资源整合观(Mehzabeen M, et al., 2018)三种主要观点。三是纽带系统的实证分析。在时间尺度上,从年际动态变化(Jennifer D, et al., 2020)、季节性变化(Rodrigo A B, et al., 2018)降维至实时动态监测(Laura B, et al., 2020);在空间尺度上,从单一居民(Wael A H, et al., 2018)、城市(Bassel D, et al., 2019)、流域(Ethan Y C, Sungwook W, 2018)扩展到全球范围(Matrin F, et al., 2018)。国内学者对于水、能源和粮食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期主要侧重于水—能源(项潇智、贾绍凤, 2016;孔令斯等, 2018)、水—粮食(李春晖等, 2008;常明等, 2019)、能源—粮食(郝帅等, 2021)等两两关系,而把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纳入同一框架内研究不多,最早追溯到2010年(米红、周伟, 2010),直到2016年国内学者才开始提出水、能源和粮食的纽带关系(李桂君等, 2017;刘倩等, 2018;白景锋、张海军, 2018)。而针对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研究不多。基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区域,以2000—2020年为研究时段,首先厘清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机理,并构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并根据耦合作用机理分析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最后对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旨在为系统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借鉴。

二、耦合协调机制分析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两两关系,而是一个“传导—耦合—反馈—适应”的复杂关系。以往关于黄河流域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流域水效率、流域水管理机制、流域水生态文明,流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本底、大气环境、水资源与水环境、生态功能的胁迫响应,以及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彭少明等, 2008;周振、孔祥智, 2015;邵鹏等, 2020;石涛, 2020;李瑞、刘腾花, 2021)。对于黄河流域来说,粮食从“农田—餐桌—厨房”的循环往复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和能源动力,能源特别是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冷却等也是以水资源的消耗为基本前提;与此同时,粮食既可以为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物质资料,又为能源生产提供生物质原材料。由于“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具有边界模糊性、动态性和开放性,这就决定了系统研究的复杂性;而黄河流域又集中反映出资源型缺水 and 季节性缺水并存的敏感区域,能源资源与粮食资源相互转化、相互支撑,能源开发、粮食生产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它们之间具备复杂的非线性响应特征,因此,研究黄河流域需要同时强调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耦合机制与协同机制。(1)传导机制:水、能源和粮食作为黄河流域的资源产品属性,水资源是核心要素,能源资源是动力支撑,粮食资源是基本保障,在生产、消费、转化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相互传导。(2)耦合机制: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是一种实现资源稀缺性有效应对的新型治理模式,且不能牺牲某一个子系统的发展来换取其他系统的发展,能够确保水、能源和粮食的供给安全和供需适配。(3)协同机制:水资源、能源资源和粮食资源是共同支撑黄河流域健康发展的“慢变量”,三者之间的演化需要先后经历失调衰退—勉强协调—耦合协调三个发展阶段,最终实现水、能源和粮食利用效率最大化,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容量最大化,进而推动实现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设计：模型、方法与数据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分布区、能源富集区和粮食生产核心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彭俊杰,2021)。基于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等部门的不同隶属关系,笔者借鉴耦合协调度的相关研究,从集中化、链条化、合理化三个维度,选取水资源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粮食子系统三个层面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

1.“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机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建立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text{正向: } X_{ij}' = [X_{ij} - \min(X_{ij})] / [\max(X_{ij}) - \min(X_{ij})] \quad (1)$$

$$\text{负向: } X_{ij}' = [\max(X_{ij}) - X_{ij}] / [\max(X_{ij}) - \min(X_{ij})] \quad (2)$$

然后参考周振和孔祥智(2015)的研究成果,计算水、能源、粮食的评价指数。

$$\begin{aligned} \text{Water} = \rho_1 &= n \sqrt[n]{\prod_{i=1}^n X_i} \\ \text{Energy} = \rho_2 &= n \sqrt[n]{\prod_{i=1}^n Y_i} \\ \text{Food} = \rho_3 &= n \sqrt[n]{\prod_{i=1}^n Z_i} \end{aligned} \quad (3)$$

式(3)中, ρ_1 、 ρ_2 、 ρ_3 分别表示水资源子系统、能源子系统、粮食子系统发展指数, X_i 、 Y_i 、 Z_i 分别表示描述三个子系统指数的标准化数值。

建立综合评价指数:

$$T = \sqrt[3]{\rho_1 \cdot \rho_2 \cdot \rho_3} \quad (4)$$

式(4)中, T 表示综合评价指数,代表纽带系统的综合发展能力,当 $T \in (0, 0.3]$ 时,说明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当 $T \in (0.3, 0.7]$ 时,说明处于中等水平发展阶段;当 $T \in (0.7, 1]$ 时,说明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

2.耦合协调度测度

引入耦合度模型主要是用来度量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和交互耦合强度。

$$C = \sqrt[3]{(\rho_1 \cdot \rho_2 \cdot \rho_3) / [(\rho_1 + \rho_2 + \rho_3) / 3]^3} \quad (5)$$

式(5)中,耦合度 C 的取值区间为 $[0, 1]$ 。由于

耦合度不能全面有效的反映“水—能源—粮食”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水平,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sqrt{C \cdot T} \quad (6)$$

式(6)中,耦合度 D 的取值区间为 $[0, 1]$,当 $D \in (0, 0.4]$ 时,说明处于极度—中度失调阶段;当 $D \in (0.4, 0.5]$ 时,说明处于濒临失调;当 $D \in (0.5, 0.6]$ 时,说明处于勉强失调;当 $D \in (0.6, 0.7]$ 时,说明处于初级协调;当 $D \in (0.7, 0.8]$ 时,说明处于中级协调;当 $D \in (0.8, 0.9]$ 时,说明处于高级协调。 T 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3.基于Moran's I指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如果单独依靠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复杂关联和相互影响并不能判断其空间作用。为此,引入全局Moran's I指数来测度纽带系统的空相关性和集聚程度:

$$\text{Moran's 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Z_i - Z)(Z_j - Z)}{S^2 \sum_{i=1}^n \sum_{j=1}^n W_{ij}} \quad (7)$$

式(7)中, n 是研究对象个数, Z_i 和 Z_j 分别为 i 、 j 区域的观测值,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 S^2 为观测值方差, Z 为观测值平均值。

4.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黄河水资源公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沿黄9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沿黄9省区统计年鉴等,缺失数据采用近邻年份数据进行差补。

四、实证分析

通过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的空间相关性、时间突变性等对黄河流域全域、上下游以及沿黄各省份之间的“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展开评价分析。

1.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如图1所示,2000—2020年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粮食系统评价指数上升态势明显,水系统次之,能源系统保持相对稳定。对于粮食系统来说,其评价指数从2000年的0.263上升至2020年的0.814,先后经历了2004年以前的低水平发展阶段、2018年以前的中等水平发展阶段

表1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单位	指标性质
“水—能源—粮食”耦合指数	水资源子系统	产水模数	水资源总量/区域面积	10 ³ m ³ /hm ²	正向
		产水系数	水资源总量/降水总量	%	正向
		灌溉面积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10 ³ hm ²	正向
		人均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人口总量	m ³ /人	正向
		人均用水量	用水总量/人口总量	m ³ /人	逆向
		生态用水占比	生态用水/用水总量	%	正向
		生活用水占比	生活用水/用水总量	%	正向
		废水排放量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万吨	逆向
		万元GDP用水量	用水总量/GDP	m ³ /万元	逆向
	能源子系统	能源生产量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万吨标准煤	正向
		能源消费量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万吨标准煤	逆向
		能源自给率	能源生产量/能源消费量	%	正向
		人均能源消费	能源消费量/人口总量	吨标准煤/人	逆向
		煤炭消费比重	煤炭消费量/能源消费量	%	逆向
		能源消耗强度	能源消费量/GDP	吨标准煤/万元	逆向
		能源消费系数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	逆向
		工业废气排放量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万吨	逆向
		能源工业投资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亿元	正向
	粮食子系统	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人口总量	kg	正向
		粮食单产	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吨/hm ²	正向
		粮食播种面积比例	粮食播种面积/区域总面积	10 ³ hm ²	正向
		机械动力	机械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	千瓦/hm ²	正向
		化肥负荷	化肥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吨/hm ²	逆向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	逆向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	逆向
		人口自然增长率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	逆向
		粮食流动成本	粮食零售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		逆向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元	正向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统计数据直接获取	元	正向		

资料来源:数据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黄河水资源公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沿黄9省(区)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沿黄9省(区)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近邻年份数据进行差补。“正向”代表正向指标,“逆向”代表负向指标。

到当前的高水平发展阶段,说明黄河流域的粮食生产总体情况逐渐向好,并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对于水系统来说,年际波动幅度最大,呈现“W”型走势,总体上由2000年的0.363上升至2020年的0.682,处于中等发展水平阶段,水系统年际波动主要受降水量地区分布差异的影响,上游的青海、四川、宁夏,中游的陕西、山西和下游的山东评价指数相对较高。对于能源系统来说,呈缓慢上升趋势,总体上由2000年的0.497上升至2020年的0.630,处于中等发展水平阶段,能源评价指数相对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山西、宁夏、陕西、青海等,能源评价指数相对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能源资源相对贫瘠的四川、河南、山东等省份。

从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来看,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0.362上升至2020年的0.705,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从综合评价指数的分布阶段来看,2000—2006年呈波动式上升,2006—2014年呈缓慢上升,2015—2020年呈快速上升。从“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内部质量的整体变化时间趋势来看,如图2所示,箱型图上限除2002年、2015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2000—2020年综合评价指数最高的陕西发展一直较快,稳步增加粮食产量、能源产量、能源自给率,降低废水排放量、能源消耗强度、万元GDP水耗等成为其重要表征;上四分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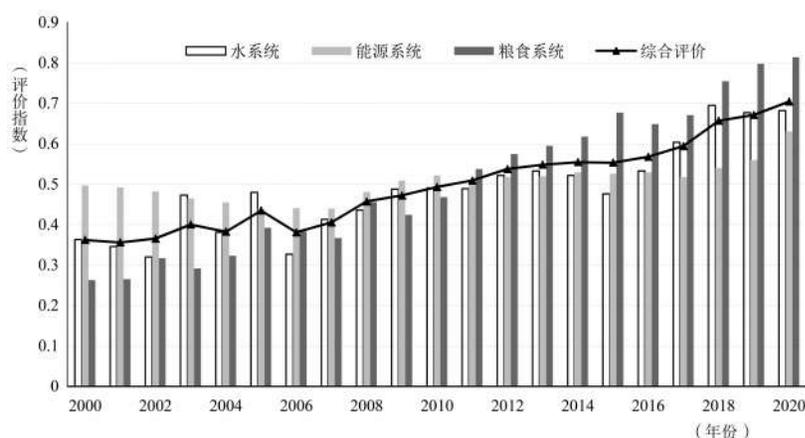


图1 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时序变化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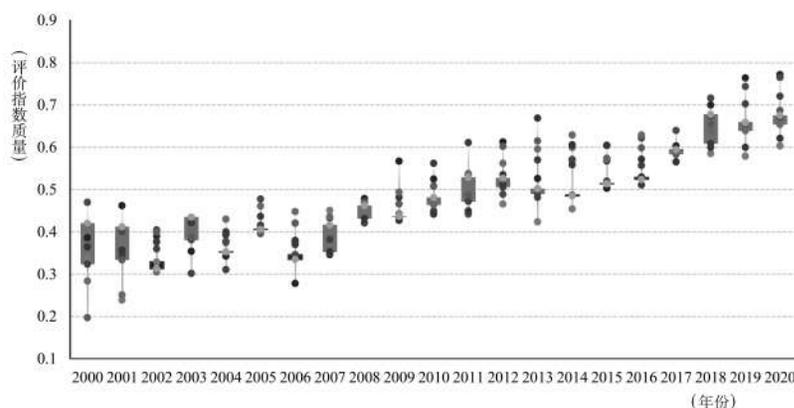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质量箱型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和下四分位整体呈增加趋势,说明综合评价指数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得分以波动式上升为主要变化趋势。

2.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纽带系统的耦合度分析。利用公式(5),计算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度可以看出,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度均值为0.980,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从总体上来看,2000—2020年耦合度呈现递增态势,耦合度均值由2000年的0.940增加至2020年的0.988,可见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正在由速度型耦合向质量型耦合全方位转变。从空间上来看,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度的空间差异较小且逐年降低,耦合度标准差由2000年的0.039降至2020年的0.010,2000年和

2020年高于耦合度均值的省份数量分别是1个和6个,占黄河流域全部省份数量的11.11%和66.67%,其中四川、陕西等省份的“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度始终高于平均水平。

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从时间维度上来看,2000—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576提高到2020年的0.822,总体上朝着高级协调的方向发展。在耦合协调度类型上,先后经历了两种类型:2000—2006年呈波动式上升,2006—2020年呈快速上升。2000年,黄河流域的宁夏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甘肃、河南、内蒙古、山西处于勉强失调状态;但到2020年,除内蒙古和河南这2个省份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外,其余各省份均处于高级协调状态。从流域来看,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上游、中游的耦合协调度从最初的勉强失调发展成为最终的高级协调状态,下游耦合协调度则从最初的勉强失调发展成

为最终的中级协调状态,并且呈现出“上游起点低、速度快、后发优势明显;下游起点高、速度慢、自然波动较大”的发展特点。这是因为在发展初期,与中下游地区相比,上游地区为了加快发展,走上了一条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之路,再加之上游地区生态本底脆弱,受到人类活动的扰动性较强,极易造成“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不协调、不平衡。特别是2016年以来,人们更加重视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合理配置、更加重视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于中下游地区来说,上游地区自然基础较好,“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恢复力和适应力更强,发展潜力更大。

为了更好地反映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我们绘制了2000—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2016—2020年各省份“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平均值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随着时间的

推移,黄河流域2002—2020年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非同步发展特征。总体来说,根据耦合协调度均值,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趋向“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递减空间分布格局。具体来说,2000—2005年,河南、甘肃、宁夏、山西等省份处在勉强失调阶段,青海、四川、内蒙古、陕西和山东处于初级协调阶段。2006—2010年,沿黄9省区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2011—2015年,黄河流域各省份“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出现了明显的转换,其中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四川、甘肃实现了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的跃升;只有河南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成为制约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区域。2016—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中级—高级协调阶段,其中青海、四川、甘肃发展速度较快,已经实现了由中级协调向高级协调的跃升。

3.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根据测算的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运用GeoDa软件计算“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I指数,结果显示,全局Moran's I指数在2015年、2020年分别通过了5%、1%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邻近省份的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正向表现显著,整体呈空间集聚态势。2000—2020年,Moran's I指数属于非平稳序列,具有典型的“阶段突变”特征。其中,2000—2010年Moran's I指数上下波动趋势强烈,并于2010年达到最低点,随后开始反弹,表现出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并趋于相对稳定状态,呈上升趋势,这表明自2010年以后,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模式,而且这种集聚程度在不断增强。通过对Moran's I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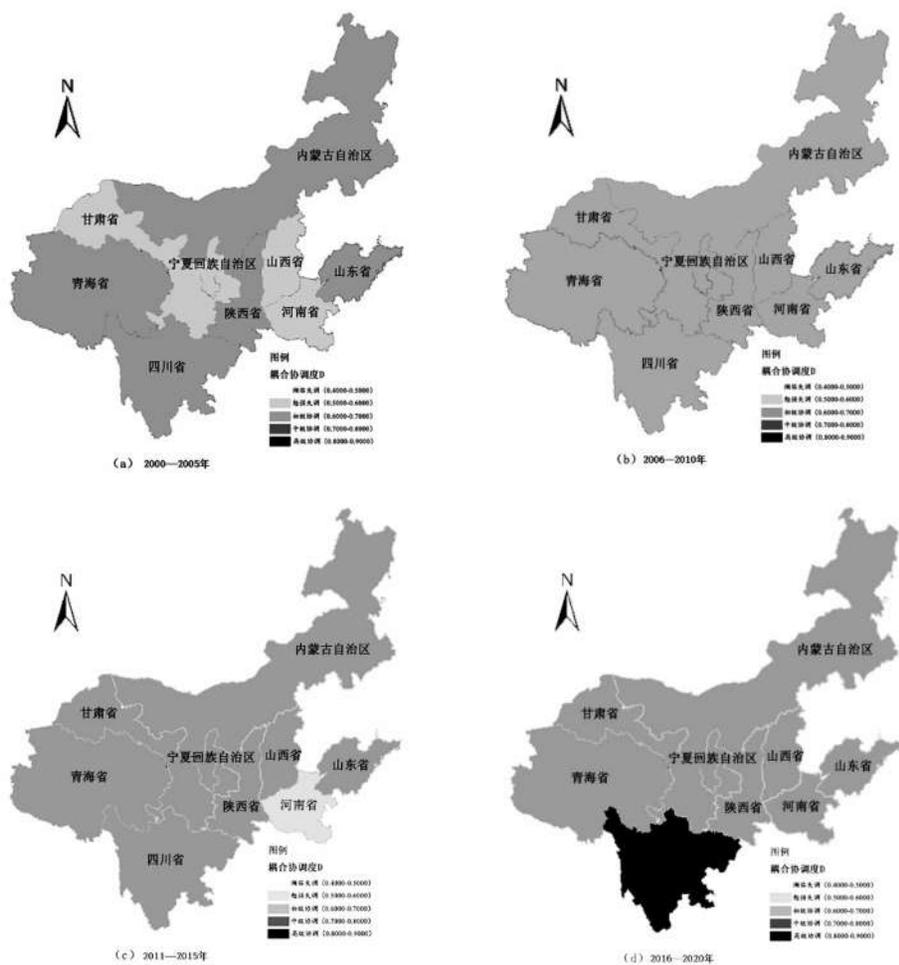


图3 2000—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2016—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数的小波分析也可以看出,2010年是研究期间的突变点,这表明“十二五”以来,沿黄各省份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水—能

源—粮食”纽带系统的协调性、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运用Stata16.0软件制作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5个年份中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I指数散点图,如图4所示。2000年黄河流域多数省份处于“低—高”区域(第二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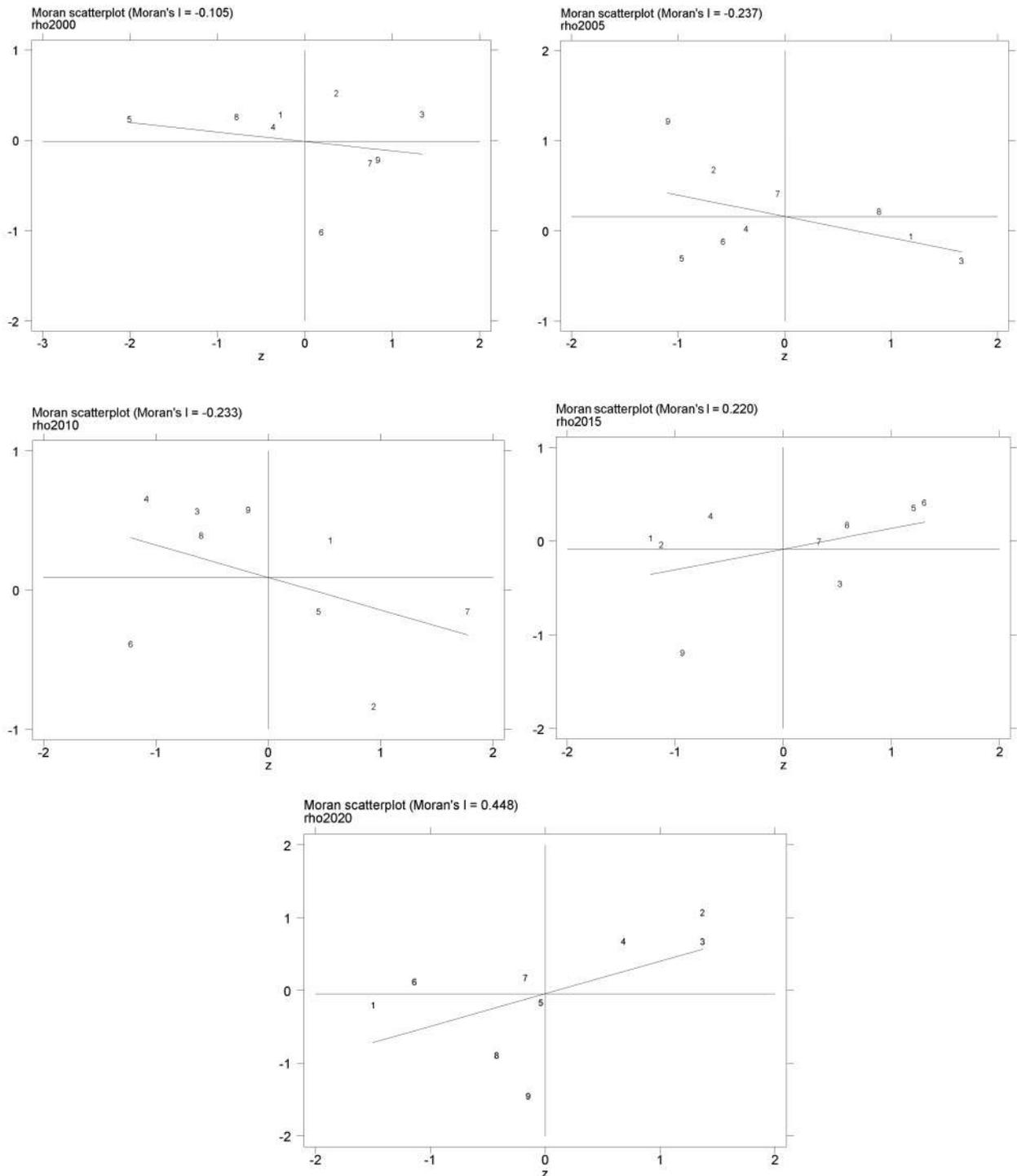


图4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的莫兰散点图(其中,1—9依次代表河南、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等省份)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限),这表明处于耦合协调度高的区域对耦合度低的区域形成包围,表现为空间负相关,呈现异质性和离散型特征。2005年黄河流域多数省份处于“低—高”“低—低”区域(第二象限、第三象限),2010年多数省份处于“低—高”“高一低”区域(第二象限、第四象限)。2015年、2020年多数省份处于“高一高”区域(第一象限)和“低—低”区域(第三象限),且表现为显著空间正相关。这说明近年来,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正在从区域离散向区域集聚发生转变,且表现为“高一高”区域、“低—低”区域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也就是说,耦合协调度高的青海、四川、甘肃、陕西等省份通过加强生态整体保护系统治理、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效率、打造黄河流域重要的清洁绿色能源基地、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调发展机制等政策举措对周边区域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进而形成相互协同、相互支撑的高值集聚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的河南、内蒙古、山西、山东等省份受到水资源布局与能源、粮食分布不匹配、水资源刚性约束、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水—能源—粮食”三者之间的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形成低值集聚区。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黄河流域9个省份“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联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1. 结论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并处于中等发展水平阶段,其空间分布与区域的资源禀赋具有高度一致性;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呈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并且具有显著空间分异性,各省份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发展特征,总体上表现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典型的“阶段突变”特征。以2010年为分界线,2010年以前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空间集聚不稳定,呈现正负分化明显的波动特征;2010年以后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黄河流域“水—

能源—粮食”纽带系统的耦合协调正在从区域离散向区域集聚发生转变,且表现为“高一高”区域、“低—低”区域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2. 建议

一是科学认识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的纽带关系。黄河流域是“水—能源—粮食”矛盾突出且集中的典型区域,水资源约束引起流域能源安全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粮食生产脆弱性的风险增加。科学认知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互馈机制,建立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为纽带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框架,通过三种资源的整体研究有助于提高可持续发展决策的有效性,有助于推动上下游、流域两岸、干支流的协同安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流域特色的保障“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安全的协同路径和资源利用最优模式,更好实现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目标,是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内容,是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的战略举措,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倒逼农业转型升级和能源安全高效,激活消费需求,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载体。

二是加快建设一批“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调发展示范区。选择青海、四川、甘肃等耦合协调度高的省份,建立一批“水—能源—粮食”的纽带系统协调发展示范区,支持其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清洁能源高效开发利用、优质粮食生产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带动沿黄其他省份“水—能源—粮食”可持续发展。例如,在清洁能源高效开发利用方面,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推动甘肃陇东、青海海西等重要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发挥黄河上游水电站和电网系统的调节能力,支持青海、甘肃、四川等风能、太阳能丰富地区构建风光水多能互补系统,以此来提升水资源和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强度。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着力点,支持“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调发展示范区内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废气废水“零”排放,树立一批行业“近零”排放示范企业和示范园区,引领带动黄河流域中下游形成有效的碳排放控制阀门,确保全流域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三是积极探索差异化的“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路径。针对“水—能源—粮食”耦

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加快实施农业节水增效和工业节能降耗并举,提升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农业节水增效方面,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普及推广喷灌、微灌、滴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实施区域化、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在工业节能降耗方面,加大钢铁、有色、石化、化工等产业绿色改造升级和落后过剩产能淘汰力度,纵深推进智能化改造和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发展再制造产业和静脉产业园等,以此来不断缩小“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提高空间集聚程度。

参考文献

- [1] Hoff H. Understanding the Nexus[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Bonn 2011 Conference: the Water Energy and Food Security Nexus,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2011.
- [2] FAO.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Anew Approach in Support of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R].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2014.
- [3] Endo A, Tsurita I, Burnett K.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the Water, Energy, and Food Nexus[J]. Journal of Hydrology :Regional Studies, 2017(11).
- [4] Van Gevelt T. The Water - Energy - Food Nexus: Bridging the Science - Policy Divide[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Health, 2020(13).
- [5] Kalomoria Z, Sofia K, Maria-Eleni K. Recasting of the WEF Nexus as An Actor with a New Economic Platform and Management Model[J]. Energy Policy, 2018(119).
- [6] Patience M, Bas V, Gert S. What Could Go Wrong with Cooking? Exploring Vulnerability at the Water, Energy and Food Nexus in Kampala through ASocial Practices Len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20(63).
- [7] Mehzabeen M, Tareq A, Hamish R M. Quantifying the Energy, Water and Food Nexus: A Review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Based on Life-Cycle Assessmen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193).
- [8] 项潇智,贾绍凤.中国能源产业的现状需水估算与趋势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6(1).
- [9] 白景锋,张海军.中国水—能源—粮食压力时空变动及驱动力分析[J].地理科学,2018(10).
- [10] 李桂君,黄道涵,李玉龙.中国不同地区水—能源—粮食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3).
- [11] 邵鹏,王齐,单英骥.基于文本分析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11).
- [12] 石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网络效应[J].区域经济评论,2020(3).
- [13] 彭俊杰.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优化路径[J].中州学刊,2021(8).
- [14] 周振,孔祥智.中国“四化”协调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5(10).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Peng Junjie

Abstract: Taking 9 provinces in and autonomou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2000—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has an obvious upward trend, and is at a medium development stag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water, energy, and food resource endowm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is mainly in the primary-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showing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divergence. The 9 provinces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non-synchronous development, and generally appear as upstream areas > midstream area > downstream area. The nexu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a typical “stage mutation” characteristic. Taking 2010 as the dividing lin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was unstable before 2010, showing obvious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fferentiation; after 2010,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changing from regional dispersion to regional agglomeration, which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high-high and low-low areas, with a trend of polarization.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ter-Energy-Food Nexus; Coupling Relationship; Spatial Correl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

【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评估与“双碳”政策探讨*

陈绍晴 吴俊良

摘要: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绿色低碳发展上也应起到示范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核算2020年大湾区各城市消费端碳排放,量化分析各行业对大湾区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在城市间差异巨大,部分核心城市与国际湾区城市的平均水平相当。(2)大湾区城市在建筑业、服务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等行业上有较大的减排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应多通路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低碳转型,注重建筑业方面的低碳管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快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碳交易市场,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多层次试点。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绿色发展;低碳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60-07 **收稿日期:**2022-0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镇居民需求端碳排放网络机制与包容性减排路径研究”(7207423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城市群能源—水—碳代谢系统耦合机制与一体化管理——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2018B030306032)。

作者简介:陈绍晴,男,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吴俊良,男,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广州 510275)。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取得了包括能源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低碳试点和碳交易市场建设等多方面进展。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原则,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分类施策,主动作为、率先达峰。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把握新发展理念,不断培育低碳产业、低碳技术和低碳管理模式,平衡好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的关系,将是重中之重。粤港澳大湾区还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阶段,过于冒进和激进的降碳措施不仅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和

成本,也可能导致“打地鼠”式的排放环节反复和反弹。因此,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在各领域制定好可量化、可执行、可持续的目标和任务。消费侧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视角,同时考虑消费支出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对于各行业碳减排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核算方法,从全球的视野来评估当前大湾区各城市消费端碳排放主要特征和来源,在现有发展规划基础上提出减排重点策略,旨在为大湾区完整准确全面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一、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通过构建嵌套式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核算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和各城市(珠江三角洲9

市和香港、澳门)的消费端碳排放,量化城市碳排放主要来源行业的贡献值。

1.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核算

投入产出分析作为一种宏观数量经济学分析工具,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锡夫创立。投入产出模型将整个经济体系分为相互联系的不同行业,并研究各行业投入与产出间相互依存的数量关系。后期发展起来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则是考虑资源—经济—环境物质流的关系,将各行业的原始资源消费、直接污染物排放等纳入经济投入,可用于计算经济发展和消费变化驱动的碳排放及其他环境负荷。本研究将我国省级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嵌套到全球国家尺度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端碳排放核算。

首先,将我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嵌套到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以大湾区11个城市(珠江三角洲9市和香港、澳门)作为核算对象。我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覆盖了30个省(区、市)(西藏无数据)和900个经济社会行业,而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源于Eora数据库,涵盖了189个国家和地区的4915个行业。通过区分大湾区各城市2020年的最终消费水平,与模型进行匹配,从而核算城市尺度的消费端碳排放量。

在利用嵌套式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进行消费端碳排放核算过程中,我们首先核算了大湾区各经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如公式(1)所示:

$$e_{CO_2i}^r = \frac{d_{CO_2i}^r}{X_i^r} \quad (1)$$

式(1)中, $e_{CO_2i}^r$ 表示区域 r 与行业 i 的碳强度; $d_{CO_2i}^r$ 区域 r 与行业 i 的直接碳排放; X_i^r 表示区域 r 与行业 i 的总产出。

$$X = (I - A)^{-1} \times Y \quad (2)$$

$$X = \begin{bmatrix} X_1 \\ X_2 \\ \vdots \\ X_{n-1} \\ X_n \end{bmatrix}, A =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dots & a_{1n} \\ a_{21} & a_{22} & \dots & a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a_{n1} & a_{n2} & \dots & a_{nn} \end{bmatrix}, Y = \begin{bmatrix} y_{11} & y_{12} & \dots & y_{1m} \\ y_{21} & y_{22} & \dots & y_{2m}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y_{n1} & y_{n2} & \dots & y_{nm} \end{bmatrix} \quad (3)$$

$$A = Z \times (\text{diag}(X))^{-1} \quad (4)$$

$$Z = \begin{bmatrix} z_{11} & z_{12} & \dots & z_{1n} \\ z_{21} & z_{22} & \dots & z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z_{n1} & z_{n2} & \dots & z_{nn} \end{bmatrix} \quad (5)$$

关于式(2)、式(3)、式(4)、式(5), X 、 Y 、 I 分别表示各行业总产出矩阵、城市最终消费矩阵及单位矩

阵; $(I-A)^{-1}$ 表示列昂锡夫逆阵; $A=(a_{ij})$ 表示直接需求系数矩阵,通过 $a_{ij}=z_{ij}/x_j$ 核算获得,其中 z_{ij} 表示行业 i 到行业 j 以货币形式的中间流动, x_j 表示行业 j 的总产出。

$$L = (I - A)^{-1}, A = [a_{ij}^r] \quad (6)$$

$$CBF_{CO_2} = [e_{CO_2}]_{1 \times n} \times L_{n \times n} \times Y_{n \times m} \quad (7)$$

关于式(6)、式(7), L 表示列昂锡夫逆阵, CBF_{CO_2} 表示大湾区各城市的消费端碳排放。

2. 数据来源

粤港澳三地的能源、人口等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报告。广东省的能源、人口及经济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局,港澳地区的相关数据则分别来源于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在直接碳排放的核算中,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指南和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港澳及全球其他地区各行业的直接碳排放数据来源于Eora中的PRIMAPHIST数据库。本研究所应用的我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则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二、结果与讨论

结果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消费端碳排放总量和人均值,识别了主要的贡献行业,从人均水平上与其他全球城市的消费端碳排放进行横向比较,并分析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现有重要政策与规划。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我国和全球的投入产出表尚未更新至2020年,因此,本研究基于消费更新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包含了技术系数不变的假定,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消费端碳排放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整体与人均的消费端碳排放如图1所示,反映出各市最终消费所驱动的排放情况。研究表明,2020年大湾区总消费端碳排放高达8.464亿吨,对应的人均排放为10.2吨/人。香港的总消费端排放量最高(2.71亿吨),广州和深圳的消费端排放量分别处于第二位(1.38亿吨)和第三位(1.36亿吨)。香港的人均消费端碳排放也高达36吨/人,这一方面是由于电力、燃气和供水业的高碳排放,另一方面也与城市居民的高消费有关。除香港外,珠海和澳门的人均排放水平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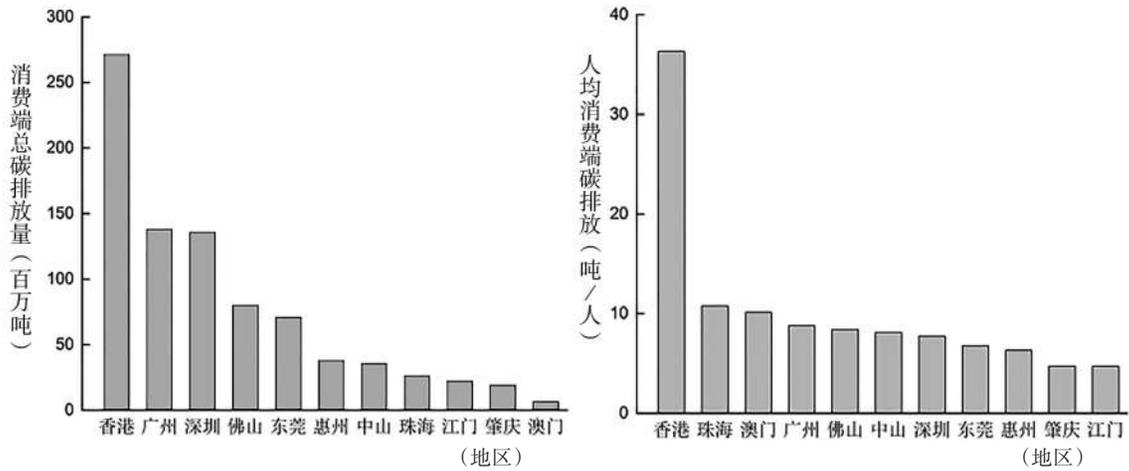


图1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整体与人均消费端碳排放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大湾区前列(高达10.8吨/人和10.1吨/人),略高于广州和深圳的人均水平(8.8吨/人和7.8吨/人),主要与这些地区人口密度较低但居民消费水平较高有关。

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三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东京、纽约及旧金山)及其他部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人均消费端碳排放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消费端碳排放为10.2吨/人,与大部分国际湾区城市及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偏低,但高于东京和斯德哥尔摩。伦敦等部分欧洲国家的城市人均消费端碳排放为10.4吨/人,略高于粤港澳大湾区,而纽约、旧金山等美国湾区主要城市的人

均排放水平高达17—20吨/人,是粤港澳大湾区排放水平的1.7—2.0倍。虽然大湾区整体的消费端碳排放水平在全球发达国家城市中相对偏低,但部分城市则比较突出,尤其是香港,2020年该城市人均排放水平达到36吨/人,高于国际三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从消费侧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大湾区未来碳排放还有一定上行的压力,但同时也有较高的降碳潜力,未来推动大湾区碳达峰碳中和应重点监测核心城市消费相关的排放变化。

2.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重点行业

粤港澳大湾区各行业对消费端碳排放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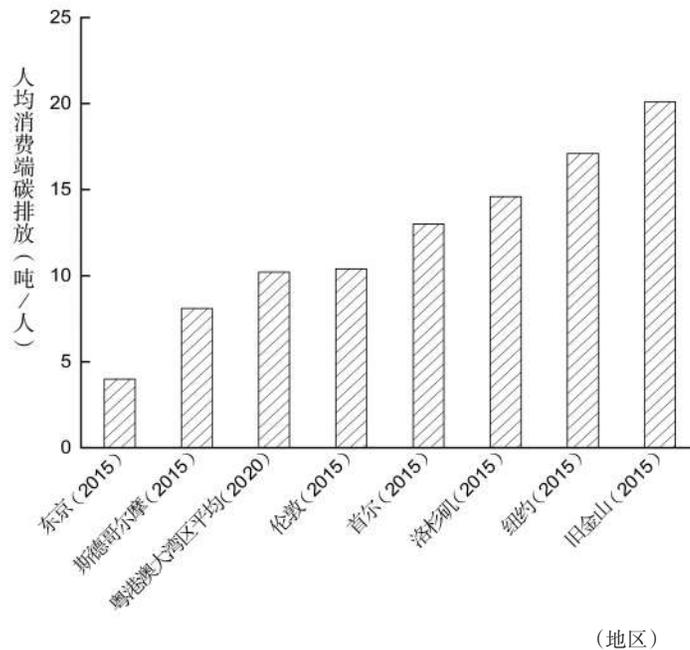


图2 粤港澳大湾区与部分全球城市人均消费端碳排放水平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如图3所示。从消费侧角度来看,建筑业对大湾区碳排放的贡献巨大,该行业所驱动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占整个湾区排放的约20%(1.57亿吨),远高于其他行业,这主要是由于在建筑物原材料采掘(水泥、瓷砖、石砖等)、建材制备与现场建设过程中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物料,在整个生产和供应链条中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不单对本

地造成影响,同时还会通过外包的形式影响大湾区以外地区。当前大湾区建筑业的总产值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近十年粤港澳三地的房地产建造和销售量都在迅速增加,带动了企业建筑原材料采掘生产与房屋装修装饰工程的增加,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能耗增长,从而带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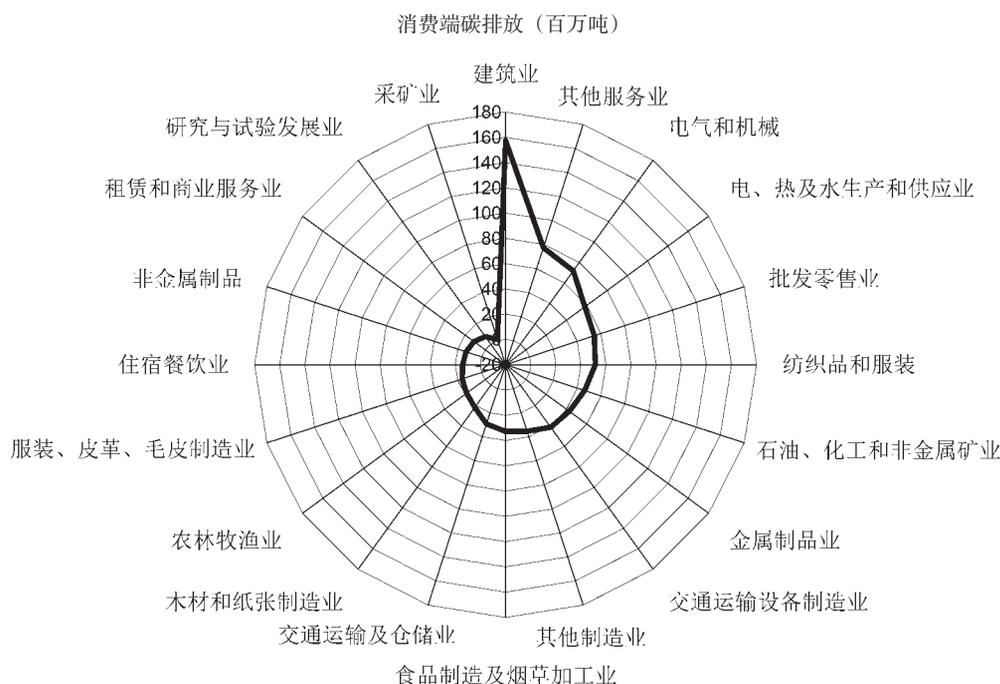


图3 粤港澳大湾区各行业的消费端碳排放贡献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服务业、电气机械、电力热力、批发零售及纺织服装等行业所带来的碳排放同样不可忽视,分别占大湾区排放的6%—9%(0.52亿—0.77亿吨)。对于大湾区而言,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大湾区服务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当前服务业已成为促进大湾区经济增长的主体行业,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广州、深圳等),第三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城市整体GDP的60%以上,港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达90%以上,而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大湾区以外的电力供应和其他产品支持,并带来了区域外溢的效应,这进一步说明跨区域产业链一体化管理对碳减排的必要性。此外,纺织服装产业也一直是大湾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相应的制品属于区域外贸出口的优势产品,但其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化学工业中间投入品,与世界先进生产企业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服装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提升还具有较大的

潜力。

3.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政策与规划

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上,粤港澳大湾区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低碳发展规划。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指出大湾区应加快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推广清洁生产和绿色低碳生活,并提出“力争碳排放”早日达峰的要求。“十三五”期间,广东省政府就发布了《广东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规划,主要聚焦在大湾区能源结构调整上,指出应降低燃煤发电,推动清洁能源的利用和发展,加快建设低碳能源体系,同时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建立低碳试点与绿色示范区。在“十四五”规划方面,广东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了《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等规划文件,对大湾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控制提出了更加清晰的目标和要求,保障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珠三角城市率先达峰,并展望2035年能源利用效率,力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港澳各地也发布了各自的低碳规划。2017年,香港提出了《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30》,旨在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燃煤发电、更具规模地采用可再生能源、改善公共交通、加强各界合作等方式增强减排成效。2021年,香港政府发布了《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远期城市实现净零发电、运输零碳排放、降低建筑用电量等目标,支撑2050年全港实现碳中和。2021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提出推动节能减排和源头减废、完善环保基建、实现清洁能源替代、降低交通碳排放等措施,打造绿色、低碳、宜居澳门。

碳达峰、碳中和是涉及全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需要可持续的路径设计。大湾区需从自身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空间出发,在保证民生、稳定生产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大前提下,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由于电力、燃气和供水业的高碳排放与居民高消费的生活水平,香港的整体和人均消费端碳排放均最为突出,广州及深圳等地的整体碳排放相对较高,但人均水平较低。从人均来看,当前大湾区整体及香港、珠海及澳门等核心城市有较高的减排潜力,在未来大湾区推动区域整体碳减排的同时,也应重点关注重点城市减排进程。当前,建筑业、服务业及电气机械等为大湾区消费端碳排放的主要驱动行业,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此外,由于三产规模的扩大及电力供应需求的增加,服务业和电气机械行业的驱动效应也不可忽视。未来大湾区需继续推动能源转型与加强对碳排放重点行业的管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能源结构优化、产业低碳转型、建筑业低碳管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碳交易、区域协调和地方试点等方面给出关于粤港澳大

湾区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若干政策思考。

1.多通路优化能源结构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火电在最终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依然较高,在用能清洁化程度上与其他国际湾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大湾区处于能源供应链末端,是能源利用大户,相比于土地资源更丰富、日照时长更长、强度更大的西部地区,大湾区在风电、光伏发电所需要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存在现实瓶颈和挑战。未来,不仅要积极开发海上风电,还要开拓外部清洁能源供应渠道,掌握好两者动态平衡,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低碳发展行稳致远。一个要点是,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在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分阶段推进,以免导致能源供应紧张及煤气价格上涨等问题,尽量减轻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降低经济社会运行风险。一是要解决能源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在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基础上,还需提升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率,促使能源消费结构逐步合理化;二是依托“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打造能源储用基地,推动大湾区内天然气主干管网融合。

2.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低碳转型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总体上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0%以上,但区域间差异较大,其中珠三角各市仍高度依赖工业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一是考虑将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工业向东西两翼和山区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利用优势互补缩小各区域的差距,同时也提高珠三角地区能源安全保障;二是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向绿色转型,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加注重在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投入,在保障关键特色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提高现代服务业比例;三是明晰大湾区各产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难度和时间点差异,建立起产业间协调互补机制,制定钢铁、炼油、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规划;四要注意低碳研发和产业人才培育、干部培训,依托珠三角和港澳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成碳达峰碳中和人才智库和技术平台。

3.注重建筑业方面的低碳管理

当前建筑业是驱动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端碳排

放增长最主要行业,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继续增长,大湾区房地产建造和销售量均在不断增加,推动建筑业的低碳转型对大湾区减污降碳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第一,大湾区应合理规划建筑活动频率及楼房建设寿命,在建筑制造过程中,应尽量使用绿色低碳材料,研发高层建筑节能和“产能”技术;第二,继续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从传统制造业向绿色制造业的转型,从而提高建筑材料的生产效率;第三,对于大湾区中像香港这样对进口依赖较大的城市,可以考虑推动进口来源多样化,鼓励引进及使用低碳密集型材料和与清洁燃料组合的水泥钢铁等材料;第四,统一在全区域推行的绿色建筑标准,打造大湾区“零碳”建筑示范工程和示范园区,争取全区在建筑领域内节能降耗减碳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大部分的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应将“双碳”工作与“十四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相结合,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在现有的节能改造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非化石能源的替代作用,加快联防联控下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的协同治理。同时,应注意保障大湾区各地市居民用电和重点企业合理生产用能,降低经济社会运行风险,推动常态化的能源转型。此外,大湾区有很好的绿色“底子”,应整合林业碳汇和生态修复工程。例如,应谋划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和退耕还林还湿等生态环境系统工程,深入挖掘环境修复的固碳潜力,完善林业保护与碳普惠机制,健全自然和人工碳汇的监测体系,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构建各地市因地制宜的固碳增汇模式。

5. 加快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碳交易市场

广东省是现有7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之一,有低碳领域的创新地域优势。相比于收缴碳税,发展碳市场对企业经营生产影响较小,为企业提供了实现碳目标的多种渠道。目前,需进一步扩大碳交易控排行业范围,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推动重点碳金融产品和新型衍生品上线,与国家碳市场错位发展、相互补充。一是在“十四五”期间,积极整合广东现有碳排放权交易资源,促进港澳与内地碳排放

权交易的协同合作、区域联动,并探索跨国(境)碳排放配额市场及自愿性碳交易市场;二是推动跨区资本合作和机制融合,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对于深度减碳的支持作用。绿色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湾区中小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节能环保的双赢,既在节能减碳、绿色发展方面积累创新技术及发展经验,又可以通过绿色信贷项目实现融资,提高市场竞争力。此外,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能够通过碳普惠平台把节能减碳行为交易变现,助力消费端的深度减排。

6. 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多层次试点

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社会制度、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应建立三地的低碳发展协同机制。可重点考虑建立大湾区三地统一的生态服务交易制度,加强当前负责协调处理粤港澳大湾区低碳发展机构的职能和作用,达成“一流生态湾区”一体化能源转型发展目标与低碳发展规划,促进能源资源利用领域的深度合作,将港澳地区金融、科技与服务的巨大优势融入大湾区的绿色低碳经济体系建设中。此外,整合粤港澳三地优势,布局“零碳”产业集群,加快碳中和试点示范项目建设。一个可行的途径是,有条件的地区选取适宜的层次率先探索碳达峰和碳中和,打造城乡、园区、社区、企业试点示范,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双碳”实践经验。比如,产业园区如能为企业提供污染物集中处理、集中供热供气和低碳专业咨询等服务,既能大大提高园区能源利用效率和减排效果,也能很好地调动企业参与“双碳”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陈绍晴,龙慧慧,陈彬.代谢视角下的城市低碳表现评估[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1(10).
- [2]Sovacool B K, Brown M A. Twelve Metropolitan Carbon Footprints: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Global Assessment[J]. Energy Policy, 2010, 38(9).
- [3]Jones C M, Wheeler S M, Kammen D M. Carbon Footprint Planning: Quantifying Local and State Mitigation Opportunities for 700 California Cities [J]. Urban Planning, 2018, 3(2).
- [4]Long Y, Yoshida Y, Liu Q, et al.. Comparison of City-Level Carbon Footprint Evaluation by Applying Single and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J]. Journal of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260(15).
- [5] Zhou Y, Wei T, Chen S, et al.. Pathways to A More Efficient and Cleaner Energy System in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System-Based Simulation During 2015—2035 [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volume 174, 2021(11).
- [6]城市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最佳实践(一):旧金山湾区[EB/OL]. <http://www.cbnri.org/news/5325867.html>.
- [7]日本通过2050年碳中和法案[EB/OL]. <http://www.cgpnnews.cn/articles/56523>.
- [8]New York's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EB/OL]. <https://www.nyscrda.ny.gov/All-Programs/CLCPA>.
- [9]郑敏嘉,赵静波,钟式玉,等.粤港澳大湾区能源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探讨[J].能源与节能,2020(5).
- [10]Chen S, Tan Y, Liu Z. Direct and Embodied Energy-Water-Carbon Nexus at An Inter-Regional Scale [J]. Applied Energy, 2019,251:113401.
- [11]Lin B, Li Z. Spatial Analysis of Mainland Cities' Carbon Emissions of and Around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0, 61:102299.
- [12]Zhou Y, Shan Y, Liu G, et al.. Emissions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J]. Applied Energy, 2018,228:1683—1692.
- [13]赵宏图.国际能源转型现状与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 2009(6).
- [9]郑敏嘉,赵静波,钟式玉,等.粤港澳大湾区能源体系建设

Assessment of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 and Discussion on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Polic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en Shaoqing Wu Junlia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enness and economic vitality in Chin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should also play a demonstrative, leading and innovative role in gree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o low-carb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alculated the carbon emission from a consumption perspective of each city in GBA in 2020 and evalu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sector to emi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big gap in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 among the GBA cities, and the emissions of some core cities were similar with the average level of foreign bay areas. (2) For these GBA cities, the potential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constr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nd electrical and machinery is high. To comprehensively, accurately and fully achieving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BA should optimize the energy structure through multiple approaches, promot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manufacturing, pay attention to low-carb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bon trading market of GBA, build multi-level pilots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Key Word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 Green Development; Low-Carbon City

(责任编辑:柳 阳)

【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吴朝霞 张思

摘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建设是中国的发展目标。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实践,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流向低碳产业促进节能减排,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笔者通过分析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梳理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和路径演化,提出完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创新产品服务、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各类主体分工等,从而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助力低碳经济发展。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低碳经济;“双碳”目标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67-07 收稿日期:2021-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下排污权交易机制对雾霾治理的影响机理研究”(17BJL042);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基于PSM-DID模型的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19A080)。

作者简介:吴朝霞,女,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湘潭 411105)。

张思,女,湘潭大学商学院博士生(湘潭 411105)。

绿色金融是指运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金融业务。绿色金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殷剑峰、王增武(2016)提出绿色金融一方面是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向更低能耗和排放水平的产业配置,另一方面是推动环保节能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开发清洁能源等手段降低耗能、排放和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等都会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绿色金融能够发挥正向传导作用,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支持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项目,推动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分析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析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亮点。

1.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投放量持续增加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投放量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21家主要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不断增加,从2013年的5.41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1.95万亿元(见表1)。绿色信贷的年度增速保持在两位数左右,最为突出的是2015年和2020年,增速均超过15%。从201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绿色金融业绩的考核。2019年,中国的绿色信贷余额首次超过10万亿元。中国的绿色债券起步虽晚,但是发展迅速,2015—2019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逐年上升,除2015年外,其余年份发行量均超

表1 2013—2020年中国21家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和增速

年份	绿色信贷余额(万亿元)	信贷余额增速(%)
2013	5.41	—
2014	6.01	11.11
2015	7.01	16.64
2016	7.79	11.13
2017	8.66	11.19
2018	9.68	11.78
2019	10.22	9.86
2020	11.95	16.93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对于部分年份的缺乏数据,采用平均增长率补齐。

过2000亿元。2017年,中国新发行的绿色债券余额创历史新高,达到349.89亿美元,约占绿色债券余额总量的一半。同时,2017年的贴标绿色债券规模达到382.46亿美元,和2016年相比增加了23%。2018年,中国在境内外市场共发行绿色债券2826亿元人民币,和2017年相比增加了12%,占全球绿色债券的18%,其体量在绿色债券来源国中排名第二。截至2021年年初,中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2万亿元,跻身世界前列。

2.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投向逐步分明

绿色金融主要投向低碳经济领域的节能、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污染防治、清洁能源、清洁交通、补充营运资金等七个方面,并朝着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方向发展。2020年年底,绿色交通、可再生资源和节能环保项目的贷款余额及增幅规模位居前列。绿色债券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式,从2017—2020年中国绿色债券在低碳经济领域的资金投向(见图1)可以看出,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污染防治在资金投向中占比最大,特别是2019年,分别占26.04%、26.01%、12.73%。补充营运资金或其他方面的投向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是因为其他方面里边包括很多细小的领域。2017年和2018年,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污染防治占比之和也超过了50%,2019年,清洁交通占比

最大。因为随着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已发行的绿色ABS包括绿色收益权、绿色租赁权、绿色应收账款、绿色企业贷款和保障房等资产类别。这些产品的直接或间接投向均是绿色低碳项目,例如,其中规模最大的绿色收益债券包括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收费、污水处理收费、绿色出行收益权。首个国家级绿色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交通和自然能源等低碳领域。

3.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类别逐渐丰富

近年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其中,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位于绿色金融金字塔的塔基部位,在市场上的投放量最大,作用效果最显著也最稳定,是绿色金融的主打产品。中国的绿色债券以金融债、公司债和企业债为主,投资期限集中在1—5年。除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外,绿色保险、绿色租赁也在持续发力,2019年中国共推出近60项产品,拓宽了绿色金融的服务领域,提升了绿色金融的服务质量。绿色保险是和环境险相关的保险计划,主要用于应对环境污染、能源替换、生态破坏等问题。绿色租赁最大的特色是能够做到合理高效的利用资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有资产,有利于经济和环境相互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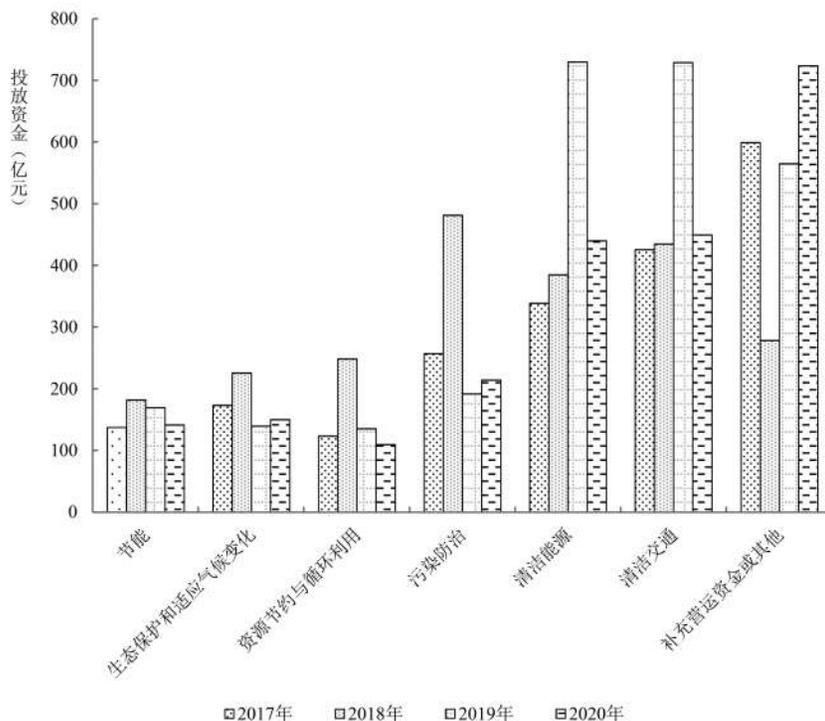


图1 2017—2020年中国绿色债券在低碳经济领域的资金投向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进、共同发展。绿色ABS是将绿色信贷的一部分转化为证券化的资产存在的一种产品,它的出现为绿色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绿色金融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4. 低碳经济中的绿色金融市场初具雏形

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基本形成了“五大支柱”的局面。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方面,中国加快了市场体系构建的速度,2020年,中国第一项绿色金融国家标准体系正式立项,并被运用到市场上。在信息披露和金融监管方面,各项工作不断加强,必须披露的信息要点更加明晰,信息披露更加规范,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提高。在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面,政府以原有的绿色信贷评价为基础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方面,中国已初步形成结构合理、层次多样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各类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共同发展,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绿色金融国际市场方面,中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日益成熟,积极利用各类多边和双边平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把绿色金融融入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急迫的市场需求背景下,陶瓷、水泥等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多余的资源消耗和不必要的污染排放,产品质量也得到相应提高。而原本的低碳环保产业也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无论是在市场开拓方面,还是在效益提升方面,都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二、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绿色金融的框架体系在不断完善、政策制度日益优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总量继续增加、服务逐渐丰富,带来的环境效益日益显著。但在政策法规、产品规模、信息披露、政府与市场职责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 绿色金融政策法规不够全面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丰富企业的融资模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法规。但是,现阶段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法规还不够全面。一些政策法规只是简单地说明条例框架,没有翔实可行的细则方案,导致下级单位无法采取具体行

动。在碳排放抵押、质押融资中,虽然出台了有关政策来鼓励企业采用这种新型的融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的倡议下,没有继续明确鼓励方案。还有一些政策法规的针对性不强,作用对象不够明晰,致使政策效果不佳。绿色金融相关法规里缺乏针对碳交易价格的调控政策,没有稳定的碳交易价格调控系统,无法比较碳减排政策前后的投资增量变化情况。同时,当市场环境有所波动时,碳交易价格不能及时进行有效调整,调控政策漏洞不利于碳交易的进一步发展。

2. 绿色金融产品存在不足

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标志性目标,需要百万亿规模的资金,绿色金融十分重要。虽然在政府的鼓励下绿色债券与绿色信贷已经成为中国绿色金融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期限和规模难以和低碳项目的周期与资金需求量相匹配。绿色金融的产品种类会影响到整体的绿色金融服务质量,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可以帮助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量,更好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现阶段中国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有待丰富,碳金融、绿色ABS、绿色租赁等产品须加快建设。碳金融市场中的各项政策和规则还不够完善,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等产品在金融市场中不够活跃。除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外,其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还没有得到推广和大规模的应用,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更好地促进地方绿色金融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支持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3.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到位

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绿色金融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中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中国法律法规中暂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环境信息披露规则,即使在信息透明度较好的上市公司中,也少企业披露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等重要环境数据,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中大部分是定性信息。重要环境信息披露不足,不仅大众不能获得和绿色金融环境方面的相关信息,而且企业自身也会因为没有及时关注和重视相关信息而导致有关问题的产生。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是受信息披露影响较大的一类主体,在评估企业环境风险时,由于环境信息的缺乏,得到的结果往往会存在较大偏差;在对企业进行信贷资产定价时,由

于一些金融环保数据没有被披露,银行不能做出准确的决策;在制定行业信贷政策时,无法以行业整体的环境数据为支撑,无法做到量化分析、可视化管理。

4.政府和市场职责不明确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绿色金融监管和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设立健全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市场发挥其自身职责。公共基础设施性质的绿色金融标准是绿色认证或绿色评级的基础,前者属于政府职责,后者属于市场行为。环境信息披露、银行环境风险定价等虽然属于市场行为,而强制环境信息披露、明确银行环境责任都属于金融政策范畴,绿色保险产品开发和运用主要是市场行为,而关于强制环境责任保险的制度则是政府行为。设立专业的绿色投资机构主要是市场主体行为,而设立相关专业机构离不开金融政策配套支持。风险管理体系既有政府职责,又有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职责,防范区域系统性的绿色金融风险是政府职责,而分散和控制项目的绿色风险则属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职责。政府和市场的职责相互交叉,界限不明,导致效率不高、效果不好。

三、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贯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题。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域不仅仅约束在自然资源方面,已经外扩到环境规制、绿色产品等方面,并且还在继续向其他领域发展。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存在转型成本过高、高污染产业资源依赖严重、企业低碳化动能不足、重污染企业的区域转移较明显等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困难。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推进低碳经济需要顶层设计、高位统筹、系统推进、持续完善。“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产业改革增添了向高质量低碳新发展模式转变的动力。金融资源是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管控闸门。绿色金融是高质量低碳新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的创新型金融产品。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深化了传统金融的功能,通过金融手段控制碳排放的强度与总量,加强对节能减排的约束效力,最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体的作用机理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产业重构、技术配置的前端引导与后端倾斜,促进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向环境友好、气候友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技术市场,重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能够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提高能效,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方式,灵活应对不断改变的市场环境,承受资本市场的不时冲击。绿色金融要求绿色项目将所有的稀缺租金都当作资本投入,在维持既有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减少污染总量,从而使二氧化碳总需求减少,实现哈特威克法则之存量法则要求。

第二,通过汇集和引导资金投向低碳产业,形成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和增量生态资本,实现哈特威克法则之增量法则要求。能源行业中加快核电等绿色清洁能源的转型发展;钢铁行业、建筑行业等高碳排放行业中实行节能减排;新能源行业中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推广。支持清洁能源行业、绿色建筑行业、新能源行业发展,挖掘低碳环保产业的市场潜力。对不同主体承担的绿色金融职责明确分工,提高工作效率。

绿色金融通过以上两条路径实现金融力量倒逼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低碳领域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的目标。绿色金融既能控制碳资源这一生产要素,又能服务绿色产业,最终形成低碳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低碳经济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动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演化

低碳产业涉及领域广,不仅包括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直接降低碳排放的产业,还包括碳吸收、碳捕集技术等负碳产业,因此,对绿色金融的服务和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绿色金融产品的种类很丰富,但在资本市场上发挥关键作用的不多,主要包括碳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租赁,以这五种绿色金融产品为发力点和引导器,分别形成了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五条路径。

“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目标从时间角度明确指出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性,绿色金融必须根据低碳经济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势而为,改革创新。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五条路径与

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相互融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着差异性的作用。其中,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三条路径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导向,通过绿色保险和绿色租赁两条路径降低了绿色金融的成本,进一步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的成本保障。现阶段,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路径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对绿色低碳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资金在绿色低碳产业的集中,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绿色低碳产业如虎添翼,发展迅猛。碳金融刚起步,这条路径发挥的作用相对薄弱一些,主要是将筹集的资金用于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领域,但随着时间推移将逐步成长、成熟。绿色保险费率直接受企业环境风险概率的影响,如果企业的环境风险率高,它的绿色保险费率也会相应变高。为了追求高盈利目标,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会尽可能地降低环境风险。因此,绿色保险路径提高了企业对环境风险的认识,预防意识增强,企业加大低碳力度,积极开展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项目,推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生产设备是基础,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如果想要完成低碳环保转型,首先要从升级生产设备入手,淘汰老化、落后的机器设备,购买节能环保型设备,这个过程会花费企业大量资金,导致有些企业迫于转型成本而无法转型,陷入资金困

境。绿色租赁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企业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使用节能环保设备,在完成企业转型的同时也不会陷入资金困境,有利于低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节能减排。

以上五条路径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绿色金融的初始阶段,赤道原则的发布为银行在信贷领域增加了新的功能,金融机构把风险控制和环境因素纳入银行的投资评估程序中,并且采用专业的会计报表方式来分析环境,低碳经济呈现缓慢发展的局面。在绿色金融成长阶段,金融行业和保险公司积极合作,出台了低碳经济政策性保险,金融行业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低碳资信评级体系,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局面。在绿色金融成熟阶段,金融机构和政府给低碳经济的发展给予自上而下的支持,不仅是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扩充和丰富,而且为低碳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低碳经济呈现迅猛发展的局面。绿色信贷路径和绿色债券路径在这三个阶段发挥着主要作用,而碳金融路径、绿色租赁路径、绿色保险路径在这三个阶段发挥着辅助作用,主要作用和辅助作用双管齐下,共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具体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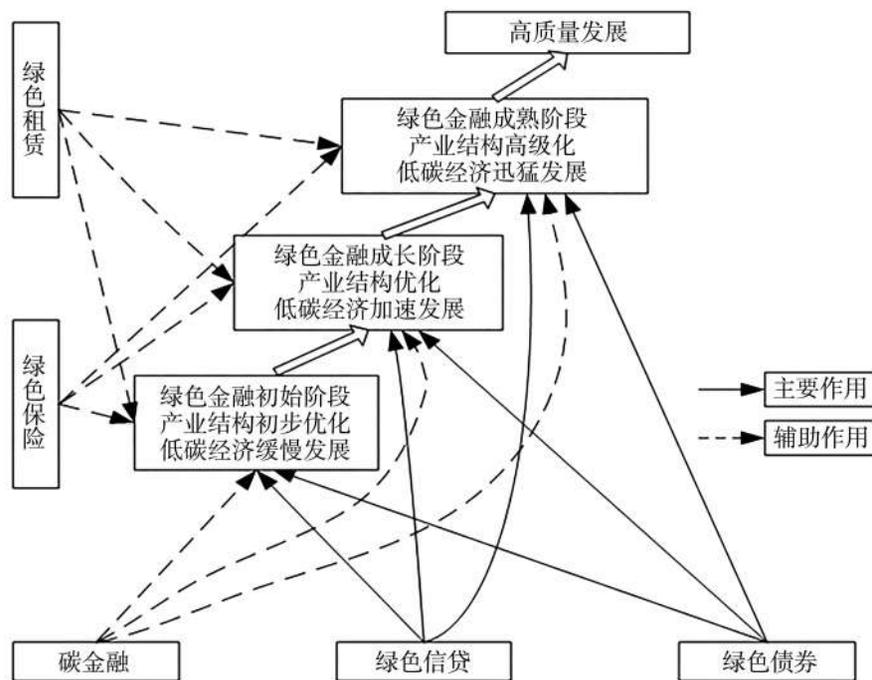


图2 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演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五、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4个方面。

1. 加强前瞻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

虽然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也意味着绿色金融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未来可以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实现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通过明确的法律政策强化法约束和制度安排,充分体现对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促进绿色发展。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中不仅要加入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发展方面的考量,还要细化考量标准,才能充分利用政策工具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为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碳排放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进行规定,加强立法机构和法务人员的专业性,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除对碳排放权和排污权进行规定外,还要明确自然资源产权,以便企业在推广绿色金融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加快研究绿色金融产品特色服务标准,完善绿色金融产品通用基础标准及信用评级标准,根据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情况修订绿色金融业绩评价体系,制定绿色金融市场的交易市场制度规则和相关标准。

2. 创新产品服务,建立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现有绿色金融产品虽然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和碳金融等,但仍然不够丰富,主要产品的投向不够广泛,投放量达不到预期数额,后期兴起的绿色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投放量更是不达标。需要加大已有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投放量,拓宽使用范围,深化绿色金融服务低碳经济的深度,做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动引领者。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创新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资产支持票据、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等绿色金融产品的产品用途,不断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质量,形成成熟的绿色金融产业链。在部分产品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国规范统一的相关绿色金融产品交易市场,适时建立符合绿色资产特征的二级金融市场,搭建全国有序高效、规范统一、两方及多

方的产品与服务交易平台。加强绿色金融专业机构发展,以专业机构平台为支撑点,做绿色金融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与维护者。加强金融科技和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增加两者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信息共享方面的应用。

3. 提高信息透明度,明确各类主体职责和市场功能

面对环境信息不透明、金融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要加强对信息公开规则的管制。统一信息披露要求和格式,便于披露主体提供标准合格的披露报告,有利于投资者对所需信息的汲取。强化相关主体的信息披露责任意识,由内而外加强企业、上市公司等主体的信息披露主动性。加大信息披露违规的惩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同时,面对主体职责不明确的痛点,要在现有绿色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哈特威克绿色金融体系框架对绿色金融进行扩展和深化。以服务对象的二分法为支撑,将主体划分为传统职责转型和新增绿色职责两大类型,对这两大类型主体承担的绿色金融职责进行明确分工;明确金融机构、实体企业、民众的职责,提高各主体绿色金融服务质效,明确各主体职责和市场功能。对于金融机构,要应用专业技能对市场环境进行风险测试,创设绿色金融产品、培育各类专业的绿色金融服务机构;对于实体企业,要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和环保标准,遵守碳市场履约承诺,对绿色资产进行管理;对于民众,要监督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监督企业在环保指标上的不达标行为,提升绿色消费意识,加大对绿色交通、绿色投资以及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支持。

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探索绿色金融实践路径

目前,中国主要是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制定绿色风险指引及风险分担机制,建立政策性的绿色投资银行、绿色产业引导基金等履行政府职能的新型绿色金融机构。政府可以采取相关措施来促使企业投资主动转向绿色金融领域,促使企业自下而上地推广绿色金融,以此来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使用率。政府可以在发行绿色债券的过程中实行相关的减免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购买绿色债券。在税收方面,可以效仿国债的免税政策,通过实行免税增加

企业的总收入,增加绿色债券购买者的数量和购买金额。同时加强宣传,让人们充分了解绿色债券的应用领域和优点,加大绿色债券的应用范围,使其成为投资者首选的投资手段。除减免税收外,地方政府可以为符合要求的企业提供投资补助、担保补贴,还可以采取财政奖励等措施。为使绿色保险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政府可以设置专门的咨询服务窗口,普及绿色保险方面的知识和成功的案例,提高企业绿色保险的购买率,增加公司绿色保险的发行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引导机构和实体企业投资绿色项目,进行绿色资产管理等,助推绿色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 [1] 史丹.《低碳经济与我国国际分工战略的调整》评介[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
- [2] Adenle Ademola A, Manning Dale T, Arbiol Joseph.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n Africa: Barriers to Financ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J]. WORLD DEVELOPMENT, 2017(100).
- [3] 张煜涵,任嘉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多边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29).
- [4] 涂建明,李晓玉,郭章翠.低碳经济背景下嵌入全面预算体系的企业碳预算构想[J].中国工业经济,2014(3).
- [5] 刘任重,曲修平.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24).
- [6] 闫怀艳,吴秋房,万佳.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及前景研究[J].金融经济,2018(10).
- [7] 胡宇聪.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挑战、对策及展望[J].中国集体经济,2019(2).
- [8] 王育宝,陆扬,王玮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耦合研究新进展[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9] 郑洁,付才辉,赵秋运.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J].财经研究,2019(10).
- [10] 殷剑峰,王增武.中国的绿色金融之路[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6).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Green Finance Supporting Low Carbon Economy

Wu Zhaoxia Zhang Si

Abstract: Promot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goals. Continuously promote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guide and imply financial resources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double-carbon" goal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green finance to support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combs the mechanism of green finance to support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e path evolution of green finance to support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studied. Finally, it should b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green finan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novative product services, correctly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clear all kinds of subject division of labor, etc., to better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my.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een Finance; Low-Carbon Economy; "Double-Carbon" Goal

(责任编辑:张 子)

【城市经济研究】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瓶颈与经验借鉴*

曹静 冉净斐

摘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发挥消费引领作用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已具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和外在环境,一些城市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依然存在着城市总体经济实力有待提升、缺少全球知名的商圈和本土品牌、对境外消费的吸引力不足、在引导消费结构变化、释放消费潜力方面需要升级等问题。从发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模式上来看,主要有自然形成模式和政府推动模式两种,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特色,我国需要进一步以技术支撑和制度创新营造优良的消费环境,增强本土品牌的全球吸引力,建立完整的时尚产业链,将实物消费与文化旅游消费相结合,提升城市社区发展,加强高端国际医疗保健服务供给,在全国更好地发挥示范和带动效应。

关键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环境;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74-07 **收稿日期:**2021-11-01

***基金项目:**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开放课题资助项目“北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研究”(JD-KFKT—2021—002);上海高校智库项目“上海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研究”(ZK2021-1-3-761);上海市商务委专项课题“关于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评价体系专项调研”(SW2021-4-110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激励和路径研究”(2020BJJ068)。

作者简介:曹静,女,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上海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上海 200235)。

冉净斐,男,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郑州 450001)。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全球第二大市场的优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全面促进消费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21年,商务部宣布,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以消费升级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是最好的载体和实施路径。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的经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之路,不仅有利于在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少

走弯路,实现弯道超车,也可以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在对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存在的主要瓶颈,通过梳理全球领先的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模式,借鉴发达国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提出我国进一步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建议,以期对我国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提供启示。

一、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区域经济布局中,城市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和扩大内需

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已具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和外在环境,一线城市特别是以上海、北京等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在此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1.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已具有良好的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已有23座城市的GDP超万亿元。《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21》显示,2020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的GDP总量超过19.4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9.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86万亿元,占全国的20.04%。上海作为我国的商业中心,总体经济实力(GDP)位居全国城市第一(见图1)。2020年,上海GDP达5609.10亿美元,经济总量远超过香港的3693.50亿美元,位居国内城市之首。居民生活富足,人均可支配收入领跑全国其他城市,2017—2019年平均增速在8%以上,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GDP平均增速依然达4%,远高于纽约、伦敦、巴黎。



图1 2020年中国GDP总量前五强城市

资料来源:根据《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绘制。

2.我国城市对消费的集聚度不断提升,辐射效应明显

城市的消费集聚度越高,对国内外消费资源的集聚效应越明显,消费的创新效应和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显著,就越有利于发挥该城市的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以上海为例,近几年上海消费对国际消费资源的集聚度在不断提升,上海已成为全球零售商进驻的重要目的地、国内外知名品牌和创意品牌的集聚地,世界知名高端品牌集聚度超过90%,全球零售商集聚度位居全球城市第二。2020年上海首发经济活跃指数为87.1,新进首店909家,国际品牌首店约占全国半壁江山。上海正在成为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消费品零售城市和进口消费品集散地。众多中高端消费品牌通过上海进入内地,上海口岸进口服装、化妆品、汽车分别

占到全国的70%、47%和36%。

3.我国城市消费需求变化快,对新品的需求旺盛

城市作为我国的区域消费中心,消费实力强,消费水平高,在高端消费上拥有更大的集聚力和吸引力。2020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42536元,居全国之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线上购物、直播带货、社群消费、在线教育等新型消费发展迅速。2021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消费能力最强的前三个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和重庆,其中消费前10强的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2194.42亿元,占全国消费总量的24.9%。城市的消费需求变化快,对于新品的消费需求旺盛。数据显示,伴随着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线上新品市场的崛起,上海在线上新品购买人数、新品销售额方面均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新品消费之都”。在天猫平台各大城市的新品消费中,上海的消费规模占比接近5%,远高于其他城市,位列新品消费与新国货创新力榜首。

4.我国城市消费创新快,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不断涌现

城市作为全国或地区的商业中心,人口密度高,消费能力强,许多零售企业都将我国大城市作为中国大陆、亚洲乃至全球新业态、新模式的首发地和尝试地,特别是在场景式、体验式消费等方面发展迅速。如星巴克上海烘焙工坊是全球最大的甄选咖啡体验中心;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超市COSTACO落户。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不断加深,城市商业也不断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拼多多创立三年即在美国成功上市,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利用平台模式整合供应链。2020年,上海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29417.4亿元,其中B2B交易额17697.3亿元,占电子商务交易额的60.2%;网络购物交易额11720.1亿元,增长29.7%,占电子商务交易额的3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一线城市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城市。

二、我国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存在的主要瓶颈

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迅速,一些城市已具备了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但同全球领先的发达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的推进步伐。

1.城市总体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城市经济规模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规模网络等级体系,提升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的经济总量虽然较高,但同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上海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为5507亿美元,虽已超过中国香港,但与作为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纽约的10651亿美元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东京和巴黎分别为9754亿美元和8375亿美元。2020年,上海的经济规模人均GDP达2.31万美元,在国内居于前列,但依然远低于香港的人均4.68万美元,与伦敦和纽约等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较大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判断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反映了城市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在全球10个主要城市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前三的城市分别是纽约、中国香港和伦敦,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0185美元、50698美元和37499美元。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66美元,在全球10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8。纽约、香港、伦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上海的6倍、5倍和3.7倍,北上广总体处于第三梯队。我国一线城市消费对整个经济的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而发达国家基本在70%以上,伦敦为87%,纽约为91%。我国城市中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政府在促进消费发展方面需要有更多的举措。

2.缺少全球知名的商圈和本土品牌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都拥有世界级的一流商圈,我国很多城市的实体商圈在全国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全国前20强商圈中,上海就拥有4个,其中排名第一的是上海的人民广场商圈。为了实现错位经营,上海把差异化、个性化、特色化作为商圈调整的方向,2019年上海优势活力街区的单元比重超过40%,在全国居于首位。但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纽约第五大道等国际知名商圈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很多城市近几年在国际知名品牌首发和首店上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进口关税等原因,这些商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城市竞争优势不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任何一个知名商圈或步行街都是现代商业和城市历史文化的融合,本土的历史、时尚和文化,特别是本土知名品牌才是全球顶级商圈

的内核。我国很多城市都拥有许多老字号,仅上海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就有220个,是全国老字号品牌数量最多的城市,但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品牌商品和特色产品发展不足。本土零售商品品牌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能够进入国际一线、二线的品牌更少,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城市商圈的全球知名度。

3.对境外消费的吸引力不足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境外游客具有强大的消费吸引力。我国城市总体上来说,对境外消费的吸引力较弱,不论是消费人数还是消费规模。欧睿国际数据库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上海接待国际旅游入境775万人次,比2018年增长3.5%,在总量上远低于伦敦(1956万人次)、巴黎(1909万人次)、纽约(1401万人次)、东京(1044万人次)等城市,在增速上也低于亚洲的曼谷、吉隆坡、孟买、大阪等城市(这些城市排名均在30位以前),排名全球第30位。2019年,上海的境外旅客销售规模达73.71亿美元,但远低于迪拜的308.20亿美元和我国香港的252.29亿美元,与国际一线城市的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也存在很大差距。在整体上,我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都属于第三梯队。这表明,我国城市的消费主要还是以境内消费为主,相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而言,无论是对于境外游客的吸引力还是在特色商品的提供方面,都缺乏鲜明的特色,吸引力远远不够。

4.在引导消费结构变化、释放消费潜力方面有待升级

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城市的消费结构逐渐从注重实物产品消费向注重服务产品消费转变,休闲娱乐、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等日益成为消费热点。上海作为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城市,80后、90后和00后人员逐步成为消费的主力军,是新业态、新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更加关注品种、品质和品牌,对于智能商品、高端商品有较大需求,对于娱乐性和享受型的需求越来越高。我国很多城市的历史底蕴深厚,拥有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而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文化消费需求。调查显示,2018年上海消费者对于服务消费的满意度最高,达89.13分,对于文化消费的满意度只

有77.92分,跨次元新消费(动漫、电竞游戏等)行业的满意度最低,为76.87分。很多城市在博物馆、公园、演出、体育赛事等方面的供给远低于全球主要消费城市。截至2019年,全球10个主要城市中,巴黎以297座博物馆数量居全球首位,伦敦与东京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博物馆数量与东京还相差10座,上海和广州就更少。而在剧院音乐厅数量上,纽约以652座高居榜首,随后依次是巴黎、伦敦与东京,构成的第二梯队,上海与北京分别为150座和130座,与国际发达消费城市有较大差距。

三、发达国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

发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不同国家由于发展历史不同、资源禀赋不同,所采取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先成为本国或本区域的消费中心城市,然后再逐渐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规划、管理和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推出尤为重要。

1.通过建立政府层面的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为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许多发达国家城市都在政府层面建立了数据平台,通过数据的共享和管理,优化城市管理,促进和引导消费。纽约于2012年通过《开放数据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政府数据大规模开放纳入法律,由此建立了一个基于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的数据“生态系统”。其中,既有按邮政编码分区的历史统计数据,也有地铁、公交系统的实时数据,还包括停车泊位、旅游景点、餐饮卫生、住房租售等相关数据,促进了纽约国际消费中心的不断发展。国际消费中心的发展不是以单一行业为支撑,而是商业、旅游、文化、体育、会展等诸多行业联动发展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消费的规模效应和整体优势。作为数字化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公共数据平台的搭建把握城市的运行信息、经济信息和各种消费信息,有利于在更精细的数据化层面分析消费动态,引导消费习惯,制定合理的政策。

2.拥有完整的高端时尚产业链条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消费创新中心和时尚

引领者,时尚产业必定十分发达,全球主要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往往也是国际时尚之都。时尚的发展大多体现在拥有一个完整的时尚产业链。伦敦是时尚界的主要城市之一,大约一半的专业时装设计工作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及周边开展,目前有46400人以各种方式在伦敦时尚产业从业。许多领先的时装设计师工作室和公司位于骑士桥地区,以这些时装设计师为核心或主导的伦敦时装周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时尚买手,每年产生的直接价值在200亿英镑以上。纽约将都市工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一抹亮色,为各种小批量、非标准化、周转时间短、创意性强、需要快速反应的中小型公司保留发展空间。目前曼哈顿地区有约1600家成衣制造公司,其中400多家位于繁华第五大道毗邻的纽约时装区,从事定制编织、镶嵌切割、样品制作等。政府从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通过微型制造、垂直制造、共享生产空间等模式,努力保护服装、创意、设计的生产制造空间,通过制造平衡战略维护其在全球时尚业生产链、商品链及价值链的领导地位。

3.拥有国际医疗中心和完善的私人医疗保健服务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城市大多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施,除能满足本地居民的医疗服务外,还能提供高端的医疗保健服务。比如伦敦的卫生服务提供的范围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从生育到肥胖,从肿瘤到整容手术。在伦敦市中心仅整形手术就有60多家专业私人诊所,哈利街区有26家诊所和100多个注册从业人员可从事健康牙科正畸治疗。同样,新加坡依托本地医学院、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发展,拥有国际知名的医疗中心和私人保健服务中心,每年仅接收境外求医就超过100万人次,带来了大量的相关延伸消费。

4.注重打造不同区域优势互补的消费和旅游品牌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规划建设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优势和资源实现差异化发展,阿联酋各酋长国就利用各自的优势发展特色旅游。同是经营体育赛事,迪拜主要是赛马、网球、沙滩排球、七人橄榄球等;阿布扎比侧重F1赛车、赛艇、飞行特技表演赛、骆驼赛等;富查伊拉是跳伞比赛;沙迦主推文化游,利用自己的地理和价格优势提出“工作、旅游在迪拜,吃住在沙迦”;哈伊马角有丰富的历史古迹和文物保护景点,主打历史文化游;富查伊拉利用其自然旅游资源,开展山区旅行、沙漠冒险、海上运动

等旅游项目;乌姆盖万则充分利用海滨优势,开发海滨旅游项目。正是这种不互相效仿,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的做法,使阿联酋各酋长国的旅游业得以形成一种共同发展的态势。这种优势互补、差异化定位的经营策略在英国伦敦也被广泛使用,世界著名卡姆登大街市场每个周末吸引超过10万名游客,是伦敦最有吸引力的景点之一。

5.通过打造“未来社区”来提升社区消费

“未来社区”是国际发达城市正在探索和构建的一种新型社区,通过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以未来邻里关系、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服务和治理等众多场景创新为引领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具有典型代表的就是新加坡组屋采用的“邻里中心”规划,摒弃了沿街为市的粗放型商业形态,坚持以本区居民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理念,全部设施满足人们在住所附近寻求生活、文化交流的需要,构成了一套强大的家庭住宅延伸体系。以大巴窑地区为例,除商业、公共服务等实际功能外,还建造新组屋单位、翻新步行街和民众广场,为行人修建道路顶棚,设置新的自行车架和自行车道,建立整栋停车楼等,以此扩展更多绿色空间和无障碍设施,配备邻里公园等供居民休闲放松的绿色场所,通过搭建“艺术与历史角落”来传承大巴窑的文化和历史。欧洲的BLOCK街区设计理念也是“未来社区”的一种模式,将街区与国际化、居住、休闲、娱乐、商务等组合在一起,规划创造一种全新的居住和生活模式。国际BLOCK街区体现的是新型居住模式,它本身向城市空间开放,具备一定的规模,能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又有亲切和谐的邻里关系,是未来社区建筑场景建设的重要模式。

四、我国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思路

我国部分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基于每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特点,我们应结合发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以扩大内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遵循“强基础、增供给、创需求、优环境、补短板、显政策”的思路,借

鉴发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政府通过政策和制度的引导,把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推向深入,发挥在全国城市中的示范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

1.以技术支撑和制度创新营造优良的消费环境
数字化时代的生产、服务和消费离不开数据的支撑,数字化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全面推进数字化城市的建设,满足消费者数字化消费的需要。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搭建各自的数字平台,但各平台数据难以实现共享,更无法实现点对点 and 端对端的链接。建立适应城市服务业发展和体现消费实际情况的消费大数据平台已势在必行,它不仅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旅游、文化、体育、会展等多种信息和消费宏观数据共享,而且也可以实现对微观的企业信息和消费个人信息等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和监测,强化国际消费中心的分析、评估工作。这不仅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的购物环境和体验环境,也便于政府实现精细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韧性,通过消费数据的分析,及时了解消费需求和满足状况,制定适宜的消费引导政策。

积极打造以新科技、新技术为特色的消费环境,通过政府管理机制的改革,持续推进签证便利化,推广离境购物退税政策,推动部门协作联动,创新消费维权机制,打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消费环境。积极争取国家在消费创新政策上的支持,对新零售、原创品牌等发展中的市场准入、税收缴纳、融资上市、知识产权保护等可能出现的制度障碍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储备。

2.建设国内优秀产品出口平台,增强本土品牌对全球消费的吸引力

优秀的本土产品是我国文化和我国特色的无声宣传者,也是提升民族自信和消费城市国际地位的重要力量。以上海为例,作为国潮创新和品牌创新接受度最高的国内城市,可探索进一步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带动效应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功能,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国内优秀产品的展示平台和出口平台,举办新品首发和首秀,集聚更多的国内优秀产品和品牌。其他城市可依托“一带一路”和作为国内知名品牌的首发地和首秀地的优势,推动国内知名品牌,特别是老字号品牌、非遗品牌、国内知名设计师品牌、国内知

名品牌等时尚和快消品的出口,实现国内优秀产品的“走出去”。

促进我国老字号企业的转型,以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为契机,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鼓励本土企业和老字号在商业模式、商业业态和商业技术上的创新,不断扩大其全国和全球影响力。对消费领域的重点龙头企业和品牌核心企业给予优先支持,除继续在财政金融方面给予支持外,建立“一事一办”定向施策制度,梯度培育本土消费品牌的主力军,提升龙头企业的数量及在全国和全球的影响力。

3.建立完整的时尚产业链,提高对全球消费的引领力

我国老字号品牌众多,但现今很多已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魅力,创新远远不够,大量本地设计师的缺失和时尚产业链的不完备是重要原因。因此,急需实行内培外引,优化时尚人才引进和评价政策,建立与时尚产业生产力更加契合的劳动关系制度,制定高端时尚特殊人才的引进政策,吸引和培育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知名设计师,鼓励本土原创品牌的发展,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建立一定的产业园区,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加强高校和各种社会机构对于时尚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时尚人才的聚合度、协同度和流动性。鼓励本土新品牌和老字号品牌举行各种发布会和展示会,搭建时尚品牌的线上和线下流量平台,强化品牌发布的体验和社交功能,吸引国内外时尚买手进入,形成国际时尚买手集聚区。打造一批有潜力和影响力的品牌,推动形成享誉世界的中国轻奢品牌,同时培育世界级的中国重奢品牌。

时尚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一流的时装设计师,还需要与时尚产业相关的本地产业链的快速反应能力、区域的产业组织能力、全球资源的动态链接能力,这直接决定一个城市时尚产业的高度,也使得消费中心生生不息。很多城市历史上曾作为中国的纺织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在成熟的产业工人和传统纺织技艺的传承方面具有深厚的底蕴和基础。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加强在工作空间、资金、人才、制度等方面的引导,打造完整的时尚产业链园区,在服装、箱包等的定制编织、镶嵌切割、样品制作、微型制造等方面形成完整的价值链、生产链和商品链,从而快速对国际时尚潮流做出反

应,引导国际时尚。

4.将实物消费与文化旅游消费相结合,释放更多的消费潜力

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持续带动商业、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悉尼2000年奥运会为澳大利亚直接带来了65亿澳元的经济效益和27亿澳元的出口额,并在随后的5年里带来了42.7亿美元的间接旅游收入。2008年奥运会为北京贡献GDP增长2%。目前我国很多城市举办的国际赛事较少或较为单一,在举办顶级国际综合性赛事上的强化承接和投标力度不够。应从整个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体育文化中心。

同时,改造、引进和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开发具有各个城市特色的国际化旅游文化项目。与国际发达城市开展摄影、服饰、电影、戏剧、美食、体育赛事等领域的人文艺术交流,进行文化旅游项目、文化旅游名城的宣传和推广,实现东西方文化互通,促进消费者流通。将实物消费与文旅消费相结合,扩大城市已有的购物节、旅游节、艺术节等在区域和全国的影响力,吸引外来消费;举行全国性的旅游消费节庆活动,加强与其他城市和省份的互动,带动全国消费。

5.提升城市社区发展,强化高端国际医疗保健服务供给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既要“顶天”又要“立地”,“立地”就是要打造具有“温度”的、人性化的社区。作为国际城市社区发展方向的“未来社区”,摒弃了传统的社区点状更新的弊端,从系统性和整体性上规划出行、交往、创业,到教育、医疗、养老等功能,覆盖了日常生活几乎所有场景,各场景之间相互衔接,层层推进,保证社区功能得到更好的完善。社区的运营和治理依托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手段,整合“线下”现实社区和“线上”虚拟社区,将政府、开发商、第三方部门、居民等各类参与主体都纳入智慧化的网络治理平台中,通过资源整合与协商合作,共同致力于提高社区的治理效能。借鉴“未来社区”的国际发展模式,政府应制定出台相应的社区建设标准、引导政策和企业投标规范。一方面,城市社区的开发提前整体布局,从系统性战略角度构建立体化、数字化、人性化、交通便利、生态宜居的示范型“未来社

区”,打造典型示范,完善社区商业配套,形成面向区域一体化、商产文旅联动、特色鲜明且错位发展的城市商业体系。另一方面,对已有社区的改造分批进行,结合原有社区的不同特点制订不同的改造方案,完成一批验收一批改造一批,以先进引领后进,实现城市社区发展的整体提升。

国外发达的消费城市大多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施,除能满足本地居民的医疗服务外,还能提供高端的医疗保健服务。因此,我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依托各城市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科研实力以及良好的学术环境,打造国际高端医疗中心和私人医疗保健中心,进一步深化在美容、整形、体检、妇幼保健、肿瘤、心血管、机器人手术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合作交流,通过园区开发形成高端医疗的集聚和集中展示,吸引更多的境外人士前来就医,建设国际医疗和私人保健服务新高地。

参考文献

- [1]汪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论坛,2019(5).
- [2]叶胥.消费城市研究:内涵、机制及测评[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6.
- [3]钟陆文.珠三角适宜消费城市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18(6).
- [4]刘涛,王薇.国际消费中心形成和发展的经验启示[J].财经智库,2017(7).
- [5]黄卫挺.关于建设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15(19).
- [6]王青.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打造开放新引擎[N].中国经济时报,2017-08-16.
- [7]魏颖.新时代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思考[J].产业创新研究,2020(1).
- [8]柳学信.加快构建国际消费枢纽城市[J].北京观察,2019(7).
- [9]张剑龙,张珂,林赛南,等.如何保持城市繁荣?对联合国人居署“城市繁荣倡议”的借鉴与思考[J].城乡规划,2020(3).

The Bottleneck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Cities in China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Cao Jing Ran Jingfei

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city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consumption. China has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city, and some cities have also mad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and attemp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city, lack of global well-known business circles and local brands, insufficient attraction to overseas consumption, and need to be upgraded in guiding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releasing consumption potent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model, consumption center c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inly have two modes: natural formation mode and government promotion mod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mbin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needs to create a goo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with technic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global attraction of local brands, establish a complete fashion industry chain, combine physical consumption with cult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improve c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supply of high-end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demonstration and driving effect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Cit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Industry Chain

(责任编辑:柳 阳)

【城市经济研究】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现实价值与提升策略*

张绍乐

摘要:都市圈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是全球城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城镇空间布局形态的不断优化和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逐渐完善,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于促进区域间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中部地区都市圈要采取有力措施,破解在交通、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部地区;都市圈;城市群;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81-07 **收稿日期:**2021-12-22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河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举措研究”(2020CJJ087)。

作者简介:张绍乐,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郑州 450002)。

都市圈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是全球城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区域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而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于促进区域间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中部地区都市圈要采取有力措施,破解在交通、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一、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城镇空间布局形态的不断优化

和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逐渐完善,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1. 都市圈建设是全球城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的主要特征包括人口高度集聚、产业布局合理、空间结构科学、城市功能完善、中心和外围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等。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演进过程来看,都市圈建设是全球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主流趋势。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典型都市圈在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纽约都市圈的面积占美国总面积的0.4%,人口数量占美国总人口的7%左右,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伦敦都市圈的面积占英国总面积的3.4%,人口数量占英国总人口的20%

左右,经济总量占英国经济总量的30%左右。世界典型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表明,都市圈建设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模式。都市圈内的人口集聚、产业分工与协作、空间布局、要素流动等都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其中,适度的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空间;有序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加强了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的产业联系,避免了不同城市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合理的空间布局能够为城镇化提供空间载体,分类引导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自由的要素流动为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要素保障。

2.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都市圈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国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做出的重大调整,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全球经济稳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而都市圈正是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的重要空间载体和核心引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强,集聚效应明显。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之一,是带动区域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第二,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发挥较好的辐射效应。核心城市作为都市圈的集聚中心,吸引了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量的人口、资金和技术等各种要素,随着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部分城市功能逐渐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疏散,辐射效应开始显现,从而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三,都市圈具有便捷高效的流通体系。便捷高效的流通体系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都离不开便捷高效的流通体系。

3.城镇空间布局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也不断深化,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3亿人增加到2019年的8.48亿人,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9年的60.60%。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人口集聚、产业集中的城市群也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作为城市之间的高级空间

组织形式和城镇化高度密集的地区,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群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主引擎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和承接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建设稳步推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份额超过40%,这也带动了其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城市群建设的快速推进,促使城镇空间布局形态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城镇空间布局形态是人才、产业、技术、资源、金融、交通、资本等不同要素在空间中的分布和组合状态,是城镇发育程度与过程的空间反映。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环境正面临深刻变化,这导致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和城市资源条件、发展基础、产业状况、发展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当前和未来城镇空间布局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既有集中团聚状形态和线性带状形态,也有多核心组团状形态和星形放射状形态。

4.都市圈正在成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都市圈和城市群都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构建以陆桥通道、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当前,以通勤高效、协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都市圈正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支撑以及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种要素集聚的重要平台。一方面,都市圈建设能够推动核心城市突破行政边界,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类要素在都市圈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核心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更大程度地发挥核心城市的集聚效应,集聚更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提升核心城市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都市圈建设能够强化核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引领带动作用,随着核心城市的制造功能和转化功能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疏散,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城市之间的分工更加合理、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同城化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助于持续优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和规模结构。

二、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现实价值

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于促进区域间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1.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是促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做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在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综合研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把握现代化发展大势、厚植现代化发展优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三个维度,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始终坚持对内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都市圈建设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都市圈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都市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向上链接城市群、经济带,向下衔接中心城市及其所辐射的区域,其建设成功与否直接关乎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中部地区作为国家的脊梁,必须加快支持武汉、长株潭、郑州、合肥等都市圈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培育发展南昌都市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做出更大贡献。

2.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是破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相继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区域协调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分化现象逐渐显现等突出问题和矛盾。因此,国家在相关规划和文件中多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建设中的主要部分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对提高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突破行政边界束缚、推动跨区域联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加快构建“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区域空间格局,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城市群建设和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大作用。都市圈是城市向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进一步增强城市群的集聚作用,有效发挥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打造科学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由此可见,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对于破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是优化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区域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而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于促进区域间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建设都市圈的目的是构建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科学合理的分工体系,实现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积极完善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其人口和环境承载力,有效发挥其集聚效应,促进大城市发展格局更加优化。二是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都市圈更加成熟、完善,从而促进城市群格局更加优化。都市圈是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般性规律和普遍现象。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由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的城市组成的城市集合体;都市圈是城市群中经济发展程度最高、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其中包括一个或多个大城市,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增长极。随着地区分工体系的逐渐完善,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开始转向产业内分工,区域内大城市的溢出效应更多地通过知识关联传导。与基于区域协同的产业间关联相比,基于知识关联的区域协同对城市的邻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都市圈中的中心城市或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邻近性更具有优势,这有利于实现知识关联传导,从而加强中心城市或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各种经济联系,最终使得都市圈在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设施共享、产业分工合理等方面对于城市群发展产生带动作用。由此可见,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对于优化中部地区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4.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本质上来讲,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 and 乡村产品和服务市场的一体化,是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巨大进展,但依然存在城市吸纳了乡村过多的资源要素、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等诸多问题。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便可看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差距依然存在,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差距达到2670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依然高达2.56。城乡融合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城乡融合也必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农民跨地区迁移后在流入地融入当地城市。都市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形态,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具

有支撑和引领作用。都市圈建设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都市圈建设有利于实现乡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互联互通。第二,都市圈建设有利于城市发展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乡村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提升。第三,都市圈建设有利于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利于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四,都市圈建设有利于乡村与城市构建良好的职住关系,让乡村居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

三、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主要瓶颈

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对于促进区域间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综观其发展现状,还存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尚不健全,产业协同错位发展难题待解,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缓慢,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还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

1. 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尚不健全

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要求相比,与上海、广州等国内发达都市圈相比,中部地区都市圈在基础设施、运输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轨道交通层级有待完善。都市圈轨道交通应该以市域或者郊域铁路为主,但是由于中部地区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及财税分担机制的不完善,且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重点集中于干线运输通道和中心城区而定轨道交通网两级,对都市圈中间圈层的城际交通、市域和郊域交通等轨道交通供给服务不足,对市域通勤客流的吸引力不足,导致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不足。第二,通道辐射能力有待增强。随着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加快,诸如航空运输、轨道交通、公路运输等多形式的交通方式缺乏协同性的规划建设,没有能够得到系统、全面的调整完善。第三,跨区域互联互通机制不健全。中部地区都市圈在通道规划建设、运输服务对接、重大问题协调缺乏长效机制,都市圈内部交通互联互通机制的不健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需要的快速、便捷、综合的整体运输体系与都市圈内部行政分割的管理体制之间产生重要矛盾,制约了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成

为构建现代化都市圈的一大瓶颈。

2. 产业协同错位发展难题待解

中部地区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中部地区都市圈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以郑州为例,2020年,郑州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为4759.5亿元,增速为4.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086.6亿元,增速却仅为1.7%。服务业的增速明显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三次产业整体的发展速度。第二,产业集聚的协同发展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在中部地区都市圈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相同类型的产业集聚互相合作度高,基本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但是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关系尚未有清晰的界定,不利于推动都市圈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制约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产业集群中小型企业较多,且企业间的规模差异较大,非公有制企业多而少,各产业集群间和集群内部产业之间缺乏合理科学的对接、整合机制,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模式尚未有效建立。第三,各类创新要素资源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从中部地区都市圈整体发展来看,中部地区都市圈的创新环境建设势头良好,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新环境的耦合度有所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从发展角度来看,创新环境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过程,是一种混合型的外部环境,而都市圈内部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过程。现阶段,中部地区都市圈各城市之间存在创新能力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急需缩小各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差异。

3.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缓慢

中部地区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能源约束依然趋紧。以郑州都市圈为例,郑州都市圈耕地面积174.24公顷,占河南耕地面积的21.36%,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人均水资源量、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森林蓄积量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人均水资源量326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煤炭消耗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超过60%。第二,生态环境治理压力增大。中部地区都市圈生态环境治理压力不断

增大,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依然有很大差距。第三,协同治理制度不够健全。中部地区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生态环境协同立法的进程不适应都市圈建设的客观要求。中部地区都市圈尚未建立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河流上下游地区的生态利益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在生态补偿领域缺乏整体性、专业性和协调性的区域合作平台,导致流域治理中存在“上游不作为、下游干着急”的现象。第四,生态文明意识尚需提高。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公民相比,中部地区都市圈内各个城市的公民掌握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较为缺乏。虽然中部地区都市圈内各个城市的公民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环境保护仍以政府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线,大多数人并未真正自觉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节水、节能、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4.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还不到位

尽管,中部地区都市圈在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基础不同、发展情况各异以及行政壁垒的制约,公共服务一体化还面临许多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受发展基础、发展条件、财政收入等因素影响,中部地区都市圈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以郑州都市圈卫生机构床位数为例,郑州都市圈各个城市卫生机构床位数存在明显差异。2019年,郑州都市圈包含的郑州、开封区域、新乡区域、焦作区域和许昌区域的卫生机构床位数分别为100492张、18724张、16976张、15621张和11667张,郑州的卫生机构床位数远超过其他四个城市。第二,公共服务制度和标准不统一。中部地区都市圈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和标准尚存在较大差别。中部地区都市圈各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发展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状况、财政实力不同,所以其采取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和标准,从而导致其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也存在较大差别。中部地区都市圈各个城市针对城镇和乡村采取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和标准,导致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第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低。虽然国家对于不同类别医院、学校、图书馆、艺术中心、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的建设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但是受具体设计思路、实际财政收入等因素影响,中部地区都市圈各个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统一,采用的软硬件标准不一致。

四、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还要加强如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构建都市圈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错位发展,推进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1.构建都市圈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中部地区都市圈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的构建要坚持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实现一体化服务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完善集疏网络。第一,优化中部地区都市圈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做好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顶层规划、设计,强化都市圈主要交通干线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主要功能,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第二,完善中部地区都市圈内部轨道交通建设。积极重构各个都市圈轨道枢纽体系,整合各个都市圈范围城市轨道交通、市域铁路与城际铁路客运组织,科学编制轨道交通沿线和站点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规划方案,强化城市功能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提高区域功能体系的运作效率,促进枢纽与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促进区域功能中心与门户枢纽、外围组团和相邻城市中心区等实现高效衔接。第三,建立完善中部地区都市圈交通协调机制。现代化都市圈交通一体化的实现,需要体制机制实现创新突破,要不断强化都市圈子系统间的协作机制,通过对合作模式的创新,化解都市圈内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构建安全、便捷、高效、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加强综合管制,减少多头管理。第四,提升城市交通的综合管理水平。完善城市道路网络建设,以大“井字+环线”城市快速路网和内外环高速为骨架,优化快速路集散系统,完善次干路、支路网建设,提升路网密度、路网容量和运行效率,逐步实现路网密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交通高效衔接、压力疏解。

2.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错位发展

为有效解决中部地区都市圈在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促进中部地区都市圈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构建,未来,中部地区都市圈应抢抓产业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强化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都市圈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最终实现中部地区都市圈产业的协同高效发展。第一,加快产业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以中部地区都市圈现有产业为基础,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改造,构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部地区都市圈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第二,注重产业协同,促进产业错位互补发展。中部地区都市圈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强化产业空间集聚和错位发展,加强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发展规划对接,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构建中部地区都市圈大中小城市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第三,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瞄准未来发展方向,注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探索产出智能化产品和智能化服务。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的源头供给和共性技术供给,积极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特色园区”的全链条创新主体培育体系。

3.推进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推进中部地区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着力构建生态经济体系。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节能减碳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中部地区都市圈各个城市新建项目和改扩建项目要严格环境准入,提高钢铁、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的发展起点。结合中部地区都市圈各个城市的产业基础、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开展产业链招商,通过引进关键链接技术促进上下游企业工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第二,着力构建资源支撑体系。优化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严守水资源利用红线,建设节水型社会。不断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第三,着力构建环境安全体系。加强水源保护,不断改善水环境质量。防治大气污染,有效改善空气质量。防治土壤污染,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推进资源化和无害化。

第四,着力构建环境监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数据库,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标准化制度化,强化节能环保执法能力建设,提高统筹协调水平。

4.促进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促进中部地区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旨在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构建资源共享、制度对接、要素趋同、流转顺畅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推动实现中部地区都市圈公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第一,优化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中部地区都市圈要加快编制各自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发展规划,并制订年度行动计划,为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供政策支撑和顶层设计。各个都市圈应鼓励中心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以合作或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向周边城市转移,让这些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大城市的各类优势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各个都市圈内自由流动。第二,转变理念,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部地区都市圈要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仅要强化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基础保障作用,而且要转变发展理念,学习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经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为群众提供多

样化的公共服务产品。第三,加大投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中部地区都市圈各个城市政府要持续加大对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投入,统筹调配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财政资金,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健全支付转移制度,加大各类资金的整合力度,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于完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 [1]童中贤.“一带一部”:区域战略建构的逻辑奇点[J].求索,2021(2).
- [2]王业强.“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冲突与战略调整[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0(6).
- [3]黄艳,安树伟.我国都市圈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J].开放导报,2021(4).
- [4]王浩,沈正平,李新春.淮海城市群战略定位与协同发展途径及措施[J].经济地理,2017(5).
- [5]何少英.福建省中心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J].就业与保障,2021(4).
- [6]张颖,卓贤.城镇化2.0的新动力与新特征——基于手机用户大数据分析[J].改革,2020(1).
- [7]贾华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党课之十七[J].党课参考,2021(3).

Practical Value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Metropolitan Area Construction in Central Region

Zhang Shaole

Abstract: Metropolitan area is the advanced form of urban regional spatial form evolution, is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glob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opening-up level, the steady progress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urban circle construction in central region will usher in a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s an important power source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metropolitan are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ree flow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between regions and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big city. Central region metropolitan area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raffic, indust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blic service and so 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Key Words: Central Region;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平 萍)

【城市经济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空间分异及演进*

李彦军 马港 宋舒雅

摘要:从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五个维度构建城市韧性评价体系,考察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总韧性稳步提升,城市间韧性差距逐渐扩大,省会城市总韧性高,但区域带动作用不强;基础设施韧性在五个维度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提升迅速,制度韧性逐渐落后于城市韧性的其他方面;城市群内城市韧性的层级分布特征明显,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存在较大落差;高韧性城市呈现团块化的分布结构,多分布在主要水系周边;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主要集中在社会韧性、基础设施韧性和制度韧性方面。改善空气质量,推进工业节能减排,提升城市开放程度和优化人口结构是破除韧性障碍的针对性举措。

关键词:城市韧性;制度;时空分异;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88-09 **收稿日期:**2021-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能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20BMZ104)。

作者简介:李彦军,男,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汉 430074)。

马港,男,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武汉 430074)。

宋舒雅,女,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武汉 430074)。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各城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进行了一次大考,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城市韧性在社会治理、信息公开等制度韧性建设上赋予了更深厚内涵,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升城市抗击包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各种不确定性扰动与风险压力的能力,增强城市发展韧性,使城市能够在遇到重大冲击时快速恢复,实现城市正常平稳运行,就显得紧迫而必要。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级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担负着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重任。近年来,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城市抗风险与保障运行安全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城市韧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也使得城市群内各城市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不断增

强。本文通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演进特征及空间分异,并识别阻碍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以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提升城市综合韧性、抵御不确定性风险和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本文从多个维度综合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的韧性状况,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和研究方法如下。

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Cutter、Zheng和杨莹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城市制度建设纳入韧性测度中,从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五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

城市韧性综合评价体系。

经济韧性指城市经济系统及各经济主体妥善灵活应对风险冲击、减少损失的能力,与城市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从城市人均经济产出、工业产出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选取指标衡量城市经济韧性。

生态韧性关注城市发展和人口集聚过程中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和恢复力,强调以最小生态和环境代价换取城市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人口”的和谐共生。基于此,从城市空气质量、生产生活废物处理能力和绿化建设等方面选取指标综合反映城市生态韧性。

社会韧性强调城市妥善应对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外在压力的能力,反映了城市发展活力和社会福利水平。为此,本文从城市人口规模及结构、消费活力和文化医疗科技事业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衡量社会韧性。

城市基础设施中,完备的供水、供电和交通系统等对减少极端事件影响作用重大,有助于克服极端事件对城市各系统之间的消极连带传递作用,在城市面临风险冲击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基于此,本文从城市水电网供给能力、道路密度和高铁建设等方面选取指标反映基础设施韧性。

制度韧性主要指地方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特别是风险发生时和发生后政府行使组织、管理、规划和行动的能力。为此,本文从社会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城市市场化和开放程度、经济多样化程度和私营企业活力等方面选取指标衡量城市制度韧性。

2. 数据来源

依据研究对象一致性原则并兼顾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除仙桃、天门和潜江三个湖北省直管市以外的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PM2.5浓度数据源自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分年度世界PM2.5密度图。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3. 研究方法

应用熵值法对城市韧性进行测算,并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某指标的离散程度并赋予相应的客观权重。为实现不同年份之间城市韧性的可比性,本文借鉴白立敏、杨丽等学者的研究,将熵值法进行时间维度上的扩展,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合理。改进

后的熵值法计算步骤如下:

设共有 m 个年份, n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z 项指标, λ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δ 个指标,则第 t 年城市 i 的第 j 个指标值表示为 x_{ijt} 。

(1) 运用极差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得到 x'_{ijt}

(2) 指标归一化: $Y_{ijt} = x'_{ijt} / \sum_{t=1}^m \sum_{i=1}^n x'_{ijt}$

(3) 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值: $e_j = -k \sum_{t=1}^m \sum_{i=1}^n Y_{ijt} \ln(Y_{ijt})$, 其中 $k=1/\ln(mn)$ 且 $k>0$

(4) 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_j = 1 - e_j$

(5) 计算各子指标权重: $w_j = g_j / \sum_{j=1}^{\delta} g_j$; 各维度层元素权重为 $\sum_{j=1}^{\delta} w_j$

(6) 计算各维度城市韧性评价: $RES_{\lambda i} = \sum_{j=1}^{\delta} w_j x'_{ijt}$;

城市总韧性评价为 $RES_{it} = \sum_{j=1}^{\delta} w_j x'_{ijt}$

由熵值法计算得出城市韧性各项指标权重分配结果如表1所示。

引入障碍度模型对阻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障碍度进行测度,以便有针对性地给出各城市韧性的提升策略。单个指标障碍度越大,表明城市韧性受该指标的阻碍作用越大。障碍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I_{ijt} = (v_{ijt} w_j) / (\sum_{j=1}^n v_{ijt} w_j) \times 100\%$$

其中, I_{ijt} 代表城市 i 在第 t 年的第 j 个指标的障碍度, v_{ijt} 为指标偏离度,代表城市 i 在第 t 年的第 j 个单项指标标准化值与理想值100%的差距, w_j 为单项指标权重。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变动趋势

通过熵值法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2003—2019年城市韧性的综合测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城市群城市韧性稳步提升,湖北省内城市韧性最高,江西增速最快

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总韧性稳步提升,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17年时间韧性水平提升近三倍,由0.0411上升为0.1229,年均增长率为7.08%。

在省域层面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呈现

表1 城市韧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代码	权重
城市韧性	经济韧性 (0.151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x1	0.0292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x2	0.0116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x3	0.0100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x4	0.0050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人)	x5	0.0458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重(%)	x6	0.0496
	生态韧性 (0.0378)	PM2.5	x7	0.0055
		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吨/万元)	x8	0.0006
		每万元工业增加值耗电量(千瓦时/万元)	x9	0.000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x10	0.0058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x11	0.012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x12	0.009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13	0.0040
	社会韧性 (0.2777)	人口增长率(%)	x14	0.000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	x15	0.0050
		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万人)	x16	0.0139
		每万人医生数(人/万人)	x17	0.0153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册/万人)	x18	0.0547
		科学支出占GDP比重(%)	x19	0.0453
		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x20	0.0153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个/万人)	x21	0.1273
	基础设施韧性 (0.3947)	人均供水量(吨/人)	x22	0.0780
		人均生活消费用电量(千瓦时/人)	x23	0.0589
		每万人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x24	0.0504
		每万人公共汽车数(辆/万人)	x25	0.0325
		高铁站点开通个数(个)	x26	0.1286
		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万人)	x27	0.0462
	制度韧性 (0.138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比(%)	x28	0.011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数占比(%)	x29	0.0657
		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比(%)	x30	0.0409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x31	0.0204

资料来源:宏观数据选取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PM2.5数据源自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https://sedac.ciesin.columbia.edu/>)。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分化格局。2003—2011年,各省份城市韧性水平差距不大;2011年后,湖北城市韧性快速上升并保持了领先地位;江西和湖南两省份城市韧性交替上升,2017年江西城市韧性超过湖南,位居城市群韧性第二位。具体而言,2003—2019年湖北城市平均总韧性最高,达到0.0755,高于城市群城市平均韧性0.0727,是城市群总韧性提升的主要来源。江西和湖南两省份城市平均总韧性低于城市群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0719和0.0702。在增速方面,江西城市韧性增长最快,年均增速达7.24%,湖北增速次之,年均增速为

7.10%,湖南增速最缓,年均增速为6.86%。

2.城市群内城市韧性的不均衡程度加大,近年来差距的扩大有减缓趋势

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各城市韧性的差距逐渐扩大,总韧性标准差由2003年的0.0116上升到2019年的0.0401。2009—2016年是各城市拉开韧性差距的主要年份,但在最近几年,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标准差没有明显增长,各城市韧性差距基本稳定。在省域层面上,湖北城市总韧性最高,但城市韧性的分布最不均衡,属于“高韧性低均衡”

省份,2003—2019年间城市韧性的平均标准差达0.0323,远高于其他省份的城市韧性差距。湖南城市韧性“低韧性中均衡”,各城市韧性的平均标准差为0.0228;江西城市间的韧性差距最小,城市韧性分布最为均衡,平均标准差为0.0153,韧性呈现“中

韧性高均衡”态势。

3.省会城市的区域带动作用不强,城市群仍以中韧性和中低韧性城市为主

分城市来看,如表2所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了以武汉、南昌和长沙为“三中心”的城市韧性高值

表2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总韧性分级

韧性分级 偏离比率	低韧性 (-30%及以下)	中低韧性 (-30%,-10%)	中韧性 [-10%,+10%)	中高韧性 [+10%,+30%)	高韧性 (+30%及以上)
城市	荆门、益阳	吉安、抚州、荆州、黄冈、岳阳、常德、娄底	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宜春、上饶、宜昌、襄阳、鄂州、咸宁、湘潭、衡阳	九江、黄石、孝感、株洲	南昌、武汉、长沙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计算、归类得来。

点,2019年城市总韧性分别达到0.2703、0.1935和0.1924。但省会城市并未形成较强的区域辐射和带动作用,以偏离全国城市平均韧性(0.1214)的百分比范围划分城市韧性等级,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仍以中韧性和中低韧性城市为主,城市间韧性展现出不协调性。以2019年为例,湖北总韧性最高的武汉“韧性首位度”为1.9447,湖南、江西同期分别为1.4118、1.3797,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存在断崖式的韧性落差,城市群韧性的协调性有待提高。

从城市行政等级上来看,省会城市的韧性提升更加迅速。2003—2019年,武汉、南昌和长沙的总韧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5%、8.01%和7.72%,均高于同时期非省会城市7.43%、7.56%和7.13%的韧性平均增速,韧性增长点继续向省会城市集中。非省会城市在韧性增速上存在劣势,再加上韧性的基础差距,城市群内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韧性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城市韧性的空间极化格局短时间仍旧难以改变。

4.基础设施韧性在各维度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迅速提升

如图1所示,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各维度韧性逐步提升。基础设施韧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2003年的0.0062上升到2019年的0.0456,年均提升13.28%。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生态韧性起到良好支撑,分别由2003年的0.0099、0.0070和0.0114上升到2019年的0.0267、0.0217和0.0206,年均分别提升6.36%、7.37%和3.74%,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生态改善取得

了明显成效。制度韧性提升速度缓慢,由2003年的0.0066上升到2019年的0.0083,年均增长率仅有1.50%,表明城市在经济多样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方面还有一定短板,在城市受到冲击时,制度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到省份和城市尺度,湖北各城市在经济韧性维度增速更快,年均增长率为7.09%;江西各城市在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韧性维度提升更为明显,年均增速分别为4.81%、7.89%、15.64%和3.00%。分城市来看,2003—2019年,襄阳、抚州、鹰潭、孝感和景德镇分别在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韧性和制度韧性方面提升最快,年增速分别为10.44%、8.79%、10.60%、25.70%和6.40%。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障碍因子分析

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集中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韧性方面。2003年障碍度位于前五位的韧性障碍因子多分布在社会韧性、基础设施韧性和制度韧性方面,2019年障碍度位于前五位的韧性障碍因子多分布在基础设施韧性、社会韧性和制度韧性方面。

从韧性障碍度位于前五位的障碍因子数量来看,2003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数占比、人均供水量和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重出现在韧性障碍度前五位的次数较为频繁,2019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数占比、人均供水量和年末总人口数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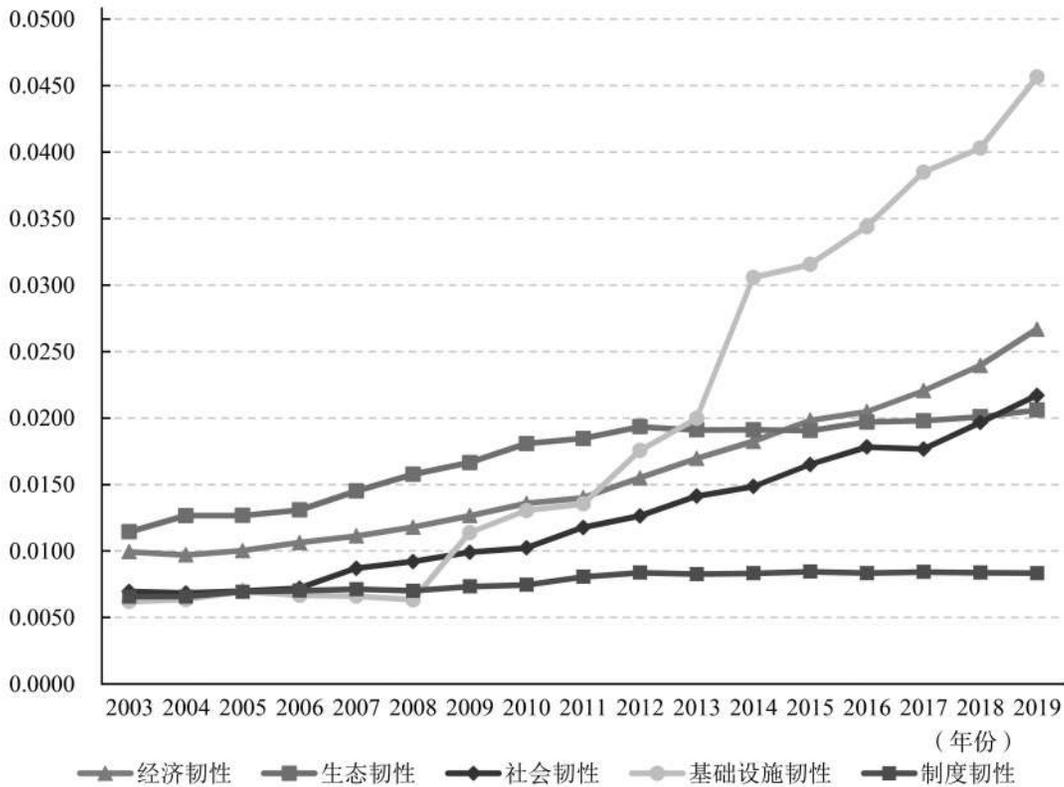


图1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维度分解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率出现次数较多,表明城市应当继续加强市场开放程度,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并且需要长期重点关注城市人口收缩和中青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韧性首位障碍因子来看,单项障碍因子的障碍度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影响城市韧性的各项具体指标的短板不是特别突出。在2003年,PM2.5、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重、人均供水量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数占比出现次数较多,对城市韧性的阻碍作用较大,而在2019年,PM2.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数占比和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重成为阻碍城市韧性提升的主要因素。在研究期间,PM2.5始终制约着城市生态韧性的提高,工业副产品处理能力和生产减排措施未能赶上工业规模的扩张速度,企业的环境效益不高。推进工业废物回收利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工业扩张 and 环境保护意义较大。

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分布演进特征

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韧性城市呈现

团块化的分布结构,多分布在长江、汉江、湘江和赣江等主要水系周边,低韧性城市集中分布于城市群中西部,区域间韧性的差距有扩大趋势(见图2)。

多种因素促成了低韧性城市分布格局的形成。城市群的中西部地质条件复杂,城市易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受到较大制约,遭遇风险时,城市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较弱;这些城市在社会建设方面落后于其他城市,科技创新缺少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创新能力较弱,城市发展的动力受限,各维度韧性没有表现出协同上升趋势,城市抵抗风险的整体能力较弱。

经济韧性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高值点向周边区域扩散的空间结构,城市群西北部也逐渐成为经济韧性高值区域。部分省会周边城市长期处于经济韧性低值区,原因在于这些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低,第二产业体量小,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相对有限,城市各主体应对和处置风险冲击的经济实力偏弱。

生态韧性方面,高韧性城市主要集在汉江、长江、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水系湖泊周边,水生态系统极大地缓解了沿线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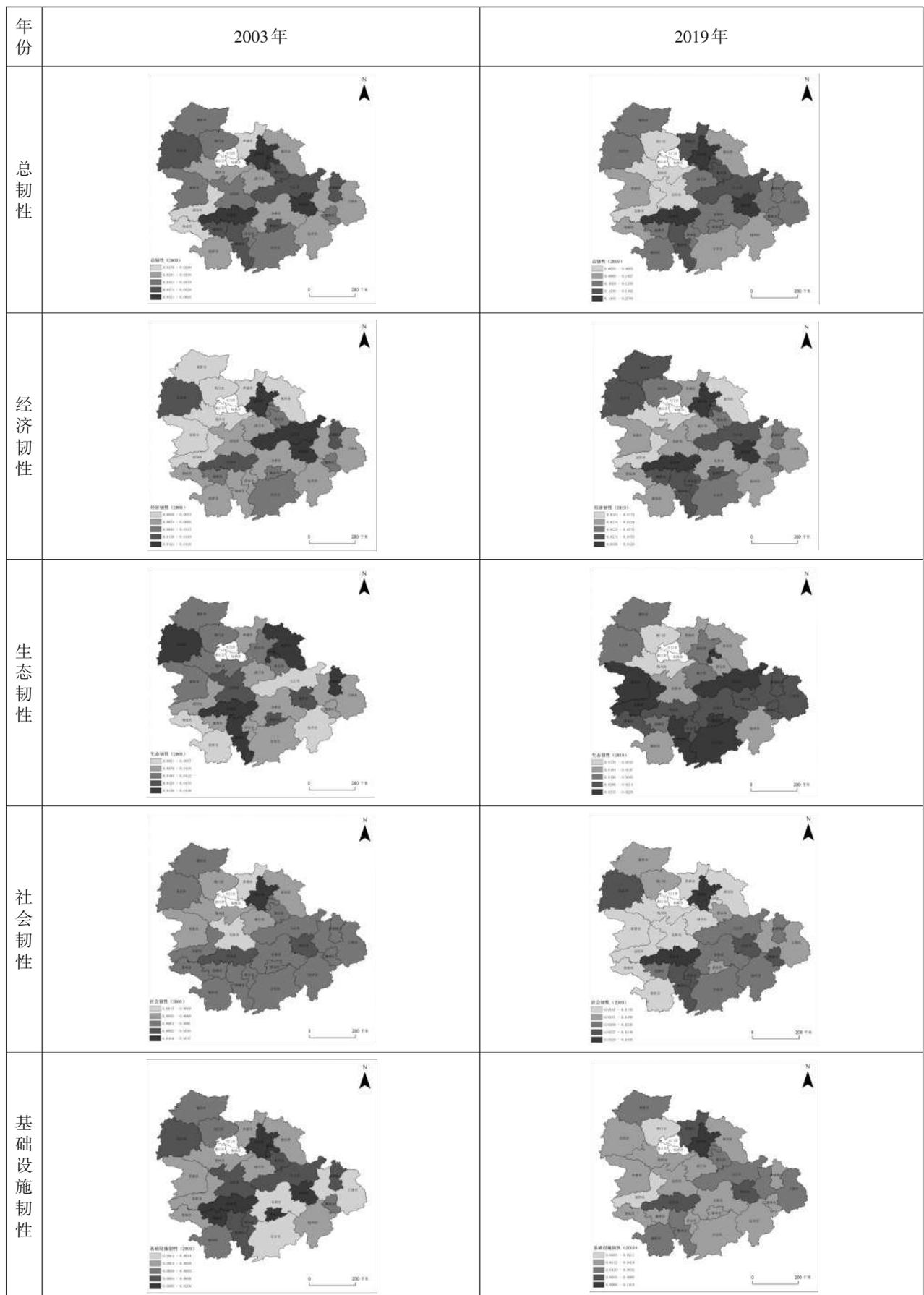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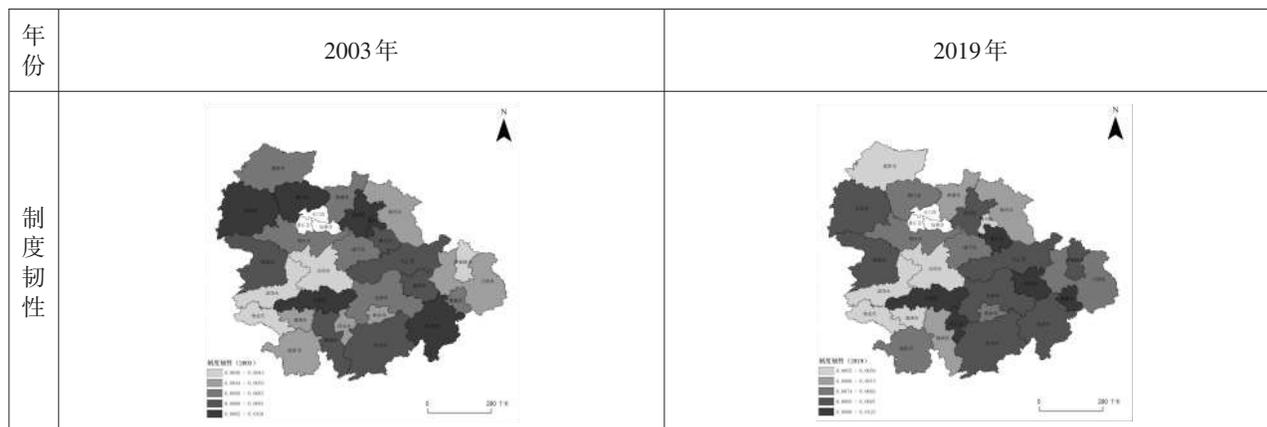


图2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各韧性维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续图2

2019年,生态高韧性区域向南移动的趋势明显,湖南和江西逐渐成为生态韧性高值区域。湖北城市生态韧性位序下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水系湖泊虽然对该省城市的生态质量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但由于空气质量差、城市工业副产品综合利用和处理率低、城市建成区绿化面积不足等,生态韧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与其他省份的城市情况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社会韧性方面,2003—2019年的空间极化现象更加明显,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成为社会韧性的高值城市,城市间的社会发展差距继续扩大,这一现象在湖北和湖南两省份尤其突出。具体而言,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在医疗资源、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维度和领域同样具有优势,在社会韧性发展上保持了领先地位。这表明,城市韧性的建设是多维一体的,韧性的不同维度具有连带和传递效应,在韧性的整体培育过程中,应该重视韧性各维度的协调性。

基础设施韧性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2003—2019年,基础设施韧性低的城市提升速度更快,中等基础设施韧性水平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多,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分布变得更为协调。2003年,城市群东南部存在大量的低基础设施韧性城市,近年来,随着水电网路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城市韧性快速提升,与其他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实现韧性超越,城市面临风险冲击时的正常运行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制度韧性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比较均衡,但在湖南省除长株潭城市群外城市的制度韧性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这些城市在吸引外资和

培育民营经济等方面处于劣势,城市应在市场化改革、政府信息发布、产品市场培育和开发、法律环境完善方面有所改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制度韧性纳入城市韧性研究框架当中,从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五个维度构建了城市韧性综合评价体系,评估了2003—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的韧性度、韧性障碍因子及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总韧性呈现平稳上升趋势。省域层面上,湖北城市韧性最高,江西和湖南城市韧性位列其后;地级市层面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韧性高值点。(2)城市间的韧性差距逐渐扩大,近年来韧性差距拉大的趋势有所放缓。与全国城市平均韧性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以中韧性和中低韧性的城市为主,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间的韧性存在较大落差,韧性提升速度同样慢于省会城市,进一步推升了城市群的韧性总体差距。高韧性城市的韧性带动作用不强,城市群整体未显现出韧性的协同发展趋势。(3)不同维度韧性对城市群总韧性提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上看,城市群整体形成了基础设施韧性带动,经济、社会和生态韧性强力支撑的韧性发展模式,各维度韧性的联动作用强。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使得基础设施韧性逐渐占据城市群城市韧性的主导地位,这其中高铁的建设发挥了突出作用,但也成为城市间韧性差距的主要来源之一;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迅速,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环境明显改善,但不同城市在创新能力方面差距明显;制度韧性出现小幅波动且增速缓慢,落后于城市群韧性

的其他维度,城市的开放程度和经济多样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4)高韧性城市在空间上表现出团块化的分布格局,多分布在城市群内的主要水系周边。经济韧性高值区集中在省会城市和城市群西北部;社会韧性呈现层级分布特征,城市群西北部和东南部韧性差距明显;生态韧性高值区逐渐向城市群南部移动;基础设施韧性在空间上趋向均衡;制度韧性在部分小范围内的落差较大。(5)对外开放程度低、生态环境质量差、水资源供应量少是制约城市群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城市人口收缩和后备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将制约城市韧性的提升。

上述研究结论对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进一步提高城市韧性、优化韧性空间布局和协同发展带来以下启发。

一是加快城市群经济社会建设,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备的经济结构是城市抵御风险冲击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应继续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建设,重视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和物质产品的储存能力,多个维度协同以整体提升城市群城市韧性。同时,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缩小城市间韧性差距,构建更大范围的风险防范屏障。

二是坚持城市群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完善区域内部的生态补偿机制。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的重点开发区和生态敏感区,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巨大。因此,各城市应该积极优化资源投向和规模,以生态环境约束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清洁产业和绿色产业,同时提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副产品处理能力,做好水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提高城市的生态运行效率。此外,可以进一步推广污染权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于为保护良好生态环境而牺牲发展机会的城市应积极给予补偿,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者的利益得到有效补偿。

三是优化城市基础设施结构,注重城市非可视型公共品的提供。在城市建设中,非可视型公共品指的是政府提供的供水、供气、供热以及排水、防洪、控温等城市功能,这些公共品对于提升城市韧性、增强城市抗灾能力意义重大。然而政府官员往往重视可以迅速带来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对于非可视型公共品(多是与民生有关的

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因此,将非可视型公共品的提供情况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当中,可以激励地方官员重视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的应急保障能力和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间接推动城市韧性的提升。

四是重视制度韧性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韧性建设模式。在政府层面上,各城市应着力提高城市经济多元程度、物资保障能力和风险预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城市在外生风险冲击下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和对居民生活的有效保障能力;在市场层面上,企业作为社会产品的主要提供主体,应积极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保障产品的持续稳定供应;在社区层面上,居民互助在城市抗击新冠疫情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应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增强社区群众的信任感和包容度,发挥基层组织的治理作用和动员能力。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加持、公众参与的多主体韧性建设模式,提升城市化解和抗击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五是加强城市群省份间和省份内部的合作,推进城市群各城市间韧性的协同发展。各城市应积极打破由行政管辖界限带来的合作模式的思维约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互保观念,完善城市韧性的多方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建设韧性格局有序、保障功能互补的城市群韧性结构。例如,政府间通过合作建设城际高速铁路,既能在源头上减少城市间韧性的差距,在城市遭受外生冲击前,提高城市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整体能力,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又能缩短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在城市遭到外生冲击时,增强各城市之间的支援能力,减少不确定性风险给城市造成的实际损失,提高城市群韧性的整体实力。通过城市间韧性建设的协同合作,可以将不确定性风险的波及范围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避免对经济和社会系统造成更大程度的损失。

参考文献

- [1]王凯,林辰辉,吴乘月.中国城镇化率60%后的趋势与规划选择[J].城市规划,2020(12).
- [2]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4).

- [3]赵瑞东,方创琳,刘海猛.城市韧性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20(10).
- [4]Fol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16(3):253—267.
- [5]汪辉,徐蕴雪,卢思琪,等.恢复力、弹性或韧性?——社会—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研究领域“Resilience”一词翻译之辨析[J].国际城市规划,2017(4).
- [6]方东平,李在上,李楠,等.城市韧性——基于“三度空间下系统的系统”的思考[J].土木工程学报,2017(7).
- [7]孙久文,孙翔宇.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经济地理,2017(10).
- [8]Briguglio L, Cordina G, Farrugia N, et al..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Economic Resilience [M]. Blata I-Bajda: Formatek Ltd, 2006:265—288.
- [9]Silva J.D. City Resilience Framework;City Resilience Index[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ARUP, 2014.
- [10]吴宇彤,郭祖源,彭翀.效率视角下的长江上游韧性评估与规划策略[C]//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6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 [11]张明斗,冯晓青.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对比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9(1).
- [12]白立敏,修春亮,冯兴华,等.中国城市韧性综合评估及其时空分异特征[J].世界地理研究,2019(6).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Mid-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Li Yanjun Ma Gang Song Shuya

Abstract: We construct an urban resilience evaluation system from five dimensions: economic, ecological,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to examin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Mid-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3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resilience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steadily improving, but the gap of resilience among cities is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total resilience of provincial capitals is high but the regional driving effect is not strong. Among the five dimensions,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gradually dominate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social resilience have improved rapidly,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has gradually fallen behind other resilience dimensions. The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obvious, and there is a large resilience gap between other cities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high resilience cities is clumped, mostly around major water systems.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mainly focused on social resilience,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mproving air quality, promoting industri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nhancing urban openness and optimiz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re targeted initiatives to break the barriers to resilience.

Key Words: Urban Resilienc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bstacle Factors; Mid-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s

(责任编辑:柳 阳)

【城市经济研究】

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刘 一 丝

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重要推动力,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创新发展与动力变革。近年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迅猛,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并呈现出以城市群为纽带的延伸态势,但城市数字经济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也较为明显。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展现出了一系列新特征,但是在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还面临一系列阻碍,如城市数据开放度不高,尚未形成完整的数字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环节缺失等。在此基础上,应从建立数字经济多规协同体系,构建数字经济空间规划体系,搭建城市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以数字经济的局部创新发展带动城市整体转型升级等方面推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市空间布局;城市体系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097-07 收稿日期:2021-10-25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与形态优化研究”。

作者简介:刘一丝,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研究实习员(郑州 450000)。

一、研究概况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夯实创新型城市发展条件,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形态,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抓手。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加强统筹、注重实效、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立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新方式。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

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水平。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发展意义重大,应紧抓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机遇,把握城市形态的演化逻辑,夯实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条件,以创新驱动发展,以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对接中国现有经济形态与城市发展模式。

此外,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上升至38.6%,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在有效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城市创新发展以及城市空间规划也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科技部和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显示,中国共有78个创新型城市,深圳、广州、杭州等在榜单排名前列的城市,其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低于60%,已经摆脱了投资依赖,走上科技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在新华三集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中,上榜的数字经济一线、新一线、新一线城市几乎涵盖所有的创新型城市。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进行了系列研究。Manuel Castells(1989)在《信息化城市》一书中提出,在信息时代,传统的城市空间将逐渐被信息空间取代,信息通信技术造就的信息流动空间将社会文化规范形式和整个物理空间进行区分并重新组合,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二元化城市”,在信息环境下劳动力地域分配、信息形成、生产扩散和选址的灵活性决定了新的产业空间分布,进而直接影响城市的空间分布。Kwan M-P(2007)指出,流空间理论、时空压缩理论对信息技术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理论支撑,强调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城市空间之间的联系。秦萧、甄峰等(2013)构建了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城市时空行为研究方法框架,认为大数据时代,对反映居民时空行为的网络或移动信息设备数据的挖掘、处理及应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时空行为。黎晓春、常敏(2020)认为,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型城市发展动力系统变革,优化城市发展路径,推动城市创新空间新一轮有机更新,影响城市空间的功能布局。本文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过程中面临的阻碍与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了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目前,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明显。

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延续上升态势,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近年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延续上升态势,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1)》显示,从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评分来看,2019年,参与评估的148个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57.3分,仅有上海(90.5分)、深圳(90.2分)两个城市的评分超过90分;2020年,参与2019年评估的城市,整体平均分

快速提升至59.8分,共有5个城市数字经济评分超过90分,分别是上海(91.6分),深圳(91.2分)、北京(90.5分)、成都(90.1分)、杭州(90.0分)。从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深圳3个典型一线城市,无论是在GDP、城市数字经济规模,还是在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评分的排名上,都位于中国前三位,在数字经济版图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表1所示,2020年,中国GDP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38700.58亿元)、北京(36102.5亿元)、深圳(27670.24亿元);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排名前三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20590亿元)、北京(19468亿元)、深圳(14658亿元);数字经济指数评分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91.6分)、深圳(91.2分)、北京(90.5分)。成都、杭州作为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其数字经济排名均高于GDP排名。2020年,成都数字经济指数位居全国第4位,比其GDP排名高了3个位次(GDP排名为第7位);杭州的数字数字经济指数排名也比其GDP排名高了3个位次(GDP排名为第8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也表现突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发展后劲,一些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自身GDP位序。例如,贵阳数字经济指数排名第25位,比其GDP排名高了27个位次;珠海数字经济指数排名第30位,比其GDP排名高了42个位次;连云港数字经济指数排名第37位,比其GDP排名高了40个位次。

对比近几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发现全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前移集中”特征,迎来了变革突破阶段。数字经济新一线、二线城市数量大幅提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与2019年相比,2020年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发展水平遥遥领先,继续保持引领位置;新一线城市达到47个,较上年增长62.1%;二线城市达到71个,且大批二线城市开始向新一线城市集中;三线、四线城市持续增多,分别由2019年的26个、18个,增长至2020年的88个、30个,城市数字经济迎来变革突破阶段。一般来说,城市综合评分达到85分,且数字经济发展较为全面、已处于领先地位的城市称之为数字经济一线城市。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2018年,全国共有数字经济一线城市4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88.65分;2019年,成

表1 中国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城市	2018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评分	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评分	2020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评分	2020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排名	2020年GDP(亿元)	2020年GDP排名	2020年城市数字经济规模(亿元)	2020年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排名
上海	89.8	90.5	91.6	1	38700.58	1	20590	1
深圳	89.2	90.2	91.2	2	27670.24	3	14658	3
北京	89.4	89.4	90.5	3	36102.6	2	19468	2
成都	87	89.2	90.1	4	17716.7	7	8801	7
成都	87	89.2	90.1	4	17716.7	7	8801	7
杭州	86.9	89.1	90.0	5	16105.83	8	8429	8
广州	86.2	86.6	88.6	6	25019.11	4	13084	4
贵阳	73.2	70.4	71	25	4311.65	52	2027	47
珠海	62.5	66.7	69.4	30	3481.94	72	1569	58
连云港	54	60.8	67.3	37	3277.07	77	1418	61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

都、杭州也达到数字经济一线城市标准,6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89.17分;2020年,6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90.3分。

2.城市数字经济以城市群为纽带延伸

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2020)》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百强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无锡、宁波、杭州、苏州、南京、合肥,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天津,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东莞,成渝城市群的重庆、成都,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济南、青岛、烟台,东南沿海城市群的福州,武汉都市圈的武汉,中原城市群的郑州等,均位于2020年百强榜前20位。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中心城市依靠其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周边城市快速发展,部分城市群内二、三线城市的数字经济评分甚至高于其他省份省会或重点城市。例如,长三角城市群的常州(77.3分)、嘉兴(76.5分),分别位于百强榜的第37、39位,均为数字经济二线城市,但数字经济评分高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75.4分)、山西省会太原(74.2分)以及江西省会南昌(74分)。

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显示,2020年,中国城市群逐渐形成“一轴三带”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山东半岛城市群、东南沿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多个城市群快速发展,整体形成了以京津冀为中心贯穿东西的黄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泛大湾区经济带“三条经济带”,以及南北联动贯通的“一条主轴”。数字经济延续“4+N”的区域格局,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综合加权分别为81.2分、74.8分、72.8分、69.9分,远高于全国城市平均得分。

3.城市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明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地区差异较大,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特征。东部沿海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领跑全国,南方城市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天优势,其地理位置优越、产业基础牢固、商业环境优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在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百强榜中,分数超过90的5个城市里,除了首都北京,第二名至第五名均是东部沿海城市。在数字经济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除北京外其余均为南方城市。

东南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具有显著优势。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从数字经济总量看,2018年,长江三角洲数字经济规模最大,为8.63万亿元;珠江三角洲排名第二,为4.31万亿元;随后是京津冀地区,为3.46万亿元。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数字经济规模较小,发展相对缓慢,分别为1.6万亿元、1.26万亿元。

三、制约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痛点

综合分析,目前在中国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

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阻碍。

1.城市数据开放度不高

在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政府是城市运行的治理者,政府各部门都建立了相应的信息系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等。但由于各部门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连通,各系统数据仅能支撑部门单一业务应用,各数据库、信息库等无法完全开放共享,数据的开放程度低,影响城市数字化进程,影响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2020下半年)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中国共有142个省级、副省级和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但其中,开放树林指数达到50分以上的,仅有9个;20分以下的,达到31个;且仍有达州、甘孜、赣州、黄山、陇南、南京、萍乡、上饶、石嘴山、乌海、乌鲁木齐、扬州、宜宾、鹰潭、永州、长沙等16个城市存在评估期内平台下线无法访问或数据无法获取的现象。此外,中国城市总体数据开放程度较低,部分地区数据开放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如南京、长沙等。部分中西部地区城市数据开放程度较低,影响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2.尚未形成完整的数字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过程,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做好城市建设发展的引导者、建设者和监督者,实现政企合作、全民参与、多方共建,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鼓励社会多元参与。受制于城市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数字城市建设业务系统的分割,很多城市尚未建成完整的协同共建生态体系,跨地区业务协同不够,数字信息无法及时传播、实时共享,导致数据的共享程度低,影响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效率。此外,体制机制不健全、技术标注和路径不统一、管理边界不明确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数字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的作用发挥受限。数据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定价权等界定不明确,城市政务数据权责边界模糊,制约城市数据资源在不同行为主体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的建立。

3.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建设发展流程中环节缺失

运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这一过程,应包含城市规划、项目筹资、城市建设、内容监控、工程评估、成果反馈等一系列环节。目前,在中国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规划

设计缺乏、监控不到位、城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不完善等问题严重。重建设、轻运营,缺乏完善的数字城市运营体系,导致数字城市建设水平低、效果差、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城市数据资源无法高效整合,政府部门间存在差异化的数据标准,都为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制造了障碍。数字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缺乏整体规划设计。目前,很多数字城市缺乏一体化设计,无法引导城市因地制宜做好规划衔接,一些城市由于整体规划不科学而造成资源浪费。数字监控应涉及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各领域的全过程,统筹监控城建项目的科学性、筹资的透明合法性、建设过程的规范性、评价指标的统一合理性,监控环节缺失也严重影响了数字城市的建设效果。此外,目前各城市新兴技术的自主研发水平不高,第三方评估不够权威,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使得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效果难以得到衡量,导致评价和反馈环节缺失,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四、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新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国家与地方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有益探索。

1.城市发展理念改变,从“产—人—城”转变为“城—人—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遵循“产—人—城”的发展路径。通过传统的招商引资,建立新城、商业区等,着力解决人口过多与城市空间有限的矛盾,在人口聚集之后使得城市的各项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高科技代表着高效益,要发展高科技,就一定要聚集高端的智慧型人才,人口聚集意味着创新能力聚集,“城—人—产”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新逻辑。通过城市面貌的塑造,将城市建设成为适合创新型人才居住的城市,从而吸引人才,进而带动城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城市面貌的改善不仅指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也需要城市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吸引人才定居。因此,宜居城市一般更具竞争力,例如,

广州、深圳地理位置靠海,环境宜居,加之发展基础雄厚,吸引了大批人才定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高,GDP长期居于全国前列。成都高标准推进“一轴两山三环七道”天府绿道工程建设,着力建设公园城市,拉大城市格局,以乐业带动安家,2019年成功挤入数字经济一线城市;2020年华为逾十亿元鲲鹏整机制造项目落地成都,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

2. 坚持人本导向开发,“定制城市”应运而生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城市空间被重新定义,空间集聚模式、使用模式、布局模式、联系模式都随之发生改变,“定制城市”应运而生。“定制城市”是指面向创新型人才的个性化追求而建立的小而专的城市,满足偏好相同人群的生活、休闲、办公需求。如蜂族公寓、创新商业、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等新型地产发展模式都是定制城市的具体表现,是助力城市发展的积极因素。蜂族公寓是为创新型人才量身定做的生活空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创新型产业人才普遍年轻,根据《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仅为35.9岁,35岁以下的占比48.8%。这些科技创新优质人才具有年纪轻、学历高、干劲足、带着比低的特点,对城市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创新商业满足了现代人的多元生活需求。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电商得以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发生变化,更加重视消费体验,追求多元化的生活服务。因此,许多城市开始创新商业,进行新零售布局,推动城市更新。在新零售方面,北京坊是一个成功的旧城更新案例,其有一个Tmall×Intersport的店,门店橱窗的人脸识别技术会对顾客进行性别及年龄初判,并根据顾客过去到访的档案进行智能推荐,利用重力和蓝牙感应,智慧货架会对所接触产品的材质、功能等各方面进行展示,随后在智慧云货架下单,商店提供配送服务。此外,医疗商场是商业创新的又一新手段。新经济时代,人们对大健康的需求增加,各地区积极规划建设健康城市,杭州大厦501城市广场就是一个成功尝试,推动了杭州的城市空间规划升级。

3. 创建数字智能之城,数字孪生城市诞生

数字孪生城市是指与城市物理实体几乎一样的“城市数字孪生体”,建立物理城市和数字城市之

间的实时连接体系和动态反馈系统,集中进行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跟踪识别城市的动态变化历程,在城市发展的规律下进行城市的规划与管理。数字孪生城市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同步规划,数据共享。数字城市与实体城市是同步规划与建设的,各类城市主体在城市建设之前就已接入数字化系统,可以用数据展示城市完整的环境特征与发展状态。第二,共同发展,实时更新。数字孪生城市与实体城市显现出同步的生命周期和建设时序,物理城市的各项建设工程都随着建设时序在数字城市中同步构建,并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更新。第三,可预测性和可验证性。将数字孪生城市看作可计算的“城市实验室”,通过将收集数据与数字模型进行紧密结合,识别和提取城市系统特征和规律,并在与实体系统对应一致的数字系统中进行预测和验证,从而做到动态调整,及时纠偏。现实中,雄安新区首次提出数字孪生城市这一概念,将“数字城市”与“物理城市”在城市建设上首次齐头并进,从规划到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

4. 保证城市长远发展,实施城市“留白”战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城市普遍呈现“大工地”现象。但由于中国城市规划起步晚、经验不足,出现城市规划赶不上城市变化的问题,城市建筑在“建设—改造—拆除—建设”这一过程中循环往复。鉴于现代生活对适应性、可变性的需要,城市建设应保有一定的留白空间。战略留白对于健全依法科学高效的规划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城市规划留白主要包括留白预测和留白分区等。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更加方便了城市指标的量化处理。对土地进行留白预测,需要计算留白比、确定留白预估量和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得出具有弹性的用地留白区间,在考虑城市功能分区,且符合城市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在原有土地规划分区的基础上,划分出一部分留白区域不做规划,作为弹性土地用途区域。202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北京市战略留白用地管理办法》,提出“为城市长远发展预留战略空间,实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双控,原则上2035年前不予启用”。这将优化提升北京首都功能,促进城市集约高效、结构调整、布局

优化、韧性提升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五、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提供了动力,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应从以下4个方面发力。

1.建立数字经济多规协同体系

一是完善协同治理的体系构建,实现协同治理常态化。立足于现行的城市空间布局规划行政体制、管理体系以及法律制度,利用大数据技术等现代科技收集与整合各类业务数据,对各部门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掌控,协调各部门利益,科学界定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责任分担机制,明确各部门的治理责任。以组织文化建设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同信任,成立空间规划委员会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实现各部门协同治理常态化。二是加深信息技术共享程度,提升数据“破壁”能力。建立空间规划平台、业务协同平台、数据操作平台等,推动部门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区政府之间的业务联动,提升平台信息化程度,实现各类数据在平台上聚集、交叉和融合,推动空间数据的交汇。推动实现数字化办公,将规划成果转化为全要素矢量图或数字图等形式,减少数据共享屏障。三是坚持空间治理人文转向,以人为本推动城市空间转型升级。考虑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公共政策属性,通过合理规划使空间治理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空间的各个主体,满足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生态需求。提高规划编制的社会参与度,实现政府、市场主体和公众共同参与城市规划的新格局;建立共建共享的空间权利机制,引导资本、市场同时成为城市空间的治理者与获利者;加速转变政府部门空间治理意识,实现人文转向,对政府权利进行制约和监督。

2.构建数字经济空间规划体系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的城市空间规划以大数据为核心,对多种要素展开研究。应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等,打破信息交流空间障碍,积极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一是对多规协同体系成果进行合理利用,以采集到的大量城市数据信息为切入点,对城市的土地应用、运行情况以及剩余空

间利用率等进行充分了解,对城市用地、城市交通进行规划与布置。明确城市各区域土地的归属关系、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在尽可能减少生态破坏的基础之上,根据各类土地的占比分配、所属区域内居民的生活需求、企业以及政府等主体的意愿,制定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理念。对城市存在的问题进行详尽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二是掌握城市剩余空间的相关数据信息,通过数字化分析,统筹规划建设一定规模的人文景观,形成与地区自然景观相协调的城市景观模式。并通过融入地区文化特色,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观念,向城市主体部分逐步推进,改进城市空间规划理念,完善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三是利用大数据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合理预测,科学安排后续的城市建设环节,为城市的长远发展以及后续空间规划调整保留一定的弹性,增强城市空间规划的可操作性,提升城市建设发展质量。

3.搭建城市数字经济服务平台

数字经济推动城市建设与发展必须要以全域性创新发展平台为支撑,通过搭建统一的城市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对现有不同层面的数字经济服务平台进行整合,发挥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对城市传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要素聚集的推动作用,构建以“互联网+”为核心理念的数字经济服务大数据库。一是加大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与传统产业的合作,减少因数据资源过度分散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为传统产业提供全面的数据信息、精准的数字化供给方案,对服务过程做好记录,并做好服务结果的统计工作,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推动数字经济服务传统产业发展全链条。二是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提升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建设“城市大脑”,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区级管理效率以及交通管制水平的提升,逐步开发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完善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三是利用数字经济整合城市存量资源,集聚城市高端创新要素。利用数字经济的共享、交互、开放等特点进行城市资源的整合,为要素赋能,实现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的高效对接,推动城市高端要素集聚。

4.以数字经济的局部创新发展带动城市整体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时代,一线城市的综合优势明显,数字

经济已渗入到城市发展的各个行业与产业中。大数据分析技术、高科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推动了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未来,应把握自身发展的优势,找准发展的侧重点,推动局部创新发展,以数字经济为纽带,带动城市的总体发展,从而推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整合与更新。以数字经济为纽带构建差异化、特色化的创新圈层是局部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构建层级分明、互补衔接、特色鲜明的创新圈层,形成城市发展的“聚能环”,以局部发展带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转型与升级。一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打造创新核心区。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在城市新区或高新区建设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引领城市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产业升级、创新科技发展,形成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二是建设城市创新功能区,打造创新街区 and 廊道。建设产业创新功能区,为创新产业园区提供扩能提质增效的阵地,引入风险投资、孵化器等高端创新要素,推动城市创新

成果孵化转化,推动创新型产业集聚。三是打造城市功能辐射区。在城市周边地区建立新型特色小镇、游乐园区、大型购物商场等,瞄准市场需求、强化创新供给,逐步建成周边地区与城市主体联动发展的城市建设空间新布局。

参考文献

- [1]鲁玉秀,方行明,张安全.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经纬,2021(6).
- [2]张洁梅,唐冰辛.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路径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0(6).
- [3]师博.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2).
- [4]刘传明,尹秀,王林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中国科技论坛,2020(3).
- [5]荆林波.韧性城市的理论内涵、运行逻辑及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机遇[J].贵州社会科学,2021(1).
- [6]王彬燕,田俊峰,程利莎,等.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8(6).

The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Liu Yis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digital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the dynamic reform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 digit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ome citi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howing a trend of extending with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link, bu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urban digital economy is also obvio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ra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pace layout update also showed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bu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drive urban space layo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update faces a series of obstacles, such as urban data openness is not high, has not yet formed a complete digital synergy to build urban ecological system, Digital economy driv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link is missing.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multi-plan coordination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construct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build the service platform of urban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through the lo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o drive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it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Urban spatial layout; Urban system

(责任编辑:齐 双)

【城市经济研究】

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思路与对策*

郑州师范学院课题组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并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心城市集聚和配置资源要素的功能显著增强,城市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大趋势和必然要求。郑州是国家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加快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是加快郑州高水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国家中心城市的现实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且具备进一步提升的基础条件,但与国际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客观分析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优势和劣势、认真理清提升总体思路、科学把握提升目标定位的基础上,明确现阶段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的重点任务和具体对策,对于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意义重大。

关键词:郑州;国际化;国家中心城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04-08 收稿日期:2021-12-0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科技创新引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22A790027);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 年度调研课题“河南推动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SKL-2021-2606)。

作者简介:课题组长:喻新安、陈耀;课题组成员:徐艳红、辛绢、杜学霞、闫德民(郑州 450044)。

城市国际化,是指一个城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向世界城市迈进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国家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加快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是郑州更好地服务和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是郑州在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与竞争中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郑州高水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必由之路。未来,郑州要提高站位,树立国际视野,找准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位置,对标世界范围内国际化先进城市,以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为目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城市的国际化功能,努力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提质进位。

一、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要素集聚和辐射能力显著增强,城市核心功能不断强化,城市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而且具备了进一步提升的良好基础。但是,与国际国内先进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总体上看,郑州提升城市国际化正处在良好机遇期。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叠加等,都为郑州提升城市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郑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外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增多,开启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历史

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要素集聚和辐射能力显著增强,城市核心功能不断强化,国际经贸合作与交往日趋密切,区域中心和国际门户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空前提高。2016年,郑州成为国家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2019年,郑州晋身全球经济竞争力城市100强、全球营商环境100强;2020年,郑州首次跻身全球二线城市行列。

“十三五”时期,郑州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一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开通客运航线245条,客运通航城市132个,基本形成了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客货运航线网络,“空中”辐射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20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63.4万吨,全国排名第6位;旅客吞吐量2140.7万人次,全国排名第11位,客货运输规模连续4年保持中部地区“双第一”,分别较2016年提升1.4倍和1.0倍。二是“陆上”获批建设中东部地区唯一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中欧班列(郑州)现已辐射30多个国家130多个城市,合作伙伴有5000余家。2020年,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1126班,累计货值达到42.8亿美元,分别较2016年增长348.6%和231.6%。三是“网上”建立E贸易核心功能集聚区,全面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创新推出跨境电子商务“郑州”模式。2020年,郑州E贸易辐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33亿美元,年均增长25%以上。全球网购商品集散分拨中心基本建成,并入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先导城市,发展总指数位列全国第5位,发展创新指数进入前三名,买卖全球更加方便快捷。四是“海上”“郑州港”国际代码获批,与青岛、连云港、天津、宁波、上海等港口无缝衔接,海铁联运班列扩容加密;2020年,海铁联运班列完成1.51万标箱。

一个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反映该城市的经济国际化程度。从相关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看,2020年,郑州进出口贸易额达到4946.4亿元,较2016年增长44.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46.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5.5%。2021年上半年,郑州的外贸依存度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

第4位,经济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尽管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但与国际国内先进城市相比,无论是在GDP总量、产业形态、科教创新、城市宜居,还是世界500强企业入驻数量、年举办国际会议场数、领事馆数量、年入境游客人数、国际友好城市数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虽然郑州已是国家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但一些主要评价指标得分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均排名靠后。郑州进入了全球二线城市行列,但尚属于二线弱城市(Beta-),在进入全球二线城市的13个中国城市中,排在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长沙、厦门之后,列第9位,仅高于沈阳、西安、大连、济南。尽管郑州的外贸依存度相对有优势,但由于受到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展指数、社会民生指数、文化建设指数、科技创新指数、对外交往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排名靠后的影响,郑州在全国21个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指数综合排名中名列第15位,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居倒数第一位,反映了郑州的城市国际化总体水平还不高,郑州的国际影响力在9个此类城市中较弱。

二、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点任务

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面临着许多任务,这些任务的轻重缓急不同,不可等量齐观,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并以此带动其他矛盾和任务的解决。从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客观要求看,当前应着力抓好提升城市产业国际化、功能国际化、人居环境国际化,以及提升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水平等重点任务。

1. 提升城市产业国际化水平

产业国际化的核心是资源要素配置全球化。一个城市产业国际化的过程,是该城市产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过程,亦是实现产业发展所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过程。提升郑州产业国际化水平,关键是要增强郑州配置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这是提升郑州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要全面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新郑州。要实施更高水平、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着力完善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制度框架体系,大力发展链接国际国内的外资外企,大力吸引集聚包括总部企业、高端服务在内的多功能、高能级全球服务机构,使郑州成为总部企业的集聚高地、各类流量高频汇聚之地。

企业国际化是产业国际化的微观基础。提升郑州产业国际化水平,必须着力提升郑州企业国际化水平。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领军企业,做强做优头部企业,支持这些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提升研发创新和产业链带动能力。鼓励创新型头部企业运用资本投入等方式打造“双创”平台,带动提升产业链协作配套水平,形成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众多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蓬勃发展的格局。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创新平台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孵化、独角兽企业培育。现代产业体系是产业国际化的重要支撑。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着力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聚焦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新兴材料等重点产业,抓紧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相关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努力把郑州打造成在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制造业基地。着力强化高附加值零部件环节的进口替代和本地化的产业链配套,加快郑州制造业向高级组装、核心零部件制造、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分工层级推升,逐步提高郑州制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提升城市功能国际化水平

城市国际化的核心是城市功能国际化。推进城市国际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完善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吸纳、集聚、承载和配置全球资源要素的能力。一是提升郑州经济功能国际化水平。着力推进郑州贸易便利化、服务设施和交往平台国际化水平提升,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吸附力、集聚力。充分发挥郑州产业特色明显、产业基础雄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着力提升郑州基础产业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郑州产业发展迈向全球中高端。充分发挥郑州经济腹地广、消费市场潜

力足的优势,推动产业与消费良性互促,着力培育发展一批国际产品和服务消费新平台,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消费商圈,加快建设具有内陆地区和中原地区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二是提升郑州科教创新功能国际化水平。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和更加开放的举措向全球招才引智,围绕郑州产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高科技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和旗帜性企业作用,面向全球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源。加快推进国际性产学研合作,吸引全球顶尖创新资源落地郑州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嵩山实验室”“黄河实验室”建设,着力打造全国领先、全球一流的科技聚集协同科研创新平台。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功能平台,完善创新策源地生态,加快构筑高端科技创新平台,着力提升郑州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多措并举加快推进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高校建设,尽快解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问题,着力补齐郑州高等教育短板。三是提升郑州城市服务功能国际化水平。具有较高国际化程度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显著特征之一。作为一个应以建设区域性国际化城市为发展方向的城市,郑州需要在全面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国际化上狠下功夫,并以此来推动整个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提升。由于各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在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国际化方面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自身的禀赋条件实际出发,郑州应把构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服务体系、国际商贸物流服务体系、国际金融服务体系、先进制造业服务体系、国际科教创新服务体系、国际社会环境服务体系、国际交流交往服务体系等作为重要目标选项,统筹推进,全面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国际化水平。四是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功能国际化水平。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血脉,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强化郑州文化国际化功能至关重要。要着力强化对郑州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文脉的保护,推进历史文化遗产创新,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统筹运用好红色文化、黄河文化、河洛文化资源,充分激发郑州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努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郑州特色”的原则要求,强化城市文化设计,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塑造城市形态风貌。着力繁荣发展郑州文化事业,加快文化产业高地建设,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强化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整合各类文化传播资源,向世界讲好郑州“黄河故事”,增强郑州城市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提升郑州城市文化的国际认可度。

3.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国际化水平

人居环境国际化既是城市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城市国际化的基础支撑。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理应要有国际化的城市人居环境与之相适应。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相比,郑州城市人居环境国际化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郑州要增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集聚能力,加快郑州城市国际化进程,着力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国际化。一是加快提升城市公共设施国际化水平。推进郑州人居环境国际化进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树立现代化思维,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着力提升郑州公共设施国际化水平,全面构筑城市国际化的硬件基础、物质形象和功能内涵。坚持规划引领,加快推进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园林绿化设施、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城市消防、防空、交通标志等设施建设,着力完善能够满足城市国际化功能需要的现代化公共设施体系。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线、城际铁路等骨干型工程建设,以现代化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推进城市国际化提供硬件保障。二是加快提升城市生活居住环境的国际化水平。优美的人居环境、优越的生活品质,是国际化城市的标配。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准,按照功能现代、服务集聚、生态宜居要求,加快推进郑州生态和人居环境的优化和完善,着力强化提升生态环境和居住、国际教育、国际健康医疗、休闲商务、多元文化融合等城市功能,致力于打造宜居宜业标杆城市。在外籍专家、留学归国人员及其子女等居住密集的街区,要加快“15分钟生活圈”内教育、医疗、购物、休闲等国际化高端场所及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具有浓厚国际化氛围的街区空间体系,打造高品质国际化街区优质生活范本,探索形成具有郑州特色的国际化街区建设模式。积极倡导和推广国际化的社区生活方式,着力打造国际文化交流交融平台,加快构建开放、多元、包容的国际社区文化空间,不断增强外籍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对郑州的文化认同。三是加快提升城市治理国际化水平。

城市治理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发挥市民的城市治理主体作用,强化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政策供给,确保城市治理成果由市民共享。准确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要求,持续推进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难题,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健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城市的承载力、包容度和宜居性,增强市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4.提升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水平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地处内陆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郑州要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找准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面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和核心枢纽城市,不断提升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水平。一是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和核心枢纽城市。准确把握郑州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凸显出“枢纽+开放”的比较优势和显著特征。围绕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和核心枢纽城市的发展目标,全面推动开放创新,着力打造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新平台,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交易链、服务链,加快提升拓展交通枢纽功能,持续放大城市开放功能及溢出带动效应,大幅提高通达世界主要城市的能力,全方位构筑“枢纽+开放”的新优势,把郑州的现代交通枢纽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各类要素在郑州高效集聚并向全球畅通流动,积极抢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体系中的枢纽节点和战略链接位置。二是加快提升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度。以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四路协同”集合效应,促进郑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坚持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统领,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为载体,在服务业开放、金融开放和创新、投资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下更大气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立健全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合作共赢体制机制。三是加快打造“四个高地”。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家开放高地、国家人才高地,是郑州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加强高端平台建设和先进仪器配备,力争在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方面实现突破,加快国家创新高地建设。从郑州产业实际出发,着力打造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推动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航空偏好型产业发展,做好军民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坚持以科技研发为核心、以头部企业为牵引、以配套企业为集群,着力优化产业生态,提升产业竞争力,努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争创开放发展新优势;着力打造各类开放功能型平台,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通道体系,进一步放大“枢纽+开放”优势,努力打造国家开放高地和国家人才高地。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切实用好现有人才,积极培养青年人才,加快引进高端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三、加快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建议

1.在推进先进制造业国际化上提质进位

一是加快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围绕富士康、郑煤机、中铁装备、宇通客车、汉威电子、明泰铝业等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着力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产业链的纵向贯通、横向链际整合,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产业集聚强大动能,着力提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制造等优势产业能级,努力将郑州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是加快提升产业层次。产业层次低,产品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缺失世界知名品牌,势必影响郑州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国际化程度。要坚持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要素链、制度链深度耦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升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掌控能力,推动郑州制造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环、迈上中高端。三是加快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应抓紧制定制造业核心技术发展战略及规划,出台扶持技术攻关的政策,着力构建技术研发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布局建立全球研发体系,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发达国家加强研发合作,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和技术研发团队,支持这些单位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或离岸孵化基地,就地就近吸引使用高层次人才。进一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获取科技创新要素的能力。围绕制造业重点领域,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在推进金融服务业国际化上提质进位

一是加快郑州金融岛建设,着力打造金融业改革创新高地。龙湖金融岛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服务“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也是郑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要把握定位、完善规划,高标准推进金融岛建设。从空间尺度和形态风貌等方面体现国际化、高端化,既富于中原文化特色,又具有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化特质,充分彰显现代CBD和中原城市的“国际范”。按照打造以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体,金融机构集中、金融要素市场齐备、金融服务完善、全国一流的金融总部聚集区的目标定位,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入驻,引入全球金融高端要素资源,着力打造中部地区金融中枢。一体布局、协同推进金融岛建设和科技城建设,使二者功能互补、相互支撑,形成强大合力。二是加快郑州商品交易所国际化发展,着力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实体避险需求、产业发展要求,充分利用期货期权等工具进行风险管理,更好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服务。加快建设期货交割库聚集区,着力打造完整的期货产业链,加强期权品种研发,丰富产业链期货品种和工具。加快形成以国际标

准为规则的期货市场交易制度体系,推动期货交易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大境外市场推介力度,加快引入境外交易者,推动更多能满足境外投资者交易需求的特定品种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与境外市场的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期货经营机构主体多元化,努力把郑州商品交易所建成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提升郑州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认真办好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为提升郑州商品交易所国际化水平提供强大舆论支撑。三是加快郑州金融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金融改革开放的部署,加快郑州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进行积极沟通,争取首创性金融开放政策举措先行先试,争取在郑州开展金融国际化创新试点。出台更多有利的政策举措,支持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在运输组织、货源组织、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造“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跨境供应链金融新平台和国际金融合作先行区。支持国外知名金融机构在郑州设立法人金融机构总部,鼓励外资在郑州设立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货币经纪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健康保险、科技保险、互联网保险、责任保险等专业保险组织,以及外资控股或参股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

3.在推进会展业国际化上提质进位

一是高品质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际大型展会承载区。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会展城为目标,着眼举办重大国际会展的需要,服务国际大型展会活动常态化的需求,按照“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原特色、科技引领”的发展理念,着力优化空间布局,高标准推进新国际会展中心建设,布局一批国际性会展场馆、大型会议中心、国际高端会议型酒店,完善高端国际展会功能区,优化布局产业会展多功能设施,提升城市会展服务功能,加快形成设施完善、功能完备、机制健全、保障有力的会展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会展要素集聚区和国际高端会议目的地。高水平办好嵩山论坛、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国际航空货运发展论坛、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高端国际会议,巩固和放大郑州的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级高水平论坛和国际公共产

品。二是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充分发挥郑州的区位交通和产业、人文优势,积极创办和申办重要的国际展会、论坛、文旅活动和体育赛事,推动会展业与城市品牌互动,与特色产业融合。发挥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聚焦新兴未来产业发展,高质量举办智能终端、应用电子、软件和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等产业展会,积极创办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北斗导航、生物制药、智能机器人等行业展会,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展会项目,引进一批在细分行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世界知名展会项目。支持和鼓励重点会展企业向品牌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努力打造办展理念和专业技能先进的国际性头部会展企业。在会展活动组织、会展项目策划、会展配套和服务等方面与国际展会标准接轨,为展会提供精细化增值服务,以吸引更多国际会展组织和机构、境外企业和客商参展参会,提高展会国际参与度。三是积极融入全球会展资源配置网络体系。加强与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IAEE)、独立组展商协会(SISO)等国际会展组织的沟通和联系,重点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展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大对会展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国内外知名会展企业在郑州设立会展公司,引进国际会展总部企业。鼓励本地会展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与国际会展公司联合办展,引导国外会展要素进入郑州市场,引进国际化程度高、全球影响力大的巡回品牌展览项目落地。支持本土会展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加国际性会展行业组织,加强与国外知名会展企业的沟通合作,提升国际办展办会水平。加强与国际各类知名办展机构的联系,借鉴会展业国际营销经验,制定体现郑州特色的国际形象传播方案,推动郑州会展业向国际高层次发展。

4.在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上提质进位

一是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商圈。开阔视野、拉高标杆,对标东京、伦敦等世界级标志性商圈,加快郑州现代化商圈建设。准确把握商圈发展定位,聚焦特色、重塑地标、打造品牌,以德化街创建全国示范步行街为统领,以加快核心商圈改造提升为主线,聚力打造二七、高铁东站两大国际化核心商圈,着力打造现代时尚的国际化商业街区。强力培育花园路、北龙湖、中央文化区

(CCD)等高端化商业中心,提升德化步行街、紫荆山路城市商业大街、农科路酒吧街、健康路体育夜市街等消费街区,打造一批具有中原味、时尚潮、国际范的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形成一批专业化、特色化、区域性消费商圈。二是加快打造全球优质消费资源集聚高地。具有强大的消费资源集聚功能,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要加快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全面提升城市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交通便利度,努力把郑州打造成汇聚全球优质消费资源的“引力场”。充分发挥郑州现代交通和消费物流枢纽等优势,加快消费平台和流通中心建设,放大现代会展业的溢出效应,积极吸引国际消费流量,着力打造全球消费品集散中心。尽快制定和实施全球消费品牌集聚规划,积极营造现代消费场景,吸引更多国际国内高端消费品牌向郑州集聚,吸引更多国际国内消费品牌总部落户郑州,着力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品首发地、时尚潮流引领地。三是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购物天堂”。深入挖掘郑州历史文化价值,增加更多各具特色消费功能区和公共空间,促进演艺、体育、娱乐、康养、美食等消费业态发展,使国内外消费者在郑州能享受到优质的沉浸式消费体验。大力发展首店、首牌、首发、首秀经济,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品牌、标志性活动、标志性场景。强化顶层设计,谋划举办全球品牌发布、时尚文化节等主题活动,使购物功能与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功能互动融合,营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场境。加快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促进在线服务消费、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促进消费领域数字化转型。积极向国家争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试点政策,加快市内免税店布局建设,并着力打造多语种服务示范场景,提升外籍人士在郑消费的便利性。

5.在推进国际交通枢纽通达性上提质进位

一是全面构建连接全球的现代化国际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体系。站位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以强化郑州与全球主要城市互联互通、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通道为目标,科学谋划郑州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以国际航空枢纽为带动,以米字形高铁、城际轨道、高速公路为依托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全面提升郑州国际航空枢

纽能级。强化郑州机场门户枢纽建设,加快机场三期工程建设,启动第四跑道和南货运区建设,用好第五航权,争取第七航权,推进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升级,以郑州为核心、以亚太地区为重点拓展国际航线,着力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加快推进郑州中欧班列创新发展和功能提升,着力打造具有亚欧影响力的国际物流枢纽。进一步优化海铁联运枢纽节点布局,完善多式联运体制机制。统筹布局航空枢纽、铁路枢纽、公路枢纽基础设施与主体功能,不断提升郑州枢纽的集疏通达能力。二是进一步强化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对外辐射能级。以“三网融合、四港联动、多式联运”为核心,加快完善直通全球、直连区域、绿色高质的运输体系,努力实现半小时通达郑州大都市圈,1小时通达中原城市群,2小时通达周边省会城市,3至5小时通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城市群地区。加快推动郑州都市圈范围内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融合发展,强化轨交站点与周边区域联动发展,统筹线路布局、站点设置,提高全市轨道交通可达性、直达性和速达性。持续加密中心城区和周边新城线路,有序推动向开封、许昌、新乡、焦作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延伸。有效提升郑州综合交通网络的对外辐射能级和势能,提升郑州的国际性、通达性。三是加快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国际一流水准为标杆,着力推进管理服务方式创新,全面提升郑州交通运输服务质量和规范化水平,打造以全链条快速化为导向的便捷运输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枢纽标准规范,加快构建功能齐全、换乘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和一体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打造综合交通运输“数字大脑”,构建数字出行网络、智慧物流服务网络、现代化行业治理信息网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管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新型治理机制。全面加强交通运输综合应急管理,着力提升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实时信息获取能力、分析研判决策能力、远程调度指挥能力、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6.在推进制度型开放上提质进位

一是着力营造符合国际规范的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仅反映一个城市的软实力和竞争

力,同时也体现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经过近些年的努力,郑州的营商环境已有较大改善,但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要聚焦审批服务、创新创业、投资贸易、企业经营、市场公平、法治保障、社会服务、政商关系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强化开放规则机制创新。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营造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制度,着力营造更加开放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着力营造竞争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二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中的引领作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郑州提升城市国际化,应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作用。把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同加强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高水平建设衔接起来,赋予郑州片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支持其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探索差异化开放路径,致力于首创性探索、集成性创新,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在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以申建“空中丝绸之路”自由贸易港为牵引推进制度型开放。自由贸易港是迄今为止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郑州开放通道优势突出,经济腹地支撑有力,申建自由贸易港的基础条件良好。要以申建自由贸易港为牵引,加快郑州制度型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大开放压力测试力度,放宽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加快清理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不相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尽快消除隐性壁垒;加强准入后的行业引导、培育和管理,引入并推行良好的监管实践;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等领域,探索新的规则规制,为“空中丝绸之路”自由贸易港成功获批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 [1]黄洁.新趋势下杭州城市国际化的新思路[N].浙江日报,2019-08-12.
- [2]季建业.完善城市国际化功能 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J].中国经贸导刊,2012(36).
- [3]梁曙霞.推进“三个国际化”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N].新华日报,2014-09-30.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Zhengzhou

Research Group of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ooming and deepen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ies to gather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ities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and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Zhengzhou is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accelera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Zhengzhou i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speeding up the high-level construction of Zhengzhou as a modernized and inter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city. Sinc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zhengzhou's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a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bu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advanced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basis of objectivel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zhengzhou national central city construction, carefully sorting out the overall idea of promotion, and scientifically grasping the promotion target position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ut forward the key tasks of promoting zhengzhou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Zhengzhou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Zhengzhou; Internationalization; National Central City

(责任编辑:齐 双)

【区域创新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路径研究*

胡艳 张安伟

摘要:大科学装置作为国家创新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现阶段中国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速度加快,经济社会效益不断增强,但是依旧存在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研究资金缺乏、预算管理不合理、科研人才缺乏、配套政策不完善、数据共享不足、相关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未来,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应立足中国现实基础,汲取国外成功经验,建立央地合作新模式,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革新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创新驱动畅通内部循环,共建共享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从而实现新发展格局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助力中国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12-08 收稿日期:2021-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布局建设研究”(21ZDA011)。

作者简介:胡艳,女,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肥 230601)。

张安伟,男,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生(合肥 230601)。

一、问题提出

当前,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巨大冲击,外部需求萎缩;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协调与内部循环不畅等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和压力,如何提高自控能力、提高韧性水平,如何畅通内循环,从而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基于区域韧性发展视角,熊彼特创新理论将创新看作社会发展的主要破坏者和长期经济转型的来源,明确创新是经济变革的驱动力。演进经济地理学认为这种由创新引致的面对冲击的适应力和进行转型的动力正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赋予城市

自我改造与打破路径锁定的能力(Wolfe D and Gertler M, 2016)。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主动适应变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大科学装置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诞生起便在国家原始技术创新、经济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防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志刚等(2004)认为,大科学装置是需要大规模人力、物力投入,服务于既定目标而建成的大型科技基础设施,通过持续的稳定运行和科学攻关,实现重大的大科学目标。按照其研究用途及目的,可分为专用研究装置、公共实验平台与公益基础设施,分别承担特定领域大科学技术研究、支持多学科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提供基础数据与信息的信息(张玲玲等, 2017; 王贻芳, 2017)。大科学装置兼具科学性与社会性,科学性在于完成既定的大科学目标,社会性则

在于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与多方密切合作(陈光, 201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科学装置的重要战略地位、要素集聚能力与合作建设趋势(王贻芳、白云翔, 2020)。

大科学装置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中支撑创新的关键一环,是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李志遂、刘志成, 2020),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区域协同等具有变革性影响。基于科技创新视角, Autio 等(2014)、Lauto 等(2013)从知识溢出和技术合作层面展开研究,认为大科学装置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此外,还有大量学者认为大科学装置由于其自身特性而具有很强的创新效益(杜澄、尚智丛, 2011; Qiao L, et al., 2016; Castelnovo P, et al., 2018)。基于产业升级视角,邢超(2012)认为大科学装置可以引起创新链中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探讨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效结合。梁永福等(2018)从聚合效应、标杆效应、干涉效应、高地效应、溢出效应、洼地效应、蝴蝶效应等方面分析了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带动效应。基于经济发展视角,Heidler R and Hallonsten O(2015)利用即时性指数与网络分析重新评估了大科学装置的投入产出,证明其存在很高的投入产出效益。张玲玲等(2019)、李斌、李思琪(2015)认为大科学装置可以实现技术攻关,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实现要素集聚并进行大范围辐射,引致产业变革。基于区域协同视角,黄振羽(2019)认为大科学装置布局对经济体系建设和发展模式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力抓手。程晓舫等(2020)利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社会经济价值。

大科学装置不仅在集聚创新要素、整合科技力量、开展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产出等方面具有重要优势,而且其自身往往叠加国家战略意图,大科学装置所在地成为世界科技交流的活动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其自身体量大、投资规模大、建设难度大的特点,联合建设、共同享用就成为大科学装置的必然发展趋势(王贻芳、白云翔, 2020)。那么如何更好地实现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以创新统筹区域循环,推动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并实现协同创新,就成为创新驱动新发展格局建设的重要命题。

二、大科学装置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

大科学装置是支撑中国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基础,那么现阶段中国大科学装置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态势,与世界范围内大科学装置建设规律相比,中国大科学装置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对于以问题导向促进大科学装置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1. 大科学装置建设现状

大科学装置作为实现国家重大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自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之后,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化能力不断增强。据统计,目前中国运行、在建以及准备中的大科学装置已有百余台,排名前六位的省(市)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与安徽(徐旻昕等, 2020),中国部分运行及在建的重要大科学装置名单如表1所示。

第一,研究领域与参与主体现状。从装置涉及领域来看,从开始的物理学领域,逐渐包含能源、生命科学、空间和天文、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多学科基础研究均衡发展。从承担机构来看,从以往中国科学院主导负责,转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府机关等多部门负责,参与主体不断扩展,多元化发展。从装置类型来看,主要以专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公共实验平台与公益基础设施稳步发展。

第二,空间布局现状。中国大科学装置空间布局呈现整体分散、块状集聚的分布特征,大科学装置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发达城市群,这也是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集聚发展、协同建设、共同受益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城市群要素壁垒相对较弱,经济联系密切,人员流动密集,经济体量大,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可以满足大科学装置资源要素的集聚需求与资金财力的投入需求,为大科学装置的落地提供基础。对比京津冀、长三角与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大科学装置数量最多,最为密集,是中国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长三角城市群拥有上海张江与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首尾串联G60科创走廊,呈现“双

表1 部分运行及在建的重要大科学装置

大科学装置名称	城市	大科学装置名称	城市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	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	惠州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北京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惠州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	北京	中国散裂中子源	东莞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北京	中微子实验装置	江门
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	上海	郭守敬望远镜	承德
上海光源	上海	中国南极天文台	南京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	上海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兰州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	上海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黔南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上海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甘孜州
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	合肥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武汉
全超导托卡马克	合肥	大连相干光源	大连
稳态强磁场	合肥	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设施	昆明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合肥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	天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心—廊”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发展的空间格局。

第三,投入产出现状。随着大科学装置在国家科技竞争中重要地位的不断攀升,其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九五”“十五”期间中国大科学装置总投入约33亿元,“十一五”期间总投入约60亿元,到“十二五”期间总投入超过100亿元(西桂权等,2020)。但是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资金支持仍有一定差距,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2013年科研经费达15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十三五”“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国家对大科学装置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并以上海张江、北京怀柔、安徽合肥和广东深圳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主开展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相关研究认为,大科学装置的投入产出比在1:3左右(王贻芳,2017),一些起步较早的大科学装置,如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早已产出丰厚的科学回报并完成产业转化。与之相比,目前中国大科学装置还处于追赶阶段,大科学装置规模不足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重大科技成果有所欠缺,完善的成果转化机制与转化产业链尚未形成。

第四,共建共享现状。从国际合作来看,中国在运行的大科学装置中,由国内外共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占比不足10%,以自身大科学装置为基础参与国际科技项目合作的大科学装置占比超过30%(徐旻昕等,2020)。可以看出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主要是采取自行设计、建设,建

成后依托设施参与国际合作的模式。但是由于大科学装置规模大、周期长、投资大的特点,国际知名的大科学装置多是采取多国投资建设模式,同时不同国家的评审程序、国际化的视野和评估,也会提高项目成功的可行性。因此,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吸引国际投入。从国内合作来看,国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合作较为频繁,合作主体主要包括科研院所、高校、政府与企业,由于大科学装置大多是投入大于产出,与企业投资目标不相符,所以企业合作相对较少。此外,大科学装置合作多以同地区科研院所、高校、政府与企业合作为主,跨地区合作为辅,需要进一步在更大的跨区域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共建共享。

第五,个案分析。大科学装置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创新发展“原始策源地”。以合肥为例,合肥能够成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建设中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安徽能够成为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地,大科学装置功不可没。依托大科学装置原始动力,合肥从原始创新突破,奠定创新城市发展基础,再到科技创新立市,产业创新强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二线城市,迈入经济总量“万亿俱乐部”,跻身新一线城市,在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榜单中位列全国第四位,成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之一。目前,合肥已经建成同步辐射加速器、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3个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已经开工。大科学装置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

要基石,以大科学装置为基础,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支撑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质量发展,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指日可待。

从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合肥市R&D支出与R&D人员都大幅度增长,创新投入力度逐步加大。R&D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3.09%上升为2019年的3.10%,2019年合肥R&D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合肥专利产出效率不断提高,五年中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上涨幅度均在8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60个百分点。作为原始创新之城,大科学装置赋予合肥无与伦比的创新活力,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省“五个一”创新主平台建设为引领的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在当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变之际,合肥可以在保持经济增长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同时,坚持用创新驱动发展,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也保证了质的升级,这其中大科学装置的布局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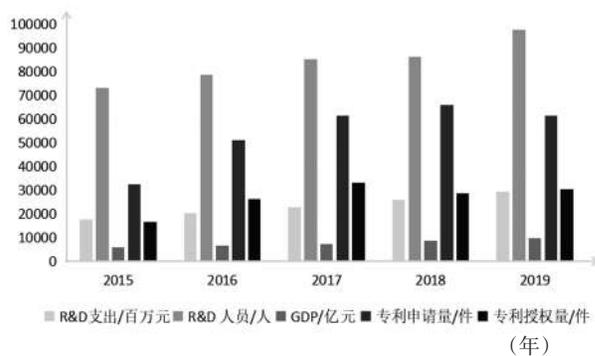


图1 2015—2019年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各年度合肥市统计年鉴。

2.大科学装置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一,空间布局不够合理。

国家大科学装置布局建设明显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但在空间布局上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其一,大科学装置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关键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在北京、上海、合肥、深圳、武汉、南京等少数创新型城市,空间布局高度集中,缺乏梯次联动,存在同质化竞争倾向。其二,大科学装置集聚地以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前沿领域聚焦有所重复,缺乏有效统筹协调,与区域发展协同程度不高,未能充分实现大科学装置布局的等级层次性、功能互补性和梯次联动性。

第二,研究资金缺乏,预算管理不合理。

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资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投资主体单一。由于大科学装置都是基于基础领域突破这一研究目标所建立的,经济效益不高且周期漫长,它的建设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政府,通过市场获取资金比较困难,但是政府资金支持是有限的,这就会造成大科学装置建设发展过度依赖国家财政,在财政收入结构没有大的变动情况下,短期内R&D经费投入不会有太大的增加(李侠、李格菲,2018)。二是大科学装置自身特点导致。大科学装置需要长期运行才能产出成果,而且产出是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转化难度大、周期长,由此决定了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发展需要的资金数量巨大。三是科研投入结构不合理。2019年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6.03%、11.29%和82.68%。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比例实际上是严重偏低的,这些基础研究经费支持偏低,对于大科学项目运行的支持也相应不足。四是预算管理不合理。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预算中,缺少对技术攻关的费用支持,也缺乏体现科学活动价值的人员经费支持。

第三,科研人才缺乏,配套政策不完善。

大科学装置的建好仅仅是开始,用好人才是关键。在大科学装置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人才短缺,依然是制约大科学装置建设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一是人才待遇跟不上。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大科学装置,却缺乏配套的人员管理机制、薪资发放机制。国外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包括10%—50%的人员经费,但是国内的大科学装置却重建设、轻管理。二是人才政策跟不上。大科学装置工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政策,人才流失率较高。申请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费用相对来说较容易,而申请研究人员支持费用则十分困难,激励不足。此外,也缺乏针对海外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方面的政策。三是在科学上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很少,无法达到支撑引领国际技术研究的要求,也就无法吸引国际一流人才。

第四,数据共享不足,相关机制不健全。

虽然大科学装置数据产生的数量与质量都大幅度提升,但是由于数据共享的激励机制不足,导致数据共享缺乏动力,数据管理效率与利用效率较低。具体体现在一是目前缺乏支持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的专项资金,导致有许多对前沿研究意义重大的科学数据并未在领域内得到充分共享和合作,创新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二是在科研项目中并未将数据开放共享作为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也未将其作为再申请项目资助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三是产权机制不够明晰,对于科学研究产生的科学数据,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机制来承认科研数据的学术成果地位与成果所有。

第五,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中国的科技成果数量很多但是转化率较低,最高在30%左右,发达国家则达到60%—70%。究其原因,首先是大科学装置科技产出过程中,由于缺少企业的共同参与,对市场需求不够熟悉,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契合度有所欠缺,导致了科技研发过程中市场、产业与技术的分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成果转化的效率。其次,科技型创新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缺乏资金支持。尽管政府出台了科技银行等系列政策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难题,但是由于其规模比较小,风险比较大,资金获取自然十分困难。另外,技术市场的不完善,如工作人员对技术转化需求的敏锐性、成果转化渠道的畅通性都有所欠缺,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三、国外大科学装置管理经验借鉴

现阶段中国大科学装置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化能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要对国外经典案例进行分析,汲取成功的经验做法,为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1. 国外成功案例

第一,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与GOCO运营机制。

美国国家实验室通过与美国能源部(DOE)签订合同,承包大科学装置的建设、管理以及运行,而能源部则通过对国家实验室的考核来保证大科学装置的高质量运行。DOE所管辖的大多数国家实验室,由大学、企业或非盈利机构来负责具体运营,属于GOCO(Government-owned, Contractor-operated)模式,即“政府所有,委托管理”模式。这种运营模式下,能源部确定国家实验室的战略发展定位和研究任务的前沿方向,国家实验室以此为指导,根据

目标进行技术攻关,制订详细精准、面向国家需求的研究项目实施方案。

GOCO管理模式将政府与科研进行分离,实现了科学的独立性,以科学效益为第一要义,保证科研工作免受政治影响,避免政府管理下的官僚主义行为,并且能够根据科研活动的需求,灵活地新增或淘汰科研人员,并根据需求适应性地调整薪资制度,通过灵活的绩效考核机制与利益机制高效率完成成果转化。为进一步提高大科学项目的绩效,以工作绩效为考核指标,制定了经费管理办法进行激励,称为实验室绩效管理系统。在能源部与国家实验室的合同中有对工作的目标、内容和考核方法的明细,实验室绩效管理系统据此展开评价,结合实验室自评和同行评议两部分内容,评估实验室工作绩效,包括科学技术绩效和运作管理绩效。此外,对实验室的工作任务类型进行细分,并根据重要程度给予不同的权重,得到最后得分,并将得分与经费支持挂钩,进行宏观的政策激励。

第二,英国政府所有、大学与企业合作运营的模式。

英国哈维尔科技创新园是世界上最早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园区,实行政府所有、大学与企业合作运营的模式。由于企业存在缺乏研发能力的不足之处,而大科学装置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于是政府创新管理方式,扮演平台角色,为大学、企业、大科学装置的成果产生与成果转化提供中介服务,实现功能互补。英国商业创新部BID(Business and Innovation Department)就专门负责提供这种中介服务,引导企业、大学与大科学装置等创新主体进行合作,从而完成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张耀方,2017)。在BID的引导下,大学、企业等依据科研需求,向大科学装置申请技术研发,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在大科学装置技术研发过程中完成的技术成果,由企业进行产业化发展,企业可根据是否达到预期技术要求选择是否公开技术成果。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由大型企业提供充足的研发资金,科研机构提供有力的科研人才,综合了大学科研人员的专业优势及企业的产业化优势。从成果研发与转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方密切合作的机制可以有更充足的资金进行研发,并更快地实现产业化发展。有企业参与的官产学研联合研究制,可以提高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速度,能够在市场导向下更

及时地推动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运行。同时政府不仅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引导促进大学等科研机构与企业达成合作;还设置了相应的评价运行机构,对涉及大学、企业、大科学装置的科研项目和成果转化等进行评价,从而更好地调整合作方式。

第三,日本企业的自主转化模式。

日本大科学装置由政府负责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主要科研机构及研究项目的领导与协调。日本的科技研发活动主要参与者及投入者是企业,企业投入远超政府投入。以日本J-PARC 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置为例,由于企业自身拥有强大的研发需求和资金支持,可以直接向大科学装置申请技术研发,然后依靠自身完成成果转化,进行产业化发展。为促进其产业化发展,由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组成相关组织,向企业宣传技术进展情况,把握自身产品升级技术需求,向科研机构人员普及国际领先技术,在各方需求的基础上,促进大科学装置、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主导下的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实的连贯性,与企业自主转化导向下的成果快速转化性。政府主导可以聚集多方资源进行大科学研究,企业依据产业升级需求进行研发申请与成果转化,快速将技术进展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同时避免了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难题与技术转化难题。但是这种模式下完成自主转化的多是寡头垄断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进行研发、转化,而不适用于其他小型企业。

第四,欧洲多国共建并行模式。

随着技术进步需求的不断升级与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大科学装置投入越来越大,单独一个地区的财力与技术都有所欠缺。通过多方合作共同出资建设和共同管理大科学装置,已经成为普遍采取的方式。欧洲核子中心(CERN,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是多国共建科研机构的典型。CERN的创建、组织、选题、经费和成果的运行,都体现了成员共建共享的特点,例如大科学装置的部署、经费的分摊、成果的所有都是通过各成员国共同协商、共同运作完成的,这为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提供典型的借鉴。CERN模式下,多国成员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竞合中逐步达到平衡,各成员无论实力如何,都可以共同建设,为其做出贡献,从而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2.经验启示

第一,国家实验室管理,多元化运营。

借鉴美国大科学装置GOCO运营机制,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应该根据国家建设、国家管理的原则,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立以及运行,并进行企业化管理。由于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营需要非常大的资金投入,财政难以提供所有大科学装置庞大的经费需求,国外的大科学装置的运营管理与项目实施更为社会化。经验表明,这种运作模式一方面缓解了由于财政紧张导致的科研经费不足,另一方面企业化管理促进了政产学研的网络化发展,引致协同创新,促进科研任务的高效实施与成果的快速转化。对于一些适合产业化发展的大科学装置而言,积极引入企业等社会投资,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公私合作机制,对于自身发展与产业升级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技术转让,促进成果转化。

对于英美等大科学装置发展模式而言,一个成功之处就是成果的快速转化。政府通过立法保障、经济激励等引导技术转让,完成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发展,从而使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经济效益。为了更具效率、更具效益地完成这个过程,可以引导大科学装置、科研机构、企业等成立特定机构,依据多方需求制定技术与成果转让条例,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或是出售技术专利,或是协同进行成果转化,或是支持科研人员创办企业等,尽快实现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创新链、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官产学研合作,相辅相成。

官产学研合作是当前大科学装置一种较为常见的组织管理模式。政府作为平台,引导大科学装置与研究机构、企业等创新系统中的主体进行合作,集聚创新资源,创新组织模式,提高配置效率,通过大科学装置与企业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并引导企业参与研发过程,了解需求,实现更快速的产业化速度,能够更及时、更全面地推动项目的产业化实施。一方面,培养一批了解市场需求并拥有一线实验操作经验的技术人才,便于研究成果更具备市场化需求,与市场深度契合;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大科学装置人员与企业进行交流,宣传自身技术并了解企业需求,推动大科学装置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第四,设施开放,促进信息共享。

作为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的典型代表,欧洲核子中心实现了各成员之间的科学领域的交叉,也实现了各成员之间的知识创新联动。学科交叉的“干涉效应”是交叉融合产生新领域、新学科的重要因素,大科学装置创新应当打破信息壁垒,构建互联互通、流动高效的服务网络,完善科研过程中项目研发等信息的共享机制以及交流机制,实现知识的高效率共享,支持各领域、各学科的交流互通,促进多学科交叉发展,促进多种类协同创新,促进各创新主体间的互通、互用、互补,真正发挥创新集群的集聚与辐射效应。

第五,项目考核,完善评估机制。

在国外大科学装置管理体系中,对科研工作与管理工作的评估,是重要的政策保障工具,并在组织层面和项目层面均建立了完善的考核体系,同时根据需求及时调整评价指标,注重项目成果的时效性,评估内容覆盖投入产出、执行过程、质量检验、经费审计等多个环节。不仅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考核结果,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组织形式;相关部门也可以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增加或者减少资金支持,从而形成宏观的激励机制,更好地开展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

四、新发展格局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的具体路径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构世界创新版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结合上文研究,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路径探索,推进新发展格局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

1.建立央地合作新模式

建立央地合作新模式,要求中央在国家层面对大科学装置投资与选址统一部署,在结合地方既有学科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大科学装置,并对地方配套建设资金给予政策倾斜,形成合力,通过财税杠杆激活地方投资与建设的主观能动性,并由中央对地方大科学装置绩效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资金支持挂钩,形成宏观的政策激励。建立央地洽谈机制,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探讨区域内大科学装置投资、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合

作框架。针对区域内大科学装置投资与建设重点、管理与合作模式做出明确规定,这有助于在横向关系上完善城市协调分工。在既有产业分工又有城市规划角色定位的基础上,以合力打造大科学装置集群为重点,以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建立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新机制,持续深入推进联合攻关,完善科技合作新机制。

2.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

激发大科学装置创新创业主体活力,建设大科学装置科技转化载体,将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众创空间等连点成线,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打造国际性、开放式的产学研成果研发与转化平台。拓宽产学研合作机制和渠道,依据需求导向大力推进大科学装置、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对接,构建“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化”的产业链条。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建立大科学装置产业化基金,大力发展大科学装置风险投资,采取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等多种方式,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大科学装置。鼓励社会各界建立公益基金,为大科学装置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提供支持。借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大科学装置技术转让新模式,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与成果转化机制。

3.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

扩大大科学装置收入分配自主权。具体内容为在大科学装置以及大科学工程中制定体现自身特点与激励机制的收入分配办法;根据科研活动需求,提高在岗位设置、薪酬调整、人员聘用、职称评审以及奖惩机制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健全大科学装置人才进行科研攻关的内部激励机制,并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设定绩效考核机制。加大对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障科研成果;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重。完善人员流动机制,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创新或在职创办企业、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新创业。

4.创新驱动畅通内部循环

在新发展格局下,进行消费升级,从而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为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解决中国经济循环中的

难点问题。对于科技创新而言,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消费需求与科技攻关倒逼基础研究,通过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知识和技术基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配套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助推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并增强产业链发展自控能力。通过提高供给质量,为消费升级创造供给条件,刺激人民群众消费欲望,释放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结合自主创新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内部循环,从而高质量对接外部循环。

5. 共建共享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也有两个基点:即国内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国际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提高国际影响力。对于国内而言,旨在实现城市之间共同建设、共同享用,实现协同创新。要完善城市之间权责对等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权责共担利益共享,从而在宏观上激励城市之间分工合作,集聚创新资源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以更深厚的创新基础参与国际合作。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积极参加国际大科学项目,广泛进行国际合作,引导形成高质量国际循环;同时以引领国际水平的大科学装置吸引国际

科研人才共享设施,进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集聚国际创新要素,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打造国际科学中心。

参考文献

- [1] Wolfe D A, Gertler M. Growing urban economies: innovation, creating and governance in Canadian city-region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 [2] 李志刚, 金铎, 阎永廉, 等. 我国大科学装置发展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议[J]. 中国科学基金, 2004(3).
- [3] 张玲玲, 赵道真, 张秋柳, 等. 依托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模式及其对策研究——以散裂中子源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19).
- [4] 王贻芳. 建设国际领先的大科学装置 奠定科技强国的基础[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5).
- [5] 陈光. 大科学装置的经济与社会影响[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4).
- [6] 王贻芳, 白云翔. 发展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引领国际科技创新[J]. 管理世界, 2020(5).
- [7] 李志遂, 刘志成. 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J]. 宏观经济管理, 2020(4).
- [8] Autio E, Hameri A P, Vuola O. A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big-science centers [J]. Research Policy, 2004(1).
- [9] Lauto G, Valentin F. How Large-Scale Research Facilities Connect to Global Research [J].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013(4).
- [10] 杜澄, 尚智丛. 国家大科学工程研究 [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u Yan Zhang Anwe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 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ar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eal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t this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in China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are increas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spatial layout, lack of research funds, unreasonable budget management, lac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imperfect supporting policies, insufficient data sharing, imperfect relevant mechanisms, and low conversion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we should learn from foreign successful experience,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central-local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novat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smooth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by innovation, jointly build and share and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so as to realize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large scientific facilit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major scientific center and innovation highland.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Construction Path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创新发展】

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孙锦礼 陈悦

摘要:基于阶层结构视角,探索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内在作用机制。以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的数据为样本,结合两阶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生态通过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因素的跨层交互作用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科技要素系统、经济生态系统、政府支持系统能够协同作用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科技金融生态内不同系统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关键词:科技金融生态;科技企业孵化效率;跨层交互;HLM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20-08 **收稿日期:**2021-12-22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模式创新研究”(202400410191)。

作者简介:孙锦礼,男,郑州科技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64)。

陈悦,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郑州 450000)。

科技创新是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但当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孵化器的孵化体系不够健全,投入产出效能不高,科技企业成长生态需进一步完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首次提出要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融合的科技金融生态,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培育创新型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汇集创新要素,为在孵企业提供资金服务、人才服务以及技术支持,利用政府政策倾斜,为在孵企业打造适宜的发展环境,在提升我国科技创新产出水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完善金融、科技、管理等多重因素融合的科技金融生态,明晰其对企业孵化器的作用机制,探索提升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策略,有助于实现我国原始创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连接人才、技

术、资本及专有技术之间的纽带,其孵化效率取决于孵化器自身(内部)的人力、财力、物力三个要素,同时还受到孵化器关系资源和声誉的影响。初期阶段我国的孵化器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孙凯等认为政府对孵化器的累积投资额能够影响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效率,且政府作为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主体,能够协调孵化器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结合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使孵化器转变成连接“政、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政府在孵化器运营不同阶段以统领、指挥或服务身份参与企业孵化。基础设施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因素、制度差异,政策倾斜、科技创新、孵化器规模等外部因素均能够作用于科技企业的孵化过程。

微观创新活动嵌套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环境中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关系环境的影响。从完整的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探究科技企业孵化绩效,受到内部活动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科技金

融生态环境是科技创新与金融深度融合的环境依托,是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中介组织等主体相互作用、协调耦合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科技金融生态系统通过资源互补和互利合作实现协同创新的价值创造,以市场内在配置机制为基础,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中介市场环境和人才环境等方面影响科技创新和产出效率。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具有调节作用,通过金融支持、政府政策和创业氛围,显著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技术资源、市场资源整合能力。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科技金融生态研究方面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对“科技金融生态”的研究多停留在概念界定上,而实证研究相对缺乏;第二,已有研究缺乏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层次划分,将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置于同一层次进行分析,忽视了科技金融生态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之间内外层级之间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利用两阶层线性模型(HLM2)对科技金融生态和科技企业孵化之间的跨层交互作用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机制。

一、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本文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层次分析以及科技金融生态作用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路径来研究其影响机理。

1. 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影响因素层次分析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将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因素视为同一层次自变量,但不同影响因素分别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产生影响,且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具有层次结构的特性。阶层结构理论指出,不同数据分类可以形成隶属关系,从而形成高低层次嵌套的阶层数据结构(Hierarchical data structure),其中,处于较低层次的数据是个体层次或微观层次,处于较高层次的数据是总体层次或宏观层次,低层次的数据通常受到高层次数据的影响和控制。

创新的微观主体总是嵌套于特定区域或特定时期的创新环境中,形成特定时期的环境嵌入式发展。从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变量结构看,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活动总是嵌套于一定的外部生态环境之中,受到外部环境中政府政策、经济状况和创新氛围等影响。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因素来看,内部活动和外部环境是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数据结构的体现,具有阶层结构性质。科技金融生态能够反映科技企业孵化器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因此科技金融生态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因素。阶层结构视角下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层次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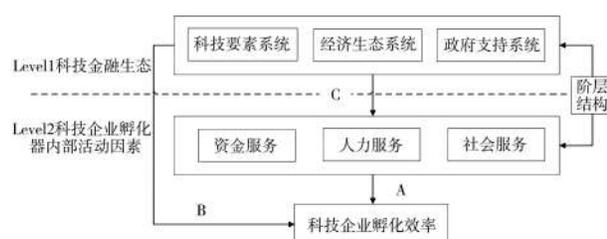


图1 阶层结构视角下的影响因素层次关系

2. 阶层结构下科技金融生态作用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路径分析

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路径可以分为三种：科技企业孵化器到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直接从科技金融生态到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科技金融生态通过科技企业孵化器到科技企业孵化效率。

科技企业孵化器路径,如图1中的路径A: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其自身的内部活动和资源整合能力,为科技企业提供孵化服务,直接促进科技孵化效率提升,该路径不涉及科技金融生态外部因素。

科技金融生态路径,如图1中的路径B:科技金融生态通过外部环境因素直接作用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该路径未涉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因素,仅研究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对孵化效率的直接影响。科技金融生态包括科技要素系统、经济生态系统、政府支持系统,通过各系统的网络协同效应提升地区整体创新水平,进而推动科技企业孵化效率提升。

交互路径,如图1中的路径C:科技金融生态通过资源互补和互利合作推动地区经济环境、科技创新环境以及政府支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从而影响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资金服务、人才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的提升,并通过跨层交互同时作用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

因此,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因素影响、科技金融生态影响以及两者跨层交互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主要由两方

面决定:一是科技金融生态环境能多大程度影响孵化器的内在嵌套关系,即跨层交互作用的影响;二是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科技金融生态和内部活动因素的孵化器本身分别对孵化效率的影响,即不同层次变量对孵化效率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设计

本文构建两阶层线性模型来研究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

1. 变量选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因素涵盖多个方面,主要分为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的微观因素和科技金融生态外部环境的宏观因素,这两层数据不仅各自影响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效率,还通过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为避免内生性,本文采用周密、孙龙等(2013、2021)学者的做法,将这两类因素分层处理,构建两阶层线性模型(two-level hierarchal liner model, HLM2)。

第一层级数据,即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服务的微观因素。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其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服务体系满足科技型企业的多样化需求,通过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优质孵化场地等基础服务;提供人力资源、研发技术、市场推广等增值服务;提供法律会计咨询、知识产权申报、工商财税检测等中介服务,助推科技企业茁壮成长。为了探索孵化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本文从资金服务、人力服务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对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微观因素进行分析,旨在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效率。

第二层级数据,即科技金融生态外部环境的宏观因素。科技金融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内部组成较为复杂,本文依据现有研究将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划分为三个维度进行度量,包括科技要素系统、经济生态系统和政府支持系统,每个子系统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2至3个指标进行衡量,共同组成多角度、多层次的科技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各变量的选取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选取情况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维度	变量符号	衡量指标	
被解释变量	科技企业孵化效率	—	EFF	累计毕业企业数	
解释变量	第一层级	孵化服务	资金服务	FUND	当年所获风险投资额
			人力服务	LAB	孵化器创业导师数 专业技术人员数
			社会服务	SPA	场地面积
	第二层级	科技金融生态	科技要素系统	TEC	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 科技人力资源
			经济生态系统	ECO	GDP增量 第三产业增加值
			政府支持系统	GOV	财政金融监管支出 财政教育支出 金融机构科技贷款额

2. 模型建立

指标标准化处理。上述科技金融生态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较多,数据存在不同的数量量纲。为了同时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特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体系中的不同量纲和数量级。

计算科技金融生态的综合发展指数,用 $I_{\alpha i}$ 表示,具体过程如下:

$$I_{\alpha i} = P_{\alpha ij} \times W_j \quad (1)$$

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ing, HLM)又叫分层线性模型或多层分析。在进行研究

时,样本往往来自于不同的层级和单位,且不同层级之间具有嵌套关系,表现出普遍的多层线性结构,由此得到的数据存在跨层交互作用。因此,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将各影响因素分层,可分别考虑不同层级和层级之间的交互调节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索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跨层级交互作用,故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将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各类因素划分为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采用两阶层线性模型对孵化效率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本部分对熵权法测度结果、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HLM估计结果进行

分析。

1. 熵权法测度结果分析

通过熵权法对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两层指标进行测度、赋权,计算出的具体指标权重结果分别如表2所示。

表2 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衡量指标权重

层级	衡量指标	权重(%)	变量	权重(%)
第一层级	当年所获风险投资额	28.16	FUND	28.16
	孵化器创业导师数	28.51	LAB	50.33
	专业技术人员数	21.81		
	场地面积	21.51	SPA	21.51
第二层级	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	14.48	TEC	26.02
	科技人力资源	11.54		
	GDP增量	13.02	ECO	26.67
	第三产业增加值	13.64		
	财政金融监管支出	23.19	GOV	47.32
	财政教育支出	9.58		
金融机构科技贷款额	14.54			

从衡量指标结果来看,在第一层级孵化器的孵化服务中,孵化器创业导师数所占比重最大。创业导师可为在孵企业提供交流咨询服务,通过观念引导、政策指导和技能辅导等手段激励和增强科技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孵化效率和创新成功率。对孵化效率影响较大的是当年所获风险投资额,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创新创业活动的有效融资方式,承担着巨大的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充足的风险资本能够解决在孵企业发展初期资金短缺的难题,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提高。此外,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赋能和孵化场地的供给也给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孵化环境,加速企业孵化效率提升。在第二层级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各指标中,财政金融监管支出和金融机构科技贷款额占比较大。政府的财政金融监管支出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促进在孵企业融资渠道畅通,在财政监管的有效保证下,金融机构科技贷款为在孵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推动在孵企业项目从方案转化为成果。GDP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加之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以及市场上科技人力的扩充为企业孵化提供了核心资源。

从变量层面来看,第一层级中的人力服务对科

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最大。首先,在孵化器的运作过程中,人力资源包括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和提供各类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致力于提升企业孵化效率。在创业导师的统筹布局和专业化的指导体系下,由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对接并提供综合化、系统化的全链条配套服务,为在孵企业发展和腾飞助力。其次,资金服务和社会服务为在孵企业投入财力、土地等物质资源,结合孵化器自身经验,促使孵化成功率的提升。在第二层级变量中,政府支持系统所占比重最大。对于孵化器而言,政府一直位于重要地位,且国内孵化器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政策支持、孵化基金的建立、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奖励和补贴等激励措施,达到降低孵化器运营风险、提高企业孵化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最后,为了实现国家创新创业目标,蓬勃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有助于驱动创新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集聚、协调资源配置,助推企业孵化产出的高质量发展。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表3中列出了本文所分析的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如表3所示,将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两层变量分为前五年和后五年进行对比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各变量的平均水平和最值与前五年相比均有所增加,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要素配

表3 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变量描述性统计

年份	层级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2010—2014	第一层级	FUND	261.184	6.981	270.014	252.354	17.659
		LAB	161.867	8.062	172.230	151.831	20.399
		SPA	375.657	5.177	382.206	369.108	13.098
	第二层级	TEC	311.232	4.998	316.368	304.264	12.104
		ECO	204.073	4.371	209.016	197.536	11.480
		GOV	315.465	6.896	323.744	304.895	18.849
2015—2019	第一层级	FUND	280.173	4.099	284.571	274.429	10.142
		LAB	190.555	9.691	200.540	177.789	22.751
		SPA	392.190	4.843	396.520	385.480	11.039
	第二层级	TEC	324.906	6.139	332.481	317.416	15.065
		ECO	218.761	5.719	224.641	210.881	13.759
		GOV	334.623	4.686	340.147	329.498	10.650

置的优化,科技企业孵化效率整体有所提升。由标准差结果来看,第一层级中的人力服务和第二层级中的政府支持系统的标准差结果与前五年相比有所升高,说明人力资本和政府支持力度在时间维度分布差异较大,其余变量的标准差均表现出了递减的特征,表明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各因素总体而言发展稳定,对成果转化的推动作用也趋于均衡。从极差结果来看,孵化服务中的资金服务和社会服务以及科技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政府支持系统的极值与前五年相比有所降低,说明我国对创新发展及成果转化的科技资本投入力度逐渐增强,加速资金流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项目,重点培育产业园区及孵化基地,增强地方科技型企业整体创新实力,结合政府主导地位,在保障经济环境稳定运行的同时,引进社会资本、培育科技人才、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专业的人才储备。此外,孵化服务中的人力服务和科技金融生态中的科技要素系统、经济生态系统的极差逐渐增大,说明我国当前科技人力资源、研发要素投入等科技要素随时间分布不均衡,为了提高在孵企业的成功率,政府应加大科技型人才培养力度、丰富人才引进战略,拓宽科技要素投入渠道,构建地区间交流互动平台,实现要素投入的稳步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协调发展。

3.HLM估计结果分析

在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所有变量中,通过层级分类确定了其受两层自变量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各个变量对孵化效率影响的不同效应,综

合考虑了以下八个模型,如表4和表5所示。首先分析孵化器的孵化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即只考虑第一层级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如表4中的模型1所示;其次,考虑科技金融生态各子系统的加入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即在模型1的基础上依次分别加入第二层级的三个变量进行跨层级拟合,拟合结果如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所示;再次,考虑科技金融生态两个子系统的加入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即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第二层级的两个变量进行阶层拟合,拟合结果如模型5、模型6和模型7所示;最后,综合考虑科技金融生态总体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即将第二层级的所有变量与第一层变量进行分层拟合,探索其直接影响及跨层交互影响,拟合结果如模型8所示。

第一,只考虑第一层级变量的影响效应时。模型1仅分析了孵化器的孵化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不涉及阶层结构关系。从回归结果来看,孵化器的孵化服务即资金服务、人力服务和社会服务,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资金服务与人力服务的影响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人力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贡献度最大,表明人力要素及资本要素仍是促进科技企业孵化效率提升的直接核心因素,科技创新的发展更是依赖人才培育和资金驱动。同时,在不考虑阶层结构作用时,第一层级的各个自变量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影响作用的系数均小于1,均未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效果,也说明要想更进一步实现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仍需加大孵

表4 两阶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1

自变量		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截距项		γ_{00}	-0.036(-0.107)	-5.797**(-2.562)	-1.878(-1.183)	-1.604(-0.592)
资金服务FUND		γ_{10}	0.182*** (7.470)	0.900*** (4.993)	-0.005(-0.035)	0.562** (2.221)
人力服务LAB		γ_{20}	0.729*** (12.690)	0.583(1.051)	1.667*** (3.977)	1.900*** (2.700)
社会服务SPA		γ_{30}	0.095** (2.215)	-0.423(-1.224)	-0.435(-1.611)	-1.103** (-2.520)
科技要素 系统TEC	截距项	γ_{01}		0.891*** (3.805)		
	FUND	γ_{11}		-0.089*** (-5.074)		
	LAB	γ_{21}		-0.002(-0.036)		
	SPA	γ_{31}		0.045(1.293)		
经济生态 系统ECO	截距项	γ_{02}			0.695*** (2.750)	
	FUND	γ_{12}			0.009(0.401)	
	LAB	γ_{22}			-0.161*** (-2.623)	
	SPA	γ_{32}			0.067* (1.659)	
政府支持 系统GOV	截距项	γ_{03}				0.330(1.217)
	FUND	γ_{13}				-0.044* (-1.830)
	LAB	γ_{23}				-0.133* (-1.998)
	SPA	γ_{33}				0.114*** (2.969)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变量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 两阶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2

自变量		系数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截距项		γ_{00}	-5.657* (-2.110)	-2.620(-0.135)	1.295(0.531)	-1.631(-0.612)
资金服务FUND		γ_{10}	0.603*** (3.239)	1.361*** (5.914)	1.322*** (5.894)	1.736*** (7.489)
人力服务LAB		γ_{20}	0.774(1.391)	1.500** (2.527)	1.698*** (2.913)	1.071* (1.734)
社会服务SPA		γ_{30}	-0.303(-0.801)	-1.588*** (-4.167)	-1.761*** (-4.684)	-1.654*** (-4.110)
科技要素 系统TEC	截距项	γ_{01}	0.478(0.838)	1.553*** (3.516)		0.716(1.286)
	FUND	γ_{11}	-0.169*** (-4.664)	0.011(0.367)		-0.078** (-2.344)
	LAB	γ_{21}	0.146(1.577)	0.135*(1.848)		0.198** (2.395)
	SPA	γ_{31}	0.043(0.661)	-0.149** (-2.513)		-0.065(-1.036)
经济生态 系统ECO	截距项	γ_{02}	0.633(1.072)		2.193*** (4.655)	1.564*** (2.810)
	FUND	γ_{12}	0.169*** (3.384)		0.346*** (7.555)	0.351*** (6.707)
	LAB	γ_{22}	-0.257** (-2.338)		-0.029(-0.308)	-0.1555(-1.341)
	SPA	γ_{32}	-0.018(-0.241)		-0.347*** (-4.620)	-0.266*** (-3.417)
政府支持 系统GOV	截距项	γ_{03}		-0.928** (-1.976)	-1.256*** (-2.722)	-1.221** (-2.583)
	FUND	γ_{13}		-0.143*** (-3.636)	-0.345*** (-7.937)	-0.317*** (-7.351)
	LAB	γ_{23}		-0.231*** (-2.882)	-0.100(-1.066)	-0.154* (-1.733)
	SPA	γ_{33}		0.304*** (4.579)	0.400*** (5.630)	0.400*** (5.506)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变量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化器各项服务的供给,并不断丰富要素投入种类、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第二,考虑科技金融生态子系统及其跨层交互作用时。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第二层级三个变量中的一个变量,拟合结果如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所示。在仅考虑单一科技金融生态系统作用下,各个子系统的加入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一层级各指标的影响效应有所下降,

甚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人力服务(LAB)在加入经济生态系统和政府支持系统后的影响效应均显著,实现了规模经济递增,但在仅有科技要素系统时的影响被削弱,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水平不高、质量不优,不能适应孵化器对科技人才的需要,仅有数量的提高并不能对孵化效率产生质的提升。因此,为了满足孵化器的人才需求,还需进一步扩大优质科技人才引进,增强高等

教育水平,提高对科技人力的激励与补贴,以推动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社会服务(SPA)仅在加入政府支持系统时影响显著,但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加入政府支持系统后,对科技金融发展的监管趋严,科技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不能达到孵化器对入孵企业的资格审批条件,在孵企业数量大幅缩减,孵化器内场地供给面积相对提高,但整体新增毕业企业数量下降。加入第二层级变量中的两个系统后,回归结果如模型5、模型6和模型7所示,资金服务(FUND)和人力服务(LAB)的显著性均明显增强,在有政府支持系统加入的情况下系数显著大于1,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表明政府的科技财政投入和人才培养计划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有较强的助推作用。

第三,综合考虑科技金融生态各个系统的影响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入第二层级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全部变量,拟合结果如模型8所示。在跨层级交互作用下孵化服务对孵化效率的直接影响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一层级与第二层级的交互作用也在科技金融生态整体作用下有所改善,说明孵化器的内部服务与外部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的共同作用可有效提高在孵企业的孵化效率。但政府支持系统通过作用于资金服务、人力服务的阶层结构作用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以政府财政金融监管支出和教育支出为代表的政策环境对企业孵化效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彰显出政府应改变以往通过财政直接投入为主导的支持方式,营造以市场化机制为基础的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引导社会资本及专业化人才的关注与支持。科技要素系统与第一层级的阶层结构作用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解释力度较弱,原因在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要素系统的建设仍不完善,急需提升科技资本和科技人才的质量和适应性,鼓励建立创新创业基地,实现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提升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经济生态系统通过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在孵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加速在孵企业获取社会资源、整合上下游科技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孵化空间,完善孵化信息网络平台,进而提高科技企业孵化效率。

四、结论

通过分析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各类因素,在阶层结构下将其分为内外两层,运用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借助HLM模型探讨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跨层交互作用。科技金融生态作为外部环境变量,影响孵化器孵化服务与科技企业孵化效率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可分为三个层面:孵化器内部孵化服务影响、科技金融生态外部环境影响以及孵化服务和科技金融生态的跨层级交互影响。

研究发现:当不考虑阶层结构关系时,孵化服务对孵化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其中人力服务的影响效应最大,但均未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在阶层结构作用下,加入单一科技金融生态系统要素时,弱化了孵化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效应,且科技要素系统的削弱作用最强。在考虑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内两个要素的共同作用时,资金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提高且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效果。综合考虑第二层科技金融生态变量对第一层变量的跨层交互作用之后,模型的解释效果大幅改善,说明科技金融生态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孵化活动存在跨层交互作用,能够影响科技企业孵化效率。科技金融生态中的政府支持系统能够显著增强孵化器内部服务对孵化效率的影响,说明政府应继续加大政策引导和金融支持协同作用,为科技企业孵化创造良好的政策和金融环境;完善的经济生态系统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企业创新提供充足的需求和动机,产业结构优化使资源供给结构、技术结构与创新需求相适应,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经济适应性,进而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科技金融生态、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活动及其跨层交互作用的结构优化,由仅注重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转变为同时注重孵化器内部服务和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建设。考虑阶层结构关系时,科技企业孵化效率不仅受到孵化器自身孵化服务的影响,同时受到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内政府

支持系统和科技要素系统的显著影响,科技要素系统在孵化器自有资金及专业化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引进外部科技资源,不仅直接提高科技企业孵化效率,还通过阶层结构作用间接调节在孵企业成功率。此外,政府应优化自身财政支持方式,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注重市场需求,鼓励具备互补潜质的地区进行资源要素及信息服务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全国孵化器整体效率提高和均衡发展。

第二,加强孵化器服务能力建设。首先,无论是从单一层次影响因素还是从阶层结构视角来看,人力服务对科技企业孵化效率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科技企业孵化器应加强专业人员和创业导师的培养和引进,打造职业化运营团队,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先进孵化理念、管理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健全在孵企业与创业导师的互利共赢机制,为在孵企业提供精准化、高质量的创业服务,提升孵化器孵化效率。其次,要提高孵化器场地服务能力,优化孵化器物理空间和共享基础设施,为在孵企业的资源集聚和整合以及创新发展提供完善的培养基地和支撑平台,拓宽其资源交流渠道和信息网络。同时,还应注重离岸孵化业务的开展,引进海外优质项目、技术成果和人力资源,帮助在孵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第三,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特别是科技要素系统和经济要素系统建设。科技要素系统内包含创新资本要素和创新人才要素。科技创新的实现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要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本配置,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实现科技创新和资本的融通发展,打造更优质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资金服务能力的提升,引导在孵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壮大。创新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科

技人力资源的增加能够改变科技进步路径,提升科技创新概率。因此,应继续增强高校教育水平及人才培养效能的优势,推动高水平人才向优质创新人力资源的转化,增加科技人才要素供给,为科技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为科技企业孵化器人力服务的实现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改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服务。科技创新活动依托于特定的空间环境,往往发源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对创新活动提出了现实需求。优良的经济环境能够汇聚创新要素、金融资本,加速信息和知识的集中,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生产要素。

参考文献

- [1] Smilor R W. Commercializing Technology Through New Business Incubator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 30(5).
- [2] 程郁, 崔静静. 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传导效应评估[J]. 科研管理, 2016, 37(3).
- [3] 翁莉, 殷媛. 长三角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效率分析——以上海、杭州和南京为例[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3).
- [4] Bigliardi B, Dormio A I, Nosella A, et al. Assessing science park performances: Directions from selected Italian case studies[J]. Technovation, 2006, 26(4).
- [5] 姚晗, 黄攀, 许治. 孵化器类型差异对孵化绩效影响的机理探讨——基于资源视角的解释[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1).
- [6] 孙凯, 曹丽艳, 毕克新. 基于改进DEA模型的企业孵化器孵化效率评价[J]. 管理现代化, 2013(2).
- [7] Mas-verdu F, Ribeiro-Soriano D, Roig-Tiernon. Firm survival: the role of incubators and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4).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Finance Ecology on the Incubation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un Jinli Chen Yue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structure, the internal ac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finance ecology on the incubation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s explored. Taking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except Hong 0, Macao, Taiwan and Tibet) from 2010 to 2019 as a sample, th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ecology on the incubation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echnology finance ecolog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cub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cross-layer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l activities of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the three subsystems of technology financial ecology can cooperate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cub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ubsystems in technology financial ecology on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cub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Technology Financial Ecology;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cubation Efficiency; Cross-Layer Interaction; HLM Model

(责任编辑:平萍)

【区域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困境与推进*

吴碧波 任文

摘要:农村城镇是实现由农村建设向城市建设转移的中介和桥梁,农村城镇新格局不仅依然重要而且要更好发挥作用,乡村振兴必须与农村城镇化有效统筹起来,更好发挥农村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小城镇数量众多、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环境各不相同,不同城市自身的发展路径和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农村城镇化的推进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合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强化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关键词: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农村城镇化;演进与推进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28-05 **收稿日期:**2022-0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杠杆下的中国财政乘数和财政空间研究”(72063030);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相对贫困多维测度、健康禀赋动态分布与居民家庭生计福利差异代际传递研究”(2021MS07010);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2021年重点项目“内蒙古牧区相对贫困多维测度、扶贫产业深度匹配与动态政策体系助推研究”(NJSZ21012)。

作者简介:吴碧波,男,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研究员,博士(后)(呼和浩特 010051)。

任文,女,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博士(后)(呼和浩特 010051)。

乡村振兴是我党对过去农村战略的系统总结和升华,对我国村镇建设做出的新的重要部署,必须有效统筹不同时期政策着力点,尤其是农村城镇化核心内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没有完成,还会有上亿人口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而农村城镇是实现由农村建设向城市建设转移的中介和桥梁,在城镇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农村城镇化不仅依然重要而且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国情决定部分农民必然农村城镇化,但在实施过程被有些地方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导致侵害农民权益、无视村民意愿等问题突出,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路径,而乡村振兴是正确认识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契机。西部地区在要素整合、外部环境变迁及社会需求驱动下,乡村地域功能、经济形态、空间格局和社会组织结构不断演化和变异,急需构建村镇新格

局,塑造村镇发展新主体,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城镇化不是对以往镇村建设模式的简单复制,不是对自然村落的简单合并,更不是搞大拆大建,农村城镇必须逐步由单一的“生活功能”转向“生产、生活、生态”的多功能复合体。

一、农村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地区通过工业化使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促使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具备转移条件的农民转入城镇就业、生活、居住。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相对集中、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乡镇周围的乡村以及县域的集镇和乡村的生产要素向中心乡镇和县城集中,导致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镇

集聚,从而产生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益又会促使经济集聚,促进社会分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增长极的扩散作用会使中心乡镇(县城)的信息、资本、产品、技术等向乡村(中心乡镇)转移,既能够促进中心乡镇(县城)的经济增长,又能够带动广大乡村(中心乡镇)的经济发展。同时,乡村农业人口不断减少,为乡村农业生产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益、提高农业生产率提供了条件。

1.农村城镇化能够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人口和产业集聚效应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形成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分工,提高专业化生产经营水平。收入水平大幅增加、生活方式不断现代化,导致消费方式和消费质量发生改变。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升级,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和变动,进一步刺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广泛推广和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质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促进商业、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传统服务业提供了市场需求和空间,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2.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村人口素质提高

劳动力素质包括体力、智力、心理等方面,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社会生产力技术水平低,体力劳动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对劳动力主要需求。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知识水平、专业技能水平等智力层面。农村中心乡镇(县城)是各种信息、商品、医疗卫生的中心,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倾斜,提高农民的知识素养和职业技能,满足了农村城镇化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3.农村城镇化有助于拓展农村市场

市场是农村城镇物流、人流、信息流决定力量,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分工、创造就业机会等起到重要作用,信息流对市场供需平衡和价格机制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农业剩余人口在乡镇相对集聚,经济量相对聚集,引起专门化生产和规模市场相联系。人口数量不断增多,扩大了消费需求和消费市场规模。农村城镇化将加快农产品市场的改

造升级,通过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一批功能完善、设施先进、交易规范的农产品交易和商品批发市场,完善农村市场功能,健全农村信息网络,畅通农村与各大中城市、与周边地区农产品市场信息交流渠道,形成完备的市场体系。

4.农村城镇化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

乡镇是城市和农村的连接枢纽和关键节点,农村乡镇建设水平的提高,加强了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有效流动。农村城镇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空间,为本地农民提供了就业创业空间,也为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空间,能够延伸城市生活方式和理念、传递先进生产技术、流通现代商品、传播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城镇从接受城市辐射中具有接应和延伸作用,被大中城市辐射又向农村延伸,促进生产要素城乡间有效流通。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逐渐落户,不断提高了城镇企业的产品层次。部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转移,优化城乡生产要素的配置,促使生产力城乡间合理布局,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困境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建设提到战略的高度,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正确看待农村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及城乡融合,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总体上仍然相当薄弱,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

1.农民被上楼,忽视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实际需要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既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又关系到农民的财产收入和社会保障。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无法入市交易,无法贷款融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很多城市的郊区,大搞土地收储整理、征收,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土地的所有权从集体变成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极差地租,是土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各地政

府土地收储整理乐此不疲,房地产开发、城镇建设、新建各种园区,农田被征收,住宅被拆迁。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没有因地制宜,没有将农民现代化物质居住需求、农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有机结合,没有很好保持乡村的原生态和宜居环境。有的地区不从农民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种植养殖需求出发,盲目地把城市居住方式强加给农民。有的地方不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考虑农民主体的生产生活实际,迁村并点、大拆大建,片面模仿城市建设形式,拆毁乡村传统的住宅院落。种地、储粮、卖粮、养家禽是农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农民被上楼”导致了种地、晒粮、贮存粮、养殖等许多生产生活不便利的问题,有的地方文化广场变成了打谷场、晒谷场,休闲乐园等活动中心也变成了家禽嬉戏的场所。

2. 忽视民族习俗,特色乡村文化走向断层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旧时的文化交流逐渐被经济交流所取代,经济发展主导取向弱化了农村人文情怀。农村和城市的文化界限日趋模糊,民俗文化被城市文明冲淡。年轻人对民俗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传播甚少,更多的是从城市中获取文化,传播文化,反向作用于长者。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满足感和充实感,没有带来被社会认可的自我认同感。城镇化为农民带来物质的丰裕,为农民带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农民带来城市文明的精神享受,但人们发现缺少了归属感。传统的重道德约束轻利价值观已经走向淡薄,农村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在走向消逝。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今天,传统礼仪习俗也变得过于简化,风俗文化意义逐渐缺失,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短板。很多城镇在政府扶持下加大了文化建设工作,但粗制滥造的现象普遍存在,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优秀文化作品相对欠缺,还需要加大力度讲好乡村故事、农民创业壮举。

3. 人为造城等,忽视产城互动的客观规律

农村地区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交通、医疗等不断改进,资源要素会从城市不断向农村转移或回流,但这个过程不等于多盖房子,主要是要为企业、农民、个体工商户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进而在农村实现产业集聚。城镇化的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农村城镇化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加强农村建设,不是简单地模仿城市,把农村变为城市。不能人为“造城”,实现

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融合,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目前“空城”现象实际就是不以科学规划为依据而“人为造城”。产业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能盲目追求农村城镇面积的扩张。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岗位,大量待业人员集聚于城镇,容易引发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的“专业镇”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繁荣。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因汽车产业而繁荣,但因为美国汽车业衰落,产业结构单一,底特律从繁荣转向衰落。不管小城镇、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关键是要有产业发展,要有吸引力。农村城镇化不能片面理解为盖房子、搞房地产,随意滥占耕地,也会影响粮食生产安全。中国目前城镇化的集约程度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相比还差很多,所以农村城镇化不能盲目圈地铺摊子,应在重点产业上、重要节点上、集约发展上下功夫,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4. 农村空心化严重,“乡村病”日趋严峻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城市对农村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产生了较强的吸附作用,大量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在农村产生了村庄用地严重空虚化、农村主体过早老弱化、农村水土环境污染化等“乡村病”。劳动力等要素向非农产业高速转移,农村人地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主体出现老弱化问题。1999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制约了农村和农业的转型发展。农村宅基地闲置,存量利用率降低,农民迁徙到城市居住就业,原有的村落尽管有的房屋无人居住,却并未自然消亡,大部分农民在离开耕作后不愿意放弃宅基地,产生“空心村”现象,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导致农田、河流、湖泊污染,乡村水土环境恶化。

5. 乡村公共服务凋敝,城镇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乡村公共服务凋敝并不是城镇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两者必须实现融合发展。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资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的虹吸效应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流失,导致乡村共服务建设滞后、服务水平不高。农

村人力资源的流失严重,乡村教师、乡镇基层公务员等职业吸引力下降,乡村整体衰落,乡村社会治理形势严峻。群众自治机制仍需完善,目前人口在城乡间大量流动,大量农民处于“离土不离乡”的兼业状态,对参与农村民主管理热情不高、参与度不够,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组织管理更是一个难题。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较差、公共服务能力较弱,乡村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畅,农村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仍需加强,时常发生“小病不及时,大病治不了”的尴尬局面。另外城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对周围的乡村辐射作用不强。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推进

乡村振兴为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农村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人口合理集聚、产业加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农村发展软环境

第一,优化农村发展软环境。严格执行权力清单,完善农村市场负面清单,优化农村经济发展软环境。强化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增收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加强“三农”智库建设。加大对农产品的收购优惠力度,加大农村商贸物流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优惠力度,提高农村城镇对资金、劳动力、技术的吸引力。第二,创新投融资渠道。西部地区引入的国内外资金,广大乡村能够充分利用的有限。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吸引各类经济主体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的融资支持力度。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建设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发展。第三,提高农村基建水平。加快机场、公路、铁路高效连通,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镇间自由流动。依托中心城镇的带动作用,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小城镇、县域经济有效结合。提高西部城镇内部生产、生活、物流、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2. 打造小城镇特色产业,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坚持特色发展路径,避免城市“千城一面”。通过挖掘开发利用自身特有资源,增强对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提升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立足小城镇经济发展基础,确立主导特色产业,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城镇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构建优势互补的城镇产业发展格局。第二,坚持文化保护与弘扬并重,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增强文化软实力。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城镇历史建筑、民族文化风格等历史风貌,积极提升城镇功能。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民族风情小镇的文化资源,以特色文化推动小镇发展,打造特色文化小镇。第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西部地区地域广袤,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民俗差异性较大,如蒙古族习惯住毡房,但是傣族习惯住竹楼,而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住宅多为砖瓦结构楼房,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尊重文化习俗,传承历史文化。

3. 促进要素科学流动,实现城乡融合

第一,农村的工业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城市,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民生。依托中心城镇,充分发挥其对周围的辐射作用,提高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水平,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第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是造成中国城乡矛盾和农村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要构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平台,土地、劳动力和公共服务等资源在城乡间有序流动,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不断增强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 and 乡村对城镇的促进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第三,推动农产品精细加工,扩展农业产业化链条,打造种植(养殖)、加工、储运、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扶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支持龙头企业探索“公司+农户”双赢模式,构建现代农业“生产—销售—加工”体系。统筹规划城镇电力、燃气、给排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农村便利生活服务网络,建设宜居的综合性小城镇。

4. 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

第一,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科技投入,推进农

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推广机械化生产、生物化学技术、改良品种等技术,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村生产力。推广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努力提高农业产量,应用现代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提高信息化水平,变革农业生产销售方式。第二,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和农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档次、加工性能,促进传统农产品生产向优质产品转型升级。延长农业产业链,减少中间环节,节约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调整生产结构以及产业规模,科学配置生产资源。第三,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推动西部地区水果、药材、蔬菜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深加工,培育农业产业增长极。依托当地资源禀赋上的优势,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发展特色农业,突出区域特色,加快产业化进程,促进企业聚集,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实行标准化生产。

5. 培育壮大中小企业,逐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

第一,培育民营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面促进小微企业发展。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扶持一批提供就业岗位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农副产品加工型企业。建设初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附近城市的配套产业基础延长产业链条。积极组织特色产品、优势产品、发展项目参与各类经贸洽谈会。第二,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自然资源加工等特色工业,以小产品做大产业。依托农产品、矿产资源等发展西部特色工业,采用现代技术,对农畜产品、绿色食品、初级粮食加工品、水产品等农产品进行精细深层加

工,提高附加值。针对特色产业带动力强、科技含量高、加工能力大的企业,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培育名牌产品。第三,依托城市发展配套产业。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加入大企业、大集团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乡镇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与到专业化分工中来,积极谋划各类配套项目。城市附近的城镇,要结合自身实际,在现代产业分工中找准定位,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的配套产业,形成地方优势。

参考文献

-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2]龙花楼,刘彦随,张小林,等.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J].地理学报,2014(8).
- [3]席建超,赵美风,葛全胜.旅游地乡村聚落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地理学报,2011(12).
- [4]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J].地理学报,2012(6).
- [5]韩长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农业工程技术,2018(10).
- [6]韩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J].农村工作通讯,2008(1).
- [7]高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突出十个重点[J].南方农业,2008(1).
- [8]张晓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抓手[J].农村经营管理,2018(1).
- [9]叶兴庆.实现国家现代化不能落下乡村[J].中国农村观察,2017(11).
- [10]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u Bibo Ren Wen

Abstract: Rural towns are the intermediaries and bridges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rural construction to urban construction. The new pattern of rural towns is not only still important, but also needs to play a better role. Rural revitalization must be effectively coordinated with rural urbanization, so that rural urbanization can play a better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tow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Different cities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and life cycles. The promo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should b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adopt suitable development paths, especiall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ave resources.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Urbanization;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责任编辑:平 萍)

【区域协调发展】

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障碍与突破*

高 昕

摘 要: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已经成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支点。面对县域经济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亟待推动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需要在突破思想理念束缚、生态环境制约、产业基础短板、基础设施瓶颈、创兴要素短缺等多重现实障碍的基础上,遵循客观性规律、增强前瞻性思维、采取超常规举措,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强化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相互促进作用,增强政策工具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抢抓新机遇、构筑新格局、激活新优势、拓展新空间、集聚新动能。

关键词:后发地区;县域经济;障碍制约;突破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33-09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十四五’时期河南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2020BJJ047);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十四五’时期河南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21A790015);2020年郑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研究”(2020RKXF0088);河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河南高等教育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021JKZD16)。

作者简介:高昕,女,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讲师,博士(郑州 450046)。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其发展演进过程衍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结构、政策制度框架之中,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支撑了高质量发展。但应该注意到,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相比,县域经济在体量规模、质量结构、速度效益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作为贯通城乡、联结工农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已经成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潜力所在、基础所在。加快引导和推动后

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不断缩小后发地区县域经济与先发地区之间的差距,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客观认识发展差距,解析内外制约因素,为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向更高层次、更广空间、更深领域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一、从区域协调发展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节点,服从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好了,整个区域的发展空间才能

不断拓展、经济结构才能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才能全面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以全国百强县为先锋的县域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后发地区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偏低、发展方式粗放、创新动能不足、资源要素流失等问题更为显著,已经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掣肘。

1. 百强县与其他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2021年8月,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2016—2020年,百强县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10%左右,但同期全国县域GDP的占比却从44.5%下降到38%。2021年9月,新华网发布的《2021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县域常住人口的全国占比为51.63%,但县域GDP仅占全国的38.0%,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3.54%。在百强县GDP贡献率维持稳定状况下,整体县域GDP占比的大幅下降,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百强县与其他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日益扩大态势。

2. 四大区域板块

间县域经济发展失衡

从四大区域的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看,2020年百强县中来自东部地区的有65个,来自中部、西部、东部地区的分别为22个、10个和3个,百强县在四大区域板块分布极不均衡。以2019年为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户籍人口的占比分别为30.0%、33.0%、30.4%和6.6%,但县域GDP占比则分别为40.6%、30.3%、24.7%和4.4%;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43.6%、30.1%、21.8%和4.4%;县域住户储蓄存款余额占比分别为39.9%、28.7%、24.0%和7.3%,不论是GDP,还是县域财政收入水平,抑或是住户储蓄余额,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都极为显著(见表1)。

表1 中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评价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百强县数占比	65.0	22.0	10.0	3.0
户籍人口占比	30.0	33.0	30.4	6.6
生产总值占比	40.6	30.3	24.7	4.4
财政收入占比	43.6	30.1	21.8	4.4
住户储蓄占比	39.9	28.7	24.0	7.3

3. 省域之间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化显著

从省域层面看,2020年全国百强县席位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分别占有25个、18个和13个席位,三省累计贡献了接近六成的百强县,其中江苏一省独大,百强县个数占全国的1/4,而吉林、山西、甘肃、青海、重庆、广西等10个省(市)均无一上榜。在县域经济体量上,2019年江苏、河南、山东、浙江及湖南五省的县域GDP均超过22000亿元,位列前五位,五省县域GDP累计全国占比达到40.4%,其中,仅江苏一省就为全国县域GDP做出了11.0%的贡献(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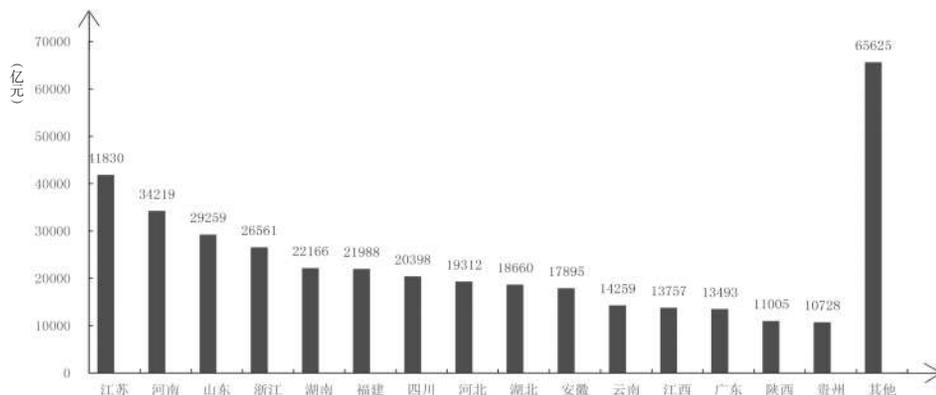


图1 2019年中国各省份县域GDP总量

从各省份县域GDP的均值来看,不同省份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2019年,江苏县域GDP均值遥遥领先,达到1020.3亿元,是位居第二位浙江县域GDP均值的两倍多,县域GDP均值在300亿元—400亿元的省份有3个,依次是福建、山东与河南;县域GDP均值在200亿元—300亿元的省份有5个,依次是湖北、安徽、湖南、重庆和广东;县域GDP均值100亿元—200亿元的省份有13个,不足100亿元的省份还有5个,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见图2)。

在财政收入水平上,各省份的县域差异也较为显著。2019年江苏、浙江及山东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超过2000亿元,分列前三位,三省县域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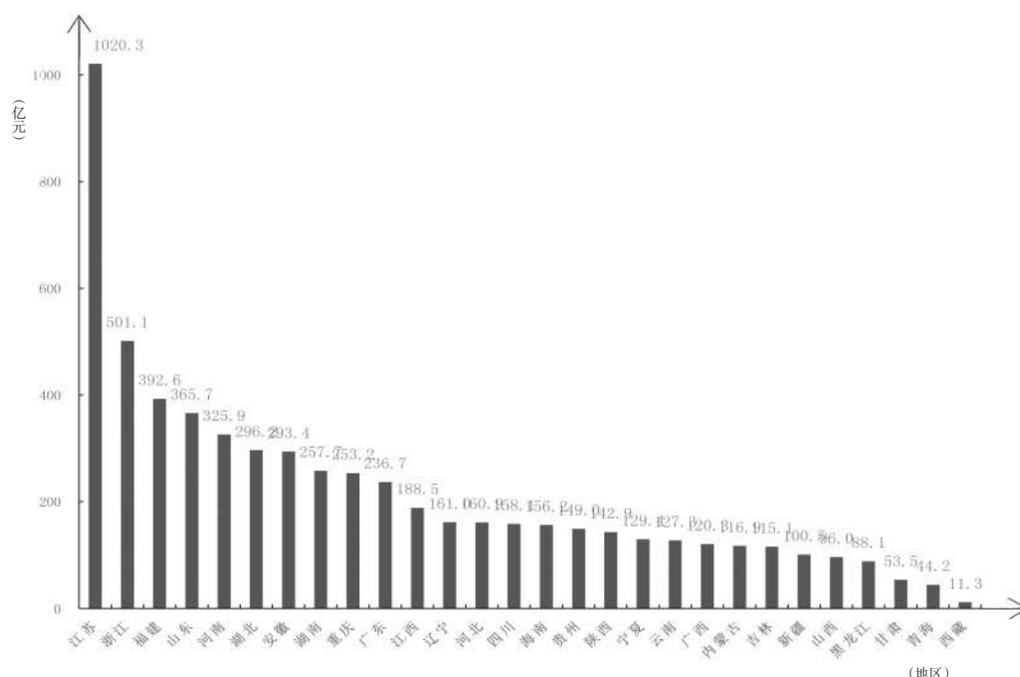


图2 2019年中国各省份县域GDP均值

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占全国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0.1%(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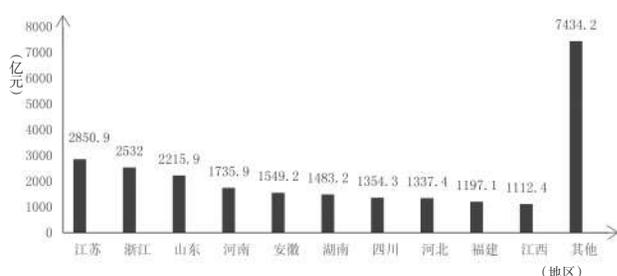


图3 2019年中国各省份县域财政收入规模

从县域之间看,县域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现象更为突出。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2019年,全国有33个县域的GDP超过1000亿元的,有208个县域的GDP超过400亿元,有607个县域的GDP达到200亿元,1104个县域的GDP达到100亿元,但还有771个县域的GDP不足100亿元(见图4)。另据《2021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有38个县域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其中,有8个县域生产总值超过1500亿元,2个县域生产总值超过4000亿元,且这些生产总值达千亿级的县域大多分布在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里。与此同时,还有1501个县域的生产总值不足300亿元,70多个县域生产总值低于10亿元。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后发地区县域经济不仅

与先发地区差距巨大,而且县域经济规模也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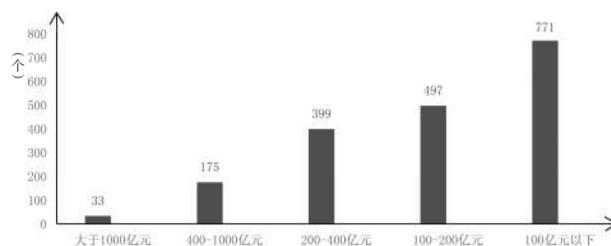


图4 2019年中国县域GDP等级分布

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四大区域板块之间,而且同一区域板块内部不同省区之间,甚至同一省区的不同地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深刻反映了当前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本质和特征。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加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掣肘,任由这种发展差距扩大,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将会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加快推动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缩小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补齐县域经济发展短板,已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二、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多重障碍

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是资源要素与内外

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与结果。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是基于区域资源要素禀赋优势,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利用经济后发优势,缩短经济发展的一般阶段,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提高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发展水平整体跃升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县域经济本身就在要素结构、产业基础、创新条件、制度环境等方面就与城市经济有着显著的差距,且后发地区的县域大多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育落后,长期处于要素流失状态,极大地制约着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当前,思想观念陈旧、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滞后、创新要素短缺不仅是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也是制约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

1. 自然生态较为脆弱

后发地区县域多处于偏远山区、边缘地带,虽然自然资源种类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但人口基数大、人均数量少且分布不均衡,生态环境约束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矛盾十分突出。前期“先破坏、后治理,重利用、轻保护”的经济高速增长传统发展方式,对后发区域自然环境的大量“透支”,导致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成为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普遍困境,同时,伴随工业化进程加速和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大量工业产能逐渐向县城集聚,进一步加大后发地区县域的资源环境压力。西南地区石漠化、西北地区荒漠化、生活多样性降低、冰川河流湿地面积萎缩等问题十分明显,其生态环境之脆弱、保护修复任务之艰巨,使得西部地区成为生态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目前中国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和差的县域面积占31.3%,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西藏西部和新疆大部地区等后发区域。长远来看,很多后发地区的县域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原有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快速凸显,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既要进一步加强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补“欠账”,又要在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条件下为转型发展增容量。

2. 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当前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从产业层面看,大

多数后发县域缺乏在国内具有影响力、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大型产业集群,已有产业集群发展层次依然较低,仍以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这些行业极易受到要素成本的影响,出现产业衰退或外移的问题,不利于县域经济稳定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多而不精,更多局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工业经济支柱作用不够突出,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且主要集中在冶金、焦化、建材等行业,产品种类单一,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不高,高能耗企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缺乏鲜明特色和吸引力,现代服务业占比偏小,服务水平不高,仅限于满足本地消费需求,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服务行业综合体系,缺乏独具特色的响亮品牌,对县域经济带动作用不明显。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全国有25%左右的县域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黑龙江、海南、吉林、广西、辽宁五省区县域第一产业占比均超过25%,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3.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体系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后发地区的县域大都远离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核心城市,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都不够完善,承载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能力较差,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城市交通绿色发展报告(2020)》发布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数显示,目前,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数平均值分别为47.04、34.25、28.44和29.02,仅有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数高于全面平均水平35.62,西部和东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指数分别比全国均值低7.18和6.60。在交通基础设施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12个省份中,东部地区有9个、中部地区有2个、东北地区有1个,西部地区没有一个省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另据《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白皮书(2020年)》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中,仅有四川和贵州两个省份的新型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青海和西藏垫底。

4. 创新要素供给不足

创新要素是后发县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支撑,但目前大多数后发地区的创新要素供给严重不足,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信息已经成为后

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指出,过去20年来领先地区与落后地区创新能力差距没有明显缩小,领先地区的创新投入与产出呈现“极化”现象,区域间的差距又近乎固化。相对于大中城市、先发地区,县域层面很少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布局,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分布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资本方面,后发地区的县域融资渠道单一、小额贷款利率高、信用担保机制不健全,直接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十分突出,对中小企业发展不利。此外,县乡财政困难、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也使得一些地方优惠政策难以落实,严重影响了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三、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突破路径

在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经济发展动力极化、产业分工格局重塑、传统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内外挑战下,推动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深化规律性认识、增强前瞻性思维、采取超常规举措,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中,抢抓新机遇、构筑新格局、激活新优势、拓展新空间、集聚新动能。

1. 高位谋划空间规划,构建多维融合发展新格局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县域空间规划在国家“五级三类”空间治理体系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细化落实,也是自身开发保护建设的具体安排,还是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框架指引。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生态共生共荣、设施攻坚共享、信息互联互通的宏观背景下,县域空间规划已经成为实现多尺度转换及多维度融合的关键。实现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要打破县域规划“多规合一”的路径依赖,遵循“目标—现状—措施”的逻辑关系,将产业布局、生态环保、资源开发、交通运输、人口分布等一体纳入,谋划、编制、实施县域空间规划,推动规划理念从问题导向向目标导向转变,规划编制从局域建设重点开

发向全域治理保护优先转型,规划实施从协调机制软性要求向制度设计刚性约束转向,形成分工合理、衔接顺畅、功能互补、协同高效、支撑有力的空间规划体系,为区域融合、城乡融合、产城融合、产业融合等全方位、全要素、全格局的融会贯通、多元整合提供更具效率的空间载体支撑。

一是拓展县域空间规划视野。强化县域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省域空间规划以及重大专项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借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理念,四川“阆苍南”等县域跨区域协同发展经验,推动县域在更大空间、更大范围、更大领域内分工协作、配置资源,实现攥指成拳、共赢发展。二是突破行政区划界线约束。变行政区思维为经济区思维,积极推进有条件的后发县市撤县设市、撤市设区、县区合并,通过区划调整,优化县域与市域的产业分工和经济联系,打破传统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政模式,促进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供应链谋划和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把县域经济强引向更大区域的功能强、服务强、协同强。三是打破城乡分割规划格局。依据功能定位导向、要素协调一致、综合集成实施的原则,将各县市乡村振兴规划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有机衔接起来,统筹空间、产业、要素,协同生产、生活、生态,依据要素禀赋差异,界定区域产业布局,依据区域产业布局,引导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功能和空间融合发展,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四是打破产业界限,优化产业布局,按照产业集群化、生产链条化、要素集聚化的思路,依托已有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载体,把现代科技成果、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商业模式等引入农业农村,促进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纵向与横向融合发展,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强化产业支撑。

2. 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激活跨越发展新优势

近年来,辽宁、陕西、河南、重庆、甘肃、山西、宁夏、内蒙古等后发地区在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已相继形成了机械设备、有色金属、化工能源、电子信息等较为扎实的产业基础,但产业结构仍多以传统产业、初级产业、上游产业为主,面临着扩能增量与提质增效的双重任务,迫切需要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取得突破。为此,应围绕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比较优势,在巩

固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沿着“存量裂变、增量聚变”的路径,通过高位承接产业转移、精准对接产业链条,高位嫁接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产业门类优势转化为场景融合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端要素链接优势,把数字技术发展机遇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推动县域产业迭代升级,培育竞争优势和发展胜势。

一是创新开放招商模式。把深化开放招商与构建产业生态、引进人才智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项目工程、服务本地企业等结合起来,大胆突破行政招商的限制,充分激发企业招商活力,发挥龙头骨干企业优势,形成招商引资的连锁效应和集群效应,完善产业链招商图谱,精选产业链招商项目,深入推进集群招商、链条招商,延长“上下游”、补齐“前后端”,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二是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开放创新、协同融合、富有活力的产业生态是县域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迭代升级一定要把产业生态放在重要位置,持项目谋划、项目争取、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四位一体”协同,把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金融创新、营商环境、项目建设、科技支撑等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共生共荣“雨林式”产业生态,撑起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四梁八柱”。三是打造高端产业平台。产业发展离不开平台支撑,要依托各自已有的产业集聚区、产业孵化区、创新示范区等产业平台载体,培育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产业集群式发展,通过培植龙头领军企业,壮大企业群体,提高产业影响力和竞争力,打造一批规模体量大、专业化程度高、延伸配套性好、支撑带动力强的产业集群,助力后发县域全速进入跨越式发展新轨道。

3. 营造最优发展环境,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

与先发地区相比,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基础差、起步晚、水平低,这就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来进行改善提升。一方面,顶格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全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一流营商环境。要拓宽视野格局,让市场主体集聚更主动。在坚持现有好做法、好的经验基础上,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以一流营商环境聚资源要素、承接产业转移、打造创新生态、塑造后发优势。要提升治理效能,让市场主体办事更便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围绕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

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放”的力度、优化“管”的方式、提升“服”的质量,当好企业服务的“店小二”、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市场规则的“守护者”。要降低经营成本,让市场主体竞争更有力。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多措并举降低投资融资成本、想方设法释放资源要素红利,以政府放权让利换取企业群众满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基建”。后发地区在地理区位、人才市场、开放条件等方面存在天然的不足,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加速数字化转型、拉动新经济发展、支撑新业态形成等独特功能,在助推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性和先导性作用。为此,要抢抓当前国家加大“新基建”投资的重大政策机遇,坚持规划建设与运营服务相结合、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创新驱动和应用引领相结合,超前谋划总体规划设计、不断完善多元投资机制、有序拓展多维应用空间、加速释放多重撬动效应,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夯实根基。

4. 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打造良好创新生态,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是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产业体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基础和内在要求。相比大中城市,后发地区县域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复杂,外部挑战多元,这就需要更加注重从实际出发,选准依托主体,找准有效载体,把准重点方向,推动创新资源向县域汇聚。

一是强化人才要素供给。人才是新经济、新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面对当前国内人口结构性流动趋势,要对人才政策进行全面审视梳理,从人才工程计划、引才用才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出新的突破性措施,拿出更加精准的“政策大礼包”,加快形成各类人才在县域安家落户、竞相奔腾的生动格局。依托产业平台、科研平台等载体,吸引人才、集聚要素,形成以产聚才、以才兴产、才产互融的格局。二是拓宽信息要素供给。整合政府和社会公共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平台,推进数据合法有序契约开放,推动数据资源市

场化开发利用。三是强化土地要素供给。推动土地供给由注重增量转向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并举,加强产业功能区用地保障,引导企业在功能匹配的产业园区选址建设,鼓励各类园区自主开发公共物业,大力推广以物流成本为导向的紧凑式工厂布局,构建工业用地亩产效益评价体系,实行差别化地价政策,对符合产业目录导向的重大项目给予用地优惠。四是推动产业园区升级。以产业园区特色化、专业化、集群化为引领,推动“纵向”上下游企业衔接和“横向”配套的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实现企业的集聚向企业“成群”的转变。通过招商引资和内生成长不断地强链和补链,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转型等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园区产业的升级。

四、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推动后发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意味着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与发达地区同步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目标,面临着赶超与转型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继续致力于做大蛋糕,在数量规模上加快缩小与先发县域的差距;另一方面要不断着眼于提质增效,转换动能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既遵循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也具有赶超跨越的实践性特征。在经济“起飞”阶段,单纯依赖市场的自由调节,后发地区往往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经济起飞的条件,应在发挥市场作用同时,运用政府干预促进经济起飞。

1. 完善国家宏观支持政策

国家层面的宏观支持政策应以优化顶层设计为路径,高度重视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一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布局。结合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战略的深化实施,将后发地区县域渐次纳入到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空间布局中,拓展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的空间范围和辐射范围,构建形成涵盖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县域在内,层次更加清晰、结构更加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为后发地区对接中心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资源外溢创造更为有

利的条件,让其更多地分享经济带和城市群发展的红利。二是建立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口帮扶机制。借鉴对口援疆、对口援藏的实践经验,选择若干后发地区县域为试点,在国家和省域两个层面探索实施后发地区县域跨越式发展结对帮扶机制,以技术转移、产业链接、飞地合作、人才交流等为重点,以“帮扶方”与“受扶方”利益共享为导向,实施多领域、深层次对口帮扶,畅通发达地区与后发县域之间的人才、信息、资源、产业、技术流动通道,推动形成中央部门和省直部门对口帮扶后发县域、中心城市帮扶后发县域、先发县域帮扶后发县域的优势互补发展格局。三是完善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配套支持政策。聚焦后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不足,在国家和省域层面设立相应的财政专项资金,以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范围拓展为契机,进一步增强财政支持的精准性、实效性、针对性和规范性。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区域利益分享、分配、平衡、补偿等调节机制,分门别类地在生态保护、资源供给、产品共赢、污染防治、人才流动等领域建立相应的利益均衡调节机制。

2. 深化省域扩权赋能改革

省域层面的中观支持政策应以扩权赋能强县为主线,差异化实施后发县域经济发展策略。一方面,深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按照“能放尽放、应放尽放、减防并举”的原则,采用“科学试点、分布实施、渐次推进”的方式,借鉴山东、湖北、河南等省份的实践经验,立足省情,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财政支配全县目录等,赋予后发县域更大自主权、决策权和裁量权,为后发县域特色化发展提供宽松政策环境。探索实行后发县域经济发展“直通车”制度,建立省级部门与后发县域的直接沟通交流机制,在项目报批、资金投放、规划协调等方面进一步降低后发县域的行政沟通成本。另一方面,持续完善差异化绩效考核和政策扶持体系。精准定位后发县域的发展定位、功能布局特别是主导产业,规避县域经济无序发展、同质化发展。加快完善县域经济发展分类考核办法,探索构建“综合指标+共性指标+专项指标+特色指标”差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量身打造“指挥棒”,激发创新活力,增强赶超信心。着力要素集聚、流程再造、正向激

励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支持和推动后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3.提升县域经济治理水平

县域层面的微观政策应以激发内生动力为核心,持续提升县域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一方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在财税政策优化、土地制度改革、人才引进培育、基本民生改善等方面定向发力,打造服务政府、民生政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由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又换位思考、强化服务,围绕企业所急所难精准发力,努力退出“越位点”、补上“缺位点”、纠正“错位点”,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需求潜力和创新动力。尤其是针对乱收费、乱检查等问题,创新服务理念,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政务服务品牌,增强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提升领导干部素养。主动对标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找差距,提高学习研究能力、分析研判能力、运用市场机制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切实把短板补起来、把本领提上去。不断提高市场驾驭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在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公共服务领域推出改革举措,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尤其是要注重提升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水平,加强网络知识和数字经济的学习,坚持学思结合、知行合一,不断增强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县域数字化转型。

参考文献

- [1]陈耀.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J].新西部,2018(Z1).
- [2]沈开艳,陈建华.试论西部后发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基础[J].广东社会科学,2012(6).
- [3]孙利芳.推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3(3).
- [4]杨振芳.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变化与分析——基于2009—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6).
- [5]王小明.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8(5).
- [6]曹丽哲,潘玮,公丕萍,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格局[J].经济地理,2021(4).
- [7]郭爱君.“双循环”格局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J].人民论坛,2021(2).
- [8]王志玲,董彦,张琳,等.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及对策——以广西融水县香粉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例[J].规划师,2020(11).
- [9]陈涛,位欣.县域“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的转向:湖北远安县实践[J].规划师,2019(24).
- [10]李先军.以“新基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N].经济日报,2020-06-16(11).
- [11]高宏霞,王成.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关联与房地产价格调控[J].江汉论坛,2021(6).
- [12]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张建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3][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14]范恒山.探索建立全要素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J].区域经济评论,2020(1).

Obstacl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in Late Developing Areas

Gao Xin

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ounty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key fulcrum for realiz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unblock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Facing the widening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county economies,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county economy in late developing areas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This requires that, on the basis of breaking through multiple practical obstacles such as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industrial foundation weaknesses, infrastructure bottlenecks and the shortage of creative elements, we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objectivity, enhance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take unconventional measures, and strengthen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complet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nhance the accuracy,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tools,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build a new pattern, activate new advantages, expand new space and gather new momentum.

Key Words: Late Developing Areas; County Economy; Obstacles and Constraints; Breakthrough Path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 路径选择*

常 露 露

摘 要: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建设过程中各种差异化因素,特别是“城市偏向”的政策导向因素的积淀,导致我国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供给有很大差距,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发展状态突出。为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要坚持城乡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推进城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41-06 收稿日期:2021-11-09

*基金项目: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河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举措研究”(2020CJJ087)。

作者简介:常露露,女,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助教(郑州 450042)。

一、前言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方略之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为基本目标所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我国要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逐步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水平的差距。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处历史阶段条件的限制,城乡建设过程中各种差异化因素,特别是“城市偏向”的政策导向因素的积淀,导致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供给有很大差距,而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失衡与城乡经济发展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城乡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较大差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深度依旧不够,尤其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住房等方面城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发展状态比较突出。所以,坚持城乡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今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需要,更是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城乡区域公共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中国城乡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及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能有所裨益。

二、城乡公共服务差异化问题剖析

当前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新时代人们的需求,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广度上有所拓展,覆盖面有所扩大,但是在服务的深度上依然不够,城乡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仅从与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险三大方面分析,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问题。

1.教育投入虽然增长快速,但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教育投入差异巨大

从2007年到2020年,我国政府教育支出从7122亿元增长到53033亿元,教育支出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63%增长到4.22%。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在15%上下波动,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支出的比例高于15%。但是综合来说,现阶段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各项投入依然落后于城镇,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离均衡化发展还有一定的距离,城乡在教育资源的投入分配、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是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大。义务教育的主体在农村,我国57%的在校初中生和80%的在校小学生均为农村生源。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相对于城镇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国家在农村的财政投入上明显不足,捉襟见肘的财政投入并不能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二是城乡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差距大。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我国农村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虽然都有很大程度提高,但是农村教育无论在硬件设施上还是软件设施上,都与城市有着较大的差距。在硬件上,农村中小学基础设

施不健全、装备陈旧,缺乏教学辅助设备等基本的教学必需品;在软件上,农村教师工资低、工作生活条件不如城市、教育资源不如城市更新快等。三是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力量差距大。由于受制于发展前景、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因素,农村教师队伍的流动性较强。农村中小学校教师收入水平和工作生活环境与城镇差距较大,造成刚毕业有学历的青年教师大多不愿意到农村任教,再加上已任教的中青年优秀教师外流现象严重,教师稳定性不够,使得农村中小学校教师队伍呈现结构失衡的状态。

2.医疗卫生服务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投入不均衡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过去40多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医疗卫生上的投入远低于世界水平。2019年,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刚刚超过7%,2020年为7.2%。而国际上该数据的平均水平是14%至20%,相当多的国家在20%以上。虽然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建设,但是投入增长缓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当前,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渐向均等化方向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医疗建设、公共卫生、疾病防控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依然很大,城乡基本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不均等、人才资源与卫生资源城乡分布不均匀等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是城乡基本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不平衡。在政府对占总预算10%左右的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中,城乡的投入严重不平衡,城镇在医疗卫生上的财政投入远高于农村。经费不足导致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以正常或有质量地开展公共卫生服务活动。二是从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来看,农村的配置数量都远低于城市的数量。乡村卫生人员的数量少、规模小,同时卫生人才的医疗水平也较为有限,乡镇卫生人员的学历水平大多以大专、中专和高中学历为主,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医护人员凤毛麟角,实用人才招聘难、留不住,再加上农村医生老龄化现象加速,还没有真正形成农村基层适宜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乡村人才

快速补充机制还未形成。

3. 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城乡基本社会保险服务不同步

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险制度上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统筹工作。在覆盖面上,城镇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内的五大社会保险制度和针对不同群体包括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在农村,社会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覆盖面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农村仍然缺失,只有刚刚起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起着非常有限的保障作用。一是城乡基本社会保障范围上下不一。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能够基本覆盖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囊括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领域,而农村居民能够均等地享受到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屈指可数。另外,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廉价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制度以及优抚安置等制度,基本涵盖了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所有项目,广大的农村地区却仍然缺失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保障等许多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到的常见的社会保障及福利项目。二是城乡居民在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上也存在巨大差距。城乡居民在各项社会保障项目的受益数量相差悬殊,城镇居民长期享受着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在内的多种社会保障福利,而农村除新型合作医疗外,就只剩2010年才开始试点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三、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需要关注的三大方面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大、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突出,影响了区域的协调发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扭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发展的局面,需要关注有关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三大方面。

1. 关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根本——公共财政体制机制改革

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整体水平较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财力不足。要

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一是加大财政投入,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于基本公共服务资金短缺的问题,公共财政改革必须加大支出结构的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在新增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加大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减少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充分利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制度,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调整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就业等的财政投入比例,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服务和就业服务等扶持力度。二是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我国各级政府必须依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对财权进行划分。根据基本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服务和就业服务的层次、主体和范围等特点,制定一个科学划分事权的标准,根据标准,清晰明确地划分出各级政府在基本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服务和就业服务供给中的责任和范围,避免地方政府“事多钱少”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局面,确保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形成相对称的局面。三是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国家必须科学化、规范化地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转移支付目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整合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效率;加快推进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进程等。四是建设科学规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融资渠道,创新政府融资模式。充分利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优点,寻找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资金供给上的平衡点,这样既可以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压力,又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种走政府推动和市场参与的多元化道路是我国各级政府融资的有效途径。

2. 关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基础——绩效评估机制与监督管理机制改革

目前,我国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评估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方面均不完善,如评估体系、评估指标和评估标准不健全、不科学,缺乏民意性等问题都有待完善。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提供居民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就要在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和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和监督管理机制。在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成效进行科学的检测和评估,重视绩效评估结果的反馈,引导各种社会组织 and 居民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评估和监管工作,不断纠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不足与偏差,以确保客观地评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水平以及群众参与收益程度上的全面性和适当性。一是健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重视居民的满意标准,尊重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完善科学可行的评估指标。注重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险的绩效评估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二是引导相关社会组织和城乡居民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改变单一的绩效评估现状,构建政府、社会力量、专家学者和居民代表广泛参与的多主体评估体系,实现决策的透明化。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监督管理机制,采用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条例或办法,制定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治懒模式。三是依靠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公众、行业协会的力量,相互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全方位地监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的服务进程。通过合力监督,全方位引导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公正科学的供给。

3.关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通道——农村居民需求表达环境的营造

在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居民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主体,是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的最终评判者。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权利,改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完善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倡导农民在需求表达方面的组织化,提高参与意愿,形成农民积极参与、勇于表达和乐于表达的氛围,营造良好的农民需求表达环境。一是加强对县乡人大代表和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同时乡镇政府要逐渐放权给村民委员会,增强农村委员会的自治能力和村民自治能力,不断扩大村委会的自治权力,提高村民自治的效率。二是建立农民需求偏好表达机制,如在乡镇政府中建立民意收集部门和需求整合部门,在农村建立村民需求表达小组等;同时深入基层,

积极走访农民群众,加大调研频率,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把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经过收集和整合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决策。三是农民能够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决策,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优化信访考核制度,积极认真及时地接待信访人员,处理信访事件。四是积极扩展农民多样化的需求表达渠道。如可以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引导新闻媒体对农村农民进行调查采访,深入基层,了解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通过利用新闻传媒的时效快、传播性强和受众多样化的优势,及时反映和表达农民的需求意愿,做农民需求意愿的代言人。

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完善、复合供给机制的健全以及公众参与机制与绩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等方面为出发点,对完善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

逐步建立公共服务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推进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公共体制改革,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公共服务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尴尬境地。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最大的弊病在于“分了钱,没分权”。2018年2月8日,国务院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涉及人民基本生活的公共服务分为8大类18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以此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范围,相应的支出责任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具体比例因各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分档进行,不搞“一刀切”。这次调整是基于原有分税制改革框架,更倾向于集权而非分权,严格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事权划分改革以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为前提,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的主要依据,在相应的财政支付手段的支

持下,努力弥补上下级之间的财政缺口,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顺利进行,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2.构建多方积极参与的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

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政府全面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公众的需求。因此,必须拓宽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供给机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市场及社会供给公共服务的作用,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一是构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合作机制。不断调整政府职能和相关结构,构建有限但有效的政府,为市场及社会的参与创造广阔的空间。在职能结构上,优化职能结构设计,逐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合作网络,在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本之间形成长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灵活运用市场和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专业管理的优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二是采取多种方式供给公共服务。政府应积极利用现代科技的先进成果,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如推进电子政务,创建政府与公众互动的网络平台,公开信息和相关程序。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引导公共服务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如推进公共服务进社区,在各个社区设立公共服务站,直接倾听百姓的问题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三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监管机制和问责机制。不断加强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鼓励市场和社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健全公共服务领域相关问责机制,将绩效考核的结果作为主要的问责依据,倒逼公共服务责任的落实。

3.以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要深入认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对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以强化,充分认识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不断加强政府部门的管理,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将为百姓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一是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公职人员的专业素养。鼓励公职人员深入群众,听取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创新

工作方式,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二是确立民主行政的理念,树立“公民本位”的服务思想,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明确将公共服务界定为民生性服务、公益性服务、基础性服务和主体性服务,并将前两类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建立政府与公民沟通对话的机制,实施有效的政府与公众沟通对话机制,积极扩大听证会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等,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对话搭建各种平台。通过良好的沟通对话,政府可以充分了解公民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满意程度等。在尊重公民意愿的基础上,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全体公民的需求。

4.建立城乡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平台机制

城乡居民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为了实现我国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必须重视城乡居民的参与行为,关注城乡居民的实际需要。一是积极拓宽城乡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渠道。城乡居民是公共服务的最终受益人,城乡居民广泛参与到公共服务的相关决策中,可以大大减少传统官本位思想下政府决定一切和精英偏好主导政策走向的现象,使城乡居民的需求和偏好成为政策的核心。政府必须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公开信息,努力确保城乡居民的话语权,加强政府与城乡居民之间的对话沟通与良性互动,从源头上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科学性。二是重点关注农村地区与特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为了让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必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着重关注农村落后地区和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投入,努力缩小公共服务的不平衡。三是加大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力度。目前我国公共服务绩效考核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城乡居民未能有效参与其中。未来应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考核的比重。以服务对象的评价结果为主可以更加直接客观地反映公共服务的效率,更有助于提升城乡居民的参与度,提高城乡居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四是努力培植城乡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公共精神。政府在不断拓宽城乡居民表达参与机制的同时,应采取适当的方法,促进城乡居民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树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权利意识、合作意识、参与意识与表达意识,不

断将公共精神嵌入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敢于说出自身的需求,敢于提出意见与建议,在与政府良性的互动沟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供需均衡。

5. 建立和完善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考核指标体系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是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建立的前提,对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有着监管作用。我国在评估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工作绩效时,主要是由上级部门进行评估,偏重于政府的经济建设方面,而缺乏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相关指标的评估,而且在评估的过程中对公民的评价重视程度欠缺。以公民满意度为主要指标,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对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非常有意义。要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各项考核标准,制定考评指标体系。一是制定科学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出台全国性和地方性专门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包括人员、财力等各项标准。在全国标准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确定科学的服务标准,并配备科学的技术支撑。二是注重和谐和民生指标,并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持续绩效评估导向,要以包含效率、效果、质量、公平、责任等的综合原则选择要评价的要素,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相适应。三是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

向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如将入学率、失学率、新农合与养老保险覆盖率、失业率等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中,并与领导干部的职位晋升等相结合,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视。四是深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绩效评估向着长期、规范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缺乏相应的绩效评估机制,导致公共服务的提供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将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健全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在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基础上,使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彭迪云,王玉洁,陶艳萍.中国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度与对策建议[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
- [2]李军鹏.新时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与对策[J].新视野,2019(6).
- [3]梁波.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举措[J].理论探讨,2018(4).
- [4]尚虎平,石梦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业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奠基探析[J].理论探讨,2021(6).
- [5]张剑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5).
- [6]钱雪亚,胡琼,宋文娟.农民工享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J].调研世界,2021(5).

Path Selection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hang Lulu

Abstract: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achiev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we need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system for provi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asic and comprehensive people's livelihood to ensure the basic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various differentiation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city bias", there is a big gap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is prominent. In order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reform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s, increase financial inpu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achieve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协调发展】

高水平开放助力后发展地区“四化”同步的思考*

戴翔 申代润 莹 占丽

摘要:推动中西部等后发展地区“四化”同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全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和背景下,“四化”同步中每一“化”实际上都离不开国际化,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助力”。无论是从经济全球化正在向制度型开放等为主的转型发展趋势看,还是从后发展地区的成长空间看,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助力“四化”同步,后发展地区均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为了抓住新机遇,后发展地区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以及采取有效的对策举措。

关键词:高水平开放;后发展地区;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47-06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研究”(21FKSB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嵌入双重价值链的动力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21CJL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产权贸易促进国内国际循环有效联动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政策研究”(21BJL10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江苏跨境电商价值链升级机制和路径研究”(2020SJA0902)。

作者简介:戴翔,男,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1815)。

申代润,女,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南京 211815)。

占丽,女,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副教授(无锡 214064)。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要求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四化”同步发展。根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中国长期存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推进现代化是要解决新起点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表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力点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对而言,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小、进度快,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

实现现代化的难度相对大,进度也慢。毋庸置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所要开启的现代化应该是全域现代化,而不是较小空间尺度意义上的局部地区现代化。因此,如何推动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四化”同步,以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对全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理论和实践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后发展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具备的后发优势

近年来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表现出很大的增长潜力和增长能力。

此外,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基本内涵来看,虽然前期发展的基础有一定影响,却不足以成为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根本性制约,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可能由此开启的新起点以及高水平开放的新模式,能够为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在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方面“出类拔萃”开新局,提供新机遇。

一方面,总体规模有限意味着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即发展潜力较大;另一方面,在具有较大上升空间的条件下,具有提升的能力可能更为重要,而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近年的发展则显示出其提升能力。根据中国历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测算2002—2020年全国及中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所得具体结果绘制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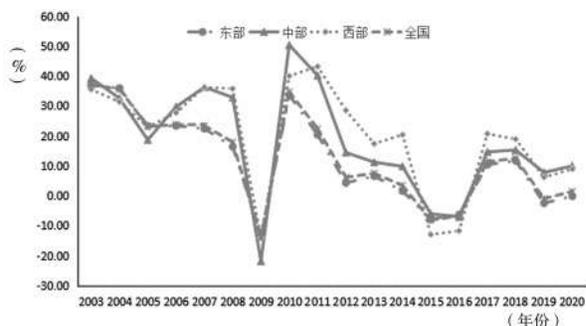


图1 2002—2020年全国及中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

从中不难发现,自2010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并显著高于东部地区。2002—2020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11.83%,而同期发展相对滞后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77%和18.34%,分别高出全国约4.94个百分点和6.49个百分点。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为-0.15%,出现了负增长,而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均出现了正增长,分别为9.98%和8.97%。这种变化其实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和预期。东部地区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足够大了,虽然增速仍然可观,但是与体量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发展地区相比,明显要低了许多。换言之,巨大的增长空间和逐步形成的增长能力,将成为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优势和重要机遇。

从进出口额角度看是如此,从利用外资角度看情况也大体如此。根据中国历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进一步测算2002—2020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利

用外资额年均增长率,结果显示,此间全国年均增长率为10.97%、东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9.73%、中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15.92%、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14.17%。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分别高出6.18个百分点和4.44个百分点。利用外资增速的变化同样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和预期。东部利用外资的体量和规模全国最大,但在年均增速上已经趋于收敛,与体量和规模相对较小的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要低了许多。与之相比,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的空间巨大,增长的速度可观。换言之,作为发展开放型经济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的利用外资,其巨大的增长空间和逐步形成的增长能力,同样将成为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优势和重要机遇。

新阶段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能够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不仅来自于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增长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对试图融入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其所具备的现实条件要求与以往相比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内容、发展模式和推进路径的前一轮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中,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害禀赋优势。更确切地说,将价值链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利用,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逻辑。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所依赖的关键要素则是“制度质量”。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被确立为“四化”同步集成改革先行区,无论是从动力和压力角度看,都有理由有责任“先行”,即被确立为“四化”同步集成改革先行区,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后发地区的优势。

二、“四化”同步下后发展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思路

如同“四化”同步并非意味着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实现“齐步走”,而是需要有重点和突破口一样,实施高水平开放虽然包括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三个维度,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有重点和突破口。相对而言,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相

对容易做到,而更深层次的开放则相对较难。况且,能否实现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实施了更深层次开放。基于前述分析,如果没有更深层次开放,就难以把握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条件下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就无法对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形成吸引和集聚作用,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愿意实施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但如果没有实施制度型开放,那么从结果上看,却极有可能无法实现真正的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对外开放。所以,实施更高水平开放,需要以实施更深层次开放为重点和突破口,而其他两个维度的开放,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演进新趋势与地区实施正确开放发展战略相契合的结果。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和突破口,如果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据此能够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场、集聚地以及流动的中心枢纽,就能顺利实现“四化”同步。

当然,强调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和突破口,并非意味着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就不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好做足功课。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也并非意味着我们只强调“对外开放”。实际上,开放发展本来就包括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两个方面,只不过在不同阶段二者的表现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不同而已。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发展环境、条件和阶段,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实际上就更加注重畅通国内大循环在重塑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助力“四化”同步,也要积极抓住国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重要机遇,积极融入和参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更宽视野、更大格局来理解实施更高水平开放问题,据此做出适当的战略调整并采取有效的对策举措。

1.在开放模式上,要注重从以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战略转型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而

言,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未能很好抓住机遇获得开放型经济的巨大发展。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度演进。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必须把握好这一机遇。不能继续走以往开放发展的传统老路,而是要紧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及时转向制度型开放。所谓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一种“境内开放”,最根本的要求就是着眼于规则制度层面,促进区域内规则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相衔接,体现监管一致性。因此,在地区层面能够先试先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只要有助于满足跨国公司统筹全球价值链、整合和利用全球要素“无缝对接”的需求升级,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自主地改。这就要求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在自主或者能够争取到的权限范围内,加快并以更大力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这既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也是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必由之路。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离不开对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高质量外资的利用,在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更需要给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促进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这就要求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在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必须着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尤其是需要对标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在营商环境方面进一步进行规制变革和制度优化。这不仅是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和创新生产要素的依托所在,也是激活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机制所在,更是发挥创新性生产要素的潜在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四化”同步。

2.在要素集聚上,要注重实现从一般要素向创新要素的战略转型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并非意味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再重要,只是旨在强调开放模式和开放方略的转变和调整。商品和要素流动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

要内容和基础所在。就上述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仍然服务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确切地说,是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型升级的需要。从以往吸引和集聚一般性生产要素,向吸引和集聚高端和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转型升级。吸引、集聚和利用全球生产要素,调整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基于适应特定发展阶段所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积极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并逐步完善外资政策体系,在扩大开放领域和吸引外资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可以说,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利用外资显然不是简单的资金跨国流动,而是以此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包括技术、管理、营销等狭义和广义层面的各种生产要素。前一轮开放发展中,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对全球要素分工演进中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不断增强带来的战略机遇把握不够,虽然吸引和集聚了部分外资,利用了全球资源发展开放型经济,但明显相对滞后。当前,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需要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在以利用外资等为表现的吸引和集聚全球生产要素角度看,在引进和集聚战略上显然需要从一般要素向创新要素的转变。应该说,这种战略转变需要具备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集成改革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外资为纽带而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实现从以往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乃至招商引智等转型。这是后发展地区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据此引领“四化”同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3.在开放路径上,要注重从以往简单承接产业国际和区域梯度转移,直接迈向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开放战略转型

以往苏南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不可否认,正是在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国际梯度转移背景下,正确地把握了发展机遇,成为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承接地。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正如前述分析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特点和新变化,抓住新一轮

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战略机遇,把握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战略机遇,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绝不可模仿以往苏南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老路。我们不能把别人淘汰的、落后的、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可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恶劣影响的产业和项目引进过来。此类项目从短期看,虽然能够拉动GDP增长,但与我们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并且从长期看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可能更高。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由此形成的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将与以往大不相同,由此产业组织形态和全球布局将不再是简单的国际梯度转移问题,即便是欠发达地区也完全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直接从最先进最高端的技术入手,发展高端产业,形成区域间更为合理的分工体系和协作关系,包括联动创新的发展方式。这才是新形势和新阶段,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根本要义所在,也是实现以高水平开放引领“四化”同步的根本路径。

4.在政策设计上,要注重从以往各部门的“政策碎片化”向“政策集成”的战略方向转型

以往的改革和政策设计,存在着“管中窥豹”的局限和不足,改革政策的碎片化和零散化等问题较为突出,导致改革的整体效益难以充分释放和发挥。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致使改革的成效难以有效发挥,大打折扣,甚至由于互相矛盾而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在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阶段,实现“四化”同步至关重要。而“四化”同步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加快推进各领域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人才体制、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和政策设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改革和政策举措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和政策举措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和政策举措的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之间的改革和政策举措相互不配套,甚至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实施高水平开放所需要的各种实际政策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也将大打折扣。比如,科技创新涉及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学校、企业、人才等,这里面的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四化”同步本身就是涵盖所有领域的宏观问题、制度型开放是涉及所有领域的协同关系。因此,未来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基于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现实需要,在制度型开放的各种改革和政策举措方面要做到“系统集成”,即对各领域改革模块和政策体系的“系统集成”。这就需要用习近平强调的系统思维来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和政策措施更多体现为“单兵突进”的话,那么当前进入“攻坚期”的改革必须要“联合作战”。

三、“四化”同步下后发展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对策举措

在具体的对策举措上,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通过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助力“四化”同步集成改革,要努力在如下几个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

1. 积极推动开放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建设

当前,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平台经济的新阶段,“四化”同步离不开平台载体,集成改革需要依托平台载体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和完成。从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角度看,急需搭建有效的平台载体,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高层次平台。比如科技创新平台的搭建、园区平台的建设等。目前,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科创平台总数偏低、开发区和园区的规模总量不高。而考虑到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自身科研院所的相对缺乏、研究型大学的缺失以及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尚且不够,因此,在科创平台的搭建上,需要以更宽视野、更大格局寻求思路和对策。可以加强与知名高校、产业研究院、各类研发中心等直接开展合作,将各类研发中心和科技创新活动引入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可以组织各类企业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孵化平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为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四化”同步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和产业支撑。在园区平台建设上,除继续依托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以大项目和高端项目为载体吸引和集聚先进要素外,可以继续强化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园区共建和联动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做强、做大、做优园区平台。可以考虑通过GDP、税收等方面的分享制度安

排,鼓励和吸引更多的“飞地经济”在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落地生根,以“飞地经济”的形式探索园区共建,将发展“飞地经济”的项目和产业来源瞄准全国乃至放眼全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依托“飞地经济”拓展利用外资新模式,让国外的产业和项目能够直接落地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

2. 积极组建专门招商队伍和完善招商机制

通过集成改革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导致优质和高端生产要素的流入。因为营商环境可能非常优越、制度质量可能非常完善,但是外部企业和人才等不一定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政策信息。尤其是在各地区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中,就更加需要我们及时总结和宣传改革开放的做法和经验,向可能入驻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或者来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创业的各类人才,精准推送各类优惠政策性信息,构建“面对面”政企沟通渠道。尤其是需要在构建制度型开放高地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和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项目。为此,需要推进招商机构改革,需要打破以往招商主要由政府部门担当的传统模式,考虑探索投资促进由专业化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模式,创新考核激励机制,培育专业化国际化的投资促进和企业服务队伍,加快走出去步伐,实现外资招商新突破。

3.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开放战略转型,对中国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整个江苏都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点。从这一意义上看,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理应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当然,更重要的是,把握因此而带来的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机遇。这种战略机遇不仅表现为对外合作方面,同时也表现为对内畅通方面,从而有助于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比如在对外合作方面,可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企业与相关国家机构合作,参与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合作区等,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创新合作,促进国内外技术、产业、人才资本对接,提升本土企业创新能力,拓展海外项目市场空间。在对内畅通方面,“一带一路”交汇点要想真正发挥

支撑作用,必须与沿江、沿大运河、沿淮河流域真正联通起来。而沿大运河区域对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实现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互联互通”,并借助这一机遇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4.积极对接其他国家战略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于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分工、项目合作、人才和要素流动、打破区际间的行政壁垒等,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为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带来的重要的发展机遇。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总体规模和体量偏小是其面临的主要劣势。实际上,没有足够的体量和规模支撑,一些开放平台和基础设施的构建都会面临着很大的制约。从这一意义上看,单靠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自身的体量规模目前还尚不足以形成有效支撑。借助于诸如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建设这一更大的平台,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分析和把握机遇,找准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在对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通过开展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整合和利用更广领域内的资源和要素,不断扩大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间商品和要素的流动量,从而可以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好的、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5.积极以跨境电商为抓手发展外贸新业态

未来,伴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外贸发展新业态的跨境电商,将会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点的重要一极。从对外部贡献来看,挖掘外贸增长潜力,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需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从对自身发展的意义来看,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同样需要抓住外贸新业态演变发展态势带来的机遇,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大企业、平台培育力度,通过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参考文献

- [1]戴翔.要素分工新发展与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战略调整[J].经济学家,2019(5).
- [2]郭克莎,杨阔.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J].经济研究,2017,52(10).
- [3]洪银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功能研究[J].求是学刊,2019,46(2).
- [4]洪银兴.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视角——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55(2).
- [5]徐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25(12).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with High-Level Opening Up

Dai Xiang Shen Dairunying Zhan Li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to be initiated on the basi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hould be global modernization, not localized reg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sense of a smaller spatial scale, that i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ust be achieved, and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must be fully modernized.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such a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Under the conditions and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ach of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s actually inseparable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eeds to be “assisted” by opening up at a higher level. Whether i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rends such as the transition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institutional opening, or from the growth space of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er levels of opening up helps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are all facing important challenges.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 order to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post-development regions must make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adjustments and tak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High-Level Opening; Post-Development Areas;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平 萍)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综述

颜银根 冀宇星 张森

摘要:在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区域要素高质量发展、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方向。

关键词: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重大战略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53-04 **收稿日期:**2022-01-15

作者简介:颜银根,男,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南京 211815)。

冀宇星,女,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南京 211815)。

张森,男,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南京 211815)。

2021年12月11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南京审计大学主办,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和南京审计大学经济监督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与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办的“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顺利召开。本次年会收到论文100多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50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本次年会主题为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设立主题报告、分论坛和专题论坛三个板块,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本次年会吸引了中国区域经济学领域的众多学者参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等学者应邀先后在大会主题报告环节发言。此外,共有40多位学者在分论坛和专题论坛报

告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王燕梅研究员和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社长任晓莉研究员对期刊的选题与写作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与指导。

一、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主要是解决量的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则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征程,需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经济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是区域经济研究的起点,也是长期困扰专家学者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大道研究员,在《关于区域的差异性与区域的相互依赖性》的报告中对地区性的发展、结构和优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陆大道研究员指出,地区性的经济发

展有其客观的规律、秩序和态势,区域经济是无数个个体行动的结果。区域经济的规律受到自然的影响,但学者对于自然因素的关注是不够的。从稳定性而言,区域经济是不稳定,内部系统在不断变化;从机制变化来看,区域经济系统变化的机制是非决定性、忽然性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格局很难改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重点推动东中西部地区的联动发展。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南北方地区的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安虎森教授在《中国南北差距之主要原因分析》的报告中,将研究的视角从中国东西部地区转向南北方地区,着重关注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的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安虎森教授指出,从2008年开始尤其是2013年以后,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显现。2013—2020年,北方地区平均名义GDP增速为6.3%,而南方地区为平均名义GDP增速8.7%。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新差异出现的重要原因,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向南方地区转移促进了南方地区企业的创新性活动,进而推动南方地区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出现了差异。国家应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北方地区投资效率,加快北方地区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北方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进而缩小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针对“十四五”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学会顾问范恒山教授在《“十四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把握的几个重点》的报告中提出了七个工作重点,包括通过提供政策支持泥沼地区经济发展、强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安排解决相对贫困和贫富差距、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省级交界地区与行政板块联动、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和扶持带动作用、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和小空间治理的有机结合、分主要发展目标和次级目标实现区域重大战略衔接协调融合以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区域发展的协调。

二、中国区域要素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全国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以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研究员在《中国不同地区工业发展及要素供给比较》的报告中对要素供给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工业能够带动地区发展和缓冲疫情冲击,成为中国赶超其他国家的重要途径,其中要素供给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要素供给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领先、中西部地区波动性上升的状态,中国制造业由于生产要素的扭曲导致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缺口大致为12%。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重工业占比较大,资本过度配置的情况较为严重;东中部地区尤其是江苏等省份资本产出弹性显著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资本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约束较强。

人口的空间流动,影响到要素在空间的分布,从而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在《人口外流、经济增长与南北差距》的报告中指出,2010—2020年,中国有6个北方省份人口出现了减少,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外流最为严重。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是导致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产业支撑缺乏及就业岗位不足导致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后。东北地区人均GDP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和边境三类地区尤为明显,深层次原因是环境体制机制和结构障碍导致东北地区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缺乏。政府应加大对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从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如果说人口流失关注的是人口流失的数量,那么人才的流失关注的则是人口流失的质量,更加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沈体雁教授在《区域协调发展的人才战略》的报告中着重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人才战略,发现人才驱动方式从之前的人口驱动方式转变为人才驱动方式。2000—2015年人口流动数据显示,中国的人才分布与迁移出现了高度聚集的现象且两

者分布极度重合,但这一现象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聚集城市的生活成本增高逐渐出现轻微分散现象。国家和地区不再一味追求人口红利、中国制造、招商引资、硬件建设,而是注重人才红利、中国创造、招才引智和软件建设。中国正由投资驱动型经济转为人才驱动型经济,由资源密集型经济转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由面向国内人才市场资源转为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

三、中国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國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和国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原部长李善同研究员在《投入产出视角下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的报告中使用投入产出表和边界效应的方法测算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系统分析了中國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从对外依存度可以看出,中国部分资源型行业对国外的依赖程度较高,而技术密集型的部分行业仍然处于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的加工贸易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开采利用效率较低以及国内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创新力度不够。在“一带一路”重塑国内贸易格局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传统贸易形式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省际贸易壁垒正在发生变化。

区域产业的发展与地区生态水平息息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如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相结合,注重地区生态发展问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传清教授在《长江经济带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中系统介绍了生态产品价值的衡量及长江经济带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的先行示范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义不容辞。2018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建立了相关制度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探索了市场化开发经营路径,构建了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为实现生态产品价

值做出了贡献。

产业的增长具有内生的动力,但生态的保护却需要外生驱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研究员在《推动产业链金融链数据链协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报告中将区域性生态产品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分为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俱乐部产品、私人产品四类产品,并认为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考虑是否促成交易行为、是否满足人类需求、是否有人的参与、是否具有可衡量性及不同生态产品交易类型是否分类施策等五个方面。从产业链、金融链和数据链出发探讨区域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框架,考虑消费的边际成本是否为零以及是否排除不支付价格群体的消费,系统介绍了不同类型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依据国内外生态修复经典案例,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域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模式分为:“政府制定规则—多主体供给—政府购买—政府监管”“政府制定规则—初期政府供给—市场买卖—政府监管”“政府授权—市场运作—政府监管”和“市场供给—市场购买—政府监管”四种路径。

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正成为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和特色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任务。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颜银根教授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与破解》的报告中指出,除户籍制度外,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也是引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农村土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拉力”,城市房价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推力”,户籍制度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反而并没有那么明显。中国的农业人口转移经历了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就业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落户两个阶段,这是中国农业转移人口人户分离的根本原因。在这两个阶段中,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所产生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政府在推进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的同时,需要关注农村土地和城市住房问题,同

时注重不同群体的异质性,更好地促进农民转移人口市民化。

随着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正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覃成林教授在《长江经济带多级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分析》的报告中聚焦长江经济带多级网络空间发展格局,指出长江经济带存在长三角增长极、长江中游增长极与成渝增长极三大增长极,包括以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为核心的“五核心”长三角增长极、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三核心”长江中游增长极和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双核心”成渝增长极。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空间经济网络密度增长49倍、网络连通度提高18倍,各增长极之间的联系强度上升40倍,长江经济带空间经济网络对增长极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增强趋势,而增长极对空间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出台长江中游地区发展战略,有助于推动长江中游地区发展。

五、结语

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经典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新时代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力求要素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解决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区

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在《推动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要重视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从区域政策目标设定、实施机制和效果等方面对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诠释。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经历了均衡发展战略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来到了新时代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当前区域政策主要追求区域发展均衡或者优化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两大目标,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需要合理兼顾两个目标,促使区域间发展差距减少的同时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推动集聚经济、建立增长极与高质量增长引擎,推动形成区域城市节点产业链、创新链与区域链,提升区域重大战略的效果。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应该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重庆工商大学原校长杨继瑞教授在《区域“缩差共富”思考及路径抉择》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共同富裕主要分为起步、攻坚、小康、深化和最终实现五个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小康阶段向深化阶段的跨步时期,减少区域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刻不容缓。以四川为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八条路径包括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约束力、充分发挥发达城市强辐射作用、发挥区域中间地带城市群的资源优势和绿色优势助推县域经济发展、构建产业链、供应链机制、构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合作创新的平台、构建招商引资的异地流转、促进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构建区域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对口协调机制等。

The Review of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2021

Yan Yingen Ji Yuxing Zhang Sen

Abstract: In the 20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bout high 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discussed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lement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depth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reflected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Major Strategy

(责任编辑:张子)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李曦辉 陈温都苏 杨新文

摘要:2021年12月4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线上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以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重点,同时涉及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解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行动建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思考等热点问题,为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2-0157-04 **收稿日期:**2022-01-17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陈温都苏,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081)。

杨新文,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081)。

2021年12月4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线上主题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办,吉首大学商学院、“民族地区绿色减贫与发展”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湖南省普通高校2011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地区扶贫与发展湖南省专业特色智库承办,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协办,11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会议围绕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丁赛研究员做了题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机遇》的报告。她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关键,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上有着地区差异,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着重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她认为,国家支持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同时民族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上也面临着如下挑战: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民族地区是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她进一步指出,民族地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六个方面,一是筑牢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二是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与规模;三是处理好民族地区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关系;四是大力发展教育,以吸引人才和增强人才流动;五是做好生态保护,发展生态经济;六是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教授做了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维度研究》的报告。他从党

和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阐述出发,回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精准扶贫、扶持较少民族发展、对口支援五项伟大实践,成效显著,意义非凡。同时,他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原因,并在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树立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及推广国家通用文字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内蒙古财经大学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陶克涛教授做了题为《党的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经济政策:百年演进逻辑与重大实践价值》的报告。他分析了党的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经济政策百年演进逻辑,并总结出八点重大实践价值,一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经济基础;二是为世界各国治理民族问题和脱贫致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三是为构建党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引领了理论方向;四是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科技开启了财富源泉;五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靓丽身份;六是少数民族数字经济发展阻断了迭代鸿沟;七是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经济桥梁;八是为新时代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理念。

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学视角下的西部地区发展新格局》的报告。他认为,“三新一高”为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而西方经济学无法解决新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具有中华文明独具的发展理念,无法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西部地区发展应以经世济民的中国经济学为指导,形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前提,以地区经济自循环为基础,以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以参与并引领周边国家共同循环为补充,为共享发展、共同富裕起示范和带头作用的新发展格局。

二、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解析

中央财经大学戴宏伟教授做了题为《新型城镇化与民族地区新发展格局》的报告。他指出,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是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和面向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他在探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分享美国经验,指出民族地区发展特色旅游业虽具有发展现代深层次旅游业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旅游内容较为单一、旅游开发缺乏长远规划、缺乏旅游品牌意识以及服务意识与水平不到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民族地区发展特色旅游业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一是把自驾游作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探险等深层次旅游形态;二是树立“大旅游”的观念,筑牢大局意识,加强旅游属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三是完善旅游地区交通、生活配套等硬件建设和服务理念、饮食安全等软件建设;四是加强旅游立法、执法及监督,认真处理对个别地区旅游业的不满和投诉;五是借鉴美国等国的经验,对个别民族地区进行特殊旅游项目扶贫。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狄方耀教授做了题为《数字经济视域下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的报告。他探讨了数字经济在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内在作用机理,并提出了三点路径思考,一是推动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化机制创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机制,着力培养数字化人才;二是推动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机制创新,积极借助数字技术等成果进行创新,并推动旅游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推动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机制创新,注重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利副教授做了题为《黔东南苗族传统工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的报告。她提出发展民族地区传统工艺是推动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黔东南苗族传统工艺代表了中国苗族传统工艺的领先水平,她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传统工艺的优劣势分析,提出了两大发展路径,一是守正,即传统工艺要坚持发扬地域文化特色和精湛的手工技艺,在工艺质量上进行深挖掘;二是创新,即主要从人才培养、产业合作和知识产权利用方面进行创新。

三、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慧教授做了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空间布局研究》的报告。她

基于PSM-DID模型实证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提升了新疆GDP总量和竞争力综合绩效指数,并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空间布局总体向好,但区域内差异依然明显。她通过刻画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向东层面、向西层面和疆内的经济发展及空间格局演变,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三点发展思路:一是在向东层面上,重点围绕北京、山东、河北等10个省(区、市)的核心层级加强经济联系;二是在向西层面上,核心区应当形成以新疆为核心,向西、向西北、向西南方向辐射的“圈射”开放格局;三是在疆内层面上,推动构建核心区“一心两带三廊三轴多支点”的空间布局和“双核八廊”的商贸物流中心空间布局,基于核心区资源禀赋和能源、资源地缘优势,把新疆打造成中国电力供应基地、油气生产基地和陆上能源安全通道。

云南大学的马子红教授做了题为《RECP下的服务贸易、新格局的理论逻辑》的报告。他基于RCEP签署的政策红利背景下,利用TC指数和RCA指数对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综合对比,指出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明显弱于东盟,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他认为,增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构建区域价值链,发挥经济贸易的规模优势,夯实服务贸易发展之基,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优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发展特色服务贸易。

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段秀芳教授做了题为《新疆沿边开放30年绩效评价》的报告。她在对新疆沿边开放与主要沿边省(区)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新疆沿边开放30年绩效评价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四点对策建议,一是对新疆沿边的开发区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建设,以促进南北疆地区的经济开放和均衡发展;二是通过资本和教育的开放带动新疆的科技发展;三是通过文旅结合扩大新疆文化开放的维度;四是落实绿色发展,提高新疆的资源环境绩效。

四、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行动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文斌研究员做了题为《“武陵人”开放共建新时代“桃花源”——人力资源高素质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点思考》的报告。他以“桃花源”变成14个集中连片

的扶贫攻坚区为切入口,指出武陵山区要坚持人力资源高素质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开放共建新时代“桃花源”。他援引职场灵性提出武陵山片区具有区域灵性,并指出通过开发区域灵性、打造区域品牌、依靠适宜的区域人力资源发展武陵山片区。同时,他认为靠山吃山、用山养山,新时代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桃花源”要依靠教育、适宜人才以及“干中学、行动中提升”三条路径发展起来。

吉首大学商学院丁建军院长做了题为《脱贫成效、转型比较与乡村振兴展望: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与区域发展十年总结》的报告。他对连片特困区十年的脱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他从脱贫成效、转型比较和乡村振兴角度,用数据肯定了连片特困区在十年的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连片特困区的乡村发展要建立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加速乡村重构、乡村重构推动乡村转型、乡村转型支撑乡村振兴的系统工程。同时,他认为连片特困区乡村振兴存在“人”“业”“地”转型困境,要坚持增强人力资本积累、优化产业结构、协同人与自然关系、优化公共文化服务、重视精英带动,推动连片特困区乡村振兴。

延安大学徐宁老师做了题为《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美丽西藏特色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思考》的报告。他以西藏地区建设边境小康村的数据为例,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建设特色边境小康村的优势与制约性因素。他认为,西藏建设美丽西藏特色边境小康村具有政治优势、基础组织优势和政策优势,但存在基础设施薄弱、远离经济腹地等制约性因素。同时,他认为,建设边境小康村要正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与边境城镇化、生态保护与兴边富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全面小康与个人富裕等五对关系。

五、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孙久文教授做了题为《新时代兴边富民的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的报告。他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边富民行动下的沿边地区9个省(区)的经济规模变化,并指出脱贫攻坚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

在边疆地区形成的战略融合点有助于实现兴边富民行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标。他通过对“十四五”规划的总结,归纳了如下四条新时期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路径,一是以扶贫开发为主线促进边疆地区发展;二是以提升边疆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为目标促进边疆地区发展;三是发挥边疆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加快边疆地区产业的发展;四是民族团结为基础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全面发展。同时,他就新时代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一是注重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避免兴边富民行动成为单纯的社会福利政策;二是政府和市场的的作用并重,积极有为地改善边疆地区的发展环境;三是发挥沿边节点城市的增长极作用,提高边疆地区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四是促进兴边富民行动与国家其他战略的协调配合;五是注重调节边疆地区的贫富差距。

西藏大学图登克珠教授做了题为《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智库建设建议》的报告。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凸显以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背景,指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经济发展,建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高端智库的必要性。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李彦军教授做了题为《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的价值评估》的报告。他在对民族地区“绿水青山”价值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一是增加民族地区科技资金投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增加“绿水青山”的单位价值量;二是积极探索“两山”的有效转化形式,突出非

实物服务价值转化的重要地位;三是积极开展生态恢复和裸地整治工作,推动民族地区低价值土地向价值量高的类型转化;四是关注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民族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防止植被及生态功能退化;五是继续完善水利设施,推广节水农业,优化种植作物类型,减少水资源负债,提高农业生产中自然降水和灌溉用水的利用率。

江苏大学孙华平教授做了题为《民族地区的“碳中和”与绿色转型》的报告。他从市场和效率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各省(区、市)的电力系统碳排放水平和三大区域电力系统碳排放效率,指出走节能减排的低碳发展道路是中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世界各国正将“碳中和”目标转化为国家战略。同时,他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要统筹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利用“1+N”政策方案,先立再破,实现双碳目标和区域发展。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郭殿东老师做了题为《坚持持续创新驱动模式发展下的企业战略》的报告。他通过分享对中国芯片短缺问题的有关思考,强调了自主基础创新问题需要上升到企业战略,并依靠持续发展模式解决,进而提出了坚持持续创新驱动模式发展下的企业战略的三点看法,一是突破定式,改变逻辑,即对传统的创新逻辑进行重新构建,从盈利模式、产品到最终的客户交互实现颠覆性的改变;二是完善学术型企业家培育机制,推动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驱动机制和动机认识模式的构建;三是打造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价值共享。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i Xihui Chen Wendusu Yang Xinwen

Abstract: On December 4, 2021, the 20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online symposium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re held in Beijing. This seminar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nvolves hot issues such a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c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conom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张子)